
葉聖陶集

074023



200253233

葉聖陶集

第五卷

- 脚步集
- 未厌居习作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叶圣陶集

第五卷

叶至善　叶至美　叶至诚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625　插页9　字数299,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平装4,000册，精装3,000册）

ISBN 7—5343—0465—2

I·25　　定价：平装5.85元
　　　　　　　精装7.85元

责任编辑　缪詠禾　常烽岚



作者与朱自清先生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摄于杭州。



公理日報

公理日報

五卅运动期间的《公理日报》



蘇州評論

蘇州評論

蘇州評論

作者和朋友们在一九二六年创办的《苏州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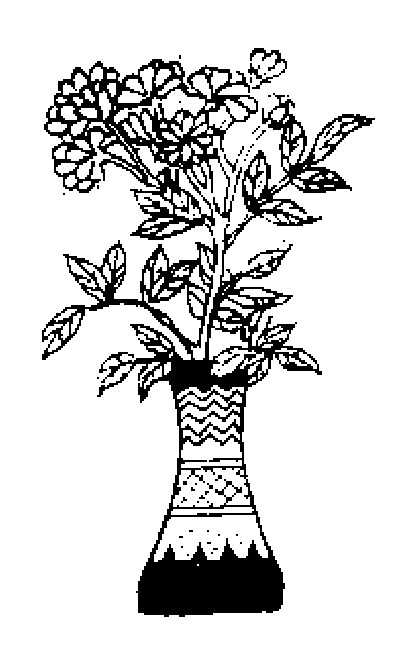


作者摄于一九三二年春。

目　　录

脚步集

未厌居习作



脚步集

女子人格问题

人类历史上种种事实，脱不了时间空间互为因果的关系，从来没有突然出现、无始无终的事实。但是事实并不一定就是真理所在。能够参透其中的因果，作理性评判的人，就走上了进化的轨道。如果弄错了，迷信历史事实就是真理，“泥古不化”，就不免自绝于进化之路了。

我国人民偏富有惰性，对于历史事实的观念偏走了“自绝于进化”一途。他们推究事理有个妙不可言的方法，说道“自古如是，当然如是。”承认那历代相传的世故，就是上下古今不可更改的真理。我今日提出这个“女子人格问题”，他们还未必承认这是一个问题，有成立的价值。他们必将说道：“女子有没有人格，不必讨论，但看历史的事实便可知道。历史上早已解决了。”果真如此，我也不必同他们讲话了。但是我对于这个问题，平日很有些想法；近来读了几位先觉的言论，又很有些感触：不写出来，心上很不舒服。所以我就随手写成了这一篇文字。

我今讨论这个问题，请先将“人格”两字下个定义：“人格是个人在大群里头应具的一种精神”；换句话说，就是“做大群里的独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种精神”。为要独立，所以要使本能充分发展；为要健全，所以不肯盲从，爱好真理：这都是

完成人格必要的条件。因时代和地位的不同，人格的"量"没有一定范围。然而同时代同地位的人，却应同具平等的人格。为什么呢？因为同是大群里头的一分子。

既对"人格"下了定义，就有以下的讨论：

第一，女子应否具有人格？这一问题，可以不加思索地答道："女子应具有人格，因为她是大群里头一分子，是一个'人'。"

第二，自来女子是否具有人格？除了最近受过教育、有自立能力的少数女子，此外就难说了。她们没有真实的确定的人生观。她们的作为不出一个家庭以外。她们的生活都靠着别人，既不健全，又不独立；岂但人格不完备，竟可以说没有人格。

第三，试看女子不幸的原因。女子的人格不完备，或是没有人格，若说是女子自身的罪过，这便错了。当初民分工治事的时候，女子不幸有那生育的事情，只得留在家里抚育儿女，带做些家里杂务。后来人智渐进，社会制度也逐渐完备，一切生产的事业没有不和社会有关系。其时和社会交接的，自然是那身无挂碍的男子。女子所做的家庭杂务，却又不是可以生财致富的；即或在家做些生产的事业，也不过做男子的襄助，仍要男子出面，始可贡献于社会。因此历世相传，女子独立自营的本能就渐渐退化了。

女子在家里专做那零碎、琐屑、无味的家事，一个人心力已消磨尽了，还有什么机会和工夫去接触外界的事实和思想？还有什么机会和工夫去研究学问？历世相传，积非成是，便成了风尚。仿佛那些德性学问的事情，只是男子的专利，那

真实的确定的人生观，不复涌现于女子的精神世界。她们爱好真理的理性已渐渐淘汰无馀了。

女子之不幸还不止此。女子又受了男子的种种熏陶，于是把自己的人格看得无关轻重，非但不想完成它，竟至不想要它，以为女子本来和男子是异致的。

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义。一是设为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她的人格：这叫做"诱惑主义"。一是看到女子较自己庸懦，就看不起她，不承认她是和自己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她的人格：这叫做"势利主义"。

诱惑主义中最有势力的一种就是"名分"。什么"纲常"，什么"三从四德"……，都是诱惑女子的利器，好在这等名分都是从"不合真理的历史事实"演绎出来的，利用着大众"世故即真理"的弱点，可以使身受的受之而不疑，是故可以说："夫妇之义，犹君臣也。"据此推论，因"君为臣纲"，故"夫为妻纲"。汉代以后能够开口说话的，差不多只是那业儒的男子。那儒家又是最不要人格的，他们只想做一姓的忠臣，一家的令子，以己例人，自然有这等教训定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人类中思想不很清澈的，往往有一种自私心。女子庸弱可欺，男子压制了她，觉得很有许多利益，因此就不顾公理，定出许多教训来。有人说的好，"周婆制礼，定可补偏救弊"，就可证明这等教训是男子自私心的结晶。这是第二个原因。

"良母贤妻"又是女子的大教训。近时开设了女学校，甚至标榜这四字做施教的主旨。这岂不是说女子只配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可做了。母为什么要良？因为要抚养男子的儿女。妻为什么要贤？因为要帮助男

子立家业。试问一个人活在世间，单单对于个人有关系，这种人生，不是同“阿黑”“阿黄”一样的没有价值么？对于大群，不是毫无关系，成了可有可无的一个赘瘤么？

这层意义还可从反面证明。既然女子只消做良母贤妻，那么男子便只该做“良父贤夫”，何以男子研究他专利的学问、讨论人生观的时候，答案纵然不一致，却从没把这四个字来作答的？可见人格完全的人，他总不把“做某人的某人”作目标，他总要在社会上做一个独立健全的分子。女子被人把“母”“妻”两字笼罩住，就轻轻把人格取消了。

更有一种很有势力的诱惑主义，就是什么“贞操问题”“节烈问题”。这等问题，是说女子对男子一有夫妻关系，或但有名分，就永远不得离贰；仿佛卖给人家做奴隶一样，只应一世做奴隶到底。就是没有丈夫的女子，倘遇着强暴，能够贞烈自守，就也称赞她，并不是赞她不见屈于强权，能保持一己的自由；乃赞她能抵抗“非礼”。仿佛女子只有做男子的妻的义务，一经聘定之礼，就是以“国士相待”，以身报之也甘心了。其实这等问题原是个不能成立的名词，因为男女结合最正当的条件是“恋爱”。两相恋爱便结合起来，倘有一方不复恋爱，那一方虽仍恋爱，也无可奈何，便应当分离开来。这等说法果真实现，决没有“贞操”的名词发生。因为爱深必专，专了哪有分注之理？不必说贞，贞的意思自具备了。所以男女对待的态度应只问恋爱不恋爱。那时两方都是主动的，自由的，两方果是恋爱深时，彼此互对，觉有一种美感，以为是精神所托，灵魂所寄的；便是“生死以之”，也不算奴性。但不可用来作为教训，做诱惑女子的利器。无奈男女结

合，很有不恋爱而不分开的。男子根据他自私的心理，以为倘不巧立名目就不能维系彼此的关系，于是“贞操”两字就“应运而生”了。这等表彰赞美的手段，比谆谆告戒还凶。一般有些意识的，一样也有虚荣心，就不顾实际，不顾真理，忍心害理去迁就那贞操节烈的一途。那辈无意识的，也依样画葫芦，情愿走上这条路去。如今也不说什么大道理，但请他们平心静气说一声，到底情愿不情愿。我想除了几个男女间有真挚高尚爱情的以外，就不免“有所为而然”了。试问做一个人，不按人生应当做的去做，不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做，他的人格还完全不完全？但是举世以这些事实为“天经地义”，大家不说它不公平，不合理，而女子已经上了男子的当了。

男子势利主义的表现，只要随时随地留心，差不多刻刻可以找到证据。我如今随便写几则出来：

我曾经听见人家说，女子仿佛是一架机器：一、她是可以听凭选择，出了财礼搬到家里来的。二、取得之后，供男子自由玩弄，供男子自由使用。三、她能制造货品——儿女，越制造得多，越是这机器的优点。四、购机器玩弄使用，不嫌其多，所以不妨多备几架。五、这架机器不合我意，或是不能出货，尽可抛在一旁，另换别的。机器是件死东西，没有自由的意志和情绪，如今用来比女子，是直截了当不承认女子是一个“人”。

自从孔丘说了“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句话，历代的男子就众口同声说“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于是“勿耽女色”，“勿谋反妇女”，就成了男子修身的大教训。犯了这教训，便是终身之玷。原来他们认定男子和女子只有个“淫”的关系，所以看

女子和毒蛇猛兽一般，是不可与亲处的。其中更可见一层意思，就是身为女子，便是罪恶。那罪恶的判定不在她的意志和行为，而在她的身体不和男子相同。

有时有几个能力较强的女子，做了些有价值的事业，大半未必真有价值，男子就摇起笔来批评，或是替她做那"留名千古"的传记，其中一定有"巾帼须眉" "可愧须眉"一派的话头。就算他抱着一种"激励风尚""勖勉男子"的苦心，这是不可辜负的，然而从反面想去，就是说："有功有德的事业是男子专利的，今竟被女子做了去，我辈高贵的华胄'须眉'快当自奋才是。"这个意思不是承认女子不配做什么事业吗？所以虽是极端主张"天赋人权"的"民权论"，却同时不承认女子有参政权。参政是善是恶，是别一问题。然而可见那"人权"两字，不过是"男权"的变相罢了。

最文明的所谓"文明结婚"，举行时男的道"吾愿保护我妻"，女的道"吾愿敬事我夫"。"保护"两字，原是成人对稚子、强者对弱者的一种侵夺主权的词。女子的主权，为什么要给男子侵夺？女子又为什么有这天赋的敬事男子的义务？有一天，我的许多朋友聚谈一室，一个朋友说："某君生了病，他的夫人服侍他衣不解带，面不舒眉，却不以为苦楚。"众人听到这里，便众口同声赞起来，却并不是称赞他们夫妻间爱情的真挚，而是称赞她能尽她天赋的义务能服侍男子！这是为什么呢？还有一件事实可证明。当时又有一个朋友道："某君新丧偶，常独行踽踽，凄苦非常。当他夫人未死时，常是衣履翩翩，夫妻两个一同挽臂出游的。"众人听到这里就诽笑杂作起来，有人还作雅谑说："某君可谓孝夫。"我从此便知道了

男子的心理了。原来女子死了，还不配受男子的伤悼，哪里有相对等的爱情可言！那某君竟违反了男子的普通心理，众人所以要讥笑他。从此反证，就可知前面的称赞的用意了。

女子既是服侍男子的，受男子保护的，所以女子嫁了，连她的名字都取消了，单称她“某某夫人”。倘若反其道而行，称男子为“某某丈夫”，男子可就不答应了。他以为女子只是附属品，在社会上没有她的地位。

以上种种，就是女子不幸的原因。今把种种意思简括提他出来：女子为事实所迫，自己的本能和理性渐渐退化，男子乘此机会，根据着自己的“迷信”和“自私心”，把诱惑主义来骗女子，把势利主义来欺女子。女子受惯了欺骗，只觉得自己地位当然如此，他人也觉她当然如此，于是专在“事实所迫”的范围里寻生活。因果循环，无有休歇，女子的人格遂丧失了。

女子的不幸既是事实，酿成这等事实的情势和思想，都根据于“世故即真理”的观念。若要把这缺憾弥补起来，得个完美幸福的解决，不可不先有一种自觉。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发展，做凡是“人”当做的事；又应知道“人”但服从真理，那荒谬的“名分”等伪道德，便该唾弃，破坏。至于她和男子不同的地方，单单在生理方面，这是天然的，光明的，绝不应牵涉善恶问题，优劣问题。她那生育的事实，应知道并不是替男子生儿女，乃是替社会增新分子。这也是一种很重要很神圣的事业。在生育的当儿，她不能从事独立自营的生活，社会就有报答她的义务。为了这一层，又要把社会上经济制度从根本上改革一番。这样的事

虽是历史所未有，然而将来必定要做到，而且为期不远。她那做妻的事实，应知道是顺自然之理，和男子做女子的夫一样，并不是去做男子的财产和奴隶，替他管家事，长财产。

男子也应知道，不尊重他人的人格就是贬损自己的人格。他那“世故即真理”的迷信，他那自私的谬见，已害了上下古今无数的女子，已阻碍了不知若干辈的人群进化。果是要想大群共上进化的轨道，而且巴望他进行得快，还是把“诱惑”“势利”的主义快快抛掉。

男女大家应该有个共同的概念：我们“人”，个个是进化历程中一个队员；个个要做到独立健全的地步；个个应当享光明，高洁，自由的幸福。

一九一九年二月一日发表

吾人近今的觉悟

现在世界各国的政府还是"强权称雄"的遗型，率了一种"强权欲"的冲动而前进，和"庶民主义"、"社会主义"根本矛盾。中国政府毫没学识，所以做出罪恶来格外难看。他国政府将学识自文，所以坏得较为冠冕，其实是一个样子。

我们欲改造世界，第一步先要铲除强权欲的冲动。我们恃自觉的奋斗精神，凡是和"庶民主义"、"社会主义"相背的，都要去反对他。我们不要怕强权，只要真能自觉，真能奋斗，最后胜利终属我们。我们如今应当认定，改造世界是我们的责任。无论什么难题，只有我们去解决——我们真欲解决，终能解决。

若是自居第三者地位，单说几句漂亮话，或是单能说不能行，或是深抱悲观，只会叹"国亡无日"，这都是懦夫的行径，我们绝对不应有这等态度。

我们要改造世界，只重在一个"我"——只重在我的"努力奋斗"——这是我们近今的觉悟。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发表

甪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

溯自政象混沌，外交屈辱，爰有“五四运动”。政府横肆摧残，务拂民情，吾三校感此潮流，五中愤结。初以群众既为正当之表示，当局或有悔祸之良心，果肯改图宁非国利？顾倒行逆施，曾不少悛，吾三校忍无可忍，于六月十一日一致罢课，非特为对付日本之表示，作释放学生之要求，根本解决乃在满足民众之希望，标的既悬，誓必践之！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发表

职业与生计

我做了八年的小学教师，有几位老辈的亲戚常对我说："你做教员，总不是个事。些些收入，到手便尽，哪里积蓄得起来？还是及早别想法子吧！"我听了这些话，面子上虽则说一声"多承关心"，心里却十二分的气忿；想道："难道小学教师不是职业么？"这样的感触，受得多了。

前天遇见一位朋友，谈话中间提起了别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他现在担任中学的历史地理教员，月薪八十块钱，又不是国文教员有改卷子的辛苦，真写意哩！"我心中便又起了一种很深的感想：历史地理教员和八十元的月薪，是一因一果吗？是相辅相行的吗？史地教员没有改卷子的辛苦，是占了便宜吗？国文教员担负了这项辛苦，是吃了亏吗？再一想，这样的谈话实在时常听到，也不足为奇。

这样的事一时说不完。我做了小学教师，别界的事不大理会，别界中进取奋斗的情形，晓得的还少，只觉得耳朵里常听得什么"运动"咧，"逐鹿"咧，"捷足先得"咧，眼睛里常看到什么"如荷玉成敢忘大德"咧，"倘蒙照拂感同身受"咧，……永远不断。起初我真不懂所谓"世故"，只觉得大家肯做事，肯负责任，却没有事给他们做，未免辜负了他们急功的勇气。后来看到他们把事弄到手了，责任有得负了，却

大家极力寻便宜的道路走；薪金可以多得一些，便大家钻上去；事可以少办一些，便大家退下来：我渐渐觉得自己的判断不对，终于证明我是个不谙世故的人。

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可以知道一般人对于职业的观念。他们以为职业是维持生计的，单单是维持生计的；职业是手段，生计是目的。这一项职业所得的酬报——维持生计的程度较高，便是较好的职业；大家都羡慕着它，想取得它。更从反面推想，有私产可以维持生计的人就不必有职业；便是现在有职业的人，只消把所得的酬报储蓄起来，到了够维持将来的生计的时候，也就可以不务职业。总而言之，为有生计问题，才有职业问题，倘无生计问题，便没有职业问题。

观察现在社会的实况，一切的官僚、政客、军人，哪一个不为自己的生计？不过他们所谓生计，范围较广，于衣食之外，还有声色货权种种，也包括在内。他们几曾想到自己的职业是不是有效益，是不是无愧于良心，是不是社会所必需的。此外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任各种职业的，辛苦经年，劳劳终身，哪一个不说："我们不为别的，只是要吃饭。"他们几曾想到事业的进取和兴趣？所以他们从事职业，是被动的，强制的，不得已的，并不是自发的，愿意的，负责任的。他们肯做，肯劳动，有一条唯一的索子系着他们，便是生计。倘有别的法子，可以不务职业而维持生计，职业便抛向九霄云外去了。社会内求神祈福的迷信，看风水问星相的习俗，至今还存，买彩票义赈券和赌博的风气，至今更甚，便是我这话极强的证据。

我们要研究把维持生计作为从事职业的目的，于个人于

社会有什么影响。有许多事务是很不人道的，然而它可以维持一般人的生计，就也叫做职业。像耕种田地和工厂里做工，所受的精神上物质上的待遇，自然是极难忍受，然而为着少量的佣资，只得忍着苦，耐着辱，不顾自己的人格，放弃天赋的权利，忍受下去。有时也许忘了痛苦，也无所谓耻辱，什么人格和天赋的权利，自然不成话说，只因这个职业可以维持我的生计，便非常感激它。康白情君的《女工之歌》，便是这一等人的心声：

一

我没穿的，
　工资可以买穿。
我没吃的，
　工资可以买饭。
我没住的，
　工资便是房钱。
我再没气力，
　他们也给我两角一天。
　　他们惠我，惠我！

二

我有儿女，
　他们替我教育。
我有疾病，
　他们给我医药。
我有家务，

他们只要求我十点钟的工作。

我有孕娠，

他们把我几块钱让我休息。

他们惠我，惠我！

这一等人不晓得自己过的是奴隶的生活，也不晓得自己的勤务究竟有什么价值；不识不知，只是要活命。将他们的弱点的总和取个名称，便是“不自觉”。社会中从事生产、维持社会安全的，却都是这等不自觉的人。他们一方面既不自觉勤务的真价值，所以种种业务，但承着前人的遗法和成例，只消一无缺漏，便算充其能量，决没有改善和创新的希望；一方面又不自觉所处的地位，所以不想改革制度，趋向新的合理的生活。这不是阻碍社会进化的两大原因吗？

有许多职业虽是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但是从事的人并没有这许多职业的经验和知识，便连这许多职业的自身，也退入无用之列。像医生和教师，一担当养生却病的重责，一担当启导未来的大任，是何等重要！然而考查社会实况，悬壶问世的到处都有，而疾废病死的总数不见减少；兴学施教的遍于乡僻，而衡量真实的效益竟无可指，怎不令人不疑惑这两种职业为终竟没有价值呢？果真就事论事，不杂别情，什么事都简单得很，容易解答，对于一种职业没有充分的经验和知识，那么不干就是了。明知道不能干，却偏要勉强干，这是为何？原来有个生计问题在背后鞭策着他们，不容他们审慎和思量，总得先把这个问题安顿下来才行。什么事务谋干得到，什么事务适逢其会，便算是他的职业，更何暇计度胜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任不胜任，能干不能干。他们把职业认作"传舍"，由彼易此，由此易彼，都无不可，只待生计问题指挥着他们走。所以他们永永只有偶然的职业，没有正确的职业。这一等人自然也说不到能够自觉，在社会中很占多数，不是直接生产的职业，差不多都是这等人担负着。从外表看来，他们似乎事事能干，其实事事能干等于一事也不能干。他们和职业既然是偶然会合，不将经验和知识做业务的资本，哪得使他们的职业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又因人人要舍去现任的职业，趋向其他的职业，所以便是业务上循例的进行，也时常有所妨碍。一方面他们在那里患得患失，此沉彼浮；一方面业务时虞停顿，社会便陷入于不安全的状态。今日的中国正所谓"非其时矣！"

更有许多事务，从它的本质说还够不上叫什么职业，却有一班人依靠着它维持自己的生活。像贩卖伪品的商人和荷枪背弹的兵士，社会中也就不少。为什么不贩卖真货而贩卖伪品，把伪品卖给他人时心里是怎样想的？持枪威胁别人是何等样的事？白吃白穿究竟亏损了谁？这些都是他们不懂得管也不愿意管的。他们只知道这样做了可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就认作自己的职业。在他们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生计重要，只有生计是唯一的重要；能够维持生计的便是正当的，应该做的。其实这等事务，社会上并不真需要它，原没有存在的理由；它所以有存在的立足地，就因为这一等人据它为自己的职业。既然如此，它自然无成绩可言，然而影响却非常之大，社会上直接或间接受他的损害一定不可数计。因为从事这等事务的人固然维持了自己的生计，但同时破坏了别人的生计。从事这等事务的人愈多，生计被破坏的人也愈多，这

就是社会大乱的原因。

从以上三段意思，可知在现在的社会中，种种事务只有停顿和弄得一团糟，即使好一些，也不过保持已往罢了，决没有革新和改进的希望。在社会中最占势力的只有几种不正当和没实际的事务，正当的事业反而退居势力极狭小的地位。并且后者被前者破坏，还岌岌可危，几乎不能存立。因此社会只有不安全，只有捣乱，决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局面，大家过新的生活。这里头的根本原因，就在一般人的没有自觉。他们吃了苦，不想怎样可以免除不平等的待遇，不想怎样可以解放；任了职务，不想怎样可以对职务尽力；做了恶事，不想怎样累了他人，却只顾奉着唯一的金训——“维持生计”，自然要捣乱秩序，阻碍进化，徒使社会上留着许多耻辱的标志了！要望社会有真实的改造，还得将一般人对于职业的谬妄观念打破，别立一个新的观念才行。

正当的观念，自然要从谬妄观念的反面去求：一边把从事职业看作是报恩，是偿债，一边就应当不承认人间有施恩者和债权者，却另有必须从事的理由。我们试想，我们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说到人生，便含有社会的意味，无论物质的一衣一食，精神的一思一虑，都取资于社会，附丽于社会。社会的存在和进化，全赖我们各各从事职业，努力工作。可知从事职业是自主的，创造的，目的在于谋共同生活，不是报谁的恩，偿谁的债。现在社会中一般的人，明明做的极有价值的事业，却以为唯此所以报人家全我生计的恩，固然愚昧可怜；那一辈滥竽业务，实不胜任的，以为挂着名儿便可交换生计的要件，也是一样的不明白；至于务作不正当的业

务，以全一己之生计，这非特报恩，实是作恶，非特偿债，实是赖债了。我要请你们注意：共同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你们尽力于职业，便是共同生活的下手方法。果能各各尽力，所收效果远在仅仅维持生计之上。你们想望这个乐境么？如果想望，请先确立了对于职业的新观念！根本既立，就有下列的见解：

有益 有益的职业包含必需普遍的意义，凡可以使人类在物质上精神上得到满足的快慰的，都叫做有益的职业。若是非人类所必需的，或反而有害于人类的，或一部分人受益而馀人不得享受的，就不能叫做有益的职业。凡属有益的，必需的程度同，效益的普遍同，所以没有尊卑高下，所以平等。灌园种菜和攻学著书，一样的重要，一样的有价值。

胜任 人的知能，万有不齐，倘若自知明确，择定一种最适于己的职业，自能收十分的效果。原来事务没有胜任的人去干，人没有选宜于己的事务干，勉强牵合，把事务弄糟了，人也气短了，这是个最不经济的办法。我们从事职业，不但当问有益无益，更要紧的是问哪一件有益的事我能不能干。必须自信不疑，知道自己的知能确能担负，然后运用心力去干。这个心力绝无虚耗，无不与社会以良善的效果，无不使施者在物质上精神上得到满足的快慰。

兴趣 一种业务既是我所胜任的，往往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因为无论何事，习久则精熟，到了精熟的时候，所谓不期然而然，只觉得干这一件事是一种嗜好，一种浓厚的兴趣，并不受他力的逼迫，自然努力起来。兴趣和努力循环不息，社会的进化也永永无已。

理想的实现　超世间的生活是超人的事。我们所想望的乃是理想和实际一致的生活。我们认为哪一种生活好，总想一蹴而至，竟实现了它，这是我说的理想和实际一致的要求。我们高谈人生究竟和人生真谛，若永远只是抽象的说话，没有具体的事实，于人生实际上丝毫没有益处。从事职业便是人生的究竟的具体的行为，也是理想和实际一致的一个接榫，因为它是一种发展，一种活动。我们的精神生活要直觉它的本体，显出它的作用，总非依托一种业务不可。各个人的精神生活，在各个人的职业上得到着落，否则便是虚玄的想法，无当于实际。

将以上四项贯穿起来，就可以给职业下一个定义：职业是有益于人类的，自己所能胜任的，全体为兴趣所涵濡的，实现我们的理想的一种活动。

然而生计问题是实际问题，当社会中的群众没有全体觉醒的时候，便是对于职业持新观念的人，多少仍旧要受到这个问题的支配；那么理想和行为终不能全然一致，这是何等的烦闷！所以我们对于生活问题必须得个解决。但是持着报恩和偿债的态度去从事职业，决不是个解决；所必需的乃是根本的彻底的解决。这生计问题所以成为唯一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那历史的谬误的结晶体——资本制度。这个制度不打破，各个人从事职业的目的就不得不趋向着它；便是观念改变，实际上还只得趋向着它。我们果真要为共同生活而从事职业，同时就有打破和这个目的为敌的资本制度的必要。要知在资本制度之下，决不容有真的谋共同生活的职业。唯有将它打破，人类方才有合理的生活，社会方才有真实的进

化。同时“生计”两字也就不成问题，凡是人类，都有享受满足精神上物质上的欲望的材料的权利。这才是根本的彻底的解决。从此便知生计问题是暂时的，旁支的，独有职业问题是本体的，是永久性的。所以职业的目的决不是生计；决不是为有生计问题，才有职业问题。

据罗骚的意思，人类的冲动大概可分占有的和创造的两种。占有冲动，易于引起种种恶德，自己占有，往往妨害了他人。创造的冲动却不然，我之所得，并非人之所失。我们从事职业，推研原始也是一种冲动，在两方面都可以立足。若是认它的目的为维持生计，便立足于占有的一方面，致使业务没有进化，社会失却辅协的作用，而呈病态现象。对于职业的新观念，却纯粹立足于创造的一方面，所以得增人类的幸福，促社会的进化，后者要说它属于占有一方面，也无不可，不过合全人类为一大我，而求占有，和前者有所不同罢了。社会需求于我们的，便是根据着这个，从事我们的事业。

一九二零年四月一日发表

评女子参政运动

“参政”这两个字，在一般人的眼光里含有一种不好的意思。他们的观察点集注于以前和现在的状况，只见治者阶级夺人权利，侵人自由，便深恶痛绝的叹一声：“政治乃万恶之源！”这也不能怪他们，凡有人心的人当然有这等的悲悯。但是试想：“万恶之源”是不是政治的自身？我们痛恨政治，不去管它，这样消极抵制，究竟是不是自己多吃些儿亏？我们何不将以前和现在的状况改换过来，再往前做去，使“万恶之源”化为“至善之府”？从这样想，参政并没有不好的意思。那些自居于治者阶级，弄权侮人的，固然是人格堕落的恶德，我们不愿去学他；至于参与人群的组织，去谋全体——自己也在内——的福利，正是我们的天职，志愿，唯一的业务。

上面说参政是我们的天职，志愿，唯一的业务，这“我们”两个字，自然合男女而言。因为男女都是“人”，都是人类的一分子。有许多人从知识上和经验上判别，说女子不宜于参政；还有人和我上面所说的一般人一样观念，说女子是高贵俊秀的人，犯不着跟着男子一起堕落，卷入政治的旋涡。后面这般见解，我已经说出了它的不彻底。至于智识和经验的问题，都是从环境和历史上来的，环境可以改造，历史可以不遵，如若不能证明女子在本质上不配参政，那么女子就能够参政。更进一步说，即使女子的本质真不配参政，然而为人类的总福

利，为女子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起见，也应当渐渐变易本质，以期能够参政。

现在的社会还建筑在男子的精神能力的上面，女子不全都属于独立的地位，就不能说是完美的社会。理想中的将来的完美的社会，一定由全体男女各出智慧，各奋能力，而组织起来的。那时候“男”呀，“女”呀，不成为习用的类名来表示两种势力不同的人类，“女子参政”更属不成问题了。

近来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致电我国女子团体，邀请加入，我国就也有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我不明白外国情状，不知这个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期求的范围是怎样？但是这段新闻引起了我的一些思念。我以为我国的女子参政运动，应当从政治的广义方面着手，不当单单去要求取得选举权。换一句话说，就是女子应当鼓起一种运动，使自己能加入社会上不论什么组织。若论现状，我国社会上各种组织里，女子能够加入的——如学生男女共事，还是少数。有女工人，而工人的组合里没有她们；有各种公务局所，而没有女子在内任职；有青年会，而另设女青年会……列举不尽。这不是摈女子于方外，看她们做特种的人么？女子要取得自己的权利，克尽自己的义务，并且要使社会进于更完美的地步，非先将这等状态打破不可。既打破了，社会上各种组织里，便都有了女子。到那时投票和被选，当然也有女子的分；女子参政，就此“水到渠成”了。况且参加社会上的各种组织，比较单单取得选举权来得更切实，更重要。至于怎么能够参这个广义的政，那就要靠女子自己的努力和奋斗了。

一九二零年五月十三日作

不快之感

两扇玻璃窗外是一个小方天井。他抬起头来，只有窗外陈旧、简单、沉寂的景物是他的世界；他看了不知多少回了，倘要他将图画描写出来，一定能够一些儿没有差错。左边的短墙青苔长满了上半截：那墙的年纪比他长，刷在上边的水泥早已不知哪里去了，竖着铺的砖便显出很明白的畛域来；那青苔簇齐的长着，仿佛一片平田种满绿秧，有纵横的阡陌把它划分得很清楚似的。有的时候从墙脚下来了一两条蜒蚰，升到半墙便停着不动。两对触角像羊角一般矗起，良久良久，才微微的，慢慢的，向左或右动一动，就这样的捱过了它全生命几分之一的时间。对面一座墙却很高，斑驳得比较的好些，但白色的垩粉已转成了灰色，此刻斜映着右旁墙上反射的日光，才稍微光亮一些；待日光过了，它那广漠的平面，闷郁的色泽，使人神经都麻木起来，竟至没有思想和情感。它和左墙原是成个直角。距这直角不到两尺，矗立着一棵已死的黄杨树。这树和对墙一样高，它死了，枯了，枝条都砍作薪柴，剩下一根直挺挺的光干。它的皮多半脱落，露出僵白的木质，和它的背景——对墙——绝对的不调和。那座右墙比较的有文采，因为上边有三方图案画的镂空花纹，砌得非常工整。花纹空处结着许多蛛网，上边都粘着灰尘，可是结那些网的工程师

早已去得远了。在和黄杨树对称的地位，是一个白铁的水落。落雨的时候，屋瓦上面的水从水落里下注，打着白铁，发出单调幽咽的声音。此刻它寂寂的直站着，在这天井里却要算是唯一有光辉的东西了。

太阳一些儿没有留恋的意思，独自上屋去了，小方天井里就被黝暗笼罩着。他眼睛虽望着天井，他的感觉却没有这个世界。——这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喜悦，憎怒，爱好，希望……种种情绪，也没有什么事想要做。他只觉有一种不可名言又像很微淡的"不快之感"，不绝的来袭他身体的不知哪一部分，——这是他天天经验的。虽说是很微淡的，然而比他尝过的一切厉害的痛苦还难堪。这真是他生命的病菌，一个奇异的仇敌！

他遇见了这个奇异的仇敌，积久更加害怕起来。他不甘心永久受仇敌的压迫，曾经求教哲学来帮助他。哲学就将空想的论证，传习的主义，一一供给他做武器；凡可以帮助他的没有不尽心竭力。可是不见什么功效：哲学的知识不就是治那生命的病菌的对症药的本身，所以那病菌还是潜伏着，时时显出他狠毒的势力。

天真夜了，小方天井的上面一方乌黑的天颓然如死的盖着，没有一颗星放些儿光！枯寂极了，暗昧极了，不可言说。

他的生命尽管滋生着病菌，真个病了。这生命既没有趣味，也没有趋向，然而他还是冲动的，盲目的迷恋着。为什么迷恋着？因为他已经有了个生命。为什么不去寻死？因为他从传说里知道寻死是一种恶行，所以不愿犯，却不因为生命有价值，所以不使寂灭。他明明知道这些，他曾经屡次把

自己剖析，提出问题来，末了总得到同样的答案。他又明明知道他的同伴谁都和他一样。可是知道自知道，患病自患病；那气喘几绝，吐出丝丝的血的病人，何尝不能细细的讲肺病的进程是怎样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现象是怎样的呢！

这枯寂的暗昧的天容底下，仿佛装置着一种模型，预定着一个方式，专等无论什么人来仿效，配合。无论什么人一受彼的拥抱，便如醉似迷，不由自主了。他想起了什么茶馆什么俱乐部的情形了：积满灰尘的电灯泡里放出不遍颇的没精打采的暗红色的光，照见几个已经有了生命的人散坐在屋的四处。他们坐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事，也并不要会见什么人，只是各顾各的安舒，吸烟呢，品茶呢，假寐呢，默想呢，吃小食呢，状态各有不同。偶然有一个人谈起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大家便接了上来信口批评一回，不判个是非，不求个解决，一笑而罢。而且他们的论点刻刻在那里迁流转化，随后的谈料，他们也不问从前边哪一节里推衍出来，只屡次振动声带各占据着永劫的一节罢了。看看电灯更为暗淡了，他们便各顾各走了。他们天天如此，有什么意味？然而不如此他们便闷郁得慌了！可贵的生命无可奈何的消费着，岂不可惜！他又想：当自己伏在书桌上昏晕的灯光底下，只有单调的钟摆声伴着的时候，随便捡一本书看，看了几行，又随便翻过几页，或是掉换一本。自己天天如此，有什么意味？然而不如此便怎样？可是那可惜的程度就和他们不相上下了。他们和自己都是个仿效模型、配合方式的东西啊。

一棵树上寻不到同样的叶子，除非摘了下来烧了，才化

为同样的灰；各支树枝没有同样的姿态，除非砍了下来解析雕琢了，才成同样的几只椅子。模型，方式，原是和生命背驰的呀！然而他和他同伴的生命，竟给模型方式拥抱了。他们体内每个细胞，从吸气，进食，借神秘的指导力量——生长、营养、更新、繁殖等作用，而享有生命；这是向上的进程，何等的可贵！可是多数细胞组织成了一体，却被病菌侵蚀着，顿然停止进程，降而为机械的物质的吸烟，品茶，假寐，默想，吃小食，看书。生命的箭终于受他力的吸引，不能射到无穷的远，这是何等空虚，结局是幻灭！

凡是游历的人差不多有一种情形：当好景还在前途的时候，他那热烈的希望，兴奋的意趣，常常引导着他，成为他活动的原力。待到一切好景都玩过了，完了，更没有什么可玩了，此后唯有回转身去，重践那来时的足迹；这时就觉得颓丧的气味浸渍到全身的不论哪一部分。旅店中躺上一天半天，火车中睡去一刻两刻，都没有不可以；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力做他的引导了。火车上的机关手，或是航船上的水手，他们从路程的这一端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到这一端，屡次反复，无有休歇，无论沿路的一棵草，一块石，一个洗衣的丑婆子，一条瘠瘦的水牛，他们都稔熟，但是疏远，不感兴味。倘若拉住他们的不论哪一个，问他"可感到你那职业真实的意味？"他一定很不高兴的回答一个"不"字。已经倦游的游客呀，往返一条路途的火车机关手和航船水手呀，谁能够不跟着你们走同一的没有兴味，宁与疏远的道路呢！

这等杂乱的自讼的思想，时时刻刻通过他的脑海，而终于引起他生命的病菌的剧烈增殖。他的感觉里没有世界——小

方天井是没有，天是没有。自己也不很真实，只觉一个虚幻的自己包围在广大的虚幻里……

黑暗的，障碍的乌云散了，月儿露出伊美丽的微笑，星星转动他们流盼的媚眼，轻风唱伊轻清的恋歌，一一表显他们生命的活动，真实，眷恋。

一九二零年七月二十一日作

寒晓的琴歌

西北风吹来非常紧急，我的皮肤当着也不感觉什么，因为是麻木了。光秃的杨枝如狂地舞动，似乎可以听得它们憔悴的衰飒的哀声。白蒙蒙的晓雾笼罩着杨树的顶部，只见很模糊的稀疏而槎枒的枝痕，仿佛是用淡墨描的。太阳还没升高呢。斜射的淡薄的光凝滞和无力，穿不透浓雾，单给东面的雾略为增一些光亮。

这里是一大片旷野。四围尽是杨树，但现在都沉没在浓雾里。我不停地向前走，只有逐渐近我身旁的一两棵可以看见。在我的右面是一个营垒，约略可以看见雉堞式的围墙。营里早已没有兵卒驻扎了。离巢的乌鸦，不知它们为什么不飞到浓雾之外去扑一扑翅膀，却栖止在营墙上乱叫；这种声浪在西北风里扩散开来，就含有凄苦的况味。

这是十二月里的早晨，我竟没遇见一个行人。寂寞和惆怅的心使我忘了自己，直到脚下踏着了小桥的石级，才知那一片旷野走完了。我无心地靠着桥阑下望，那河水流动得好急，一条波纹涌着一条波纹，显出高低不平的无数阶级。那后生的波纹特别有一线的白痕做标记，流到桥下，便同化于深蓝色的水波；那一线白痕又去做更后生的波纹的标记了。

“何来胡琴的声音？”我这么想。这是不会拉的人拉的：弦

音尖厉而艰涩，旋律的进行屡屡间断，而且时常发出散音。我不待思索，我的脑子里立刻有一个念头回答我自己的疑问，“这条小桥边原有几家歌女，——我平常经过时见她们门上的题名，所以知道，——她们夜间应人家的征召，当然没有练习的工夫；此刻是清晨，征召她们的人睡了，她们才得在那里预备她们的功课。”

我望这几家沿河的楼窗，都紧紧地关着，窗上的明瓦零落了，有的糊着新闻纸，已是破碎，经了风只管往里吹；更看不见别的。但是我的想象力可以看见她们的屋内。那发出胡琴声音的一所屋里，有一个女孩子执着生疏而可怕的胡琴在那里练习。伊或者因为没有好好儿睡眠，困乏极了，或者因为手指寒冷，不能灵活自如，或者因为对于教者的威权恐惧而希望躲避，使伊的琴音更为恶劣，几乎不成音调。咿咿唉唉的声音连续送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听疲者的呵欠，冻者的抖颤，弱者的心跳。而我心底的眼睛更看见伊朦胧欲睡的倦态，索瑟不堪的蜷缩，惊惶无奈的神情，——一幅难以描绘的图画。

和着琴音有低微的歌声了。何尝是歌声？这是个细小、怯弱、干枯、颤动的叫声。但我可以确定这是从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的喉间发出的。伊的声音传出一切弱者柔软的灵魂，一切被侮辱者心底的悲哀。然则这正是很好的歌，不过不是供人家取乐，听着开开心的罢了。

可惜这时候人们都睡着，这个歌声只我一个人听见。倘若在广大的都城里，聚集了成千成万的听众，教伊当众唱出这很好的歌，该会增进人们彼此之间的了解。但是我更有所

忧虑，果真教伊当众唱出，伊哪里敢这样真切地唱呢！

我听了一会，一种奇异的感觉来袭我心，也辨不出是什么滋味。不要听吧。回首望刚才经过的旷野，依旧给沉默的滞重的浓雾笼罩着。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作

“先 驱 者”

今夏一天的午后，我坐在一家大书局的陈列室里。这个陈列室在第三层的楼上，全屋共有五层呢，是宽广精美的一大间。我先经过下面两层，他们营业部的所在。延绵不断的柜台，掩没了墙壁隔开了全屋的书橱画架，几乎全被着动人的广告，强烈的色彩纷纷刺激我的视官。营业人庄严而忙迫的神态里时常流露不屑的意思，银元到了手里，不肯再看一看那付出银元的顾客。银元敲击作声，包书的纸张发出爽脆的响声，此外一切杳沉，除了窗外街上经过一二辆摩托车作怪异的吼叫。这时候我的感觉异乎寻常，但是描摹不出，粗略地说，觉得接触到的一切都不习惯。

陈列室里却安静得多了：里面有很舒适的椅子，椭圆形的几上预备着上好的雨前茶，也有写字的桌子供人家写录时应用。室内先有十几个人在那里看书，他们都是青年，坚定的目光直射他们手中握着的书，似欲将书中的意思完全吞咽下去；至于他们以外还有世界，这时候恐怕他们是不觉得了。

室中陈列的都是那个书局所出的书。他们每月所出的目录总是一本很厚的小册子。我住在乡僻的地方，四面都围着水，二等邮局里只有一名邮差，那唯一的邮差常常递寄那种小册子。我就在里边拣选几种，由每小时行六里的航船到近

处城市的书店去带来。那些书本印刷非常精美，款式装钉都能满人之意，这就容易联带地引起人对于书的内容的赞美。批评家的目光注射到他们的作品时，总是称誉多于指摘。我也常常这么想：他们的事业真是重要且伟大！他们给人以精神的粮食，授人以心的锁匙，他们不是超乎庸众以上的群么？——至少也应是先驱者。换一句说，我对于那些著作家的精神的工作很表谢忱敬意和同情。

我在室左角一只藤椅上坐下来，不取看陈列的书，我只想同所有的书谈一谈心。原来不论哪一部书都很坦白地表白它自身的价值——虽然没有声息，却可以入人心曲——在大书特书的说明书上，那些表白的话由谦抑赞美不自满和适量的自夸组合而成，使人确信为如实称说，决无过当或不及。

我环视全室，那许多书次等同我谈起心来：

一个架子上搁着多种书，它们封面上图案画的式样和色泽各各不同，有几幅是很能动人的。它们一齐很殷勤地向我道，“我们是最新出的杂志，我们的足迹及于最乡僻的地方的最荒凉的一角。我们的性质彼此不同，但与人以惠益却是我们共同的志愿。不论攻究科学的文学的乃至一切学问的，不论经商的做工的乃至营一切事业的，不论男的女的乃至幼稚的，在我们中间总可以找到你们最有益的朋友。我们因此更欲力图改善，永远奔驰于进取的道路。诸位肯帮助我们么？那是我们真诚而迫切的求祷。”

继续与我深谈的是一连十多架的教科书。这引起我特别的感情：我的脑海里立时涌现无量数未成熟的人，他们很急迫地求索精神的粮食，希望达到超过祖先的壮健；而这里是

满贮着他们的粮食的仓廪呵！未成熟的人，你们好好儿吸取和消化你们的粮食……它们——教科书——不容我再往下想，它们抢着向我说以下的话。

“我们的编辑者都是富有经验的教育家和精通各种科学的学者，所以我们能适应各级学生的需求，是现时代最合用的教科书。我们曾得到全国批评家的赞美和全国教师的采用，我们却不敢因此自满，还欲竭尽编辑者的能力，容纳赞助者的意见，随时修正，希望达到更为完美的地步。我们的每一种都另编有教授书和参考书，一切材料，一切方法，统统列举无遗。教师倘各置备一编，就不至于虚费精神和时间，而获得的效果一定非常优良。”

这些话何等地真实呵！止就我所见的就可以证明。我曾经遇见的许多学生和教师，他们的书包里和书桌上，确然都有那些书籍，有的书角已折转了，封面已撕破了，纸色也已玷污了。我又见风行的报纸上都有它们的广告，书名的上面冠有“新法”“新式”“最新编”等字，可知他们不以旧有的为满足，刻刻在那里产出所谓“新的”。

大而亮的金字拦住我的眼光，从许多又大又厚的册子的皮脊上。我虽没有取它们在手里，却联带起一种沉重的感觉，感得我的臂腕无力。它们是字典和各科的辞典，它们的表白别有一种尊严的神态。

“时代是刻刻趋新的，学问之海的容量是刻刻扩大的。要永久站在时代的前列，要探测深广的学海，可以要求我们帮助。我们是竭尽了数十位专门学者的心力，耗费了一二十年的时间，更经过了好儿回校订的工夫，编纂而成的。不论哪

一个图书馆的书橱里，学问家的研究室内，都有我们的伴侣的踪迹。”

这是多么巨大和繁重的工作！

全室的书籍纷纷向我表白，我很惭愧不能尽记它们的话语，但是它们的诚意我已经全部领受，它们的价值我也非常坚信。我因而出神地想：我总要看一看，只要看一看，产出那些东西的著作家，他们的面貌品性乃至一言一笑，都有个理想的模式在我的心里，看一看就可以证明我所摹想的或是或否。为欲满足这个想望，我就参观那个书局的编辑部。

高大且阴沉的厂屋在路的两旁，喧响而单调的机器声振荡得人心烦乱，机器油的气味散布于空间，充满着劳工生活的感觉。我向前进行，环顾围绕我身的境界，只觉得我的——也许是人类的——微小和无能。这是那个书局的印刷部。我从窗外望进去，每一架机器都在那里运动。屈伸的杠杆仿佛我们的臂膀，但是运动的迟速却绝对地均匀，没有倦怠的意思。一张白纸被铁板翻过去，翻转来时什么都印上了。站在旁边的工人似乎是全没用处的。

我更从那一旁的窗外望进去，略带红晕的电灯光下，工人都伏在工桌上刻画些什么，偶然有几个抬起头来，很沉闷的样子向窗外望望自然的天光——但是未必能望见，对面的屋这么高。我是他们不经意的过客，也劳他们不自主地看我一眼。

行尽了印刷部，到一所广厅，就是编辑部。一个事务员为我导引，我只见一望不尽的写字桌陈设着，不知总数是多

少，每一桌子前坐着一个人。他们有的注目视着两种稿本，头频频摇动，有时提起朱笔来在稿本上写一两个字或是做一个什么符号，有的握着一柄巨大的剪刀，比缝工用的更大，将什么报纸什么杂志裁剪开来，涂上胶水贴在另一本簿子上；有的侧着头不停手地抄写一本书，有的正答复印刷工人的问话，微微听得是"就是这样吧"，"随它吧"；有的就近旁的人谈话，使我联想到茶馆里的有馀多的光阴的茶客；有的支着颈颊在那里默想。他们的神态和动作虽是各各不同，总保持着全室的尊严和静默。

偶然看到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叠稿子，字迹草率而模糊。我就想，这一叠稿子到人家书桌上的时候一定是非常精美了。又见一个人正在起他的稿子，目光从眼镜下射到纸上，很随便地尽往下写。我又想，他所撰的不是不论什么人的益友，便是未成熟的人的精神的粮食，或者是追踪时代探测学海的引导者了，看他的工作真便当呵！

我在这广大的多人的室中，如沉入大海，又觉得我是这样微小。微小的我当然引不起别人的注意，所以我的参观不致改变他们平时的空气。然而我的想望是满足了，我已看见了超于庸众的群，我已看见了"先驱者"。

"我所见的和理想中的著作家的模式是不是一致？"这是我参观以后思索的问题。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作

原题无引号

生　活

乡镇上有一种"来扇馆"，就是茶馆，客人来了，才把炉子里的火扇旺，炖开了水冲茶，所以得了这个名称。每天上午九十点钟的时候，"来扇馆"却名不副实了，急急忙忙扇炉子还嫌来不及应付，哪里有客来才扇那么清闲？原来这个时候，镇上称为某爷某爷的先生们睡得酣足了，醒了，从床上爬起来，一手扣着衣扣，一手托着水烟袋，就光降到"来扇馆"里。泥土地上点缀着浓黄的痰，露筋的桌子上满缀着油腻和糕饼的细屑；苍蝇时飞时止，忽集忽散，像荒野里的乌鸦；狭条板凳有的断了腿，有的裂了缝；两扇木板窗外射进一些光亮来。某爷某爷坐满了一屋子，他们觉得舒适极了，一口沸烫的茶使他们神清气爽，几管浓辣的水烟使他们精神百倍。于是一切声音开始散布开来：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打出了一张什么牌，就赢了两底；有的讲自己的食谱，西瓜鸡汤下面，茶腿丁煮粥，还讲怎么做鸡肉虾仁水饺；有的讲本镇新闻，哪家女儿同某某有私情，哪家老头儿娶了个十五岁的侍妾；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有几位不开口的，他们在那里默听，微笑，吐痰，吸烟，支颐，遐想，指头轻敲桌子，默唱三眼一板的雅曲。迷濛的烟气弥漫一室，一切形一切声都像在云里雾里。午饭时候到了，他们

慢慢地踱回家去。吃罢了饭依旧聚集在"来扇馆"里，直到晚上为止，一切和午前一样。岂止和午前一样，和昨天和前月和去年和去年的去年全都一样。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城市里有一种茶社，比起"来扇馆"就像大辂之于椎轮了。有五色玻璃的窗，有仿西式的红砖砌的墙柱，有红木的桌子，有藤制的茶几和椅子，有白铜的水烟袋，有洁白而且洒上花露水的热的公用手巾，有江西产的茶壶茶杯。到这里来的先生们当然是非常大方，非常安闲，宏亮的语音表示上流人的声调，顾盼无禁的姿态表示绅士式的举止。他们的谈话和"来扇馆"里大不相同了。他们称他人不称"某老"就称"某翁"；报上的记载是他们谈话的资料，或表示多识，说明某事的因由，或好为推断，预测某事的转变；一个人偶然谈起了某一件事，这就是无穷的言语之藤的萌芽，由甲而及乙，由乙而及丙，一直蔓延到癸，癸和甲是决不可能牵连在一席谈里的，然而竟牵连在一起了；看破世情的话常常可以在这里听到，他们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某人干某事是"有所为而为"，某事的内幕是怎样怎样的；而赞誉某妓女称扬某厨司也占了谈话的一部分。他们或是三三两两同来，或是一个人独来；电灯亮了，坐客倦了，依旧三三两两同去，或是一个人独去。这都不足为奇。可怪的是明天来的还是这许多人；发出宏亮的语音，做出顾盼无禁的姿态还同昨天一样；称"某老""某翁"，议论报上的记载，引长谈话之藤，说什么都没有意思都是假，赞美食色之欲，也还是重演昨天的老把戏！岂止是昨天的，也就是前月，去年，去年的去年的老把戏。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上海的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谁能计算他们的数目。车

马的喧闹，屋宇的高大，相形之下，显出人们的浑沌和微小。我们看蚂蚁纷纷往来，总不能相信他们是有思想的。马路上的行人和蚂蚁有什么分别呢？挺立的巡捕，挤满电车的乘客，忽然驰过的乘汽车者，急急忙忙横穿过马路的老人，徐步看玻璃窗内货品的游客，鲜衣自炫的妇女，谁不是一个蚂蚁？我们看蚂蚁个个一样，马路上的过客又哪里有各自的个性？我们倘若审视一会儿，且将不辨谁是巡捕，谁是乘客，谁是老人，谁是游客，谁是妇女，只见无数同样的没有思想的动物散布在一条大道上罢了。游戏场里的游客，谁不露一点笑容？露笑容的就是游客，正如黑而小的身体像蜂的就是蚂蚁。但是笑声里面，我们辨得出哀叹的气息；喜愉的脸庞，我们可以窥见寒噤的颦蹙。何以没有一天马路上会一个动物也没有？何以没有一天游戏场里会找不到一个笑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我们丢开优裕阶级欺人阶级来看，有许许多多人从红绒绳编着小发辫的孩子时代直到皮色如酱须发如银的暮年，老是耕着一块地皮，眼见地利确是生生不息的，而自己只不过做了一柄锄头或者一张犁耙！雪样明耀的电灯光从高大的建筑里放射出来，机器的声响均匀而单调，许多撑着倦眼的人就在这里做那机器的帮手。那些是生产的利人的事业呀，但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了！

一切事情用时行的话说总希望它“经济”，用普通的话说起来就是“值得”。倘若有一个人用一把几十位的大算盘，将种种阶级的生活结一个总数出来，大家一定要大跳起来狂呼“不值得”。觉悟到“不值得”的时候就好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发表

梦

听见拍刺一声响，水面激起范围很广的波纹，就想到刚才跳出水面的是一尾很大的鱼。看见鲜红的花朵，深密地藏在绿叶之间，就想到它一定发散着醉人的香气。

想着大鱼就不免有点艳羡，最好投下网去把它网了起来。想着香气就不免有点爱好，最好摘取下来，供养于胆瓶之中，整日相对。

但是激起广大的波纹的，不一定是大鱼；也许是一尾很小的乌鲤，它跳得高了，落下时鳍和尾巴动得急了，才激成很广的波纹。显出美丽的颜色的，不一定是香花，也许还有难受的臭气，像入腊红一样。

假若终于不下网，便不知其为乌鲤，艳羡之想靡有间歇。假若终于不摘取，便闻不到它的臭气，爱好之情亦无已时。

这个艳羡和爱好正是一种安慰啊！假使网是下了，花是摘了，艳羡和爱好如云如烟地消散了，这个失望怎能忍受呢！因为怕经这等失望，宁愿把打鱼的网搁起来，宁愿把摘花的剪藏起来，终于在“可想而不可即”的境界里生活。这虽是弱者怯者的行径，但境遇也应分担弱者怯者一部分的讥谤。昔人词句有云“相见争如不见”，断章取义地看来，这实在是经验之谈。待我说来：

每一个人各有扩散不已的波纹，彼此波波相织，遂成时而涟漪时而汹涌之观，所以叫做“人海”。每一个人又各有姿态颜色，彼此不同，恰如鲜花，所以俗语人间叫做“花花世界”。

学术的论文，抒情的文艺，表意的演说，创构的艺术，厚编巨册，连篇累牍，当众滔滔，万人瞻仰，不就是各人的波纹么？安步于驰道之中，驱车于名园之间，进退接应则温和中节，酬饮联歌则欢娱有情，不就是各人的姿态颜色么？

接触了他们的波纹，看见了他们的态色，不由得引起无穷的艳羡爱好钦敬愉快之心，以为他们何等地伟大，何等地和平呀！他们的一切异乎常人，他们超出于群类。世界若是琐碎的，判离的，他们就是维系世界的索子，粘合世界的浆糊。他们虽不强欲维系世界，粘合世界，而世界却待他们去维系去粘合。

然而止有接触波纹或是看见态色才能有这般效果。这是很危险的，若然一朝审察那波之动原，嗅那花之气味。一嗅一审察之后，或者竟是有臭气的入腊红，小而丑的乌鲤，怎不使被维系被粘合的仍归于琐碎和判离呢？

不幸人们总有欲嗅欲审察的癖性。虽然失望是可怕而难堪的，宁愿安于“可想而不可即”的境界；而矛盾的心意时时在那里嗅，在那里审察。于是所谓和平的态色，竟是包裹防备阴险戕害嫉恶等等的外套；所谓伟大的波纹，竟是笼罩于实体的表面的一些浮影。那些即被发见，想到内容之可鄙，就不见外套之可羡可乐；浮影诚然大于实体，而实体没有什么重大价值；就不见外套之可敬可爱。悲叹从此开始了，隔膜

从此增甚了！

“相见争如不见”！

就极平凡的说起来，哪一个做父母的真了解他的儿女究竟是怎样的人？哪一个人没有深埋在心底里的秘密？我们所敬慕钦服的，果真恰如我们所知于他的么？我们所喜欢赞美的，果真里面也有值得喜欢赞美的么？复次，我们所恨所怨所轻视所鄙弃的，果真适如其分，应得受恨受怨受轻视受鄙弃么？

因波浪想到大鱼，因艳色想到花香，简单的直觉造成个梦的世界，于是有艳羡和爱好。略一审思，止馀隔膜和悲叹而已。

总希求外套里面所包的，和外面一样地优美纯洁；实体外面并没有浮影，而本身就同秋月一般明皎。即使这还是个梦，究竟是比较的更足以慰安的梦了。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发表

经 济 时 间

马路上搬运人体的家伙多极了：睁着巨睛吼着怪响的载着人体；一匹马拖着一个篮子样的东西载着人体；一所自动的四壁玻璃的小屋子装着人体；一个人体拖着一件东西，里面装着人体；一个人体推着一件东西，两旁装着人体。假使别个星球的人有兴趣，光临咱们敝地球参观或游历的时候，一定使他眼花缭乱，弄不清楚。可是咱们人究竟有科学，能够应用逻辑的归纳法，给这许多装着人体的家伙取了个“车”字的类名。

走不到几步路，觉得太费事了，便雇一辆车。身边驶过一乘电车，便不自觉地一足跨了上去。江湾赛马，龙华桃花开，汽车的橡皮轮忙极了。男的女的没处谈心，便驾着马车慢慢地游逛，顺便看看春江的繁华。小脚的女子结伴出游，走得累了，嘻嘻哈哈挤上独轮车，被运回去。

经济时间诚然是天经地义，因为我们生活在时间之流里。但是有一层，一切东西要用得经济，都由于节省下来的有莫大的价值。如其节省下来的毫无价值，讲经济不是绝无目的么？我要请问乘各种车辆的诸位。诸位这么忙迫，忙的是什么？诸位这么经济时间，节省下来的时间干了什么？倘若诸位上车以前，下车以后，不过懒懒地坐，闷闷地愁，闲谈，

打牌，喝酒，睡觉……似乎没有乘车的必要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发表

原题为《时间经济》

说　话

生了一张嘴，本来谁都能够说话。说话若真同鸡鸣犬吠，出于遗传的习性，发自机械的喉咙，那也罢了。可是人的习惯，说出话来总希望他有真实的意思，更希望他与自身行为一致。听人家的话时，也与听几声鸡鸣犬吠不同，还要想：那句话有真实的意思吗？那句话与说话者的行为一致么？为什么人的习惯是如此，研究心理学伦理学等等的人当然能说出许多理由来，我却说不出，只能说人的习惯就是这样。

只要两个人遇见，就有谈话发生。若有一位统计家将一切所谈的话统计一下，一定得出揶揄多于赞扬、谩骂超于评论的结果——我并没有统计过，但直觉告诉我如此。人类真是不长进的东西，总因满身集合着可以揶揄可以谩骂的细胞，才获得被揶揄被谩骂的资格。长此以往，恐怕"应该被揶揄被谩骂的"就是人类的界说了。

但是人总不能飞升到天空中去说话吧？若是能，那么俯视地上，尽可以说你们怎么怎么，自己却不在其内！你们极恶，我一个人独居善；你们丑陋，我一个人独优美；你们应当怎样，我一个人独可以不必。可惜是不可能的！唯其不可能，那末说到"你们"，"我"就在里头，"你们"的极恶丑陋，未必不是"我"的羞；"你们"所应该做的，未必不也是"我"

应该做的。说话的时候不应当仔细想一想么？至少也得审定所谓“你们”以下的话，是“我”确然没有犯的——若是积极方面的话，需是“我”早已这样做的。

现在生了一张嘴说话的人却不然。自己如飞升在天空中，说出话来，都可以加一句注脚：“为你们而言，我是除外的。”说话的人当然希望所说的话发生效力，但是着眼到效力就可以不问自己么？不问自己的人，从公平讲，可以有说话的权利么？

“不以人废言”，恐怕不是说话的人应当说的；在听话的人，当然应当抱这个态度，以期多所进益。至于说话的人，还是要“本真诚而发言”。倘若说话的尽管不问自己，将自己提开一边，一面要人家“不以人废言”，人人如此，谁是听话的呢？所说话不将等于鸡鸣犬吠，但有音声，毫无价值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九日发表

啼　声

睡眠不得宁贴的，莫过于怀中抱着婴孩的母亲了。独对寒月的思妇，含泪阖眼的鳏夫，睡眠都比她宁贴。惟有她，完全抛开了自己，竟不把睡眠当一回事。眼睛虽或阖着，有时也发出疲倦的鼾声，然而心神是永远清醒的。这清醒的心神凝定专一，只守护着熟睡的婴孩，婴孩一伸手，一转侧，没有不感应似地立时觉察出来。不但如此，便是婴孩的一切感觉，没有什么外面表现的感觉，她也能觉察，好像受了神秘的启示。婴孩没有放出饥饿的啼声时，她就给奶吃；婴孩将要张开疲倦的小眼时，她就拥抱得更紧贴一点。这样，她的睡眠就不成其为睡眠了。

妻趺坐着，抱着新生的女婴给奶吃了。昏黄的灯光透过蚊帐，她们俩就占据在这闷热的昏黄的方的空间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细碎的钟摆声不能告诉我们时刻。约略听得窗外有细细屑屑的雨点声，但也不一定是雨点，细听去却又没有了。

女婴吃了一会奶，忽然哭了，声音很激越，有极短的间歇。妻轻轻地拍着她的小身躯，同时发出柔美的睡梦似的呜声。但是没有效果，女婴的啼声依然不止，而且有点沙哑无力了。

我想：今夜妻已经坐起了好几回。她的心神固然永远清醒着，她的身躯总该睡一会儿。现在女婴的啼哭不会一时便歇，要她熟睡，时间当然更长，那么今夜妻的睡眠不将无望了么？

我这么想着，便起来将女婴接过来。同时叫妻躺下去睡，毫不经心地睡；我自会抱她，呜她，待她止了哭，睡熟了，也会拥着她。有几夜我们也曾这么做，不是第一次了。于是妻就侧身躺下，散乱的头发盖着她尚未恢复的苍白的左颊，入睡了。

到了我的床上，我靠着枕头，半躺地坐着。女婴的啼声弛缓而轻微了。她的略微张开的眼睛，有些不成滴的泪痕，似乎瞪视着我。丰满的两颊，堆起的可爱的小嘴唇，虽然二十多天内看惯了，还像乍见似的，只觉得这形象蕴蓄着无限的希望；便在昏晕的灯光里，我的倦眼仍不厌地看着她。我也同妻一样轻轻地拍着她的小身躯，还发出粗劣而不中节的倦怠的呜声。这样不知经过了多少时间，她的啼声听不见了。

女婴向我开口了。这是这样的：她不仅是她，也就是人间无量数的子女和学童。我听了她的话，同时也听了人间无量数的子女和学童的话。我不仅是我，也就是人间无量数的父母和教师。我在听着，人间无量数的父母和教师也在听着。她和我都变化了，一个就是众多，众多就是一个。但是我绝不觉得这回事有点奇怪，只觉得情形本来如此。

她没有开口之前，举起小拳头向我作打击的姿势，眼睛张得很大，射出愤怒的光。语声从小嘴里发出，很有威严，使

我慄然。她说，“你这么拍我，呜我，在你以为是爱我；如其不往深处想，我也可以承认你是爱我。但是，你终究是我的仇敌！”

“这多么足以惊怪，突然指我们是他们的仇敌！既然爱了，为什么又是仇敌呢？”这时候我觉得“我”和“我们”竟是意义相同，可以随便换用的两个代词了，而“她”和“他们”“你”和“你们”也一样。我心里虽然惊怪，却并不开口问她，为的什么，我自己也不明白。

“你们试想，你们所谓爱我们的，有多少意义？不如确切一点说，这是你们自己的游戏和消遣。先问你们：你们曾为我们的身体着想而寻求过适宜的保育方法么？你们曾为我们的智慧着想而给与过有价值的玩具么？你们曾为我们特设过一种好的环境么？你们曾为我们讲说过一些好的话语么？你们曾针对我们的需要而付与过么？你们曾觉察我们的危害而预防过么？总之一句话，你们曾真个为我们尽过一点心么？”

我只是不开口。她的——也可以说他们的——脸上露出鄙夷和嘲讽的神情，接着说，“为什么不开口？答不出来么？自知的确不曾有过，不好意思开口么？看你们那样羞惭的眼光，知道后面一句话我们说中了。真个不曾有过，却还自以为爱我们！这种肤浅的爱值得什么呢？

“你们只是游戏和消遣罢了！不管是什么食品，你们高兴的时候，便是粘韧难以消化的，也同喂猫狗一般给我们吃了。我们所需要的营养料，你们反而不给，因为你们觉得没意思。不管是什么衣物，你们以为可以装饰你们的小玩偶的时候，便是笨重累赘的，也给我们穿了戴了。我们所需要的轻暖舒

适的服饰，你们反而不给，因为你们不喜欢。你们中间穷苦的，给我们吃，有一顿没一顿，给我们穿，掩了下身掩不了上身。黑暗的积满灰尘的屋角里，我们被扔在那里蜷缩着。繁殖着臭虫蚤虱的草铺上，我们被扔在那里躺着。这就是你们的保育方法了。

“你们中间，有些人同牛马一般，肩背上担负着不可堪的工作，要我们帮一点忙，便将笨重的工具授与我们，叫我们软弱无力的小手拿着，也照样工作。有些人读惯了某些书本，看惯了某些画幅，要我们尝到同样的滋味，便将那些书本画幅授与我们，叫我们照样读着看着。你们喜欢赌博，当赢了钱非常乐意的时候，就给我们一副纸牌，叫我们照样玩去。你们喜欢参拜神佛，当参拜完毕，信心坚强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蒲团，叫我们多拜几拜。这些就是你们所给与的玩具了！

“空旷的原野，你们以为是野蛮人居住的地方。葱绿的树林，你们说里边藏着老虎。小刀小斧小锥小凿是下流的木匠的家伙；颜色铅粉有什么用，又不要当什么画小照的穷画工：你们是常常这么说的。你们要将你们的小玩偶造成个又斯文又高贵的东西，所以把我们藏在又方正又简单的房间庭院里。你们的院子和校园，干净到一无所有。你们的房间和课堂里，方方的桌子，方方的椅子，一不小心就会撞破了头，使我们不敢奔跑。你们中间穷苦的，又何尝不希望有那样又方正又简单的房间庭院，将我们养在里边；不过办不到罢了。可是，你们的家又太过狭窄杂乱了，粥锅，便器，草席，桌，凳，种种东西尽将我们挤，将我们挤到了门外。于是我们只能在泥

渍水浸风沙飞扬的街上打滚。这就是你们给与我们的环境！

“你们又何尝同我们谈过话！你们坚信小玩偶不是你们谈话的对手，你们自有你们的高尚而有意义的思想，不是我们所能懂得的，你们中间操劳的，自己当机器还来不及，自然也不同我们谈话。只有你们快活的时候，才‘小宝贝’‘小心肝’地叫一阵；不爽快的时候，就‘讨厌的东西！’‘我要打了！’‘快给我滚开！’地骂一回。这使我们不能想清楚一个念头，说完全一句话，因为想念头和说话都靠谈话做钥匙，而你们对我们只有欢叫和怒骂！

“感谢你们，特地标出极重大的题目，像煞有介事地，教育我们了。你们保存着古昔传下来的记忆，相信这些完全是好的，因为合着你们的脾胃；你们就将全部传授给我们，还希望我们也照样传授下去。我们曾否向你们需要这些，曾否感激你们的传授，你们却完全不问。你们自有你们的模型，我们是烂泥，要制造只供玩耍的泥人儿，将烂泥往模型里按就是了。这就是你们的教育！

“你们自身害了没法治的恶病，毫不经意地把我们生了下来，于是我们终身受冤屈，也害着恶病了。外间疫病流行的时候，你们如无其事，带着我们在病菌飞舞的地方乱走，于是我们得到传染，性命危险了。我们的学龄到了，你们随随便便地，把我们送进一个学校就算。我们的恶习萌芽了，你们还从旁赞扬，说你们的小玩偶乖觉。你们就是这样地不关心我们！

“总之，你们起劲的时候，便想起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取出来玩弄一番，正像猫儿弄垂死的老鼠当游戏，老太

太用骨牌打五关做消遣。要是你们不起劲，没工夫，就同没有我们一样，我们被搁在一旁，在你们的心意中占不到百分之一的地位。

"你们究曾真个为我们尽过一点心么？一点，只要有一点，我们就承认你们有真个爱我们的根苗了。但是，这一点在哪里！"

她的——他们的——面容变得惨厉，声音带着凄楚了。我只是醉迷迷地听，不想开口。

"我们是要不停地前进，向将来走去的。这将来虽然尚在前方，但我们可以预测，多一半是惨酷的遭遇。我们固然要奋发自己的能力，和那些惨酷的遭遇斗争。可是我们已经做了你们的玩物，你们的消遣品，我们已经被损害了。斗争的结果怎么样，正难说呢！

"你们听着：我们的身体将脆弱而多病！我们的情感将淡漠而无所属！我们的思想将拘束而不得自由！我们将无所有，无所能！我们将微小如沙粒，卑弱如蚯蚓！这都是你们的赏赐！你们究竟爱我们么？

"我们不曾请求你们做父母做教师呵！你们既然不自谦地做了，爱我们就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却不能爱！不能爱也罢了，退一步说，总该不给我们损害。你们偏又随时随地给我们损害！你们不是我们的仇敌么？

"我们不愿有虚幻的奢侈的希望——希求你们的爱，只欲抗拒你们将我们作游戏和消遣，就是你们自以为爱我们的那一套。至于我们，也决不能爱你们，因为我们没有受到你们一点好处，你们是我们的仇敌，不给帮助反加损害的仇敌！"

她说着，哀哀地愤愤地哭了，我听见他们哀哀地 愤 愤 地 哭了。

妻的不眠的心神感应着女婴的哭声，半身爬起来，揭开蚊帐唤我。我醒了，听得稀疏的雨点敲着白铁水落的寂寞的声响。女婴在我臂弯里啼着，一副愁苦的脸，小胳臂用力舞动，手握着小拳头。

妻温柔地说，"我的心肝，到妈妈怀里来吧！"

我起身抱女婴给她，心中迷惘地想，"不要妈妈爸爸的，且求不至于做她的仇敌吧！"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作毕

记 徐 玉 诺

假设我没有记忆，
现在我已是自由的了。
人类用记忆把自己缠在笨重的木桩上。

这是玉诺许多杂诗中的一首。他对记忆最感愤慨，他辨出了记忆的昧道。在又一首小诗里，他说：

当我走入了生活的黑洞
足足的吃饱了又苦又酸的味道的时候，
我急吞吞的咽了咽；
我就又向前进了。
历史在后边用锥子刺我的脊梁筋；
我不爱苦酸，我却希望更苦更酸的味道。

他的记忆确是非常酸苦的。只就他的境遇来说：他的家乡在河南鲁山县，是兵和匪的出产地。他眼见捎着枪炮杀人的人扬长走过；他眼见被杀的尸骸躺在山野间；他眼见辛苦的农人白天给田主修堡垒，夜间又给田主守堡垒，因为要防抢劫；他在因运兵而断绝交通的车站旁边，眼见在尘土里挣

扎的醉汉，只求赏一个钱的娼妓，衙门里的老官僚，沿路赌博的赌棍，东倒西歪的烟鬼和玩弄手枪的土匪，而且与他们作伴。当初与他一起的，后来他觉得他们变了，虽然模样依旧，还能认识；这更使他伤心得几乎发狂，尝到了记忆的最酸苦的味道。他曾经对我说："在我居住的境界里，似乎很复杂，却也十分简单，只有阴险和防备而已！"我虽然不知道他所有的记忆，只就"阴险和防备"来想，倘若拿来搁在舌尖上，就足以使我们哭笑不得了。

他咒诅"阴险和防备"的境况和人物的诗很多。在这样的境况和人物之中，当然只有咒诅，只有悲痛，而无所期求。但是在咒诅倦了，悲痛像波浪一样暂时平息了的时候，他羡慕"没有一点特殊的记忆"的海鸥。当然，他要像海鸥似的，漂浮在"不能记忆的海上"生活，是做不到的。所以他赞美颠倒记忆的梦幻，羡慕泯没记忆的死灭，以为在这两种境界里，尝到的总不是现在尝到的酸苦的味道了。但是，梦幻不会破空飞来，死灭又不可骤得，这又引起他深沉的悲叹。试读以下两首诗：

现实是人类的牢笼，

幻想是人类的两翼。

*

一只小鸟——失望的小东西——

他的两翼破碎而且潮湿；

他挣扎着起飞，

但他终归落下。

呵，可怜的脱不出牢笼的人呀！

——《现实与幻想》

自杀还算得有意义的：
没意义的人生，
他觉得自杀也是没趣味。

——《小诗》

不过他在一首《春天》里，起先叙了小鸟、小草、小孩对于春天的赞颂，以下说：

失望的哲学家走过，
逗留着无目的的寻求；
搂一搂乱发，
慈祥的端详着小鸟，小草，小孩……
仿佛这……告诉他说虚幻的平安。
倦怠的诗人走过，
擦一擦他的眼泪，微笑荡漾在枯皱的额上，
仿佛这……点缀了他梦境的美丽。

在现实的境界里，足以使他暂时满足的只有“虚幻的平安”和“梦境的美丽”的自然景物了。他最喜爱和自然景物相亲；不仅相亲，他能融化陶醉在自然景物之中，至于忘了自己。去年的初夏，他到杭州去，中途在我的乡间住了三天，那正是

新苗透出不容易描绘的绿，云物清丽，溪水涨满的时候。我因为工作忙，不能每天陪着他玩。他看惯了中原的旷野，骤然见到江南的田畴，格外觉得新鲜有趣。他独自赤着脚，跨进水齐到膝盖的稻田，抚摩溪上的竹树，采访农家的小女孩，憩坐在临门的小石桥阑干上，偃卧在开着野花的坟墓上，回来告诉我说："我已经领略了所见的一切的意思。"后来他回鲁山去了，还在信里问起他抚摩过的竹树和踏过的稻田。他描写景物的诗，与其说是描写，不如说是他自己与自然融化的诗，都有奇妙的表现力，"这一片树叶拍着那一片"，"一片片小叶都张开它的面孔来，一个个小虫都睁开它的眼睛来"。他常常有奇妙的句子花一般怒放在他的诗篇里，不在于别的，在于他有特别灵敏的感觉。他并不是故意做作，感觉到这样，就这样写下来了。不仅是写景物的诗，他所有的诗都如此。他并不把写诗当一回事，像猎人搜寻野兽那样。在感觉强烈，情绪兴奋的时候，他不期然而然地写了；写出来的，我们叫它做诗。他的稿子往往有许多别字和脱漏的地方。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仔细一点儿写？他说："我这样写，还恨我的手指不中用。仔细一点儿写，那些东西就逃掉了。"这就可知他的诗有时不免结构松散，修辞草率的缘故。但是也可知他的诗所以那么自然，没有一点儿雕凿的痕迹，那么真实，没有一点儿无谓的呻吟。

他虽然有时陶醉在自然里，但是"记忆"像锥子似的在背后刺他，他不能不醒来，醒来的时候当然还是愤慨；他在福州，大半是为了吃饭，所以他觉得"勉强"。他曾经对我说："我一切都有些勉强。"既然"勉强"，热带的密林和微风的海边，于

他都漠然了，他只是恋念遥远的故乡。故乡虽然是兵和匪的巢穴，然而有他的母亲父亲在那里。他还没到福州，在途中就有一首题为《给母亲的信》的诗：

当我迷迷糊糊的思念她的时候，
　　就心不自主的写了一封信给她。
——料她一字不识——
待我用平常的眼光，
　　一行一行看了这不甚清晰的字迹时，
我的眼泪就像火豆一般，
　　经过两颊，滴在灰色的信纸上了。

他写了许多恋念故乡的诗。在那些诗里，爱慕母亲之外，还记挂鲁山的山谷，草原，田园，家里的小弟弟，两头母牛，三头牛犊，以及父亲的耕耘，小弟弟的玩弄小石子与他自己的割草。他的心时时飞过林原和海天，翱翔在所爱的故乡。他的爱实在很热烈而广大。他所以有咒诅的声音，就像鲁迅先生说爱罗先珂那样，叫做无所不爱而不得所爱的悲哀。所以他一方面咒诅，一方面又宽恕被咒诅的，同时还加上十分的怜悯。这种情形在他的诗里时常可见。从这里就可以推知他对于和他心灵相通的几个人是怎样的热诚而天真地相爱了。

他脸色苍黄，眼睛放射出神秘的光，"乱发乘风飘拂"，不常剃的短髭围着唇边。绍虞兄看了他的相片，说他是个神秘家。我说有些儿意思，但是你如果与他见面，即使不开口谈话，就能感到他真朴的心神。在他乘着小汽轮来我的乡间那

时候，我在埠头听见报到的汽笛，期待的心紧张到十二分了。汽轮泊定，乘客逐一登岸，我逐一打量。在许多客人的后面，一个人穿黑布衣服，泥污沾了很多，面貌像前面说的那样，一手拿一个轻巧的铺盖，一手提一只新的竹丝篮，中间满盛着枇杷香蕉等果品。我仿佛受着神秘的主宰命令似的，抢先紧握着他的胳膊，"你——玉诺？"他的目光注定在我的脸上，几乎使我想要避开，端详了一会儿，才把铺盖也提在提篮子的手里，随即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圣陶！"这当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只感到满足，至今也忘不了。

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发表

原题为《玉诺的诗》

节育的本义

有些人听到节育问题，就要想到一个可怕的景象。这景象是这样：世界上全是衰老的男的女的，没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人类寿命的延续者。后来那些男的女的全死了，世界上的人声就此寂灭，只剩鸟兽草木在那里作主人；人类光荣的历史，同毁灭的星球一样，从此没有这回事。

这个景象在具有种族延续的本能的人类，当然是可怕；可怕在什么地方虽说不出，总是个异常的空虚。但是实行了节育主义，是不是就会产生这个景象？换一句说，是不是有了节育这个因，这个景象一定是它的果？这是必需讨论的；否则这种想念或许是过虑，倒为此惊怕，很有点儿不值得。

为希望读者注意起见，先将讨论的结果提前述说，就是：这种想念竟是一种过虑，节育并不会产生人类绝灭的果。以下再述说我的意思。

一般人看“节制”这个词往往误会，以为这含有消极的意思，节制什么就是不要做什么。其实节制与“适当”“合宜”有相类的意思，一件事做到刚合恰好，才叫做“有节制”，譬如用钱，当用的地方毫不吝惜，不当用的地方毫不妄费，才可算能够节用；单单握住了钱不用，便入吝啬一路，实在说不到什么节制。明白了这一点，才知节育不是不要产育，乃是

不要过量的或不适当地产育。节育主义并没有教人家绝对不要产育，假若世间的人全都误会地信奉了它，到末了人类竟致绝灭，罪名也不应归到它的身上。

有人就要说，罪名不应归到它的身上，果真不错，但人家误会了，竟成绝对不产育，究竟是可怕的事。然而这也是一种过虑。人自有希望有孩子的心情，有时并不为什么，却觉得这种心情十分强烈。在这等情形之下，又没有过量或不适当地产育的嫌虑，那就尽管可以产育，而且所得的安慰一定很满足，所产的孩子一定很佳健。至于因物质上精神上的关系而不适宜于产育的，当然不产育是他们的幸福。但何至便有人类绝灭的忧虑呢？人类寿命延续的责任，并不全担在他们身上。

从上面所说的意思，可以知道节育主义的本意不是绝对不要产育，在事实上，人类又决不会全体不产育。所以像篇首所说的景象，終于是一个幻想而已，决不会实现，惊怕的心可以放下了，不妨回过来看一看我们自己！

我们曾经过量地产育么？我们的心力能够担负过量地产育么？我们子女的出生都适当么？我们愿意在不适当的情形之下而有子女么？这么逐一自问，我们就见得产育这件事，有节制的必要！——但不是否定这件事，不要有这件事。我们可以觉悟，不论什么事情，有预计的总比较好一点，而产育这件事就是这样。节育只不过是一种预计的结果，同开了预算表用钱，定了计划表办事一个样子。说它平常，真是平常不过的事，决不至涉及道德衰败的问题。有些人恐怕道德将因它而衰败，这不免与人类绝灭一样是个幻象。

幻象往往导致迷乱。切身的问题，总要不被幻象所惑才好。

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四日作

纵欲与堕胎

近来颇有人投函本社询问纵欲的方法，也有人问及堕胎的方法。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会。我们不得不向投函者郑重声明：我们的途径与他们是完全不一致的。

我们所取的是严肃的态度，不含有一丝一毫游戏或放纵的意味。同时对于社会、家庭、道德、经济、个人自由、群众健康，都抱着无限的热诚，希望进于优善的境地，而不至于退败，因为这里边含着一种人道的精神。凡是不合于人道精神的举措，都是我们所排斥的，不愿意做的。

我们确信要解决人的问题，生物学的诏示总是一种很重要的指导，因为人也是生物。生物有持续种族的本能，表现于外时便是性交。所以我们不赞成禁欲！——禁欲主义虽然有人提倡而且实行，这是各人的自由，而不是可以强制多数人的。应当认清，不赞成禁欲不就是提倡纵欲。所谓不禁，乃是不去阻遏本能的意思；不是让它特别发展，以致占了整个生活的大部分。譬如饿了自然要吃，我们不赞成捱饿，但决不是主张进食无度，没有节制，以致损伤了胃肠。误会我们的人大概除了具有生物的本能以外，还受到一种很不严肃的教育，所有非人的小说和图画、秽狎的谈话和观念，都是他们的指导者。他们慢慢地变了，成了一种病象，以本能为游

戏，以生命为消遣！他们贪溺追求，不能自已，还来询问我们。误入迷途的人呀，请你们认清自己，回到生物的路上，与其他生物取同一的步骤吧！你们看别种生物，决无以本能为游戏的。

至于堕胎，确然是一件不道德的事。这没有什么深义奥旨，只要懂得杀人是不道德，就可明白堕胎不道德了。胎儿也是一个人，只不过在蛰伏期罢了。不论已出生或正在蛰伏的人，对于社会都负担持续的责任。倘若我们杀人，被杀者生命见夺，社会中则少了一员担任持续的人，这是何等的不道德呢！并且堕胎这事何等惨酷！明知这具有生命的小形体，正熟睡似地在那里逐渐发育，突然施以毒害，剥夺他的生命，停止他的发育，我想谁也不能安心这样做吧。可怜的人呀，请你们想及应具的道德和仁爱为怀的人道精神，万万不要做这可怜的事——堕胎吧。

除了持禁欲主义者，我们以为一般人应走的路是这样：在不至放纵的范围以内，任本能之自然，并不加以禁遏。但从自己的幸福、健康、经济、教育能力、对于幼者的爱等等着想，就不希望这种本能多所结果。不道德的残酷的勉强的制止法决不应使用，所以宜以有效的合于卫生的方法，防止那不希望结果时的结果——愿意结果时当然不用防止，也自能结果。这是“节育”两字的正确的解释。

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日发表

节自《时事新报·现代妇女》社评

没有秋虫的地方

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生活，鹁鸽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秋虫的声息。并不是被那些欢乐的劳困的宏大的清亮的声音淹没了，以致听不出来，乃是这里根本没有秋虫。啊，不容留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地方！

若是在鄙野的乡间，这时候满耳朵是虫声了。白天与夜间一样地安闲；一切人物或动或静，都有自得之趣；嫩暖的阳光和轻淡的云影覆盖在场上，到夜呢，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歇，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踌躇满志。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众妙毕集，各抒灵趣，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

虽然这些虫声会引起劳人的感叹，秋士的伤怀，独客的微喟，思妇的低泣；但是这正是无上的美的境界，绝好的自

然诗篇，不独是旁人最喜欢吟味的，就是当境者也感受一种酸酸的麻麻的味道，这种味道在另一方面是非常隽永的。

大概我们所祈求的不在于某种味道，只要时时有点儿味道尝尝，就自诩为生活不空虚了。假若这味道是甜美的，我们固然含着笑来体味它；若是酸苦的，我们也要皱着眉头来辨尝它，这总比淡漠无味胜过百倍。我们以为最难堪而亟欲逃避的，唯有这个淡漠无味！

所以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多感，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一口苦水胜于一盏白汤，一场痛哭胜于哀乐两忘。这里并不是说愉快乐观是要不得的，清健的醒是不必求的，甜汤是罪恶的，狂笑是魔道的；这里只是说有味远胜于淡漠罢了。

所以虫声终于是足系恋念的东西。何况劳人秋士独客思妇以外还有无量数的人。他们当然也是酷嗜趣味的，当这凉意微逗的时候，谁能不忆起那美妙的秋之音乐？

可是没有，绝对没有！井底似的庭院，铅色的水门汀地，秋虫早已避去惟恐不速了。而我们没有它们的翅膀与大腿，不能飞又不能跳，还是死守在这里。想到“井底”与“铅色”，觉得象征的意味丰富极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作

藕与莼菜

同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然怀念起故乡来了。若在故乡，每当新秋的早晨，门前经过许多乡人：男的紫赤的胳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躯干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健康的感觉；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头巾，虽然赤脚，却穿短短的夏布裙，躯干固然不及男的那样高，但是别有一种健康的美的风致；他们各挑着一副担子，盛着鲜嫩的玉色的长节的藕。在产藕的池塘里，在城外曲曲弯弯的小河边，他们把这些藕一再洗濯，所以这样洁白。仿佛他们以为这是供人品味的珍品，这是清晨的画境里的重要题材，倘若涂满污泥，就把人家欣赏的浑凝之感打破了；这是一件罪过的事，他们不愿意担在身上，故而先把它们洗濯得这样洁白，才挑进城里来。他们要稍稍休息的时候，就把竹扁担横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随便拣择担里过嫩的"藕枪"或是较老的"藕朴"，大口地嚼着解渴。过路的人就站住了，红衣衫的小姑娘拣一节，白头发的老公公买两支。清淡的甘美的滋味于是普遍于家家户户了。这样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课，直到叶落秋深的时候。

在这里上海，藕这东西几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从我们故乡运来的。但是数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华公子硕腹巨贾的帮闲茶房们把大部分抢去了；其馀的就要供在较大的水果

铺里，位置在金山苹果吕宋香芒之间，专待善价而沽。至于挑着担子在街上叫卖的，也并不是没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和腿，就是涩得像未熟的柿子，实在无从欣羡。因此，除了仅有的一回，我们今年竟不曾吃过藕。

这仅有的一回不是买来吃的，是邻舍送给我们吃的。他们也不是自己买的，是从故乡来的亲戚带来的。这藕离开它的家乡大约有好些时候了，所以不复呈玉样的颜色，却满被着许多锈斑。削去皮的时候，刀锋过处，很不爽利。切成片送进嘴里嚼着，有些儿甘味，但是没有那种鲜嫩的感觉，而且似乎含了满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兴，他把这许多片嚼完，居然有半点钟工夫不再作别的要求。

想起了藕就联想到莼菜。在故乡的春天，几乎天天吃莼菜。莼菜本身没有味道，味道全在于好的汤。但是嫩绿的颜色与丰富的诗意，无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在每条街旁的小河里，石埠头总歇着一两条没篷的船，满舱盛着莼菜，是从太湖里捞来的。取得这样方便，当然能日餐一碗了。

而在这里上海又不然，非上馆子就难以吃到这东西。我们当然不上馆子，偶然有一两回去叨扰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莼菜上市的时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过。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亲戚来了，送他瓶装的西湖莼菜 他送给我一瓶，我才算也尝了新。

向来不恋故乡的我，想到这里，觉得故乡可爱极了。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起这么深浓的情绪？再一思索，实在很浅显：因为在故乡有所恋，而所恋又只在故乡有，就萦系着不能割舍了。譬如亲密的家人在那里，知心的朋友在那

里，怎得不恋恋？怎得不怀念？但是仅仅为了爱故乡么？不是的，不过在故乡的几个人把我们牵系着罢了。若无所牵系，更何所恋念？像我现在，偶然被藕与莼菜所牵系，所以就怀念起故乡来了。

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七日作

将　离

跨下电车，便是一阵细且柔的密雨。旋转的风把雨吹着，尽向我身上卷上来。电灯光特别昏暗，火车站的黑影兀立在深灰色的空中。那边一行街树，枝条像头发似的飘散舞动，萧萧作响。我突然想起：难道特地要叫我难堪，故意先期做起秋容来么！便觉得全身陷在凄怆之中，刚才喝下去的一斤酒在胃里也不大安分起来了。

这是我的揣想：天日晴朗的离别胜于风凄雨惨的离别，朝晨午昼的离别胜于傍晚黄昏的离别。虽然一回离别不能二者并试以作比较，虽然这一回的离别还没有来到，我总相信我的揣想是大致不谬的。然而到福州去的轮船照例是十二点光景开的，黄昏的离别是注定的了。像这样入秋渐深，像这样时候吹一阵风洒一阵雨，又安知六天之后的那一夜，不更是风凄雨惨的离别呢？

一件东西也不要动：散乱的书册，零星的原稿纸，积着墨汁的水盂，歪斜地摆着的砚台……一切保持原来的位置。一点儿变更也不让有：早上六点起身，吃了早饭，写了一些字，准时到办事的地方去，到晚回家，随便谈话，与小孩胡闹……一切都是平淡的生活。全然没有离别的气氛，还有什

么东西会追紧来？好像没有快要到来的这回事了。

记得上年平伯去国，我们一同在一家旅馆里，明知不到一小时，离别的利刃就要把我们分割开来了。于是一启口一举手都觉得有无形的线把我牵着，又似乎把我浑身捆紧；胸口也闷闷的不大好受。我竭力想摆脱，故意做出没有什么的样子，靠在椅背上，举起杯子喝口茶，又东一句西一句地谈着。然而没有用，只觉得十分勉强，只觉得被牵被捆被压得越紧罢了。我于是想：离别的气氛既已凝集，再也别想冲决它，它是非把我们拆开来不可的。

现在我只是不让这气氛凝集，希望免受被牵被捆被压的种种纠缠。我又这么痴想，到离去的一刻，最好恰正在沉酣的睡眠里，既泯能想，自无所想。虽然觉醒之后，已经是大海孤轮中的独客，不免引起深深的惆怅；但是最难堪的一关已经闯过，情形便自不同了。

然而这气氛终于会凝集拢来。走进家里，看见才洗而缝好的被袱，衫裤长袍之类也一叠叠地堆在桌子上。这不用问，是我旅程中的同伴了。"偏要这么多事，事已定了，为什么不早点儿收拾好！"我略微烦躁地想。但是必须带走既属事实，随时预备尤见从容，我何忍说出责备的话呢——实在也不该责备，只该感激。

然而我触着这气氛了，而且嗅着它的味道了，与上年在旅馆里感到的正是同一的种类，不过还没有这样浓密而已。我知道它将要渐渐地浓密，犹如西湖上晚来的烟雾；直到最后，它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便会把我一挤；我于是不自主地离

并这里了。

我依然谈话，写字，吃东西，躺在藤椅上；但是都有点儿异样，有点儿不自然。

夜来有梦，梦在车站月台旁。霎时火车已到，我急忙把行李提上去，身子也就登上，火车便疾驰而去了。似乎还有些东西遗留在月台那边，正在检点，就想到遗留的并不是东西，是几个人。很奇怪，我竟不曾向他们说一声"别了"，竟不曾伸出手来给他们；不仅如此，登上火车的时候简直把他们忘了。于是深深地悔恨，怎么能不说一声，握一握手呢！假若说了，握了，究竟是个完满的离别，多少是好。"让我回头去补了吧！让我回头去补了吧！"但是火车不睬我，它喘着气只是向前奔。

这梦里的登程，全忘了月台上的几个人，与我痴心盼望的酣睡时离去，情形正相仿佛。现在梦里的经验告诉我，这只有勾引些悔恨，并不见得比较好些。那么，我又何必作这种痴想呢？然而清醒地说一声握一握的离别，究竟何尝是好受的！

"信要写得勤，要写得详；虽然一班轮船动辄要隔三五天，而厚厚的一叠信笺从封套里抽出来，总是独客的欣悦与安慰。"

"未必能够写得怎样勤怎样详吧。久已不干这勾当了；大的小的粗的细的种种事情箭一般地射到身上来，逐一对付已经够受了，知道还有多少坐定下来执笔的功夫与精神！"

离别的滋味假若是酸的，这里又搀入一些苦辛的味道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二日作

客　语

侥幸万分的竟然是晴明的正午的离别。

“一切都安适了，上岸回去吧，快要到开行的时刻了。”似乎很勇敢地说了出来，其实呢，处此境地，就不得不说这样的话。但也不是全不出于本心。梨与香蕉已经买来给我了，话是没有什么可说了；夫役的扰攘，小舱的郁蒸，又不是什么足以赏心的；默默地挤在一起，徒然把无形的凄心的网织得更密罢了，何如早点儿就别了呢？

不可自解的是却要送到船栏边，而且不止于此，还要走下扶梯送到岸上。自己不是快要起程的旅客么？竟然充起主人来。主人送了客，回头踱进自己的屋子，看见自己的人。可是现在——现在的回头呢？

并不是懦怯，自然而然看着别的地方，答应“快写信来”那些嘱咐。于是被送的转身举步了。也不觉得什么，只仿佛心里突然一空似的（老实说，摹写不出了）。随后想起应该上船，便跨上扶梯；同时用十个指头梳满头散乱的头发。

倚着船栏，看岸上的人去得不远，而且正回身向这里招手。自己的右手不待命令，也就飞扬跋扈地舞动于头顶之上。忽地觉得这刹那间这个境界很美，颇堪体会。待再望岸上人，却已没有踪迹，大概拐了弯赶电车去了。

没有经验的想象往往是外行的，待到证实，不免自己好笑。起初以为一出吴淞口便是苍茫无际的海天，山头似的波浪打到船上来，散为裂帛与抛珠，所以只是靠着船栏等着。谁知出了口还是似尽又来的沙滩，还是一抹连绵的青山，水依然这么平，船依然这么稳。若说眼界，未必开阔了多少，却觉空虚了好些；若说趣味，也不过与乘内河小汽轮一样。于是失望地回到舱里，爬上上层自己的铺位，只好看书消遣。下层那位先生早已有时而猝发的鼾声了。

实在没有看多少页书，不知怎么也朦胧起来了。只有用这朦胧二字最确切，因为并不是睡着，汽机的声音和船身的微荡，我都能够觉知，但仅仅是觉知，再没有一点思想一毫情绪。这朦胧仿佛剧烈的醉，过了今夜，又是明朝，只是不醒，除了必要坐起来几回，如吃些饼干牛肉香蕉之类，也就任其自然——连续地朦胧着。

这不是摇篮里的生活么?婴儿时的经验固然无从回忆，但是这样只有觉知而没有思想没有情绪，该有点儿相像吧。自然，所谓离思也暂时给假了。

向来不曾亲近江山的，到此却觉得趣味丰富极了。书室的窗外，只隔一片草场，闲闲地流着闽江。彼岸的山绵延重叠，有时露出青翠的新妆，有时披上轻薄的雾帔，有时不知从什么地方来了好些云，却与山通起家来，于是更见得那些山郁郁然有奇观了。窗外这草场差不多是几十头羊与十条牛的领土。看守羊群的人似乎不主张放任主义的，他的部民才吃了一顿，立即用竹竿驱策着，叫它们回去。时时听得仿佛

有几个人在那里割草的声音，便想到这十头牛特别自由，还是在场中游散。天天喝的就是它们的奶，又白又浓又香，真是无上的恩惠。

卧室的窗对着山麓，望去有裸露的黑石，有矮矮的松林，有泉水冲过的涧道。间或有一两个人在山顶上樵采，形体藐小极了，看他们在那里运动着，便约略听得微茫的干草瑟瑟的声响。这仿佛是古代的幽人的境界，在什么诗篇什么画幅里边遇见过的。暂时充当古代的幽人，当然有些新鲜的滋味。

月亮还在山的那边，仰望山谷，苍苍的，暗暗的，更见得深郁。一阵风起，总是锐利的一声呼啸一般，接着便是一派松涛。忽然忆起童年的情景来：那一回与同学们远足天平山，就在高义园借宿，稻草衬着褥子，横横竖竖地躺在地上。半夜里醒来了，一点儿光都没有，只听得洪流奔放似的声音，这声音差不多把一切包裹起来了；身体颇觉寒冷，因而把被头裹得更紧些。从此再也不想睡，直到天明，只是细辨那喧而弥静静而弥旨的滋味。三十年来，所谓山居就只有这么一回。而现在又听到这声音了，虽然没有那夜那么宏大，但是往后的风信正多，且将常常更甚地听到呢。只不知童年的那种欣赏的心情能够永永持续否……

这里有秋虫，有很多的秋虫，没有秋虫的地方究竟是该诅咒的例外。躺在床上听听，真是奇妙的合奏，有时很繁碎，有时很凝集，而总觉得恰合刚好，足以娱耳。中间有一种不知名的虫，它们的声音响亮而曼长，像是弦乐，而且引起人家一种想象，仿佛见到一位乐人在那里徐按慢抽地演奏。

松声与虫声渐渐地轻微又轻微，终于消失了……

仓前山差不多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尤其可爱的是晚阳淡淡的时候，礼拜堂里送出一声钟响，绿荫下走过几个张着花纸伞的女郎。

跟着绍虞夫妇前山后山地走，认识了两相仿佛的荔枝树与龙眼树，也认识了长髯飘飘的生着气根的榕树，眺望了我们所住的那座山，又看了胭脂似的西边的暮云，于是坐在路旁的砖砌的矮栏上休息。渐渐地四围昏暗了，远处的山只像几笔极淡的墨痕染渍在灰色的纸上。乡间的女人匆匆地归去，走过我们身边，很自然地向我们看一看。那种浑朴的意态，那种奇异的装束（最足注目的是三支很长的银发钗，像三把小剑，两横一竖地把发髻拢住，我想，两个人并肩走时，横插的剑锋会划着旁人的头皮），都使我想到古代的人。同时又想，什么现代精神，什么种种的纠纷，都渺茫得像此刻的远山一样，仿佛沉在梦幻里了。

中秋夜没有月，这倒很好，我本来不希望看什么中秋月。与平常没有月亮的晚上一样，关在书室里，就美孚灯光下做了一点功课，就去睡了。

第二天的傍晚，满天是云，江面黯然。西风震动窗棂，“吉格”作响。突然觉得寂寥起来，似乎无论怎样都不好。但是又不能什么都不，总要在这样那样里占其一，这时候我占的是倚窗怅望。然而怅望又有什么意思呢？

绍虞似乎有点儿揣度得出，他走来邀我到江边去散步。水波被滩石所挡，激触有声。还有广遍而轻轻的风一般的音响平铺在江面上，潮水又退出去了。便随口念旧时的诗句："潮声应未改，客绪已频更。"七年以前，我送墨林去南通。出得城来，在江滨的客店里歇宿候船，却成了独客。荒凉的江滨晚景已够叫人怅怅，又况是离别开始的一晚，真觉得百无一可了。聊学雅人口占一诗，藉以排遣。现在这两句就是这一首诗里的。唉，又是潮声，又是客绪！

所谓客绪，正像冬天的浓云一般，风吹不散，只是越凝集越厚，散步的药又有什么用处。回到屋里，天差不多黑了，我们暂时不点火，就在昏暗中坐下。我说："介泉在北京常说，在暮色苍茫之际，炉火微明，默然小坐，别有滋味。"绍虞接应了一声就不响了。很奇怪，何以我和他的声音都特别寂寞，仿佛在一个广大的永寂的虚空中，仅仅荡漾着这一些声音，音波散了，便又回复它的永寂。

想来介泉所说的滋味，一定带着酸的。他说"别有"，诚然是"别有"，我能够体会他的意思了。

点灯以后，居然送来了切盼而难得的邮件，昨天有一艘轮船到这里了。看了第一封，又把心挤得紧一点。第二封是平伯的，他提起我前几天作的一篇杂记，说："……此等事终于无可奈何，不呻吟固不可，作呻吟又觉陷于怯弱。总之，无一而可，这是实话。……"

似乎觉得这确是怯弱，不要呻吟吧。

但是还要去想，呻吟为了什么？恋恋于故乡么？故乡之足以恋恋的，差不多只有藕与莼菜这些东西了，又何至于呻

吟？恋恋于鹁鸽箱似的都市里的寓居么？既非鹁鸽，又何至于因为飞开了而呻吟？老实地说，简括地说，只因一种愿与最爱与同居的人同居的心情，忽然不得满足罢了。除了与最爱与同居的人同居，人间的趣味在哪里？因为不得满足而呻吟，正是至诚的话，有什么怯弱不怯弱？那么，又何必不要呻吟呢？

呻吟的心本来如已着了火的燃料，浓烟郁结，正待发焰。平伯的信恰如一根火柴，就近一引，于是炽盛地燃烧起来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作

转 过 头 来

客中的心绪，陈套一点说，自然是“麻乱”，但实在是简单到二十四分的，只不过一个“怅怅然”罢了。说这由于想那恋念着的谁某，由于想那萦系着的什么，当然最能取得人家心意的默许；他们会得这样反证，不为了那些，又为什么至于怅怅然呢？然而殊未必。有时候一念突起，仿佛荒林中赶出来一个猎户，他要堵住一些刚才在这里乱窜的野兽——那些忽藏忽露忽闪忽现的思念。可是没有，连一根毛一个影子都没有！似乎刚才觉得有野兽在这里乱窜仅是一种幻觉，其实这里只有空虚的荒林与死样的沉寂。于是猎户迷疑而发呆了：他不想起所顶何天，所履何地，所形何人，甚至把自己都忘了。试想所有的思念既然轻微淡漠到这样，至于不可捉摸，还能说是在想着所恋念的所萦系的么？然而唯有这样地轻微淡漠，捉摸它不着，不捉摸又来了，所以时刻感觉被裹在个薄薄的“怅怅然”的网里；——也可说堕入一个循环：因也是怅怅然，果也是怅怅然。

低头做功课，也只是微弱的强制力勉强在支持着罢了。这可以把乐器的弦线来比喻：细韧的弦线找不到，固然可以把粗松一点的蹩脚货来凑数。从外貌看，这乐器张着齐整的弦线，一挥指，也能够发出“卜东”一声。但是粗松的弦线经不

起弹拨，只要你多弹一会儿或者用力重一点儿，它就"拍"的一声断了。当然，你可以把它重行续上；然而弹不到一会儿，它又"拍"的断了！断是常，不断是变，不能弹是常，能弹是变：这蹩脚的弦线还要得么！可怜我仅有这蹩脚的弦线，这微弱的强制力，所以"神思不属"是常，而"心神倾注"是变了。

在这屡屡神思不属的当儿，如其听到窗外有细碎的鞋底擦着沙地的声音，中间偶尔夹着轻松而短促的一声"蓬"，便淡漠地想："他们又在那里玩篮球了。"这样的听到，这样的想，与其说原于知觉，不如说仅是反应，似乎中间只有很简单的联系。倘若感受得回数多一些，恐怕渐就疲癃，终于连这一点儿反应也没有了，竟成为冥顽无觉了。

但是我还不曾看过一回他们玩篮球。十三四岁的时候，学校里的运动场还没有铺好，刚铺了一层小石块，预备在上面铺一层沙土，再用铁磙碾得坚结平贴。我们却等不及了，捧出皮球就踢；也无所谓双方的门和界线，无所谓门守冲锋等等的分职，只是朝着球跑，见球下落就抢，抢着了就举足把它踢出去而已。我虽然难得抢到球，就是抢到了，踢起来也高过我的头不多，而且脚背上总感觉麻辣辣的痛，可是奔跑和抢的勇气决不让于能踢高球的几位同学。有一天，记得是傍晚时候，书包已拿在手中，预备回家了，只因对于那个球还有点儿恋恋，所以不曾离开运动场。正在奔逐之际，突然间耳际"砰"的一响，左颊受着猛烈的一击，就跌倒在地上。当时也想不起这是什么，只觉得一块又大又结实的东西，不知为什么撞到了我的脸上来；那"砰"的响声渐次转为粗浊，延绵不断，似乎什么地方在轻轻地打鼓。"血！"同学们

把我扶起时吃惊地嚷着。我迷糊地依着他们的指示看去，是右膝盖，裤子破了，可以看见溢出的鲜血和裂开的皮肉。我才觉得痛，不可忍受的痛。同学把我扶回家里，让我躺在床上。这伤处很不巧，只要动一动，已经凝合的伤口又裂开了，又涌出血来。我一动不敢动，整整地僵卧了一个星期，方能起身到学校。这自然与没有这回事一样了。然而不然，看见了在场上腾跃着的皮球就觉得有点儿怕，再也没有追赶它，把它抢在手中，举起足来踢它的勇气了。有几回自己策励着说，"怕什么，这点儿小痛楚！何况皮球又不会天天撞到脸上来。"虽然这样想，两条腿总像被无形的绳索牵住了，总不肯再跨进运动场，加入踢足球的队伍。我对球类游戏的这一段回溯，成为现在不想看一看在楼下玩篮球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以说受了"怅怅然"之毒。不看固怅怅然，看了也无非怅怅然，反正一样，倒不如省去从桌子前走到窗前去的麻烦。

这一天上午，绍虞走来闲谈，不知从什么谈到了午后的篮球比赛。他说："今天这十个人是这里最好的两组，在福州地方，他们是常胜军。"我的心一动，但是随后就淡忘了，既不复想起刚才心头曾有这么一动，当然不会想起为什么而动。午后，已经四点多了，蛎粉墙上映着淡淡的斜方的日影，略有风声水声来自江上，无意中听得楼下有细碎的鞋底擦着沙地的声音，中间偶尔夹着轻松而短促的一声"蓬"。这把我的淡忘的印象唤回来了，心里想："这是最好的两组，是常胜军，何不看一看呢。"便站起来走到窗前，倚着栏杆，就是每天傍晚靠着它怅望那上潮或下潮的江面，以及若隐若现的远

山，或是刻刻变幻的云霞的栏杆。

这球场是经行惯的；沿着场的方框疏疏密密站着些旁观者，这也是以前在别处见惯，不足为奇的。可是这两组十个人的活动却把我的心神摄住了。他们的身体那样轻，腿那样健：才奔向这一角，刹那间已赶到那一角了，正同于绝顶机敏的猎犬。他们的四肢百骸又那样柔软：后弯着身躯能接球，能送球；横折着腰肢能受球，能发球；要夺球时，跳起来，冲前去，便夺得了；要让球时，闪过些儿，蹲下些儿（甚至故意跌倒在地上），便避开了。他们两方面各有熟习的阵势：球在某人手中，第二个人早已跑到适当的地位等着，似乎料得定他手中的球将怎样抛出来，而且一定抛得怎样远。同时预备接第二个人的球的第三个人也就跑到另一个适当的地位，预备接到了球便投入那高高挂起的篮里。在敌对的一面，那就一个人贴近正拿着球的，极敏捷极警觉地想法夺那手中的球。又一人监守着预备接球的第二个人，似乎他能确断他站的是个最为适当的地位，那球过来时一定落在自己手中，又一定能送到同伴的手中——他的眼光早已射到站在远处的可把球付与的同伴了，而他的几个同伴正散开在几个适当的地位等着。这些仅是一瞬间的形势而已，而且叙述得太粗疏了，实际决不止这些。待球一脱手，局面便全变了。主客之势，犄角之形，身体活动的姿态，又样样是全新的了。那球腾扔不歇，场上便刻刻呈现新的局面。

他们都沉默不作声响；脸上现出一种特异的神采，这不能叫做希望的容光，又不合称为争竞的气概，勉强地说，“力的征象”或者“活动的征象”也许较为适切。偶然间一个人感到

有招呼同伴的必要，那就极轻悄的一声“某”——真是轻悄到十二分，仅足使同伴感觉而已——这某字是姓是名字，当然无从知道。可是这么一声“某”已能收到与几多言语同样的效果，要表达的提示嘱咐鼓励等等意思，都一丝不漏地传达给称作“某”的同伴，虽然他并不回答一声“知道了”，甚至点一点头抬一抬眼的表示都没有，然而旁观者自能默悟，知道他确已完全领会了。

擦擦的脚步声是场上的音乐，节奏有徐有疾，却总带着轻快的情调。皮球着地或者与人的肢体碰撞时发出空洞的音响，仿佛点着板眼。

我对这一场力的活剧，活动的表现，仅有一种感觉，大略如以下的情形。我感觉这十个人如涌而来，如涌而往，竟同潮水那样伟大。皮球的一回抛出，身体的一回运动，完全与各个人相呼应，正如潮水的一波一浪，与全潮水的呼吸融和着一样。他们那样地无心，什么胜利荣誉贪婪欺诈的心都没有，简直可以说他们没有各自的我。他们的心已融和为一个了！他们又这样地雄健，什么困疲伤残痛楚的顾虑都没有，简直可以说他们没有各自的身体。他们的身体也已融和为一个了！他们就是力！他们就是活动！

当时不及反省，现在更无从回想，不知为着哪一端——被压迫于他们的伟大呢？有感于融和为一的情味呢？或者别有其它——忽然觉得心头酸酸的，呼吸急促起来，同时眼前有点儿模糊，眼泪偷偷地渗出来了。我不能再看，于是转过头来。

十几天前，听说那个建筑师要回国去了；原因是他的叔父死了，遗下来的商业事务归他继续经营，所以他亟须回去。这里的房屋都出于他的手，他自己的一所住宅是最先落成的。我不很经意地想，他要与亲手经营的成绩，与自建的住屋分别了；这分别将继续到何时，能不能重复会合，都是难以预料的。

隔了六七天，偶然靠墙凝望，见几个工人扛着装器物的板箱经过楼下的沙路，当时也不措意。后来他们扛过第二批第三批，我立即想起这是建筑师运回国去的货物；留心察看，见板箱上写着建筑师的名字以及他本国的地址，我的揣想便证实了。随后想，这未免太劳累了，现在整理装箱嘱咐转运，到达以后，取携启封处理位置，足使心神麻乱两三个月还不止。器物本是供人使用的，如今反为所累，这又何苦。假若到处有非常精良的供应使用的器物，而且数量极多，每个人分配得到一份尚不嫌欠缺，那时候，一个人到地球的东面有这样的享用，到地球的西面也有这样的享用，事实上不需要多占一份，需要时总能得满足，又何必各人独自占有一份私产？更何必带着累累赘赘的器物从甲地搬到乙地？这样的世界并非空中的蜃楼，物质的供给又是人力所能操纵的，只要大家具有使它实现的诚心，它就一定会实现。最紧要的是大家刷新意识，大家发生这样一种诚心！——我想得太空洞不着实际了。

这一天早上，起身推窗，望那隔江的群山还把头埋在白云的被里；山腰以下没有遮盖，承着阳光，显出明鲜的绿意。楼下的场上直到江边，阴阴而愈见静寂，原来连山把东方的初

阻挡住了。江面泊着一艘待潮出口的海船，仿佛是古代留下来的什么建筑物，带着凄恻孤零的况味。江水又低又平，似乎横铺着一条白蜡。

我依着老规矩，靠在窗阑无目的地向前直望。风吹拂过来颇感得些寒意，是西风又是秋风，这就见得无聊了。忽然砰砰的一阵响，从右面的山凹处送出，使我惊讶起来。但是我立刻明白了：建筑师今天动身，这声响当是送行的爆竹。于是侧身右望，看是怎么一回情形。来了，山坡最先走出个工人模样的人，执着一根竹竿，竿头挂着一串细小的红色的东西。随后便两两三三的走出好些人，大部分是工人的模样，有三四个也执着竹竿，竿头也挂有细小的红色的东西；更有几个手中拿着大爆竹。我看他们点燃药线，看那些红色的爆仗腾跃而上，立即听得干脆而宏大的"砰""砰"，接着便是细碎的"拍拍拍拍……"小爆竹的声音密接无间。这就把宁静的空气弄得紧张了；从实说，则是我的心被引得紧张了。

建筑师夫妇两个就杂在这群人中。他那高高的身材，走两三步就要略微抬一抬头的姿态，在人群中特别明显，更兼他的服装和一行人也显然不同，所以极易辨认。他与两个人并肩走着，时时侧顾，谈些什么。他的夫人穿着一件淡红色的衣服，前几天我见她穿过，当时曾想这件衣服至少可以减轻她五岁的年龄。她行时身体很灵活，向这个又向那个谈笑着，又屡屡回头望背后。背后山凹处是他们几年来的住宅，现在是空无所有了，东西早几天就搬走了，人也开始上路了，她或者恋恋于住宅吧？或者她要多望几眼什么再也不能望见的无形迹的东西吧？

一群人走下山坡，就来到场上。爆竹的音响使耳官起了异感，火药气也阵阵地激刺着鼻管。看那建筑师夫妇两个一路笑语着，向站在旁边给他们送别的人举起手来挥扬着，似乎很高兴的样子，又似乎有点儿勉强，不像他们平日那样自然。放爆竹的人只顾忙着放，声响很急；他们的步子也跟着加快。霎时间大小爆仗的碎屑散得满地。其馀的人也不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有的靠近建筑师或他的夫人说一两句话，有的头也不回只是走。一切有形的无形的都加倍地紧张；照此情势，且将继长增高至于三倍四倍呢。

我模糊地想，“他们归去了，他们在送行……”；同时看见建筑师夫人举起手臂，向不知是谁挥扬，似乎发狂的模样；爆仗是“呼！呼！拍拍拍拍……”地响着。突然心头一酸，鼻际也就酸得难过。我不能再看了，于是转过头来。

一九二四年四月九日作毕

原题为《回过头来》

泪的徘徊

我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养成这样的性习，看什么看得出神，听什么听得入妙，突然间，心头与鼻际便酸起来了。虽然这酸酸的是一种很耐体会的味道，然而也觉得不大能忍受；况且跟在背后的流泪总得避免为妙，于是只好立刻别过头去。转过头来之后，看的自然是看不见了；便是听的，因为眼前别有一番形色，听的凝注力也消散了，这样才算把酸味化淡了，把眼泪挡住了。

庆祝的集会中，常常有向国旗行礼及三呼万岁这些节目，对于我真可以说是恶作剧。全场寂静了，一切都凝固了似的，独有那面国旗微微飘动，或者还有点拂拂的轻响。一个人以幽灵似的声音颤颤地喊道："一鞠躬"，于是一群人木偶一般折起腰来。我仿佛骤然感受着寒冷，周身一懔，心头便酸了，鼻际便酸了，眼泪便欲夺眶而出。在这样的沉默之后，一轰而起地是同声喊："中华民国万岁！"仿佛能看见那些声音像爆裂的火花，急升乱窜，终于零零星星地散落下来。我感觉全身都张紧了，几乎皮肉要迸裂了；同时心头便酸了，鼻际便酸了，眼泪便欲夺眶而出。既已临场，当然唯有转过头来之一法。如果不临场就可免却转过头来的麻烦，所以我难得去参加这些集会。

前此七年的秋天，我在乡间病倒了，便雇舟载回城中。连日发热，精神很兴奋，尽是这样那样想，或是信口谈说。医生诊断说是"类疟"，非常偃蹇的，说不定几时才能痊愈；可是危险是没有的。这在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本来不曾想到危险不危险；只是在天天劳作的生活中，得以略微歇一歇肩，又得专有相伴的人的慰护与殷勤，就觉得这个病未尝不可感激，而且就是它离去得迟一点也无妨。

一天下午，医生照常来过了，去配药水还没有回来，我依然绝不疲倦地躺在床上，随意与妻闲谈。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不知当时谈些什么，总是关于节序的那些话。我忽然说，"国庆日快要到了，那时候或者还不能离床呢。"妻说的什么也不能追想了，大约是不至于的，或是即使到那时尚须休养，也并不要紧那些意思。我不很注意去听她的话，很快地，像感受电流一般感到那种对着国旗鞠躬的景象以及群众轰呼万岁的声调，几同实现在眼前，直送入耳官。究竟是病体，约束力不及平时，胸口一涌，便放声哭出来了。于是哭占有了一切，想象中的景象与声调便模糊了，只是无所为而哭，像一呼一吸那样地自然。然而越哭越剧烈了，起初是长号，是间歇的，后来竟转为几乎不及透气的呜咽。涕泪流于两颊，直到耳后，直到颈际。妻惊诧着，她实在莫明其故，只得慌张地劝止道，"停住吧！停住吧！"——她的手按着我的额角。我不能回答她；心里这么想，我自己也作不得主，怎么就能停住呢！这一哭直延长了半点钟光景；生平类此的哭止有两回：一回是当了两年教师，突然被辞退了，我也厌倦这职业了，而友人来信，介绍我到另一个学校去当教师，我

便欲回绝，父亲与叔父却毫不迟疑地说“答应为是”的时候，(是黄昏时候，我正从酒家喝醉了回来)；又一回是五年前父亲死去的时候。

这场大哭的结果是体温骤然增高两度有馀；面目也现异样，从家中人惊惶的情状推想，大概是很可怕的。于是去还未久的医生重又被延请回来了。

至于无端感触，强忍而止的机会，除了已写入另外一篇杂记的，尚有好些呢。那一年冬天在杭州，早上正料理功课，佩弦走进来说，“今天停课，为着国民大会。”我听了不由得心头一松。(教员每喜欢听说停课，不知这一句能不能成为通则，在我，的确感得这么一松。)随后便想走去看看，因为我从不曾参与这种集会，看一看是怎样的情形，也可增长阅历；况且会场就在湖滨，就是没有什么会，我们也常常跑去的。佩弦赞同我的提议，便一起到湖滨。

湖滨体育场中已挤满了人。队队的男学生女学生，两两三三的穿长袍着短褂的，仅有很窄的间隙；我们这么用力前挪，偏着身子，与左边右边的人相摩相撞，才得慢慢地走近中心。那些人大部分执着长条的白布旗子，或齐眉头，或则举起得比头顶高一点；粗粗一望，只见摇摇晃晃零零碎碎的一大簇白。旗子上写的是“反对……”“不承认……”“同胞……”“亡国……”那些语句，写得极工整的固有，但是潦草到使人起反感的也不少。

我们再也不能前进了；原来前面的人挤得更紧密，仿佛是坚致的垣墙(围成个群众的核心)，而我们已贴着这垣墙

了。从许多头颅之间抬眼望去，便见中间高起得不多的一个平台，台上站着三二十个执旗的人，有一个人正在演说呢。在全场嚷嚷之中，实在不能听清楚他是不是在那里说话；但是从他的手臂的挥动，身体的转侧，以及嘴唇的翕张，我能断定他是一个演说者。

一忽儿这个人说完了，匆匆点着头，便归入背后一群人的队里。这一队人推拥了一阵，从后面推出一个人来，站在刚才这人的地位。他也演说了。他狠命用力，把声音提得很高，几乎每个字眼都转变了，——我代他感到岑岑的头胀。他那副面容是愁苦的，似乎所有的皮肉都蹙紧着，而且涂上一层灰色。他这样顿足，这样挥手，这样曲躬侧身，全乎表示一种追不及待几同呼吸将绝的样子。他教人家要争持这一次的外交事件，要同心协力，非达到目的不休。他夸扬民意的威权，说谁也拗不过来的是民意。他提出第一个第二个的办法，假若达不到目的时，那些办法就是后盾。末了，他的喉咙沙哑了，号哭一般喊道，"拱宸桥那边不是有他们的领事馆么！在场的同胞一齐去呀！更呼唤没有在场的同胞一齐去呀！""去呀……"群众哄然喊起来了。"教他们看看我们的民意呀！"演说者补足一句，全然是哑音了。"去呀……"所有的白旗一齐高举起，急急拂动，于是嚷嚷之中夹着刷刷的音响。

我感觉受着异样的压迫，同时模糊地想着人间的情感，如其再站在这里，非流泪且放声而哭不止。这算什么呢？于是拉着佩弦的衣袖，回转身子说，"我们走罢。"

前三年的秋天，我回到乡间去，先前任事的学校里正开

恳亲会。我并不是去酬应，像祝贺人家的寿事喜事一样，却是真心诚意情愿去看一看。原来人不必等到衰老的时候，重寻童时的踪迹，某人是当年同出入的伴侣，某地是当年游钓的处所，才觉得有一种淡淡而弥可恋的甘味，足使心儿微微地一笑；就是当壮盛之年，就是判离不久的旧游，倘若得重一追历，也是非常欣快，足以润泽心灵的事情。那几许同伴，共事的以及小朋友，不知怎样了？以前坐在里边治事的屋子，站在那里眺望的园场，不知怎样了？根据着前此一年两年尚且很少变动推测起来，大概现在这三四个月之别，总不会有什么大变动。然而不知怎样了的想念，也总消融不了。因此，我真心诚意情愿去看一看。

到了学校里，旧友的叙谈，近况的陈述，各处的周览，果真没有什么特别新异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一切没甚变动。然而我觉得非常地安适。——我们不该看轻"安适"这两个字。"有病方知健是仙"，乃是对于安适的追慕，假若不病，安适的可贵便被忘了。但是唯此习焉而罔觉的才是人间至乐。要说它是什么味道，勉强描摹，可说它像不受风吹的轻云，像潺潺自流的山泉，——然而太着迹象了。

会场怎样地布置，观众怎样地纷多，乃至一一的节目怎样地表演，在此都无关紧要，所以不说。这里单说幼稚生唱歌的一节。登场的是六个孩子，六七岁的样子，衣服颇新鲜，头面也极整洁（这应是他们的母亲的成绩；母亲说，"今天学校里开会，儿又是要当众表演的，给你梳头发，给你洗脸面，给你穿起红的绿的蓝的黄的新衣裳，好教人家赞声好。"于是孩子们被缀饰得这么可爱了。），他们各捐着一柄中号的

"而"字耙，似乎担当不起的样子，略微摇晃着。这样长且笨的器具在他们的手中，更见得他们的幼小，但是也显出无知的努力的美。

他们一齐举起铁耙，像农夫锄地的模样，一足退后，略略蹬下身子，以取姿势。同时他们启口而唱了；我不知唱的是什么歌词，可是我能领略这声音的情味。这声音这么清新，这么富有生意，使人仿佛想见青葱的颜色，又使入起芳春轻暖的感觉。他们的铁耙一起一落，合着歌曲的节拍；他们的歌声抑扬徐疾，摄住所有的观众：他们以外再没有一个动态，再没有一丝声息。

我想，"可爱的努力的美呵！可爱的小农夫呵！——这么天真这么愉适的小农夫！"这并不曾想出什么来；却又无端地心头恅恅，有待忍泪了。幸而他们的歌随即唱毕，他们就下台了。

经过几个节目之后，是两个女学生的"优秀舞"。当幕布揭开的时候，我的眼睛发眩了——说发眩并不确当，实在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这两个女学生是十三四岁的年纪，一个是圆脸，含有笑的意象，又一个脸较瘦削，常常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教过她们一年的功课。我们这乡间虽然离通都大埠不远，然而一般的服用起居总可说尚在俭约一方面，时世装之类，仅见于喜庆的人家或是社戏的场中而已。平时女学生穿的不过是布衫布袄，至多用那些有条纹的，有花点的；裁剪又往往不甚称身。她们的头发则编成绕直的辫子，纠结到梢；有几个爱作新样，也只是剪一排额发，短短的，疏疏的，就自以为颇美好了。而现在这两个女学生仿佛才经蜕化的蝴

蝶，使人不能相信从前那三角形的蛹儿就是她们的旧形，她们真个地翩翩然像个蝴蝶了！她们穿的是白绸的舞衣，宽大而不长，下缘刚齐着两膝，袖口正及臂弯缀着褶绉的纱边。纯丝的袜子映出微红的肉色，软薄的舞鞋仍能显现两脚的原来的曲线。头上裹着桂黄的锦带，把头发束住；以下的发披散于肩背，——并不故意烘得使蜷曲，却有波折自然之致。她们不是站定在台上，也不是正从后台走出来，乃是这么进退转侧地舞蹈着。她们不只是单调地舞蹈着，更有谐和的琴声与弦声应合着她们的动作。圆脸的那一个，嫩羞的红晕泛于颜面，其明艳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比拟；看她这样娇憨地含笑，却又似不解羞的。较瘦削的那一个呢，平日的若有所思的面幕揭去了，这才显露出少女的天真活泼的本色；她也带着感情的笑容。她们高高举起两臂，抬头仰视，像是遗世的仙子。她们伸手作抚慰的姿势，微微垂睫，又像是慈悲的大神。随后相对招手，而走近，而携手合舞，眼注着眼，笑对着笑，简直是爱神的化身。

我初不料她们两个会这样地显示于我的眼前！我初不料她们两个会这样地发挥她们被掩隐的美！她们的一动一盼都强烈地摇动我的心，越摇越郁结，致感不舒。眼泪又欲偷跑出来了。于是我只得低下头来。——附记一句，距开幕不过一分钟光景呢。

今年一月六日，观黎锦晖先生所撰《葡萄仙子》上演。这是一个童话剧。葡萄仙子正预备排芽，发叶，开花，结果，恰好雪花、雨点、太阳、春风、露珠，五位仙人陆续来访问她，

并且说明愿意随时给她帮助与保护。当仙子从事她的工作的时候，次第地，喜鹊奶奶向她要枯枝用，甲虫先生向她要嫩芽吃，山羊小姐向她要嫩叶吃，兔子弟弟向她要鲜花戴，直到结了果，白头翁老先生向她要嫩果吃。她都不肯，给他们说明这些东西都不能损伤，都要留着为将来之用——枝为着芽，芽为着叶，叶为着花，花为着嫩果，而嫩果要留待它的成熟。后来仙子的果子成熟了，哥哥和妹妹向她要果子吃，她立刻答应了，并且说，"我辛辛苦苦地结果子，就为着你们小朋友啊！"——这个剧本情节就是这样。

这个歌剧，所有的表述和对白都和着音乐演唱。乐谱有新撰的，也有采取现成的，其情味一如说话那样自然，而且把歌词衬托得更见有力，更见优美。说到歌剧，在不懂音乐和戏剧的我，觉得昆曲那样唱法简直是有声无词，即使唱得十二分神妙，也只能给听众以声音的趣味（听众本已熟悉曲词的，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至于京调，固然可以听得清词句了，但它的曲词另成一种格式，与说话相差颇远，而且又多有不通之病。真正内行家的欣赏京调，在乎咀嚼它的声调与音味，至如曲词的成不成话，是通是不通，却存而不论，可见它给与听众的实在同昆曲差不多。要能够领略这等声音的趣味，非有素养不办——非得也修炼成行家不可。全本外行的人自然也有耳朵，听着声音觉得配合口味时，也自会发生一种快感；然而仅仅是莫能自明的快感而已，此外不复能有什么。倘若听到的是一番说话，是完全能够领会的说话，同时这里边就含有乐歌的声音的趣味，那就觉得所得更多，中心的感动必将愈益深至。《葡萄仙子》的歌词与曲谱的关系就

是这样。我想，假如要教歌剧这东西发展而为健全的，完成的，这是一条适当的路径。

演员全是孩子。扮演雪花、雨点等五位仙人的，衣服的色彩含有象征的意味，舞蹈动作都表现他们的本真。扮演动物的亦然。——最可爱的是那个扮山羊的孩子，戴着羊皮的帽子，帽上饰两枝羊角，反穿着羊皮的褂子，这已经洁白得教人恋恋了；他两手权充前足，这样不徐不疾地爬出来，略微仰起头唱着，他的声音锐利而却柔美，不十分高，正像草场上咩咩地叫着的东西，怎不教人的心儿甜软如饧呢！扮演葡萄仙子的是黎先生的女儿，鲜绿的舞衣，缀珠的红帽，衬以雪白的手套同袜子，——我仿佛觉得春光早就遍布人间了。她的歌声特别清亮，动作表情与歌词无不应合，一笑一盼都有诗的意味。自开场到闭幕，她始终在场，告这个，语那个，为各个角色的中心，如太阳之于众星。

一场一场看下去听下去，我心无所想，只有一种薄醉似的感觉，超乎平常所谓舒适以上。到最后一场，所有的角色一齐登场，同声唱着。末梢是这样的句子：

我爱你！我爱你！
你爱他！你爱他！
大家相爱，大家相爱，
愿世间开遍爱的花！

这真是极寻常的句子，在少年们青年们的诗篇中，可以找出一大堆类似的或竟是相同的来。然而经这些小朋友唱着，可

真不寻常！他们唱到这几句，转为热烈飞扬的调子；手与手牵起来了，大家围成个圆圆的圈儿，轻快地跳跃着。第二个"大家相爱"方毕，互牵着的手轰地一齐高举，身体舞动得更为狂热，歌声也愈益高亢：他们这样地着着实实地唱出"愿世间开遍爱的花！"

戏是完毕了，假使让我继续适才的薄醉似的感觉，直到回去，岂不是全始全终。然而什么事情往往自己作不得主，偏偏这末了的几句歌词，末了的一节乐调，锋利得比钢刃更厉害，对正我的心头刺来。尤其是末一句，"世……间"，"爱……的……花"，竟然是快枪射出的火弹了！我中了这火弹，止不住渗出泪来，只得低下了头。全场的观众正忙个不歇地鼓掌，我可没有这勇气了。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九日作毕

泰戈尔来华

这一次泰戈尔来华讲演，颇引起少数人的反对，我们早已听得许多口头的反对论调了，昨日在泰戈尔的欢迎会上，又看见了一两种印刷物，对泰氏大加攻击，说他是过时的人物，和我们中国的梁启超张君劢一般。又有人平白无故地把他牵混到甚么阉宦缠足的“中国文化”上去，而声明反对这种政客式的文人的欢迎会。这些印刷物，我虽然也接到一两份，但现在都已经遗失了；而在当时，我虽然也草草地看了一遍，但现在也已经几乎全部忘记了，因此不能多引原文的话来讨论。而我自己，则不但不敢以政客式的文人自居，并且连“文人”两字，自己也知道担当不起，本来用不着出头来说什么话。不过我既然加入了这个欢迎会，总算是对泰氏这个人抱有相当的敬意的。对于反对他的人的论调，似乎总要分辩几句，以表明我并没有欢迎什么阉宦缠足的“中国文化”。

我个人对于这些人的反对意见，似乎觉得是太过火了些。本来在我们的同人中，也有沈雁冰等一两个人，也是不大赞成泰氏的讲学的。我曾经和他讨论过，以为泰氏只是一个文学家，实在没有什么足以惹起我们的反对的地方。他第一次在张家谈话，就已反复声明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诗人，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思想家了。而雁冰也说，如果他这次是纯粹以一个诗人

的态度来的，我们也自然用不着反对他。因此，我很不理解反对他的人，在还没有听见他对我们说过提倡东方文化的话之前，何以便先行竖起反对的旗帜来？我对于以前来过中国的杜里舒，的确也抱过反对的意思，因为他虽然做过一个生物科学家，但不幸在他来到的时候，已经变成一个生物玄学家了。这是从他的演讲看出来的，而生物的玄学，则决非我们所欲得的知识，我们自然要反对他。至于泰戈尔呢，他还没有对我们说出什么提倡中国旧文化的话来；至于他偶然说两句奖誉过当的话，那也不过是他对主人所应说的客气话，我们不怎么能怪罪他。反对他的人便赶先拿他牵混于什么阉宦缠足的中国文化里，也未免太过火了。至于说他是印度的过时人物，那也未见其然，他的作品在他本国里的风行，他个人在他本国里所受的敬仰，都未见得便衰落了。而且伟大的文学家，断不曾有成为过时人物的事情。他的感人之深倚赖于他的几种文学作品的，还视他之凭借于他的哲学思想为多。即就我个人看来，他的"人生之实现"在哲学里的价值，也远不如他的几本诗集在文学里的价值那么大。我们始终可以认定他是一个文学家，是一个诗人，不是什么哲学家，思想家，那么，我们就觉得我们对他提出反对的意见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至于说梁启超张君励一流人，在我们中国，也算是过时的人物，那也是有几分过火的。梁先生开出书目来叫人读中国书，诚然是有几分弄差了，但他只是开出书目而已，并没有强逼着少年人，叫他们都抛开了现代知识的追求，而投身于故纸堆中。张先生的不满人意，只在他的"人生观"的论调。

然而这种主张完全是各个人的自由的见解；我们本来不能指定哪一种见解是现实的，哪一种见解是过时的。人生是多么复杂的对象。对于复杂的人生，各自提出他个人的不同的见解来，我相信这内中是可以包容许多反对的论调的，你可以信这个，不信那个；你也可以信那个，不信这个：但你终要记着，这个和那个，都还只是各个人自己的见解而已，你终不能把一个推崇于其馀的一切之上，做了唯我独尊的见解之王。因此，虽然我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纯粹的机械观的信徒，但我对于张先生一流人的对精神生活的见解，却始终抱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态度，从不敢一笔抹杀，强名之曰“过时的见解”。而且像梁先生的“理知统于科学，感情超绝科学”的说法，也自有其一方面的充足的理由，不是绝对不可相信的。我们终要尊重个人的自由的见解，实在不应当抱着“入主出奴”的态度，而强号人家为“过时人物”。因为论及泰戈尔之故，使我不由自主地纵笔及此，顺带将梁张两先生的主张略加串说，并不是要回护他们俩的人生观的论调。

总之，我们对于一切的人的主张和见解，都要平心静气地研究分析，似乎不应当卤莽灭裂地把许多过火的话发表于印刷物之上。这种举动，徒伤过客的感情，自失地主的优礼来宾的礼貌而已。等到人家说出了不适宜于我们学术界的话来的时候，然后起来反驳他，也为时未晚啊。

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发表

原题为《杂感》

到 吴 淞 去

五月一日那一天，我们到吴淞去，为的是达夫的订婚，好久不得达夫的消息，不知道他恋爱的故事已经完成了。前几天接到一封从吴淞来的信，信封讲究极了，压印着非常致密的图案花框，拆开一看，原来是达夫邀我们去参与订婚茶会的请柬，这才代他感到成功的欣悦。“去！去！”我们相互邀约，带着青年的兴奋的心情。

没料到五月一日正是阴历的三月廿八。我们走到天通庵车站，看见站台上挤满了人，他们匆忙而起劲，显然在期待着盛大的欢快，问询之后才知因为是阴历三月廿八，各处乡镇迎神赛会的日子。其实迎神赛会可说是农民的假期，恩惠无比的休闲游散的日子。过了这一天，农事要忙起来了，农民再也没有整整地玩一天的馀裕了，所以把这一天作个总结束，游乐一个畅，高兴一个畅。无名无目举行一个盛会自然是他们不以为然的，于是归属到神的身上去：拥着神像在路上跑，实际上他们得到了结队游行的欣快；供起神像请它看戏，实际上他们得到了艺术欣赏的满足；分神胙，受福祐，实际上他们得到了亲朋会宴男女杂席的佳趣。在我们看来，这等事情似乎未免愚蠢。但是在不曾获得替代者以前，我们相信这等事情是必要的。

站台上的人是等车向江湾去的，因为江湾有极盛的神会。那些人不是工人，便是商伙；当然，没事做的少爷少奶老爷太太们是爱凑热闹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如其没有更为有趣的消遣，就也得有他们的一份：于是农民的快乐的日子也成为农民以外的人狂呼欢跃的日子了。他们的心一齐向南面望着，希望火车的踪影早一点显现，汽笛的音响早一点传送过来。

不知谁最先听到了，又不知怎样地一传告，全站台的人哄然喊起："来了……"我们退得后一点，互相传告说，"等他们上了车我们再上，"因为我们买的是二等票。不一会车到站了，还没有停妥，大众就什么也不顾地涌上去，顿时见得异样地纷乱。车厢中立刻塞满了人，站台上还有大部分的人在那里乱挤。我们见等待未必有用，挣扎一番是难免的了，就也加入他们的群中。我的同伴居然挤上了头等车的脚踏——这时候真可比诸生死关头，只要有车，载得身体去，便无论如何要挤上去，还管什么拿的是几等票，上的是几等车。我有点儿着急，也想跟上去，却给成团结块的许多人一排挤，反而倒退了好几步。事情更不妙了，上不去车的人又来了一大群，大家见这头等车的门，毕竟是上车的通道，便一齐向着前挤。我就被困在中心了，力气小，不能向外展张，只好受人家的压迫；脚跟站不住了，前后左右只任别人的势力；汗早已渗出来了，呼吸也喘喘然了。好容易找到一个罅隙，我像囚犯一样逃出重围，退到群众的背后，才舒舒畅畅透了一口气。

车厢里真个满了，站台上还有好些人。站员没有法子，只

好劝大家等下一趟车去，他预备扬起旗子，把口笛送进嘴里。我着急了，赶到他面前，把手中的车票给他看，说："我还没有上去，请你想个法子。"他平淡地笑着答道："实在 没有 位子，我也无法可想。"

我怅然回头，却看见车窗中露出的那些脸面，都现着快适且含有骄意的笑容。

我突地感觉自己的卑鄙，自己的无能，竟会做出这样的丑事。拿票子给站员看，请他想法子，不是心头蕴蓄着一句没有说出的话么？假若把它说出来，就是："我买的二等票呢！我多出一倍的钱，总该给我一个坐位！不管 别人 挤不挤得下。"这真是个要不得的卑鄙的念头，竟萌生于我的心胸！

要有个位子，最平常而最光明的办法就是往上挤。用的是自己的气力；占的是一个人的地位——一个人总该有一个地位，可说是天赋的权利。这是何等平常，然而何等光明：到了目的地所领受的是满足希望的快感。车窗中露出的那些脸面都现着笑容，他们确然有笑的资格。不用气力，不往上挤，却想凭借旁的势力，如多出一倍的钱，如站员的设法而得到位子，如我所取的路径，那就只有被挤在后边，怅然看人家乘车而已。

将来的生活也应当是这样子；车辆固然希望它加多，而气力却必须各自出各自的，不出气力的人只配站到生活的道路的外边去。你若想凭藉旁的势力，那时候旁的势力早化为幻影，至多平淡地笑着，对你说"我也无法可想"而已。我想，这样的生活才算公平。

以上只是我一瞬间的感想。一阵内愧过后，我醒悟了，除

掉向上挤更无别法。这时候发见车员的公事房尚空，只站着十多个人，有好些人正向那边挤，我跑到那边用力顺着挤。

手握着了把手的铁条了，脚踏着一级踏脚板了，更一努力，居然挤进了这公事房。于是我能到吴淞去参与达夫订婚的茶会了。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七日作

原题为《到吴淞》

从墓似的人间

上海有种种的洋房，高大的，小巧的，红得使人眼前晕眩的，白得使人悠然意远的，实在不少。在洋房的周围，有密叶藏禽的丛树，有交枝叠蕊的砌花，凉椅可以延爽，阳台可以迎月。在那里接待密友，陪伴恋人，背景是那样清妙，登场人物又是那样满怀欢畅，真可谓赏心乐事，神仙不啻了。但是我不想谈这些人和他们的洋房，我要引导读者到狭窄的什么弄什么里去。

在内地有这么一个称谓，叫做"上海式房子"，可见这种房屋的式样是起源于上海而流行到内地去的。我想，再减省不得再死板不过的格局，要数上海式的房子了。开进门去，真是井一样的一个天井。假如后门正开着，我们的视线就可以通过客堂，直望到后面一家人家的前门。客堂后面是一张峭直的扶梯，好让我们爬上楼去。最奇妙的，扶梯后面还不到一楼一底的高度，却区分为三，上是晒台，中称亭子间，下作灶房。没有别的了，尽在于此了。倘若要形容家家相同的情形，很可以说就像印板文字那样，见一个可以知道万万。住在这种房屋里的人们，差不多跟鸽子箱里的鹁鸽一样，一对对地伏在里边就是了，决说不到舒服，说不到安居，更说不到什么怡神悦性的佳趣。但是，假如一对夫妇能占这么一所

房屋，他们就是十二分的幸运者，至少可以赠给他们“准贵族”的称号了；更有无量数的人，要合起好几对来，还附带各家的老的小的，才得以占这样一所房屋，他们连鹁鸽都不如呢！

最大的限度，这样一所房屋可以住七八家人家。待我指点明白，读者就不会以为是奇闻了。客堂以及楼面各用板壁划分为二，可以住下四家，这是天经地义，所以平淡无奇。亭子间可以关起门来自成小天地，当然住一家。各家的饭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那么灶房里也可以住一家。在晒台顶上架起些薄板，只要像个形式，不管风来受冷，雨来受淋，就也可以住一个单身汉或者一对孤苦的老夫妇。再在楼板底下，客堂后半间的上面，搭成一个板阁，出入口就开在扶梯的半腰里，虽然出进非爬不可，虽然陈设不下什么床铺，两三个“七尺之躯”还容得下，所以也可以住一家。这不是八家了么？

情形如此，我们还称这是一所房屋，似乎不很适当了。试想夜深人睡的时候，这里与那里，上层与下层，都横七竖八躺满了人，这不是与北城郊外，白杨树下，新陈错杂的丛墓相仿佛么？所不同的，死人是错乱纵横躺在泥土之中，这些睡着的人是错乱纵横躺在浑浊不堪而其名尚存的空气之中罢了。

丛墓里的死人永远这样躺着，错乱纵横倒还没有什么关系，这些睡着的人可不然，他们夜间的墓场也就是白天的世界。一到晨梦醒来，竖起身子，大家就要在那里作种种活动；图谋生活的工作，维持生活的杂务，都得在这仅够横下身子的领域里干起来。他们只有身体与身体相摩，饭碗与便桶并

列，坐息于床铺之上，烧饭于被褥之侧：今天，明天，今年，明年，直到永远！

在这个领域里实在也无从整理，当然谈不到带着贵族气息的卫生。苍蝇来与他们夺食，老鼠来与他们同居；原有的窗户因为分家别户不免少开几扇，一部分清新的空气就给挡驾了，于是疾病之神偷偷地溜了进来。这家煨破旧的泥炉，那家点无罩的煤油灯，于是祝融之神默默地在那里相度他的新领土。小孩在这个领域里产生出来，生活过来，不是面黄肌瘦，软弱无力，就是深深印着这么一个观念，杂乱肮脏就等于生活，于是愚蠢者卑陋者的题名册上又要添上许多名字。总之，这活人的丛墓面前清清楚楚标着这样几个无形的大字，就是“死亡，灾难，愚蠢”。

是谁把这什么弄什么里化成丛墓的呢？是谁驱使这许多人投入丛墓的呢？这些真是极其愚笨的问题。人家出不起独占一所屋子的钱，当然只好七家八家合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要编派处分，谁也怪不得，只能怪住在丛墓里的人自己不好，你们为什么没有富足的钱！你们如果怪房东把房价定得太贵，房东将会回答你们说：“我是将本求利的，这房屋的利息是最公道的呢。我并不做三分息四分息的营生。你们不送我个‘廉洁可风’的匾额，倒怪起我来了么！”你们如果去怪市政机关没有限制，没有全盘的规划，市政机关会回答你们说：“就因为我们没有限制，你们才有个存身之处。有了限制，你们只好住到郊野去了！至于空阔舒畅的房屋尚没有人住的，某处有一所美国式的洋房，某处有一所带花园的别墅，某处某处有什么什么，你们为什么不去买来或租来住呢？”他们都

不错，只有你们错，你们为什么没有富足的钱！

为千错万错的人们着想，只有两条路。其一，回复到上古的时代，空间跟清风明月一样，不用一钱买，在山巅水涯自由自在地造起房屋来。其二，提倡货真价实到二十四分的精神生活，尽管七家八家挤在一起，但是天理可以胜人欲，妙想可以移实感，所以大家能优游自适，无异处高堂大厦。

假如既已出了轨的世运的车是继续向前奔驶的，那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是没有希望了，第一条路通不过去了。假如理学不昌，生活不能不依赖物质，那么七家八家死挤，总是莫大的悲哀，第二条路又通不过去了。

这似乎颇有点绝望。但是也不尽然。平心而论，同是一个人，所占空间应该是同样大小，没有一个人配特别占得多，也就没有一个人该特别占得少。你能说出谁配多占谁该少占的理由么？能够做到所占均等，能够做到人人得有整洁舒适的居所，那么，丛墓就恢复为人间了。这决不是开起倒车，退到歧路那儿，然后郑重前进的办法所能办到的。这须得加速度前进，飞越旧的轨道，转上那新的轨道。

什么事情的新希望都在于转上新的轨道。困在丛墓中而感到悲哀的人们，就为这一点悲哀，已经有奔向新的轨道的必要了。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作

原题为《丛墓的人间》

骨　牌　声

走进里里，总弄的靠墙角的一盏盏电灯全都亮了，在第四盏灯底下，一张轻便的桌子斜角摆着，四个女人围着“打麻将”。她们不用扇扇子，也不在周身乱拍乱搔，像其他乘凉的人那样；大概暑气与蚊虫都与她们疏远了。

这使我想到伯祥近来的一夜的失眠。伯祥的屋子是带“跨街楼”的，就把跨街楼作为卧室。那一晚他上床睡了，来了！就在楼底下送来倒出一盒骨牌的声音，接着就是抹牌的声音，碰牌的声音，人的说笑，惊喜，埋怨，随口骂詈，种种的声音。先前医生给伯祥诊察过，说他的血浆比较薄，心脏不很强健；影响到心理，就形成感觉敏锐。这楼下的声音并不细微，当然立刻引起他的注意，朦胧的倦意就消失了。声音继续不绝，他似乎被强迫地一一去听，同时对于将要失眠了又怀着越来越凶的惴惴。楼下的人兴致不衰，一圈一圈打下去，直到炮车似的粪车动地震耳地推进里里来了，他们方才歇手。谁输谁赢自然是确定了，或者大家还觉得有点儿软软的倦意；但是他们必然料不到楼上的伯祥也陪着他们一夜不曾合眼。

在我家听力所及的四围的邻居中，也常常有通宵打牌的。我是出名的贪睡汉，并不曾因此失眠过一回，像伯祥那样。

在我还没有睡的时候，听见他们抹牌，很不经意地想，“他们打牌了”，随后也就安然，躺下不多时，就睡熟了。偶尔半夜里醒来，又听见他们抹牌，朦朦胧胧地想，“他们还没有歇手呢”，一转身，又睡熟了。直到小女孩醒了，我似乎被她闹醒，看窗上已经布满含有希望的青光，这时候又听见他们抹牌，轻轻地，慢慢地，似乎乏力的样子；这才知道他们打了通宵的牌。

不是没有白天打牌的；据家里人说，日里头也常听见骨牌与桌子相击的声音。不过我日里头在家的时候少，就觉得打牌的事总是夜里发生的多了；然而有几回回家吃午饭的时候，也曾听得拍拍劈劈的骨牌响。

有人说，“游戏而至于打麻将，可说最没有趣味的了；组织这么简单，一点儿用不着费心思，有什么好玩！”说这句话如果意在劝人不要打麻将，简直是不通世务的读书官人，明白的人决不会这么说。

现在先讲趣味。趣味是须经旁人判定的呢，还是在于本身的体会？这似乎无须讨论，当然在于本身的体会；别人固然可以代我判定，但是没有办法使我与他同感。譬如别人尽可以向我说大蒜是最爽口的东西，但是我总觉得大蒜的恶臭不堪向迩；别人又可以向我说这西瓜不好，不要吃吧，但是我总不肯舍弃，因为凡西瓜不论好坏我都爱吃：这有什么办法呢？

那些朝打牌夜打牌的男人们，大概有个职业，他们认定职业是为着吃饭的，天生就一张嘴一副肠胃，就不能不从职业上弄到一点消费的材料。这里头颇含勉强的意思，即使有

趣味也淡得很了；不然，为什么工人喜欢歇工，教员爱听放假呢？那些女人们，大概担负大部的家务，她们认定家务是自己先天注定的重负，为男人，为孩子，为全家族，都是不可推诿的；这就未必是心甘情愿的了，似乎说不上有什么趣味；不然，为什么弄口电灯底下，常常有两三个女人在那里互诉家务的辛苦呢？至于一些游手好闲的男女，东家靠一靠就是一两点钟，西家坐一坐就是半天，谈些捉到几个臭虫，昨夜给蚊虫扰了一夜的事，实在也是莫可奈何，才做这种无聊的消遣；如果要他们说一声"这很有趣味"，我猜想他们未必愿意答应吧。

人总爱做点有趣味的事，藉以消解种种的劳困与无聊。他们有什么事情可做呢？你说，为什么不去欣赏艺术？不错；但是欣赏须得有素养，他们有么？你又说，为什么不去逛公园？不错；但是逛公园男的须穿起洋服，女的也须打扮得体面一点，这岂是人人办得到的事？房屋是丛墓的样子，三家四家的人统统砌在一楼一底里，身也转不得，更不用说北窗消暑，月院乘凉了。好在桌子是现成摆在那里的，骨牌是祖传或新置的，倒不如就此坐拢来，打这么八圈十二圈。心有所注，暑气全消了，蝇蚊也似乎远引了，趣味一。大家说打牌是写意("写意"是苏沪一带人常说的，含有漂亮、舒服、轻快、推开责任等等意思，这里指舒服)的事，现在居然身为写意的事，同大大小小的写意人一样，趣味二。或者幸运光临，还可以有赢到几个铜元几个银角子的希望，如同中了什么奖券的小彩，趣味三：谁说是没有趣味呢！

其次讲用心思，这尤其是简单不过的。你以用心思为有

味，也许人家以不用心思为有味；彼此如果因此争论起来，结果当是谁也不能折服谁。况且向来不曾用过心思的，你定要他非用心思不可，岂不叫他头痛？他们说，麻将之所以使我们欢喜，就在于一点儿用不着费心思；你又有什么话说？

世间不通世务的读书官人究竟不多，做点有趣味的事这个观念究竟是普遍的，于是我们常常听见骨牌声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六日作

卖　白　果

总弄里边不知不觉笼上昏黄的暮色，一列电灯亮起来了。三三两两的男子和妇女站在各弄的口头，似乎很正经的样子，不知在谈些什么。几个孩子，穿鞋没拔上跟，他们互相追赶，鞋底擦着水门汀地，作"替替"的音响。

这时候，一个挑担的慢慢地走进弄来，他向左右观看，顿一顿再向前走两三步。他探认主顾的习惯就是如此；主顾确是必须探认的，不然，挑着担子出来难道是闲耍么？走到第四弄的口头，他把担子歇下来了。我们试看看他的担子。后头有一个木桶，盖着盖子，看不见盛的是什么东西。前头却很有趣，装着个小小的炉子，同我们烹茶用的差不多，上面承着一只小镬子；瓣状的火焰从镬子旁边舔出来，烧得不很旺。在这暮色已浓的弄口，便构成个异样的情景。

他开了镬子的盖子，用一爿蚌壳在镬子里拨动，同时不很协调地唱起来了："新鲜热白果，要买就来数。"发音很高，又含有急促的意味。这一唱影响可不小，左弄右弄里的小孩子陆续奔出来了，他们已经神往于镬子里的小颗粒，大人在后面喊着慢点儿跑的声音，对于他们只是微茫的喃喃了。

据平昔的经验，听到叫卖白果的声音时，新凉已经接替了酷暑；扇子虽不至于就此遭到捐弃，总不是十二分时髦的

了；因此，这叫卖声里似乎带着一阵凉意。今年入秋转热，回家来什么也不做，还是气闷，还是出汗。正在默默相对，仿佛要叹息着说莫可奈何之际，忽然送来这么带着凉意的一声两声，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我真要感谢了。

这声音又使我回想到故乡的卖白果的。做这营生的当然不只是一个，但叫卖的声调却大致相似，悠扬而轻清，恰配作新凉的象征；比较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有味得多了。他们的唱句差不多成为儿歌，我小时候曾经受教于大人，也摹仿着他们的声调唱：

烫手热白果，
香又香来糯又糯；
一个铜钱买三颗，
三个铜钱买十颗。
要买就来数，
不买就挑过。

这真是粗俗的通常话，可是在静寂的夜间的深巷中，这样不徐不疾，不刚劲也不太柔软地唱出来，简直可以使人息心静虑，沉入享受美感的境界。本来，除开文艺，单从声音方面讲，凡是工人所唱的一切的歌，小贩呼唤的一切叫卖声，以及戏台上红面孔白面孔青衫长胡子所唱的戏曲，中间都颇有足以移情的。我们不必辨认他们唱的是些什么话，含着什么意思，单就那调声的抑扬徐疾送渡转折等等去吟味；也不必如考据家内行家那样用心，推究某种俚歌源于什么，某种

腔调是从前某老板的新声，特别可贵；只取足以悦我们的耳的，就多听它一会；这样，也就可以获得不少赏美的乐趣。如果歌唱的也就是极好的文艺，那当然更好，原是不待说明的。

这里上海的卖白果的叫卖声所以不及我故乡的，声调不怎么好自然是主因，而里中欠静寂，没有给它衬托，也有关系。全里的零零碎碎的杂声，里外马路上的汽车声，工厂里的机器声，搅和在一起，就无所谓静寂了。即使是神妙的音乐家，在这境界中演奏他生平的绝艺，也要打个很大的折扣，何况是不足道的卖白果的叫卖声呢。

但是它能引起我片刻的幻想的快感，总是可以感谢而且值得称道的。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作

深夜的食品

里的总门虽然在九点钟光景关上了，总门上的小门，仅容一个人出入的，却终夜开着。房主以为这是便利住户的办法，随便什么时候要进要出都可以；门口就有看门人睡在那里，所以疏失是不至于有的。这想法也许不错，随时可以进出确实便利；然而里里边却出了好几回疏失，贼骨头带着住户的东西走了。这是否由于小门开着的便利，固然不能确凿断定。

我想有一些人必然感激这小门的开着，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挑售食品的小贩们。我中夜醒来(这是难得的事)，总听见他们的叫卖声："五香茶叶蛋！""火腿热粽子！""五香豆腐干！""桂花白糖莲心粥！"还有些是广东人呼喊的，用心细辨也辨不清，只听见一连串生疏的声音而已。这时候众喧已息，固然有些骨牌声、笑语声、儿啼声在那里支持残局，表示这里里的人还没有全部入睡，但究竟不比白天的世界了。这些叫卖声大都是沙哑的；在这样的境界里传送过来，颤颤地，寂寂地，更显出这境界的凄凉与空虚。从这些声音又可以想见发声者的形貌，枯瘦的身躯，耸起的鼻子与颧颊，失神的眼睛，全没有血色的皮肤；他们提着篮子或者挑着担子，举起一步似乎提起一块石头，背脊是弯得像弓了。总之，听了这声音就会联想到《黑籍冤魂》里的登场人物。

有卖东西的，总有吃东西的。谁在深夜里还买这些东西吃呢？这可以断然回答，决不是我们。我家向来是早睡的，至迟也不过十一点钟(当然也是早起的)。自从搬到乡下去住了三年，沾染了鄙野的习俗，益发实做其太古之民了。太阳还照在屋顶，我们就吃晚饭；太阳没了，我们就“日入而息”，灯自然要点一点的，然而只有一会儿工夫。近来搬到这文明的地方上海来住，论理总该有点进步，把鄙野的习染洗刷去一部分，但是我们的习染几乎化为本性了；地方虽然文明，与我们的鄙野全不相干，我们还是早吃晚饭早睡觉。有时候朋友来访，我们差不多要睡了，就问他们：“晚饭吃过了吧？”谁知他们回答得很妙：“才吃过晚点，晚饭还差两三个钟头呢。”这使我惭愧了，同时才想起他们是久居上海的，习染自然比我们文明得多。像我们这样的情形，决不会特地耽搁了睡觉，等着买五香茶叶蛋等等东西吃的；更不会一听到叫卖声就从床上爬起来，开门出去买。所以半夜的里里虽然常常颤颤地寂寂地喊着什么什么东西，而我们决非他们的主顾。

那么他们的主顾是谁呢？我想那些神经不衰，通宵打牌的男男女女总该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尚未睡眠，胃的工作并不改弱，到半夜里，已经把吃下去的晚餐消化得差不多了；怎禁得那些又香又甜又鲜美的名称一声声地引诱，自然要一口一口地咽唾沫了。手头赢了一点的呢，譬如少赢了一些，就很慷慨地买来吃个称心如意(黄包车夫在赌场门口候着一个赌客，这赌客正巧是赢了钱的，往往在下车的时候很不经意地给车夫过量的钱，洋钱当作毛钱用；何况五香茶叶蛋等等东西是自己吃下去的，当然格外地慷慨了)。输了的呢，他想藉

此告一小段落，说不定运气就会转变过来；把肚皮吃得充实些，头脑也会灵敏得多，结果"返本出赢钱"，吃的东西还是别人会的钞。他这么想的时候，就毫不在乎地喊道，"茶叶蛋，来三个！""莲心粥，来一碗！"

其次，与叫卖者同属黑籍的人们当然也是主顾。叫卖者正吞饱了土(烟土)皮，吃足了什么丸，精神似乎有点回复，才出来干他们的营生；那些一榻横陈，一枪自持的，当然也正是宿倦已消，情味弥佳的当儿，他们彼此做个交易，正是适合恰当，两相配合。抽大烟的人大都喜欢吃烫的东西，有的欢喜吃甜腻的东西。那些待沽的东西几乎全是烫的，都搁在一个小炉子上，炉子里红红地烧着炭屑；而卖火腿热粽子的，也带着猪油豆沙粽，白糖枣子粽；这可谓恰投所好了；买来吃下去，烫的感觉，甜的滋味，把深夜拥灯的情味益发提起来了，于是又重重地深深地抽上几管烟。

其他像戏馆里游戏场里散归的游人，做夜间工作的像报馆职员之类，还有文明的习染已深，非到两三点钟不睡的居民，他们虽然不觉得深夜之悠悠，或者为着消消闲，或者为着点点饥，也就喊住过路的小贩买一些东西吃。所以他们也是那些深夜叫卖者的主顾。

我想夜间的劳工们未必是主顾吧。老板伙计一身兼任的鞋匠，扎鞋底往往要到两三点钟；豆腐店里的伙计，黄昏时候就要起身磨豆腐了；拉夜班的黄包车夫，是义务所在，终夜不得睡觉的，他们负着自己和全家的生命的重担，就是加倍努力地做一夜的工作，也未必能挣得到够买一个茶叶蛋一只火腿粽的闲钱来。他们虽然听着那些又香又甜又鲜美的名称

而神往，而垂涎，但是哪里敢真个把叫卖者喊住呢！

他们不敢喊住，对于叫卖者却没有什么影响，据同里的人谈起，以及我偶尔醒来的时候听见的，知道茶叶蛋等等是每晚必来的；这足以证明那些东西自会卖完，这一宗营生决不会因为我们这样鄙野的人以及劳工们的不去作成它而见得衰颓的。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作

苍　　蝇

住在这里里，第一件不如意的事要数苍蝇的纷扰了。晨光才露，我们还没有起来，就听见昏昏的嚷嚷之声。等到一开门，又扑头扑面地飞进许多新客，它们与隔宿留在这里的旧客合伙，于是嚷嚷之声使你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

市上的苍蝇拍脆弱得可怜，用不到两三天便纱穿柄脱，只剩三四分的效用了。妻不愿意再买，自已去买了一方铁纱，手制成三个苍蝇拍；那铁纱颇结实，拿着虽觉重一些，而所向必能奏功，那是不待试验的。于是妻一个，母一个，孩子也是一个，捕蝇队居然组织起来了；别的都不管，一心一意只在于拍，拍，拍，差不多半天工夫才停手。地上的蝇尸足有一酒杯的容积，若在夸耀武功的人，这也足以"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京观"了。又把吃饭的桌子储菜的橱子以及地板都用水冲过抹过，以免招引未来的新客。这时候耳根特别清静，脸上手上也没有刺得痒痒的感觉，大家很安适。

但是，我家没有富翁准富翁家里所有的铁纱门窗。出进是不得不开门的，为要透气，窗又不得不开着；不多一会工夫，不招自至的新客又从门外窗外飞进来了。起初只略见几个在眼前掠过，继而就成轻微的营营，终于是不可堪的骚扰了。

于是捕蝇队继续努力，不休不歇，只是拍，拍，拍。

这样经过了三五天，妻觉得无聊了：几个人什么也不做，却一天到晚不得空，只是拿着这劳什子拍，拍，拍，算个什么呢！她提议改用捕蝇纸，以为这是以逸待劳，而且或许可以一网打尽的办法。那一天我到租界去，就买了几张捕蝇纸回来。

捕蝇纸上确乎粘住不少苍蝇，到处横飞的现象也似乎觉得好些。至于一网打尽，却还远之又远。那些苍蝇不飞到铺着蝇纸的地方去，犹如野兽在没有陷阱的地方消遥，就奈何它们不得。有些已经走近了那纸的胶质，用口器或前脚轻轻去探一探，就振翅飞去了。看它们那样轻捷的姿态，似乎故意表示警觉与狡狯。捕蝇纸对它们自然是失败了，为补救这等缺点起见，捕蝇队还是不能退伍，还是要常常拿起这劳什子来拍，拍，拍。

这个里在去年还是一片荒地，是粪尿废物的积聚所。苍蝇曾在这一片地上有过一段繁盛的历史，那是可想而知的。自从房屋落成，道路铺好以后，我想去冬未死的老苍蝇定有今昔之感了。幸而还有几个垃圾桶，它们可以在那里长养子孙，绵延族类。里中住户大概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流，他们开了桶盖，倒了垃圾，转身就走，桶盖就让它开着。他们家里吃了饭或是瓜果，所有骨壳皮核渣滓之类就随手向门外去，省却一番洒扫的麻烦。这对于苍蝇实在是无上功德：它们在垃圾桶里闷得慌，桶盖开着，就可以自由自在出来看看广大的世界；它们没有可口的东西吃，无谓游行也未必有趣，骨壳之类遍地，就无往而不写意了。安知那营营的声音里，它们

不是在唱“被人类劫夺了的领土，现在光复了”的得胜歌呢。

我们觉得苍蝇可厌，希望它们不要来骚扰我们，根本的办法，自然在于做到这里里没有苍蝇。简单想想，似乎这一点不难办到。凡是苍蝇的发祥地，如垃圾桶之类，都给它倒些杀虫药水；垃圾桶盖每开必关，骨壳之类一定要倒在垃圾桶内，以免游行的苍蝇饱吃和追逐；捕蝇拍和捕蝇纸家家必备，有飞进门来的，总不让它侥幸生还：这样，不消半个月工夫，就可以做到一个苍蝇都没有了——这算得难办的事么？

怎么能约齐家家户户一起合作呢？这似乎不成问题；我们想起了这办法，就由我们向邻居传说，这是最方便不过简单不过的。除尽了苍蝇，大家舒服，不光是我们一家受到好处，哪会有不赞成的道理？

但是，我们的经验开口了：“不然，大不然。你劝他们把垃圾桶盖关了，他们说偏不高兴关，你怎么样？你劝他们不要把骨壳等物丢在路上，他们说偏爱这么丢，你怎么样？你劝他们扑灭苍蝇，买拍子，买灭蝇纸，他们说没有这等闲钱闲工夫，或者爽性回答你一句，他们不怕什么苍蝇，你又怎么样？所以约齐家家户户一起合作，不过是个梦想罢了！”

经验的那种老练的腔调每足使希望的心爽然若失；它这样说，我们的办法不就等于无法么？“这个里将永远是苍蝇的世界，”我们想，“澄清既无望，还是搬到别处地方，没有苍蝇的地方去住吧。”

但是，这实在是腐败的不道德的思想！我们搬走了，不是就有一家搬来住么？我们怕苍蝇，所以要搬走，却让给了后一家，难道他们就命该受苍蝇的累么？譬如吃一样东

西，我们尝了一点儿，发现这是含毒的，就吐掉嘴里的，丢掉手里的，自顾自走开了。人家不知道，捺起地上的东西，无心地大嚼起来，结果不是牺牲一命，就是沉疴三月：这不是我们的罪恶么？所以凡是尝到了毒物，最正当的办法是先把毒物消灭净尽，再进一步，想法制成无毒有益的东西供大家吃；倘若舍此不图，就是腐败，就是不道德！而搬到别处去住的思想正与随手丢掉毒物的情形相仿佛，这怎么能要得！由此类推，住在上海地方的人说上海太污浊，须得离开它；住在中国地方的人说中国太不堪了，须得抛弃它，也同样是腐败的不道德的思想。唯其污浊，唯其不堪，我们一定要住在这里；使它干净，使它像样，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责任；改造成个灿烂的上海，涌现出个庄严的中国，是我们进一步的努力。到了那个时候，情形又不同了；高兴住的当然住下，想换换空气的就不妨离开，因为与道德不道德的问题没有关系了。

话说开来了，现在回过来：总之，搬到别处去的办法是要不得的。那么，装起铁纱的门窗来，行么？我们并不主张还淳返朴，现在固然未必装得起，可是确乎希望有一天家家户户装起铁纱门窗来。然而，即使家家户户装起了铁纱门窗，若不从扑灭苍蝇这方面下手，苍蝇还是要猖狂的；它们飞不进我们的居屋，就在路上扑头扑面地飞舞；偶尔闪了进来，就像进了养老院，终身隐居于此了。

至此，我们可以制定一句格言："我们嫌苍蝇讨厌，只有一法，就是扑灭它们。"

而单独扑灭之不能收效，我们的经历已经证明了；所以

上面的格言还得修正为以下的说法："我们嫌苍蝇讨厌，只有一法，就是联合邻里共同扑灭它们。"

这真像苏州城外坐马车，绕了一个圈子，依旧回到原地方了。我们的经验不是已经说过，这是个梦想么？

不错，我们的经验确曾这么说。但是，一切梦想如能不致发生，发生之后如能马上消散，那自然没有什么；设或不能，梦想在前头诱引着，我们在这里可望而不可及，总是一种莫甚的懊丧。这只有奋力向前，终于跨进梦想的实境，把经验先生的见解修正一下，才能彻底排除这种懊丧。除此之外，再没有丝毫的办法，唯有终于懊丧而已。

所以我们要扑灭苍蝇，想联合邻里通力合作，虽然被经验先生嗤为梦想，我们却只有走这一条路。怀着梦想的既是我们，当然先由我们向邻里们一一传告。这当儿，"偏要这样，不高兴那样"的回声是必然会有的，但这算得了什么！给孩子们吃药，不是总回你个哭脸么？我们还是凭我们的真诚与理由，锲而不舍地向他们陈诉。总有一天，他们会觉得垃圾桶是非关不可的，骨壳等物是非当心收拾不可的，买蝇拍灭蝇纸并非浪费的开支，拍拍苍蝇并非无聊的消遣；总而言之，他们也觉得苍蝇是必须扑灭的了。于是通力合作，处处注意，不消半个月，苍蝇就可以消声绝迹。于是在这原先苍蝇猖狂的里中，也得享受没有一个苍蝇的欢乐。

这当然是大众的舒服。然而我们的得以享受这舒服，不得不感激邻里们的明达与努力。因为他们是我们仅有的伙伴，如果他们不明达不努力，灭尽苍蝇依然只是我们的梦想。

说了一大堆话，苍蝇还是三三五五在眼前飞舞着。但我

们的路是决定了，其要旨如上述，今后就照此做去。

末了想蛇足地说一句：扑灭苍蝇是如此，扑灭类似苍蝇的任何事物，也是如此，惟有去找我们仅有的伙伴，惟有靠着伙伴们的明达与努力。

再蛇足一句：一个人如其不能够扑灭里里的苍蝇，再也不用抱着扑灭类似苍蝇的东西的梦想了——因为无非徒然抱着个梦想而已。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作

成 串 的 人

今天午饭后，在伯祥的过街楼上闲谈，无非谈些适才爆发的战争的事。忽然伯祥夫人惊愕地说："看，他们逃进来了！"我走近窗沿去看，只见两个车夫拉着空车闪进四弄里去；其中的一个，似乎比我的孩子大不了多少，半裸着身体，脏得跟泥地相仿佛。同时许多弄里跑出来好些男女，也有从弄外来的，他们都谈论着马路上正在拉人。顽皮的孩子跑进跑出乱喊，"来了！来了！"又召来许多男女；他们不敢走出屋子，只高高地从晒台上向下呆望。我们走下楼去看，只见全里的几处铁门都关上了。

风潮过了，我从大铁门的小门走出去，去到做事的地方。大家都谈论这件事，全楼的空气被搅乱了。每个后到的人走进来，似乎身上总带着新鲜而又可骇的消息，众人的目光就不由自主地集注在他身上。

约莫一小时以后，一位同事嘻笑地指着窗外说，"来了！来了！"他的嘻笑几乎成了习惯，跟人说话总是这样，不论所说的是不是可笑。大家走到窗前朝下望，只见两串人正在马路上经过，两条长绳拴着一个个人的胳膊，成为两串，并排走着，像体操时候的双行；前面后面有些穿黄衣服的人，当然是牵绳子执藤条的了。也有好些趁热闹的，站着，跟着，看

这奇怪的行列，但是并不嚷嚷，脸上都有些愕然的样子。至于那些被拴的人，木然走着，我实在看不出他们的感情，正像一串牵往屠宰场去的羊羔，我们也不能明白它们作何感想。

我止不住愤怒，无论怎么合理，总不应该把人当牛羊看待！是他们不愿意去么？那就应该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另外招愿意去的。是怕他们逃走么？既已愿意应招，拿工钱，服劳役，哪有才承允就后悔的道理！实在想不出一点理由来，我止不住愤怒。

张君告诉我，前几天在苏州看见的，也是这样的情形。

招募民工的告示实在使人满意，有“不得……”“优予……”一类的话。这不能不怪执行的人没有明白告示的意思，或者由于什么冲动使他们忘了告示的意思。

我现在不想非战。要是一切不顾，实行非战主义，那么人家对你“预备，放！”你就垂下了手准备作枪靶子么？但是战争跟吗啡一样，要在医生手里用；跟电流一样，要在技师手里用。如果由职业的兵募来的兵去战争，不论在善势力一面或者恶势力一面，总有点靠不住。小而言之，这是把人当牛羊看待了。大而言之，不甚明白为什么而战，只是听从长官的指挥而战，未必能有奋不顾身的勇气；一想到“为了几块钱的饷而拼命，犯不着，”也许就弃枪而走了。

唯有真个受教育的人，明白为什么而战的人，才配当兵。

说到国民革命，说到铲除恶势力恶组织，需要战争的时会多着呢。受教育的人，明白为什么而战的人，应该把原有的权利从职业兵手里收回来，宣言说：“现在要由我们来使用战争了！”

回想从前捐过几年的枪，什么散兵线和野战等都操练过，靶子也打过，这真是切实的根基。

世间不该有一部分是专门说空话的人，一部分是专门实干的人。如果有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演化的错误。

轻快的枪杆背在肩上，耳闻凄清的军号声，使我悠然神往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作

原题为《两串人》

家

十一二岁的时候，在学堂里练习跳高，回家后似乎恐怕一夜的间歇会减低已达的高度，乘着夜色还没有十分浓厚，在屋内继续练习。木架子当然是没有，幸而所谓高度并不怎么高，一只凳子，上面再加一个面盆，就相仿佛了。于是两只凳子同两个面盆代替了木架子，上面搁着一根细竹竿，我就一回一回地跳着。也不管足跟顿在方砖地上不大舒服，也不管头颅有撞在门框上以及门限上的危险，只觉这室内就是学堂里的运动场了，我也有在运动场里一般的快乐。一天，正在这么运动的当儿，竹竿子刚刚被碰落地，在清脆的敲击声中，听见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接着一位同学跨了进来，使我不知怎么才好，羞愧的心仿佛掩住了我的口，一时不能答应出来，脸上热辣辣的。

我家中有个花坛，七八尺宽，三尺多长，绿茸茸长满了草。正中是一株月季，被那些草侵占得几乎伸不出头来；叶子照例是小毛虫的食料，存留的只有些索索络络的叶脉；偶然透出一两个花蕊来，才露一点红意，不知给谁发见了，大家才记起这草丛中有这么一棵月季。靠墙一排是七八丛玉簪花，肥厚有光的叶子，似乎表示它们是得天独厚的；七八月里开花的当儿，那挺出成穗的花真娟媚真香，无论在早晨在

傍晚在月下，总是庭中的一件宝贝。这两种花都是前此住在这里的人家留下来的。前人种花，后人欣赏，谁说一群不相识者中间没有关联呢？那一年我忽然想起，这花坛大可整理得很清楚。拔去那些杂草，补种些别的花卉，一定极有兴趣；不待想完，已经耸身而上，动手就拔草。到底是个没用的孩子，还没有拔完一半，腿便酸了，索索地抖将起来；手指也觉得发胀，似乎血液已经充满，将要破皮而渗出来了。但是我不肯就此放手，什么都忍耐着，继续地拔。泥土的气息送入鼻孔，额上的汗水积在眉间，背脊上觉得一缕的湿热，中间都含蕴着无穷的快乐。

为什么想起了幼年的那种事情呢？因为看我们的孩子现在竟得不到这一种快乐。窄窄的方方的一间屋子，桌子椅子床铺以及零星的东西把空间占了去，所馀只有一个人仅能旋身的地方，还能够像我当年那样充作屋内运动场么？偶尔大的孩子在床上想翻筋斗，小的孩子推着小竹椅奔，算是推车子，立刻遭我们所谓“大人”禁止了。虽然所以禁止的缘故，大人们未必全同，其中却显然有共通的，就是这样玩儿实是件危险的事，翻着奔着，随时有撞着桌子碰着凳脚的机会；而桌子上又陈满了器物，万一茶盏掉下来，剪刀飞下来，那更其不得了。所以须教他们一动也不动，至多只能在母亲身上爬一爬，靠一靠，其外都是有干禁令的了。

再讲到种花，我们的孩子简直没有做过那样的梦。妻偶然从小菜场中带回一束剪枝的花，便插在瓶里。这是他们仅见的花朵。在枝头摇曳着映耀着的丰姿，衬着枝叶衬着背景的情调，可怜他们的眼睛没有这福分领受过。真同井一样

的天井里，若在别地，未尝不可以栽种一两种花卉。但是这里，硬硬的水门汀地，你能把它敲破了，显出底下的泥土来么？

想到将来，想到他们的将来；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现在这样地孱弱与愚陋：禁不住怅惘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发表

“万方多难欲何之”

我不知道这句句子有没有来历，曾不曾见于某翁某先生的诗集子里，我只从某甲某乙等等的谈论里叹息里，面目上神态上，听了又听，相了又相，总觉得是这么一句：“万方多难欲何之”。

前天从苏州回来，同车的一位肥硕的中年朋友带笑说：“安逸，安逸的日子远得很呢，什么地方都不得安逸。”他不巴望甲子换了乙丑，国运家运身运说不定都会转好；他知道像这样攘攘下去，决不会闪出个俊俏可爱叫做“安逸”的面目来。这是他“漂亮”的地方。他自己也觉得这有点儿“漂亮”，所以带着笑容说出来。但是我紧接着想，又是一句“万方多难欲何之”。

这一句诚然不错。现在“没饭吃”“生活难”的呼喊已经到处可以听见，姑且除开不说。就是好好地坐在家里，也会有人来敲门，开门进来，为首的却是一支手枪。另一种情形是突然风声紧急，就将有子弹来找你，炮弹来会你，兵大爷来访你，使你不得不扶老携幼，尝一下颠沛流离的滋味。再则如孩子在妈妈的怀里，在后间门外的小天井里晒日黄，可说是极其安逸无虑了，谁知打门的闯进来一抱而去，顿时成为可怜无知的“肉票”。“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

所。"古代诗人说得多骄傲，现代人只能望而生羡，羡而生妒。离开了这里，所谓"彼乐土"也者在哪里呢？江之南这样，江之北也是这样，山之东这样，山之西也是这样，能闹什么"去"和"适"的把戏呢！想得宽些，索性到外国去吧！但是也不行，有的国家订了很严的移民法，有的国家正在闹经济恐慌，而兵衅之一触即发，盗机之无所不伏，又和本土不相上下，这哪里好算"乐土"，又哪里可以放心托胆，冒冒失失就"适"呢？总括一句，"万方多难欲何之"，这是直抒胸臆万分真诚的大感慨。

且不管禹究竟是天神性还是凡人性（这个问题让辨论古史的如顾颉刚先生之辈去讨论），现在只当是有这么一个人的。当时禹爬到东边的树顶上望，只见洪水茫茫，爬到西边的山头上望，也只见洪水茫茫，爬到南，爬到北，无不如此。试想，这当儿他有没有搔搔头，唉声叹气说，"万方多难欲何之？"这是个奇怪的问题，但是其中藏着我们近几千年一段历史的大关键。假如禹是这么叹过的，他一定老站在原来站的地方，一动也不动，专等浪头来抱他，大鱼来吞他；要不然，他为了适应洪水的环境，两臂渐渐化为胸鳍，两腿渐渐化为尾鳍，身上生出鳞片来……于是他的子孙的氏族名要到字典的鱼部里去查了。现在中国虽然常常有河水泛滥波及几十个县份的新闻，但是比起禹那时候的洪水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其次，中国并没有类乎鱼的人，虽然袁世凯洗澡的时候身上有鳞片掉下来，但是据说是他预先把鱼鳞放在浴盆里的，而这一件轶事又是编撰《袁世凯全传》一类书的人杜造出来的。据此两点，可以断定禹虽然在四顾只见洪水茫茫的时候，决

不曾叹过"万方多难欲何之"。他不叹，他不去想"何之"的问题，他觉得这个多难的本土可以变成不多难的乐土，就决定了治水的志愿，就揭开了我们近几千年历史的首页。

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为什么现在的人只会叹"万方多难欲何之"呢？

揣摩叹者的心理，万方多难既是事实，那就没有法子可想，"欲何之"者，无所之也；但是未尝不希望靠一种神通，使"一切灾殃化灰尘"，此方此土立刻涌现庄严宝相，极乐无上，然后舒舒服服过一辈子。如果叹者之辈出来声辩，说心里确实不曾有过这样的希望，我还是要一口咬定他们是这样希望的，这种希望不生根在他们的意识里，就生根在他们不自觉的下意识里。最合他们心意的进程是这样的：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暂隐所"，好比剧场里的后台，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藏在那里；于是由所谓"神通"出来摆布，好比舞台上布景的职员，他们把破板凳、缺脚床、空米罐、烂铜锅急速搬开，换上摇椅、沙发、花瓶、镜框……一件件都布置得非常妥贴，然后揭开帘幕，让在后台休息的演员们出来演一出喜剧。这果真又写意又有趣，可惜的是，在这多难的万方里很难找到一个后台，很难找到一个"暂隐所"。陶渊明先生大概是曾经找过的，结果只不过做了一篇《桃花源记》，聊以解嘲而已。退一步说，就算这个"暂隐所"竟然被哥伦布发现了，而神通由谁来使又是个问题。叹者之辈都到后台休息去了，当然决不会在台上显什么神通。要是说等待《封神榜》里的一班天神出来，那么无神论的常识现在已经普及，大家知道这是近乎愚妄的想头了。所以即使发现了"暂隐所"还是不行，何况那

是决不会发现的。结果仍旧只好站在多难的万方中的一方，唉声叹气地吟着“欲何之……”

禹所不为的，在叹者之辈却认为走得通的道路。其一，给浪头抱去，给大鱼吞去，换句话说，就是不要这条小性命。其二，化而为鱼，以期适应生存于洪水，换句话说，就是也去打枪，放炮，当小偷，做绑票。

如果对于这两条路都有点不愿意走，那么徒然叹息决不是路，上面已经说明“此路不通”了。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日作

希　望

希腊神话里这样说：天上众神之王宙斯派他的使者曼克莱送一个女子到地上来，随后又派曼克莱带来一只小箱子，寄存在那女子和她的男子同居的地方。那女子见这只雕镂精致的箱子没有锁，只用一条金索捆着，很想解开来看一看。但是她的男子不同意偷看别人的东西，劝她不要多管闲事。她难过极了，几乎忘了一切，总想看一看才好。当她一个人在房里的时候，听见箱子里发出一阵声音，越来越清楚，原来在喊她的名字，求她援救。她再也忍不住了，同时外面有脚步声，来的一定是她的男子，等他跨进门来就要被他阻止，她就急忙解掉金索，揭开箱盖。仅仅开到一条缝那么宽，里面就冲出来一群长着翅膀的小东西，一会儿四处飞散了。这些小东西是制造烦恼的专家，其中有病魔，有罪魔，有战魔，有仇恨嫉妒的恶魔；于是世界上开始有烦恼了。那女子自知闯了一场大祸，非常懊悔，只要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她都愿意去做。正当她吓得放手的时候，箱子就关上了，里面又有一阵呼声送出来，说："只要放我出去，我能医治你们的痛苦。"那女子又惊又喜，又怀着疑心，但是除了姑且试一试没有别的办法。最后放出来的那个小东西却是好的，名叫"希望"。他能补救他的同伴们的过失。世界上受到他的同伴们的

蹂躏而感到烦恼的，一遇到他，就能够产生新精神，勇于向前干。“希望”这个小东西真值得称颂啊！

现在讲一个老鼠的家族。这个家族并不繁盛，计有公鼠两名，母鼠四口，其中大的一公一母是夫妇，其馀都未成年，是他们的儿女。大概“希望”这个小东西是墨子的信徒，他安慰了世界上的人，也不肯亏待世界上的老鼠。这个老鼠家族受到他的安慰，恬适地过日子，直到最后。故事如下：

“痒啊，痒，”一只小公鼠索索地牵动着身躯说。

“我这张皮要是能够撕下来倒还舒服些，”一只小母鼠项颈的部分痒得最厉害，不住地旋转她的头。

“蚤虱这东西最乖觉不过，咬了一口，就不知钻到哪里去了！”又一只小母鼠这么说，随后又低下头去向胸腋间一口口地咬。

“没有办法，痒啊，痒，”小公鼠翘起细长的尾巴在自己背上只是抽。

老公鼠伏在暗角里，全身都隐没不见，只有两颗眼珠子闪出一点儿光。他沉静地说道：“我难道不痒么？我也同你们一样地痒。只因闹也没有用，不如定心养养神的好，所以半个字也不说。”

“不错，”一群小鼠赞同地想，“闹也没有用。我们闹我们的，蚤虱咬它们的，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定心养养神来得受用些。”

但是痒究竟熬不大住，他们仍旧浑身牵动着。

“我倒有一个希望在这里。”老公鼠不要不紧地表示他的意见。

“希望！”一群小鼠都像刚刚畅搔了一阵，觉得异常松爽，齐声喊了出来。

“我想，我们要捉尽蚤虱，应当请求那只白猫帮助。他身上也生过蚤虱，但是现在都给他捉光了。他的眼力，他的趾爪，我们向来是佩服的，他又有了新的经验，不找他还找谁！他会不会欺侮我们，我想大概不至于，他的脸没有一刻不在笑呢。我们希望着吧，只希望他答应为我们干这件事。”

像通了电似的，霎时间母鼠和一群小鼠心里都存着这个希望，痒的事情仿佛微不足道了。

不一会儿，那只白猫来了。他嘴里衔着一段“油炸桧”，四面看了看，放下嘴里的油炸桧，“妙乎妙乎”地叫几声，声音挺柔和挺妩媚。雪白的脸的确在那里笑——鼠的家族大家都觉得他在那里笑。

油炸桧唤起了鼠的家族饥饿的感觉。大家觉得动嘴巴的事儿远在好些时候以前了。在这一角地方，一点儿储藏也没有，花生米屑，饼干屑，熏鱼骨头以及其它等等，统统都搜得光光了；而突然感觉的饿却来得特别厉害，竟有点忍受不住的样子。于是请求代捉蚤虱的事暂搁，大家都默默地不动。

油炸桧在白猫的嘴里像棍棒似的舞动，原来白猫要把它玩弄一番再吃，这就可见他颇有吃东西的艺术了。鼠的家族个个看得清楚，禁不住一口一口咽唾沫，肚子里一阵阵地作怪。

老公鼠暗自想：“他大概吃得正饱，吃不下了。分给我们一点儿，看他那副慈善的样子，未必不肯答应吧。”

“妙乎！”白猫叫了一声。

“他答应了，”老公鼠心里一喜，好像已吃了半顿，因为希望的明灯挂在他前面了。他就用他的鼠须触触他的夫人和一群孩子，表示他的欢喜。

母鼠和一群小鼠其实并不知道他心里的欢喜，但是大家都对他点点头，表示能够领会。他们以为他想的该是这个意思：白猫吃油炸桧一定会有小块残屑掉下来，那就是我们的好处了。他们本来就这么想，现在一家之主也这么想，可见这是大可希望的希望了，于是大家也好像已经吃了半顿。

白猫开始嚼他的油炸桧。

不知是哪一只鼠希望太盛，欢喜得忘形了，身体一动，发出索索的声音。

白猫连忙放下油炸桧，突然袭击过来，一口衔住那只老公鼠，一只右前脚抓住了他的夫人。四只小鼠吓得浑身麻木了，八只眼睛直望着那笑着的猫脸，僵僵地，仿佛是烂泥塑成而晒干了的群像。

所有的希望统统飞去了。

但是，新的希望像魔术一样马上又出现了。老公鼠横在白猫的嘴里，觉得白猫的牙齿咬得不十分紧，就想：“希望你咬得再松点儿，不然，就像现在这样也还受得住。”母鼠伏在白猫的脚爪下，她想：“希望你不要弄破我这件皮外套。”四只小鼠大致相同地这样想：“够了，希望你不要来衔我们抓我们吧！”

希望越浓，恐怖越来越淡，像秋天的轻云一般终于消散无存。

“希望”安慰生灵，使生灵无时无刻不觉得恬适，又能安

慰生灵直到临命终时也不作已经到了绝路之想。这小东西真值得称颂啊！

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作毕

无谓的界线

前几天和几位朋友喝酒。一位朋友新近完成他的恋爱，正在计划同居的事。大概他周询博访已经好多回了，这一天问到我：他以为仪式总是要的，但是用怎样的仪式，繁呢，简呢，尊长本位呢，新人本位呢，那是应该考虑的。

我还没有回答出来，另一位朋友先开口了。他已经是中年人，因为生活负担和职业的缘故，头发变成了灰白色；近视眼几乎到了极度，眼镜的两片凹玻璃就像两个鼻烟盆。去年初冬，他为他儿子完了婚，大概他自以为对于结婚的事是熟悉的，禁不住这么说：

"当然从新式。借旅馆也行，借花园也行。能简便最好，免得许多麻烦和浪费。可是回到家里见尊长是一定要行礼的，非磕头不可！去年我的小儿结婚，他们就是磕头的。"

"为什么？"我自言自语，又似乎问他。

"这是报答。"

"报答！"对于他那伸出手臂大呼"拿谢仪来"的态度，我颇有点儿反感。我知道谢仪是只有馈赠没有索取的。

"的确应该报答，尤其是我那个小儿。他在学校里念书，忽然病起来了，是严重的神经衰弱，这当然是用功过度引起的，我就接他回家养病。接连几个月病不见好，妻悄悄地向我开

口了：'你知道他的病怎么来的？''他用功过度了。''用功过度？一点儿也不相干。他不敢对你说，却对我透露了，他不要定下了的亲……'我明白了，那学校里外国校长的几个女儿常常跟学生们拍网球，那些同学又很有几个结交女朋友的，这些事情影响到我的小儿了。

"我知道这是个重要的时机，错过了这个时机，事情就要弄糟了。可是我决不能损伤父亲的尊严，我仍然若无其事的样子，只让妻去暗示儿子，要他赶快结婚，一面向女家关说，动以利害，要他们答应在这时期把女儿送来。女儿送来了，一切侍奉的事都移交给她。儿子的病果然渐渐地好起来了。我就给他们结婚，小夫妻非常亲密，一点没有什么——我是知道的，临到这样的时机，只有赶快把他们牵合在一起，牵合在一起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他端起酒杯呷了一口酒，得意地说："他们两个不该给我磕个头么？不过我没有坐下来受他们的头，我和妻只站在椅子旁边。这也是谦逊的意思。"

记得去年的《妇女杂志》有过一回讨论，《结婚是否必须有相当的仪式？》参加讨论的几位中间，似乎只有一位主张要仪式的。但是这一位没有举出"报答"来做他的理由，也没有说仪式中间必须有"磕头"一项。像我的那位中年朋友，虽然和我们在一家酒店里促膝聚饮，虽然和我们有多年的友谊，丝毫没有恶感，可是无形的绳索或是不可见的围墙把他束缚或是圈禁在另一个世界里。他的世界既然和我们的不同，那么他要仪式，要磕头的仪式，我们就不便讥笑他议论他了。我们能够讨论的，只有在我们的世界以内的事情。

在我们的世界以内，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承认结婚必须有恋爱的。这句话的含意是：倘若没有恋爱，就是郑重其事大举结婚的仪式也不相干。换句话，要是真的两相恋爱，就是一点仪式没有也不要紧。讨论这个问题主张不要仪式的人，据我看来，不外乎把这一点意思敷陈开来，说得比较充畅而已。我也只能这样想，免得雷同，所以不再敷陈了。

我在这里这样问："结婚是什么？"

谁都要笑我的这个提问，鄙夷不屑地回答："这还用问，结婚不就是男女两个共同生活么？"

不错，男女两个共同生活，我早就知道了。但是请问，共同生活是结了婚才开始的么？男女两个由初次见面到发生感情，到爱好，到热恋，这中间互诉爱慕不知多少回，互倾心曲不知多少回，互帮互助做成大事或者小事不知多少回，相伴相携游山玩水吃东西看电影等等又不知多少回。在这样的时候，两颗心交融了，不感到彼此的差别，只觉得必须这样的合在一起才是完美的整体。要是说这不是共同生活，不但我不承认，这男女两个首先要表示反对了。那么，结婚就是男女两个共同生活这句话未免有点不切实了。

我再在这里问："结婚之后还是互相恋爱么？"

恋爱的火正燃烧着的男女们必然高声回答："还是互相恋爱，直到海枯石烂！"

这是的确的，假如结婚之后就此不恋爱，结婚真成恋爱的坟墓了。这就可见恋爱像一条无穷无尽而时刻有新意味新境界的通路。除非不走上这条路，一走上这条路就永远前进，以恋爱始，也以恋爱终。我们在地球仪上画出经纬线，为的

是便于指认。在无穷尽的恋爱的路程上，也给它画上一条界线叫做“结婚”，这算什么呢？

结婚这个词儿既不足以包括男女两个的共同生活，把它作为恋爱路程上的界线又用不着，那么，到底含的什么意思呢？老实说，就只表示男女两个发生肉体关系。说他们今天结婚，就像说他们两个将要发生肉体关系了；说这是结了婚的一对，就像说他们两个已经发生过肉体关系了。依我愚见，发生肉体关系是极其平常的事，是恋爱路程中的一个境界，走走走走自然会走到那里的。既是恋爱的一对，已经临近这个境界，如果不违背卫生学的条教，对于这意外而又意内的事又有了适当的准备，那就无妨任其自然地跨进去，就像两只手相携，两个头相偎一样。其他的事如有没有结婚之类，当然是不用问的了。要是在时间上画一条界线，标明从此开始发生关系，这样的不自然，这样的看得特异，是嫖客跟娼妓的事，从前叫做“梳栊”，现在窑子里叫做“点大红蜡烛”，决不是恋爱的一对的事。但是，结婚这个词儿却有和“梳栊”之类同样腐朽的气味。

把发生肉体关系这件事看得特异，大概也是我们很远很远的祖先的“蛮性的遗留”。人类学者一定能明白地告诉我们，当时这族的女子抢了他族的男子，或者这族的男子劫了他族的女子，而至于发生肉体关系，那抢劫者对于被抢劫者就有“这是我的东西”的想头。那是多么不平常的事呀，所以在发生关系之前，或者在发生关系之后，要举行一种仪式，歌呼跳叫，表示于众。一是夸耀“这是我的东西”；二是警告他人“这是我的东西，你们不得染指”。其唯一的根据，就在发生

肉体关系这件事上。那怎么能不把这件事看得特异呢？

世界进化，本来是抢劫的已经进化到互相恋爱，本来是“我的东西”“你的东西”已经进化到“同心一体”。彼此都不是物品，就没有所谓夺过来的光荣；真正是互相爱着，就没有让谁插进一个足趾来的危险；还有什么值得夸耀必须警告的呢？从此可见嚷着结婚这个词儿的，无非表示他自己不爱思索，只是盲目地保存着远古残余的习性而已。

所以，是昂起头挺起胸来的人，是愿意过合理的生活的人，不但不要结婚的仪式(磕头不要，三鞠躬不要，茶话会也不要)，并且不要结婚这个词儿。始于恋爱，终于恋爱。

不受传统观念的拘束，能自趋于合理的生活，这是真正的道德。至于没有了结婚这个词儿，没有了什么仪式，就会扰乱社会，给人们以坏影响，我实在想不出其所以然，所以我不相信。

本来想到此为止了，忽然记起传闻的一位小姐的话。当人家谈起某某男女两个的时候，她“若将浼焉”地嗤之以鼻说，“喝，他们跟店家一样，是先行交易的！”

这男女两个曾否先行交易，我们无从查考，好在也不必查考。只是这位小姐不问别的，如相爱不相爱之类，偏偏注目于“交易”，已经够别致了，而又深恶痛绝于那个“先”字，特地加上含有春秋笔法的一声“喝！”尤其值得玩味。

原来这位小姐又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人。在她的世界里，相爱不相爱是废话，男女的关系是“交易”。在正式开张以前而“交易”是不道德，正式开张之后呢，“交易”是唯一的天经地义。她认为这样的世界最合适，所以她“待价而沽”，所以

她讥贬"先行交易"。

在她的世界里，正式开张的重要不言可知。我替他们想，不但结婚这个词儿不可无，而且必须大磕其头才行，因为头磕得越响越见得郑重，越见得真个正式开张了。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九日作毕

线　装　书

似乎有点诗兴，嘴里哼着“云淡风轻近午天”或者“日暖风和二月天”，这里头有诗，这里头有“仄仄平平仄仄平”，这里头有云呀风呀日呀天呀等诗境，虽然不是自己的名句，总觉得至少是个懂得诗能够吟味诗的雅人。一看到“啊，没出息的狗，如果我给了你一包粪，你大概就会欢天喜地的闻它……”，情形就不同了。这固然也算是个意思，然而里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还成什么诗！于是连忙跑去洗眼睛。但是人家的确算这是诗，而且是名诗人波特莱尔的诗。这就没有法子了，只好学齐抚万茂才当时对韩国钧老先生的话说，“哪里管得了这许多！”

同样的情形，翻开线装书来，一阵的诘屈聱牙，一阵的心性义理中庸达道，就觉得藐躬颇有点儿“先哲之教”；这就了不得了，好像偶尔坐一回二等车，颇觉带点儿绅士气派似的。所以胡梁诸大家以及某某国文教授某某国语教员开出学生用的书目来，总有这样的迹象，就是这也舍不得不要，那也舍不得不要，结果是都来点儿吧。近来《京报》副刊征求人家公举十种青年必读书。十种的数目可说不怎么多了，“必读”两个字又限制得何等紧，可是有选举权的先生们总不肯放过几种线装书，一定要投它一票（虽然也有几票画上叉叉，或

者老实写举不出的)，这又大可以窥见此中消息。

我们过的是现代的生活，不懂得诗，不能够吟味诗，未必就等于不能够生活；何况诗这个东西原来是超乎“仄仄平平仄仄平”以及云呀风呀日呀天呀之外的。依此类推，我们过的是现代的生活，不懂得“先哲之教”未必就等于不能够生活。你说要懂得一点为人的道理，处世的法则，像公民科，像童子军的训练，都可以满口应承，担任下来，“先哲之教”的必需又在哪里呢？虽然我没有向《京报》副刊贸贸然投票，却觉得有几位先生举出的《结婚的爱》这部书很不错，青年该读一读；假如我投票，一定把它写上去，作为十种里的一种。因为不读《孟子》《荀子》并不要紧，在研究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的时候，这些古籍里的精华都会接触到；不懂“结婚的爱”而结了婚，对于结婚生活没有体味的能力，那就吃眼前亏了。

何况线装书里头岂只是“先哲之教”而已。在一阵的诘屈聱牙中间，那些虽是臭的，仿佛有点儿香，虽是恶的，又仿佛有点儿善；古人总是不错的，写下来给我们后生小子看总有些道理在，说它没意思反而显得自己无知，于是这么咿唔一阵就混过去了，何况这就颇有点博通的光荣。因此，你说要读这个，我也说要读这个。青年们真交运，为他们预备的异味这么多；有点儿可惜的是，只怕他们的胃太弱肠子太细。

又何况吃河豚须得拚死，煮野菌要伴以银器，异味往往毒的多。

顾颉刚先生发明了一个方法，他以为要显示线装书的含毒，应当做翻译的功夫。他说，

旧道德的权威即伏在古书的神秘之中，越难读就越神秘，使得攻击它的人眼花缭乱，不得要领，若是翻译出来，大家知道原是这么一回事，它就要站不住了。——见《语丝》第十一期

这固然很好，你要说某女士是美人，须得她裸体的时候见得美才能使人相信，翻译就是替她脱下衣裳的办法。衣裳脱下来了，伛背凸肚天花瘢肉疙瘩都露出来了，任你利口，还能说她是美人么？可是，这样做不免又要兴起“古今文之争”。我们做了翻译的功夫，他说这是“新今文”，是非圣的，是叛道的，这就大有给他犟嘴的机会了。所以这个方法未必完全有效。

我也想了个法子，姑且写在这里。药房里或者化学试验室里，对于含毒的药品往往特地标明，用意在恐怕有拿错误吃的，闹出什么乱子来。窃取这个意思，我以为对于含毒的书应该在封面上大字特书：“内含毒素，读者当心。”读者总是有眼睛的，又总是识字的，这八个字又是《平民千字课》里边有的，一定不至于有弄不清楚的意外。这就颇含有“救救孩子”的征旨，功德一定不在花了钱在报上大登其《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丹桂籍》之下。但是，这个方法恐怕也行不通。旧版善本是向来不刊这八个字的；大书馆小书坊等等虽然颇有翻印旧书的倾向，要是刊上这八个字，不是和发明“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句名言的那位先生同样的傻么？多财善贾的侩先生们哪有这样想不通的？这是一层。毒药瓶只须摆在药房跟试验室里，只由药剂师化学师们去弄，不会家家的小孩子各

拿一两瓶在手里玩的。我们认顾颉刚先生等人是药剂师化学师，他们自己弄惯了药品，难道还不会在药瓶上做个标记，却要我们来代他们做么？至于小孩子以及其他的人，只要不是药剂师化学师，本来就不必与毒药接近，又何须特地为他们在毒药瓶上一一作标记？这是又一层。

而现在的情形又非所语于此。先生们非但不肯做傻子，见书馆里不肯印，就自己提起笔来，一一为毒药瓶题这八个大字，更因为自己抽惯了鸦片，即使生吞三钱还是个活烟鬼，就以为毒药是非吃不可的，于是一瓶瓶封着当施药来赠送。这有什么办法呢！

我望见前面一片黑。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作

原题为《读书》

"双双的脚步"

小孩看见好玩的东西总是要。他不懂得成人的"欲不可纵"那些条例，"见可欲"就老实不客气要拿到手，否则就哭，就闹。父母们为爱惜几个铜子几毛钱起见，常常一手牵着孩子，只作没看见走过玩具铺子；在意思里还盼望有一位魔法师暗地里张起一把无形的伞，把孩子的眼光挡住了。魔法师既没有，无形的伞尤其渺茫，于是泥马纸虎以及小喇叭小桌椅等等终于到了孩子手里。

论理，到了手里的后文总该是畅畅快快地玩一阵子了；玩得把爸爸妈妈都忘了，玩得连自己是什么，自己在什么地方都忘了，这是可以料想而知的。但是事实上殊不尽然。父母说："你当心着，不要把这些好玩的东西一下子就毁了。最乖的孩子总把他的玩意儿珍重地藏起来。现在给你指定一个抽屉，你玩了一会儿也够了，赶紧收藏起来吧。"祖母说得更其郑重："快藏起来吧，藏起来了日后再好玩。只顾一刻功夫的快乐，忘了日后，这是最没出息的孩子。我小时候，就是把小木碗郑重地收藏起来的，直到生了你爸爸，还取出来给他玩。你不要只顾玩了，也得想想留给你将来的孩子。"这样在旁边一阵一阵地促迫，孩子的全心倾注如入化境的玩戏美梦做不成了。他一方面有点儿生气，一方面又不免有点儿怕父

母祖母的威严，于是颓然怅然与玩具分了手。这当儿比没有买到手还要难受；明明是得到的了，却要搁在一旁如同没有得到一样，这只有省克功夫有名的大人们才做得到，在孩子确是受不了的。

隔天，泥马纸虎等等又请出来了，父母祖母们还是那一套，轻易地把孩子的美梦打破了。这样，孩子买了一份玩具，倒好像买了一个缺憾。

这似乎是无关重要的事，孩子依然会长大起来，依然会担负人间的业务，撑住这个社会。但当他回忆起幼年的情况，觉得生活不很充实，如同泄了气的气球，而这又是没法填补的（哪有一个成年人擎起一个纸老虎玩得一切都忘了的呢？我们读过梭罗古勃那篇小说《铁圈》，讲一个困苦的老工人独个儿在林中玩一个拾来的铁圈，他觉得回到童年了，满心的快乐，一切都很幸福，这也不过是沉于空想的小说家的小说罢了），这时候憾惜就网络住他的心了。

世间的事类乎孩子这样的遭遇的很多，而且往往自己就是父母祖母。譬如储蓄钱财，理由是备不时之需。但是到了要用钱的时候，再一考虑，却说："这还不是当用的时候，且待日后别的需要再用吧。"屡次作如是想，储蓄的理由其实已经改变了，变而为增加储蓄簿上的数目。在这位富翁的生活里，何尝称心得当地用过一回钱呢？

学生在学校里念书做功课，理由是预备将来做人，将来做事，这是成千成万的教师父母们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万的学生们信守着的。换句话说，学生过的并不是生活，只是预备生活。所以一切云为，一切思虑，都遥遥地望着前面的

将来，却抹杀了当前的现在。因此，从初级小学校以至高等大学校里的所有一个个生物只能算“学生”，还不能算“人”，他们只学了些“科目”，还没有作“事”。

念书，念得通透了，就去教学生。学生照样地念着，念得与老师一样通透了，也去教学生。顺次教下去，直至无穷。试问，“你们自己的发现呢？”“没有。”“你们自己享用到多少呢？”“没有想到。”这就是一部教育史了。聪明的大学生发见了这种情形，作了一篇题为《循环教育》的文字，若在欢喜谈谈文学的人说起来，这简直是地道的写实派。然而大学教授们看得不舒服了，一定要把作者查出来严办，于是闹成大大的风潮，使各种报纸的教育新闻栏有机会夸耀材料的丰富。大学教授们大概作如是想：“循环难道不好么？”

上对于父母，我得作孝子。从身体发肤以至立功扬名，无非为的孝亲。下对于儿女，我得作慈父。从喂粥灌汤以至作牛作马，无非为的赡后。这的确是人情，即使不掮出“东方文化”“先哲之教”等金字招牌来，也不会有谁跑来加以否认，硬要说对父母不当孝，对子女不当慈。可是，对自己呢？没有，什么也没有。祖宗是这样，子孙是照印老版子。一连串的人们个个是抛荒了自己的，我想，由他们打下的历史的基础总不见得怎样牢靠结实吧。

将来的固然重要，因为有跨到那里的一天；但是现在的至少与将来的同样地重要，因为已经立足在这里了。本与末固然重要，因为它们与正干分不开；但是正干至少与本末同样地重要，没有正干，本末又有什么意义呢？不懂得前一义的人无异教徒，以现世为不足道，心向天堂佛土；其实只是

一种极贫俭枯燥的生活而已。不懂得后一义的人犹如吃甘蔗只取根部与末梢，却把中段丢在垃圾桶里，这岂不是无比的傻子。

过日子要当心现在，吃甘蔗不要丢了中段，这固然并非胜义，但至少是正当而合理的生活态度。

朱佩弦的诗道：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作毕

纯 乎 其 纯

像我似的，不高兴的时候听见孩子嚷嚷就要呵斥，写信或是写什么的时候不许他们有较为繁琐的说话声，他们哭得不休的时候，觉得这哭就是不好，就该骂，也不问为什么而哭；但是偶尔兴致来了，又正好没有旁的事做，“父亲的”心情忽然觉醒了，于是拉他们到膝前来，抚摩着，讲些人间海外的故事，又唱着仅有的几个从前学堂里的歌儿，这当儿，颇自以为教育的意味沦肌浃髓了。试问，这算得当之无愧的父亲么？当然算不得，因为才一会儿，所谓教育的意味就幻梦一般飞散了，呵斥、厌恶、禁止等等马上恢复原状。

好的父亲一定不是这样，他所以不同于平常的父亲，就在永远怀抱着“父亲的”心情。孩子的嚷嚷他能够利导，使化为天真嘹亮的歌声，或是娓娓动听的谈话，而决不加以呵斥。孩子哭了，他更能入微地体贴：是身体的机能有什么障碍么？是小小的心灵有什么不安么？切心的忧虑是有的，而与怒骂绝缘。至于自己有什么工作，即便是从事伟大的发明，撰写名山的著作，也决不为了这些侵占孩子们的自由，他相信这天下是孩子与大人共有的。他这样做，用不着什么强制的工夫；只以为对付孩子就只有这种态度，就是醉里梦里也换不出第二种，他唯有这样做才觉得合适，才觉得舒泰。结果，他

的孩子有福了。

类推开来想，各色的人都有当之而无愧和当之而有愧两类。人间需要的，当然是当之而无愧的一类，但是这一类少得很，我不禁为世道担忧了。

大学里的教授，学问为学生的先导，人格为学生的模式，从这些概念上想，该是怎样一种人可以知道了。而近来听见有公然喝打的教授，有挥众动手的教授，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却是个赤手空拳的人，而且并不是应该与众共弃的恶人。虽然他们自辩的文电里屡屡说“全属子虚”，而在场目睹其事的人却“言之凿凿”，未必真属子虚吧。我们闭目冥想，当他们指挥群众的时候，脸一定涨得通红，脉络一定胀得挺粗，眼光带着杀气，声音转变成异样的呶叫；学问是什么，人格是什么，飞散了，飞散了，散得无影无踪；主宰着他们的身体的只有原始的蛮性，粗野的无所谓教育的本能。我想，好的纯乎其纯的大学教授该不是这样的吧。

游山玩水的当儿，或当生离死别之际，忽然一念涌上心头，“此时此地，不可无诗”，于是笃旧的就仄仄平平一韵两韵地吟咏起来，维新的也美丽啊悲哀啊写下一大堆。在忽然一念之前，他们本同诗分隔在两边，莫说其生活其心情不曾沉浸在诗里头，连诗的水滴也不曾沾着一点儿。但是他们有记忆，记忆在那里提示着：“你是自以为能诗的，你在诗这方面是有浮名的，你是看重诗这件东西，认为是生活的点缀品的。现在是时候了，为什么不做诗呀？”这就感到欠了夙债似的一种心情，似乎非赶紧清偿不可，于是他们就吟咏起来写录下来了。但是，我想，好的纯乎其纯的诗人该不是这样的吧。

书馆里的编辑员，报馆里的主笔先生，在坐上他们的座位以前，做种种活动，或为营利求名，或为寻欢享乐，总之想不到今天坐上座位写的第一个是什么字。坐定了，笔从笔帽里抽出来了，稿纸也铺在桌上了，一支笔扶乩似地画几画，随意落纸，这才算写定了第一个字。这固然写意得很，舒服得很；但是，我想，好的纯乎其纯的编辑员和主笔先生该不是这样的吧。

孙中山先生临死之际，几乎不能说话了，还断断续续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见十八日《申报》《北京通信》），这里头含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从这里就可见中山先生是一位纯乎其纯的革命家。他没有把自己分成两橛，一橛是这个，一橛又是那个；他的思想行动，无论巨细，全都沉浸在革命里头，非由勉强，自然神化；假若把他分析起来，可以说他的每个细胞就是革命，所以他的思想精神绝对不是外铄的，所以直到最后一息，什么都不说，单给我们说这表示革命的伟大精神的金玉之言。我不佩服自己作孩子的父亲，我不佩服会显原形的大学教授，我不佩服视作诗为还债的诗人，我不佩服落笔才写定第一个字的编辑员和主笔先生；不佩服的理由，就在这些都出于偶然的高兴与勉强的自制，结果一点事也做不好。但是我佩服中山先生，我要称他为"圣人"；因为他干革命工作，终身以之，生死以之，不知其他。

纯乎其纯的精神太可贵了。能有这种精神，如果是为父的，儿子有福了；如果是大学教授，大学生有福了；如果是诗人，我们有好诗读了；如果是编辑员和主笔先生，我们有好书好报看了；如果是革命家，中国就将终于得救了。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作

暮

西窗的斜阳才欲退隐，所有的色彩似乎暗淡了一点。主人翁觉得不耐了，“来，把灯开了！”拍的一旋，成串挂着的电灯如同闭了眼好久骤然张开似地一耀，什么都仿佛涂上了一层油彩。谁说这不是快适的享用，文明生活这个题目中的应有之义呢？

那工场中的地下室，围困在几百间房间里的单人客舍，百货商店的柜台橱架之间，以及沉没在烟里雾里的什么什么铺子和人家，电灯成日成夜地亮着，简直把大地运转的痕迹抹掉了。这是个实际问题，暗了必得它亮；否则为着生存，为着生存(写到第二个“为着”，以为总该换一个别的，却觉得只有“为着生存”最妥当，所以又写了一个；就此为止，不再写第三个了)的种种活动不就停顿了么？

我不反对有快适的享用的文明生活，实际问题尤其无可反对。但是我不禁为处于这等境界中的人惋惜，他们有的是优游的，有的是劳顿的，却同样地失去了一种足以吟味的美妙的诗境了。有如对于音乐一般，某甲则心领而神会，某乙却无异对琴之牛：感受与不感受固截然有别，即使感受，又大有程度之差；然而没有音乐送到耳边，始终不给你接触的机会，这无论在某甲某乙，都该是一个缺憾吧。

这种美妙的诗境就是“暮”。

所谓暮者，乃指太阳已没到地平线之下，而黑暗的幕还没有拉拢来，一切景物承着太阳的残馀的弱光这期间。这自然不是“斜阳暮”了。在这时候，我们可以玩味那暮的特有的颜色。充满空际的是淡淡的青。若比晴朗的长天，没有那么明；若比清澄的湖水，没有那么活；这是微暗的，轻凝的，朦胧的，有如卷烟徐徐袅起的烟缕，又教人想起堆在枕旁的美人的蓬松的长发。这青色蒙上屋檐、窗棂、庭树、盆花，以及平田、长河、密林、乱山等等，任是不协调的也给调和了，消融了各具的轮廓和色彩，在神秘的苍茫中凝合为一气。

自然，我们也给这青色蒙住了，若从超人间的什么眼看来，我们就在这一气之中，正如一滴水之于大海。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我执，便觉这淡淡的青有一种压迫的力量，轻轻的，十二分轻轻的，然而总会教我们感觉着。这力量似乎离头顶一尺的光景，——不，似乎触着了头顶，——不，压到眉梢了，——也不，竟然四肢百体都压到了。虽然是压迫，不但轻，而且软，仿佛靠着木棉花的枕头，裹着野鸭绒的被褥。被压得透不转气来自是没有的事，而使神经略微受点激刺，同喝这么一盏半盏酒似的，不是醉于美德，不是醉于欢爱，不是醉于旁的一切，而醉于暝色之中了。

“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这醉的滋味就是愁。是怎样的愁呢？这愁不同于夕阳将下淡黄的光懒懒的映在屋半腰树半梢那时候所感觉的。那时候感到一种衰零的情味，莫名地惋惜，莫名地惆怅，扼要称说，当然逃不了一个“愁”字。而

在暝色之中，依恋是沉下去了，更无所谓惋惜，驰骛是停止住了，更无所谓惆怅。只有一种微茫的空虚之感，细细碎碎的又似乎无边无外的，在刺着我们的身体，渗入我们的心。这也是愁呀，但不涉困穷，非关离别，侵掠到劳人思妇以外，所以更是原始的，潜在的。在含着上两句的那首词的下半阕有一句道："何处是归程？"是何处？是何处？实在无所归呵！于是那词人发愁了。

我们想象那"日暮倚修竹"的佳人，她那时候一定不在想身世的遭际和恋爱的问题，等而下之如关于服装饰物那些事情。暝色笼住了她，修竹发出瑟瑟的低音，那种微茫的空虚之感渗入她的任何部分：无所归呵！无所归呵！她只有默默地倚在那里了。

又试念李后主的句子："独自暮凭阑，无限江山。"江山无限，在苍茫的暝色之中更能体会。但是，归向何处呢？江之东，江之西呢？山之南，山之北呢？全都不是归路，只有一句"无所归呵"的回答！这是李后主当时的愁绪。至于国亡家破之感，他当然是有的，但这时候归于浑忘了。他卸去了彩色斑斓的愁的衣服，看见了赤裸的潜在的原始的愁了。

犹之潸然滴泪的时候，心酸是微微地脉脉地，乍一念起，觉得这是个微妙的境界，其中有说不出的美。暝色之中的愁思正有同样的情形，所以我说它足以吟味。

如其不是独处在那里，旁边伴着的有爱人或至友，想来也只有默默相对吧。在这样的境界之中，有什么可说呢？有什么可说呢？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作

一件烂棉袄

家传的一件烂棉袄，破到几乎不像棉袄了，棉絮露出来了，沾了灰尘垢污，同蓝布面子一样转成油光光的黑。

冷呀冷！风穿过棉袄的罅隙，刺着肩膀，刺着腋下，刺着背心，也刺着前胸。受不住呀，受不住呀，于是勉勉强强去买一件新的，这自然是为的要活。

古语云，“衣食足而后知礼义”，现在脱一句调（仅仅脱调），新袄来而后摆架子。不行，不行，没有一件旧棉袄，没有一件烂棉袄，不就证明向来没有穿过棉袄么？没有穿过棉袄，当然也没有穿过短衫，也没有穿过长袍，这不就是裸体么？裸体是野蛮，比亡国奴更可耻；亡国奴犹可，一向是裸体，其辱不可堪。——这样想的时候，就庄重地把那件烂棉袄捡起来。

那件烂棉袄有历史呢。二十四世祖穿了它去吃邻村的喜酒，曾邀一位戴红花的大姑娘瞟过一眼；十八世祖请他的仇人吃清脆的巴掌，博得旁人一阵喝彩的时候，也正穿着它；除此以外，列代祖宗逢到婚丧喜庆总穿着它。仿佛觉得身躯扩大了，举高了，尽扩大，尽举高，巍巍乎，巍巍乎，俯视“你们”，俯视“他们”，何藐小乃尔！何低微乃尔！华胄是我，大国民是我，什么什么全是我，总之，好的都在我这里——

于是重行披上那件烂棉袄；心情与先前不同了，似乎一点儿没有风，似乎穿着锦绣那样光辉。

一切的棉袄简直不在眼里，无论是新裁原旧，无论是杭纺湖绉，我有我的烂棉袄，尽够安身立命了。作诗曰：

我不想歌唱杭纺的柔软，
我不想歌唱丝棉的轻暖，
我不上衣庄也不找裁缝，
你穿得漂亮我也不爱看。

我有祖宗传下来的布棉袄，
它的历史那么长那么荣耀。
你有么？你有么？
拖一片，挂一块，胜过皇帝的龙袍。

风自然照旧穿过棉袄的罅隙，刺着身体的露出的部分。但是关什么紧要呢？耽了禅悦似的，早已“似乎一点儿没有风”了。而要活的事，在禅悦里本来是不成问题的，自可不提。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日发表

魔　法

到民间去！到民间去！阁下是公爵么？侯爵么？贝子么？贝勒么？阁下现在住的是天上的琼楼玉宇，皇家的深宫巍阙么？

本来是民众，本来在民间，何所用其“到民间去”？鱼游于水，却号呼着“到水中去”，不是虚伪浮夸的坏鱼么？

我知道了，在漂亮地号呼着这句口号的时候，魔法在那里使弄它的神通了。

第一套，它幻化成一乘华美的飞艇把你载着，上升上升。你开始还看得清下方人的头顶，继而只看见模糊的黑点，末了是一片混茫，只约略记得其中包含着成千成万的生物。你于是靠着飞艇的绿绒的窗沿悲悯地想，“这是民众，这么扰扰攘攘多可怜！”于是不禁脱口而呼道：“到民间去！”

一套完毕，再来第二套。它幻化成一所庄严又富丽的宫殿把你留着，周围是葱翠的林木，珍异的鸟儿上下飞鸣。你偶尔从林隙望去，看见路上丧家犬似的人们来来往往，仿佛有一条长鞭子紧跟在背后；或者在你午睡梦醒的时候，听见繁碎的鸟声中混杂着一片“邪许”声，同时又闻到血腥和汗臭。你于是放下半盏清茶悲悯地想，“这是民众，这么扰扰攘攘多可怜！”于是不禁又脱口而呼道：“到民间去！”

到民间去做什么？这还待问么？自然是教训他们，指引他们，帮助他们，援救他们了。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总而言之，这就是入地狱主义。老实不客气，鄙人就是我佛。

我佛之与地狱里的小鬼，其间相去何止十八层？一位“鄙人”忽然不次升迁，化为十八层以上的“我佛”，这是魔法的第三套。

虽然一齐喊着“到民间去”，但是下面这种情形也是常情所难免：坐飞艇的往往喜欢找坐飞机的，住宫殿的往往喜欢访住园林的，而我佛总是同罗汉们坐在同一个寺院里。这样，坐飞艇的与坐飞机的，住宫殿的与住园林的，我佛与罗汉们，还不是“咱们一伙儿”么？“咱们”唱得顺口了，自然而然会漏出“他们”来——“他们”是谁？是民众呀。于是一条鸿沟横隔在“咱们”与“他们”中间了，这是人工凿成的，就像巴拿马运河。

原没有彼岸与此岸，却吃饱了没事做，特地凿起一条鸿沟来，然后唱着“到彼岸去！到彼岸去！”这是魔法给你的好处，你如果不以多事为嫌，自然应该感谢的。至于到底能去不能去，当然是另外的问题。依我的愚见，无论你能够造船也罢，能够架桥也罢，总不如自始就不要凿这条鸿沟的好。因为你即使用船只或者从桥上渡了过去，而“此岸”“彼岸”的见解已经深深地种在心里，不可磨灭，这就和没有渡过去并无两样；又何况你究竟能不能造船或者架桥还是个疑问呢。

从前人说“正能克邪”；魔法之类总算不得什么正道吧，只要你心地清明，魔法的神通就化成一阵轻烟吹散了。试试

看，试试看，先服一颗清心丸。

你试想：进学校受教育好比偶然中了彩票，书面和口头的学问就像会场里飘飘地挂着的花纸，彼此的所知所能只不过方面不同罢了，谁也未必多过了谁。这样想的时候，你眼前就没有华美的飞艇，当然不会飞升起来，你只与所有的人一同站在地面上：你就破了魔法的第一套了。

你试想：袋里多几个钱无非不动手的窃掠，服用好一点只不过多光顾了几回百货公司，用力气，流血汗，彼此都是半斤八两（说不定你还不及人家呢）。这样想的时候，你眼前不见有庄严又富丽的宫殿，当然你不会独自深居在里头，你只与所有的人一同挤在大街小巷之中；你就破了魔法的第二套了。

同时你就不会自认为先觉者，自认为有力者。教训和指引，帮助和援救，都是些大言不惭的欺人之谈，你将唾弃唯恐不尽了。你只会这样想：世界如果是地狱，谁都是小鬼，你也是一名小鬼；直到世界化而为天堂，谁都成了佛，那时候你当仁不让，自然也是一尊佛。——不是又破了魔法的第三套么？

于是你同所有的人全包在"咱们"里头，再没有什么"他们"。你好像一片平原上无数草中的一株，回头四望，青青的，摇摇的，全是你的伙伴。这片平原非但没有鸿沟，简直一条小溪都不存在。你高兴的时候顺着轻风唱歌，就说，"咱们住在这里，咱们住在这里，"——决没有"他们住在那边"。

哈哈，魔法完全失败了！魔法的失败，恢复了平常的原本的你。你旅行需要结伴呀，你要生活也得结伴。你所有的，

仅有的伙伴不就是围着你的一切人么？你自然要拉住他们的手，钩住他们的肩膀。手拉得愈紧，肩膀钩得愈牢，还有什么不相协调不相理解的事呢？

这样地拉着钩着，到底是向西天呢还是向地狱，现在姑且不论；但是比起高高地乘着云端里的飞艇，默默地住在深深的宫殿里，以及特地凿起鸿沟，然后站在此岸望彼岸来，至少要不寂寞有意思得多了。可惜的是，清心丸并不容易弄到。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发表

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

从车上跨下，急雨如恶魔的乱箭，立刻打湿了我的长衫。满腔的愤怒，头颅似乎戴着紧紧的铁箍。我走，我奋疾地走。

路人少极了，店铺里仿佛也很少见人影。哪里去了！哪里去了！怕听昨天那样的排枪声，怕吃昨天那样的急射弹，所以如小鼠如蜗牛般蜷伏在家里，躲藏在柜台底下么？这有什么用！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有什么用？

猛兽似的张着巨眼的汽车冲驰而过，泥水溅污我的衣服，也溅及我的项颈。我满腔的愤怒。

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不要紧，我想。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还不够是一课严重的功课么？血灌溉着，血滋润着，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

我注视这块土，全神地注视着，其馀什么都不见了，仿佛自己整个儿躯体已经融化在里头。

抬起眼睛，那边站着两个巡捕：手枪在他们的腰间；泛红的脸上的肉，深深的皺纹刻在嘴的周围，黄色的睫毛下闪着绿光，似乎在那里狞笑。

手枪，是你么？似乎在那里狞笑的，是你么？

"是的，是的，就是我，你便怎样！"——我仿佛看见无量数的手枪在点头，仿佛听见无量数的张开的大口在那里狞笑。

我舔着嘴唇咽下去，把看见的听见的一齐咽下去，如同咽一块粗糙的石头，一块烧红的铁。我满腔的愤怒。

雨越来越急，风把我的身体卷住，全身湿透了，伞全然不中用。我回转身走刚才来的路，路上有人了。三四个，六七个，显然可见是青布大褂的队伍，中间也有穿洋服的，也有穿各色衫子的短发的女子。他们有的张着伞，大部分却直任狂雨乱泼。

他们的脸使我感到惊异。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退隐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佩弦的诗道，"笑将不复在我们唇上！"用来歌咏这许多张脸正适合。他们不复笑，永远不复笑！他们有的是严肃与郁怒，永远是严肃的郁怒的脸。

青布大褂的队伍纷纷投入各家店铺，我也跟着一队跨进一家，记得是布匹庄。我听见他们开口了，差不多掏出整个的心，涌起满腔的血，真挚地热烈地讲着。他们讲到民族的

命运，他们讲到群众的力量，他们讲到反抗的必要；他们不惮郑重叮咛的是"咱们一伙儿！"我感动，我心酸，酸得痛快。

店伙的脸比较地严肃了；他们没有话说，暗暗点头。

我跨出布匹庄。"中国人不会齐心呀！如果齐心，吓，怕什么！"听到这句带有尖刺的话，我回头去看。

是一个三十左右的男子，粗布的短衫露着胸，苍暗的肤色标记他是在露天出卖劳力的。他的眼睛里放射出英雄的光。

不错呀，我想。露胸的朋友，你喊出这样简要精炼的话来，你伟大！你刚强！你是具有解放的优先权者！——我虔诚地向他点头。

但是，恍惚有蓝袍玄褂小髭须的影子在我眼前晃过，玩世的微笑，又仿佛鼻子里轻轻的一声"嗤"。接着又晃过一个袖手的，漂亮的嘴脸，漂亮的衣著，在那里低吟，依稀是"可怜无补费精神"！袖手的幻化了，抖抖地，显出一个瘠瘦的中年人，如鼠的觳觫的眼睛，如兔的颤动的嘴唇，含在喉际，欲吐又不敢吐的是一声"怕……"

我如受奇耻大辱，看见这种种的魔影，我愤怒地张大眼睛。什么魔影都没有了，只见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微笑的魔影，漂亮的魔影，惶恐的魔影，我咒诅你们！你们灭绝！你们消亡！永远不存一丝儿痕迹于这块土上！

有淌在路上的血，有严肃的郁怒的脸，有露胸朋友那样的意思，"咱们一伙儿"，有救，一定有救，——岂但有救而已。

我满腔的愤怒。再有露胸朋友那样的话在路上吧？我向

前走去。

依然是满街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作

虞洽卿是“调人”！

虞洽卿到上海来了。有人问他对于此次事件的意见。他说：“这样各走极端是不对的呀，我是来作调人的。”

调人！虞洽卿是来作调人的！同胞听见么？

我不知道他的国籍是什么！不知道他的头脑是什么！不知道他血管里有没有一点一滴红热的血！

凡是中国人，没有不热血沸腾，痛恨万恶的强权的。凡是有感情有思想的人，没有不一致起来竭力反抗，以为决不可略为退让的。

但是虞洽卿如同看邻家的事，他以为东邻西舍争起来了，他想出来排难解纷。他又认为我们同胞的态度是走极端，言外大有应该退让几百步的意思。

单从一句话看，虞洽卿之罪已经不可掩了。

请问同胞，究竟要他出来作调人么？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有交涉，无调停！

这回事件，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我们的同胞，决没有以“调人”自居的，决没有口口声声“我来调停，我来调停”的。为什么缘故，因为这回的耻辱是全体同胞的耻辱，所受的痛苦是全体同胞的痛苦，只有愤恨，只有反抗，是我们应走的路。至于调停，只是不相干的人的事情，只是旁观者应取的态度。试问凡是中华民国的同胞，对于这回事哪一个是不相干的？哪一个是旁观者？

现在颇听得有些人——确是我们的同胞——透露调停的声浪。我们不想从坏的方面揣测人家；我们姑且认为他们是愚昧，是不明事理，特在这里郑重地向他们提出警告：

> 要知道你们的态度无异于表示你们不是中国人，无异于表示这回事于你们是无关的。这从道德上讲，简直丧尽天良；从利害上讲，必遭全国唾弃。快明白一点儿吧！这是万万不应当取的态度呵！

没有调停！没有调停！只有交涉！只有严重地交涉！

怎样严重地交涉？就是要英人完全答应我们要求的条件（条件见本报中缝）。不答应呢？我们有抵制的方法在（亦见本

报中缝）。大家严厉的实行这抵制的方法，我们不相信英人能够安然生活于租界之中，我们不相信英国商业不会大受打击！

望同胞们切记："有交涉，无调停！"

一九二五年六月六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华队公会的供状

昨天《申报》《新闻报》封面载有《华队公会宣言》，读罢觉得非常愤懑。这里头没有一点儿血性，没有一点儿天良。中华同胞假如尽作此态，我没有别的可说，只能说大家快要做亡国奴了。这篇宣言自以为全是至理，但是首先要问，你们是哪国的国民？英国队可以这样说，你们明白宣言"我们是大英帝国顺民"的时候也可以这样说，惟其是"华队公会"，决不应该这样说！

此次事件，谁不气愤填膺，谁不奋力反抗。你们先是一点儿没有表示，似乎把它看作别人家的事，可以不问。现在你们宣言了，说到此次事件只有"此次租界罢市"六个大字。你们可知道为什么罢市？你们对于此次罢市有什么感想？从宣言里看，可以断言你们是不知道为什么的，你们是没有什么感想的。这还可以认你们是中华国民么！

你们说："夫商团有华队之设，原以维持租界公共治安为唯一之宗旨。"不错，这个宗旨很好。但是要问，在最热闹的大马路，是游行演讲的学生，是聚集听讲的群众，却给排枪打死打伤打散，这是什么样的治安？你们要实行你们的宗旨，就该出来维持，扑灭残暴的恶魔，保护同胞的生命，这才不愧是"义勇的中华队"。但是，你们这样做了么？

你们说："凡力所能及，可以维持治安，而无损于国体者，华队同人莫不坚心毅力以赴之。"不错，这也很正大。但是要问，同胞被屠杀了，中华人的生命被认为随时可以残害的了，这对于国体有没有损伤？跟着残杀我们同胞的仇敌，在众目共见的马路上站岗，还要搜查行人，搜查旅客，而行人与旅客正就是你们的同胞，显然可见中华有一批人是没廉耻没义气的，这对于国体有没有损伤？华捕不是也有维持治安的职责么？现在大部分华捕因表示反抗而罢职了。你们无损于国体，难道他们华捕反而有损于国体么？

你们说："惟知义务所在，责任所归。"懂得义务懂得责任的是你们么？我不相信。不妨拆穿说，你们认为跟着仇敌逞威是你们的义务，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这份宣言自以为措辞很巧，文章很工了，但是绝对掩不住本质的奸邪和彻骨的污迹。你们不甘自居于"大英帝国顺民"么？请你们本着中华国民的良心重新发一回宣言。

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不要遗漏了“收回租界”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我们看见了。各方面自以为有势力有地位的人（要注意，这是他们自以为）发表的意见和办法，我们也看见了。条款的数目不等，说明有详有略，都不必论；但是有个共通的缺点，中间没有抓住最切要的精魂，就是我们主张的第一款：收回租界。

提出与我们同样主张的，实在不少。不知道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为什么不取供参考而加以采纳。不知道自以为有势力有地位的人为什么不旁征众意而作同样主张。

没有想到么？我们不能相信。

想到了，觉得太迂远，所以不提出么？如果如此，那就岂有此理。租界这个东西本来是不讲公理的产物。我们要讲公理，就得立刻收回，否则我们是公理的罪人。现在发生了“五卅”事件，什么都不必说，单从他们野蛮太甚，不配管理一处地方这一点看，租界非立刻收回不可。收回呀，收回呀，心里想着，嘴里喊着，同时与他们严正地交涉。为什么要藏在心里，不把它透露出来呢？

这算得聪明么？以为他们一定不肯答应，免得事情弄僵了不好办，不得不把自己的愿望打个折扣。在我们看来，这非但不聪明，简直是卑怯，充其量就一个条件也不用提，因

为他们对于我们提出的条件，决没有一条是心悦诚服，愿意接受的。

现在正式交涉尚未开始，赶快修正还不嫌迟。条件中最切要的精魂，应当是收回租界！

末了，我们还得声明：我们提出收回租界，绝对不同于店家故意提高货价，结果好得个“脱手数”的意思。我们从公理的立脚点着想，从中华国民的立脚点着想，认为非这样提出不可，所以就提出了。“必达”是我们的目标；“不达”我们当然不满意。提案的人与负责交涉的人能够与我们取一致态度，自然最好。如或不然，我们就认为不满意；但是我们绝不悲观，因为我们自有我们的力量在。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援助罢工工人！

昨天我们对于捐资援助罢工工人有所论述。这是非常切要的事，不厌一提再提，所以今天再来提起。

平常的捐资，大都以怜悯心为出发点。见到贫苦无告或者突遭天灾的人，觉得他们很可怜，应该寄与同情，于是慷慨解囊，一以稍解对方的困顿，一以安慰自己的怜悯。

这次的捐资可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受援助的工人并不同于颠连受难的苦人（虽然他们没有钱），出钱的人也不同于乐善好施的仁人。这一点大家要注意！要知道现在的情形是，受援助的与出钱的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这条阵线是全民族反抗强权的，因而所需的力量是全民族的。

工界同胞的力量在哪里呢？啊，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罢工，罢工足以制仇敌的死命。他们好比开赴前线的军队，他们是与仇敌接仗的勇敢的英雄！各界同胞的力量在哪里呢？啊，各界也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出钱，出钱可以使我们的军队勇往直前，有进无退。

可是要万分注意，这两种强大的力量要合起来才行，缺一就不成其为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明白，捐资并不为怜悯，并不为乐善，只为唯有这样做才是善于运用我们的力量。

凡是爱国的同胞，希望这回民族运动成为光荣的，胜利

的，就该尽量出力。这是义务，是责任，是良心的命令！怎样出力呢？各种各样的运动固然是，最紧要的却是出钱。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刊于《公理日报》

日报公会不答覆

我们劝日报公会宣告不登英货日货的广告，曾于十日下午送致他们一信(原信见昨日本报通讯栏)，到此刻发这篇稿子时，经过四十八小时有馀了，没有得到他们的回音。我们那封信没有送到么？不然，我们有回单，上边硃色烂然打着日报公会的木戳。

那么，他们不愿意丢掉主顾么？这是很好的理由呀，既然是商业，既然以营利为目的，哪有丢掉主顾的道理！但是，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答覆我们呢？

或许是他们暂时不高兴爱国么？这也勉强是个理由，他们可以援引自由之说来强辩，说你们有爱国的自由，他们当然有暂时不爱国的自由。但是，为什么不明白说出来，答覆我们呢？

本星期的《国闻周报》第一篇社论叫做《静穆的悲哀》，差不多是代上海报界申辩。社论中说，“我们相信沉默中的严重，终究有不可侮的权威。”现在日报公会的不答覆，算是沉默么？严重么？不可侮的权威么？我看见一颗颗腐烂了的变了色的心。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三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再告报界与金融界

十三日，工商学联合会委员会有一个决议，由该会函致商界联合会，通告报界勿再登载英货日货的广告。十四日，该会第九次大会有一个决议，由该会致函中南银行及安裕顺康两钱庄不得接济英商，并函告总商会严行制止。

这两个决议我们完全赞同，在本报已经屡次提及了。诚以此次民族运动，非步调整齐团结坚固不能成功，所以对于步调不齐的，我们要督促他们；对于行为荒谬的，我们要斥责他们。凡是致深恨于仇敌的人，凡是抱热望于我族的人，哪一个不这样主张？因而可以说这是爱国同胞的公意。

公意可以违逆么？我要问问报界与金融界：你们自以为拥有固有的势力，落在爱国同胞的后头不要紧，破坏爱国同胞的功绩也不要紧么？错了！如果这样想，你们错了！你们违逆了同胞的公意，你们就一点儿势力也没有！你们每天发刊登载着仇人的广告的报纸，每一张是画供的罪状；你们每天解送银洋与仇人，每一回是犯罪的证据！公意有口，它能大声疾呼。公意有权，它能裁判你们的罪行。公意有力，它能执行你们的死刑。你们以为公意可以违逆么？

你们如果不敢违逆公意，就应该赶快表示你们的态度——这一句我们说过不知多少遍了。表示的方法很简单：各

报馆拒登英货日货的广告，并在报端标明“本报以后永不刊登英货日货广告”；各银行钱庄也在报纸刊登广告“以后永不与英日两国银行往来”，立即切实遵守。这样的表示如果还不愿做，不敢做，那么你们临到灭亡的时刻了，绝无可怜，毫不足惜。

坏人往往带坏了好人，少数往往连累了多数。几家报馆几家银行钱庄的贪利忘义，大家说起来总是“报界和金融界”；所以，凡是存心无愧的，爱国心殷切的报馆、银行和钱庄，为自己的心迹与名誉，尤其应当赶快出来表示。表示之道：报馆可以单独表示，不必取决于日报公会，昨天我们已经说过了；银行可以欢迎各界推举代表随时检阅罢市以来的账簿。这两件都是容易不过的，务望爱国的报馆、银行和钱庄照办。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六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总商会的条件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明明是主持此次事件的总机关，他们明明提出先决条件四项，正式条件十三项，交与蔡曾两个特派员及许交涉使。怎么来了个总商会！怎么总商会另外有十三项条件提出来！怎么交涉当局正式提出的恰恰就是总商会的十三项！

无论如何，总商会决不能解脱自己的错误。既然有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总商会就应当在委员会之下尽力协助，决不该单独有所主张。如果单独提出主张，试问，谁托付他们的？谁承认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竟有所主张了！且不说比工商学联合会主张得坏了，就是主张得更好，也不能不派他们错，因为他们没有单独提出主张的权力！

无论如何，交涉当局也决不能解脱自己的错误。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是提出主张的合法机关，他们主张了，提出了（而且提出得早），交涉当局却不把他们的主张对外提出，而与总商会作非正式的接洽，接洽之后，就丢开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主张，而提出总商会提出的主张。交涉人员的职责是代表全国与人家交涉，现在的外交当局却忘了全国，凭私意取舍于其间，我们说得尽量宽恕，也不能不斥责他们使我们大大不满。

同胞，要知道总商会之所以另行提出主张，交涉当局之所以把总商会的条件对外提出，有两种心理在那里作祟：其一，以为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主张太严厉了(其实我们还嫌太和平)，对方一定要勃然大怒，因而把事情弄僵；弄僵是最可怕的，还是再和平些再降低些来得好。其二，以为照总商会所提出的主张，只要对方肯承允，已经很过得去了；他们看不见民族前途的命运，他们看不起工界同胞的权利。

但是，同胞，我们也因为怕事情弄僵，宁愿过分迁就，提出那样怯弱的条件么？我们也只求过得去就算，宁愿不顾民族前途的命运，不尊重大多数同胞的权利么？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第六条，关于工人权利的保障订得很具体，总商会提出的第七八两条都很含混，骨子里是把“订定工人保护法及组织工会之自由及罢工之自由”一笔勾销了。关于这一点，本报第十四号已经详细论及，兹不再提。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第十二条是“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第十三条是“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这两条何等重要，但是总商会的条件中绝对没有类似的语句。如果承认他们有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领土内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裁制；如果承认他们照旧驻扎海陆军，当他们高兴的时候，依旧可以占据学校，搜捕人民，作种种的暴行。但是，在总商会看来，这些是当然之事，认为不必提出来交涉了！

我们呢？我们的见解不同于总商会，我们的愿望不同于总商会，所以应该大家起来设法补救，务使外交当局照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条件提出。若说“既已提出，不便更改或增补

了"，我们以为那是不通的欺人的话。是民众的意思，可以压制下去以迁就外交当局的不便么？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八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无耻的总商会！

开市了！明天开市了！总商会议决明天开市了！我闻此讯，心血沸腾，怒火如焚，我不料中国人里头会有这样无耻的总商会，卖国的总商会；然而中国人里头竟然有这样无耻的总商会，卖国的总商会！同胞，我们应当怎样对付它？我们应当怎样对付它！

“五卅”事件发生之后，总商会没有丝毫表示，他们没有中国人的心，没有中国人的气，这是罪状一。后来他们勉强跟在群众后头，主张罢市，但是罢了市就算了，再没有别的举动。人家以为他们有实力，人家期望他们出力合作，他们却沉默得像一只死老鼠，这是罪状二。再后他们良心发现，出来担责任了，很使大家高兴。但是担责任的结果是破坏群众的势力。对于工商学联合会，他们不肯加入，对于妥协的势力，他们却多方勾结，务使民众的力量由强而弱，由结合而分散，这是罪状三。更可诧异的，他们勾结外交当局擅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条件，因而把交涉弄糟，这是罪状四。外界对于经济绝交，正闹得如火如荼，他们对于金融界的黑幕却不问，对于各商家的媚外奸行也不问，人家督责他们，他们总是聋了耳朵似的，这是罪状五。现在，他们不知羞耻，不讲义气，他们出卖中国，出卖同胞，出卖他们以外所有的同

胞，竟宣布明天开市了，这是罪状六。

交涉虽然尚在后头，但是民众是失败了，至少这一回是失败了。失败的责任由谁负？是这个，是这个无耻的卖国的总商会！

记着，同胞记着，我们受了总商会的欺骗和出卖，应当怎么样？简单一句，大家起来打翻这个无耻的卖国的总商会！

打翻了无耻的卖国的总商会，我们的步调才可以整齐，这才可以打倒外来的帝国主义！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发表于《公理日报》

“认 清 敌 人”

“认清敌人”，这是近来最流行的一句口号。不错，敌人确实是要认清的；否则一切都成无的之矢，我们愤怒，我们咒诅，我们抵抗，我们进攻，无非无的之矢而已。

聪明人说，这很容易认清的呀。我们的伙伴吃了枪弹，流血而死，是惨痛的事件。只消问谁拾着枪的，枪弹从谁的手里飞出来的，谁就是我们伙伴的加害者，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准此，在纱厂里开枪的有名有姓，在大马路开枪的也个个有名有姓，记录起来还不消一本四页的点名册；我们在封面上题着《敌人题名录》五个大字，或陈于案头，或藏诸怀中，再会有弄不清楚的时候么？我们要为死者伸冤，要为同胞雪恨，事情也很简单。不管法权收回没收回，公审公廨总容许我们告一状的。待他们判下来，开枪撓人该押禁一个月或者七天，或者罚洋若干元充公，岂非冤得伸恨也雪了么？——虽然其间还有些拿不稳的，也许判下来说开枪的非但无罪，而且有功呢？但是实在顾虑不了许多。再从我们已经死了这许多人着想，审判者总该有点儿恻隐之心，大概不至于这样判吧。——除此以外，全是徒劳，全是胡闹：罢市罢工是商人工人的自杀，罢课是学生乘机赖学，经济绝交是无聊

的叫嚣，对英宣战简直是不要脸的吹牛……

这种办法固然觉得极为太平。但是列名于《敌人题名录》的那些人在被押禁被罚款的时候，一定会直叫冤枉，“我们是奴隶呀！我们是工具呀！你们来寻我们的事，还不如去找我们拿过的那几枝枪，因为枪弹确实从它们的管子里射出来的。”

《敌人题名录》于是要涂改了，把带姓连名的一个个都抹掉，填上第若干若干号枪枝的字样。枪弹确实从它们的管子里射出来的，还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么？

可是，有点儿不对呀，我们要认清的是“敌人”，现在却找到了“敌物”，文不对题呀。还得另找道路，重擦擦眼睛，再来认，再来认。

聪明人又说，再来认也并不难呀。纱厂里放枪是远因，暂且不管；我们只要想：大马路，负责当局，徒手的群众，不断的排枪，这些竟会连结在一起，我们认清我们的敌人了：就是英国人。

准此，《敌人题名录》可以搁在抽屉里了，因为英国人太多，实在记不胜记。但是认清却依然办得到的。遇见一切有色无色的人，不妨开口就问，阁下的国籍是……？如果回答出个“英”字来，我们就板起脸来直斥道，你这敌人！这不是十分简便么？

负责当局是英国人，我们认清英国人是我们的敌人，诚然千妥万当。但是英国人仍然可以叫屈，“我们是命运不济，八字不巧，会逢其适，才闹出这个乱子来的。要是负责当局不是我们，谁凑巧落在这个旋涡里，谁就会开枪打死人。那时候，你们的敌人就不是英国人了。”

我们能够确切地否认这些话么？我们能够坚持唯有英国人才会做出这等事来么？

况且，一个来电，一个同情我们的来电，在许多署名者中间有两个，肖伯纳，柏塞尔，正就是英国人。电文中的警句说：

> 你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仇敌，
> 你们的胜利也就是我们的胜利。

这怎么讲？我们的敌人是英国人，而我们的仇敌就是敌人的仇敌，我们的胜利也就是敌人的胜利，多么错综纠缠而不合于名理啊，讲不通，讲不通！

枪当然是由人扛的，我们舍枪而找扛枪的人；扛枪的人是奴隶，我们舍奴隶而找他们的主人。那主人怎么敢随便杀人呢？因为他有狮子那样的野心，想要慑服群类，从中称王；因为他有豺狼那样的贪心，想要吞噬群类，藉以自肥。他不杀人不能肆其威啊！他不杀人不能逞其欲啊！——正如文人们常常说的，好像层层剥蕉那样，剥到最里层，必将有所见；至此，我们认清我们的敌人了，是那些开枪杀人的奴隶们的主人，他的性格混合着狮子和豺狼的性格。会逢其适，凡具有同样性格的都会随便杀人，所以这批人都是我们的敌人——虽然现在的敌人是属于英国籍的。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似乎确有人能够奉行，所以现在常听见如下一类的话：我们在热烈呼号之馀，何不略一静心

自反呢？枪弹为什么不钻进人家的身体，却找到我们的伙伴？夫亦有自取之道乎？谁也不用认清了，还是自己下功夫修炼吧。修炼到真正充实的那一天，管他狮子和豺狼，谁敢来碰一碰！

不错，自己下功夫修炼，这是天经地义。要说有自取之道，别人不得而知，至少我不能承认，而将归咎于我们的祖先；因为狮子和豺狼的形成以及对它们的纵容，非一朝一夕之故，自有其积渐的历史，这其间我们都没有在场。现在，扑灭它们的责任落在我们肩上了。

一九二五年七月五日发表

"一致对外"

士大夫们撰论文,发表意见书,责备人家唱高调不负责任;商人们在电风扇底下,的搭的搭拨动算盘珠,计算开市以来的进益;所谓外交当局也者,不干似乎不便,竟干又有点儿不敢,婆婆妈妈地只是推三让四;独有,独有工人们,仿佛孤军深入,抵拒于前线,死也不回顾。这叫做"一致对外"!

宽容确然是很可贵的。解释一下,就是说无论什么事不该单从自己这方面想,更应当从别人的方面想。于是发现别人之不同于自己,自有种种原因(譬如士大夫们的责备人家,由于他们态度的稳健;商人们的忙着打算盘,由于他们希望赚钱不希望亏本;外交当局的踌躇审顾,由于他们想起了名誉利益等等),这叫做"了解";唯其有种种原由,也就难以深责他们。取这样的态度,就叫做"宽容"。但是,说到"一致对外",自然要"一致"拿力量出来。请问,士大夫等等的力量呢?请问,除了工人们抵拒于前线之外,士大夫等等的力量呢?不拿出力量来要是也可以宽容,那么杀中国人的那些别国人又何尝不可以宽容?我们也很了解他们,他们要遂其侵略之欲,伸展其帝国主义,非这样干不行呀!

一致对外的前提是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一伙儿"。进而问一句,为什么都是中国人就该一致对外?四个大字回答,

就是："利害相同"。这诚然是很好的理想。可惜，仅是很好的理想而已！按诸实际，凡中国人都以为自己与所有的中国人利害相同么？这却是个大有价值的疑问。

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九日发表
原为《文学周报》之《杂谈》

切要的工作

有热度的（无论五分钟三分钟），有喉咙的（无论狂喊狂叫），有力量的（无论不去上工或不买一支“红锡包”），大概已经浮萍一般显露在水面了。底里呢？冰冷的，喑哑的，软弱的，同水蛆一样繁多；你若取起一滴水，中间就有无数的这一类的生命。

所见的只是显露在水面的浮萍呀，受嘲笑当然也就是他们。于是批评家捻着髭须开口道：“又是五分钟吧？喊叫的用处在哪里呢？力量仅有这么一点点么？”他们自己处在非常超然的地位，岂但是世界人，简直是太空人，所以能说得这样地纯客观。

这也不用管他。五分钟的，至少还有热；叫喊的，至少能作声；力量虽小，至少比无力的略胜一筹：这班人在批评家的眼光中固然罪在不赦，而自己觉得并没有走错了道路。为了不孤单寂寞，这班人应该集合在一起，如昏夜的暴风雨中，亲爱的兄弟姊妹拥抱得紧紧一般。

复次，这班集合在一起的人们应该知道：所以仅只五分钟，所以仅只叫喊，所以仅只微弱的力，就因为单单有自己之类的一班人浮显在水面。要变更这个局面，非把沉潜于底里的也显露出来不可。至此，就可以知道自己目前的切要的

工作，就是把沉潜于底里的一一把他们拉起来。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
原为《文学周报》之《杂谈》

诸　　相

一、“教育家”

仿佛是清道人天台山农之辈写的三个大字，“教育家”像电影字幕似的显现在这个脸上，其闪亮耀眼，也正像电影的字幕。这个脸非常之大，要是与身体四肢相比，就像小孩子画在墙上的那样，脸是大大的一圈，身体四肢只是细瘦可怜的几笔，生在颔下。

在这个非常大的脸的后面，大约有仅仅齐到颈项，有无数藐小的人物，一个个仰望着这个大的后脑勺，他们的脖子伸得很长很长，像一群鸭子。从他们的腋下，腰间，胯下，模模糊糊地，似乎有些更藐小的人物显露出来，像山水画里的隐士渔翁似的，眉目一无所有，这些是“学生”。

我擦拭我的眼睛，定一定神，才能从闪亮的字幕里看清这张脸，觉得这张脸非常特殊，一张嘴占去了三分之二的地位，倘若是粗心一些的人，一定会说这张脸就只有一张嘴。

我听见声音了，是体面的声音？高等的声音？渊博的声音？深奥的声音？科学的声音？道德的声音？……实在也难以细说。我仿佛看见一个个声音从翕张的厚实的嘴唇皮之间滚下来，好像雨天檐头落下来的点点雨水。

嘴唇皮之间滚下来的就这样的丰富，这样的佳妙，要是从头脑中拿出来，心窝里掏出来，那还了得！于是大家拍手赞叹道："我们有了教育家了——了不得的教育家了！"

在后面仰望着后脑勺的人们自然格外把脖子伸长，直到伸断为止；而眉目全无的学生们经这么一拥挤，一喧嚷，岂但模糊，简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知识阶级"

"士君子"不免陈旧了，"知识阶级"却是崭新的名词。提起这个名词，至少会有"望之俨然"之感，仿佛跨进崇高的教堂，不免有点肃然起敬的样子。

要有几斤几两或者几尺几寸的知识，才配站上这一层阶级，我弄不大清楚。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总之，他们知道思想和名词（古昔的和现今的）；他们能够把这些思想和名词这样那样地搭配，就像拼七巧板似的；他们还能把这些东西传下去——这大概就是所谓"知识阶级"了。

"他们无知无识啊！他们无知无识啊！"这是常常从"知识阶级"嘴里漏出来的语句。"他们"，用来区别于"我们"，这是所谓"阶级意识"；"无知无识"，指不知道思想和名词之类而言，自然是事实；至于"啊"字，不用说是感叹词了。

所以世道人心，文化进程，一一担在知识阶级的肩膀上，虽然没有举行过投票公决，知识阶级也就居之而不疑。

任你粗壮结实，种得熟十亩田，织得成十丈布，但是你无知无识，那就对不起，什么也不与你相干。岂但不相干，种熟了田拿来，织成了布拿来，知识阶级不能够饿着肚皮光着

身体呀。这也是发明得很早了，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可惜，历来掌握治人的最高权力的大都不是知识阶级，其中无赖光棍倒不少，通海以来虽然风气大变了，而此例依然未破。至于修降书、上劝进表，制礼作乐，争论正统歪统等等，这才轮得到真正老牌的知识阶级。修书修得对，上表上得好，诚然是知识阶级之功；而修得不大要脸，上得有点难以为情，过错也断然派不到别人头上。总而言之，知识阶级所称的“他们”是决不在场的。

这就有点类似娘儿们的行径了，拈着绣花针绣幅鸳鸯，剥了瓜子仁排个卍字，无非给房间里增添些点缀，使老爷感到有趣而已。而端来饭菜奉上衣裳的这种态度，尤其和娘儿们毫无二致。娘儿们的生活是好是坏，各人的看法不同，说她们极端写意，大可羡慕的，固然不是没有，但是说她们等于玩物，简直可耻的，也不乏其人，现在可以不论。我们单就效果讲，类似娘儿们的行径，在老爷府第里表现固然没有什么关系，而在社会上，老实不客气，用不着。社会的房间诚然破陋不堪，但是试问，挂起了知识阶级手绣的鸳鸯就不破败了么？何况鸳鸯之类根本就不是什么有意义的东西。

我们回过来谈谈所谓“他们”吧。不知道思想和名词之类确乎是事实，但是用不着自馁，要知道所谓“不知道”，不是一概不知道，只是不知道“那一部分”而已。既然有“那一部分”，不是还有“这一部分”在么？如力量，活动等等，全都是思想的实际化，靠这些却把社会撑住了。虽然不以此自傲，至少可以心安理得，俯仰无愧。再加修炼自然是需要的，什么

事情总该在场参加，一变从前的恬退态度。

到那一天，所谓“他们”也者大踏步地一齐站出来，步步着实，坚定有力，定会把娘儿们似的一批人所站的那些阶石踩得粉碎。

我觉得其期已经不远。

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发表

记佩弦来沪

每回写信给佩弦，总要问几时来上海，觉得有许多的话要与他细谈。佩弦来了，一遇于菜馆，再遇于郑家，三是他来我家，四呢，就是送他到车站了。什么也没有谈，更说不到“细”，有如不相识的朋友，至多也只是“颠头朋友”那样，偶然碰见，说些今天到来明天动身的话以外，就只剩下默默相对了。也颇提示自己，正是满足愿望的机会，不要轻易放过。这自然要赶快开个谈话的端，然后蔓延不断地谈下去才对。然而什么是端呢？我开始觉得我所怀的愿望是空空的，有如灯笼壳子，我开始懊恼平时没有查问自己，究竟要与佩弦细谈些什么。端既没有，短短的时光又如影子那样移去无痕，于是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

过几天后追想，我所以怀此愿望，以及未得满足而感到失望，乃因前此晤谈曾经得到愉悦之故。所谓愿望，实在并不是有这样那样的话非谈不可，只是希冀再能够得到从前那样的愉悦。晤谈的愉悦从哪里发生的呢？不在所谈的材料精微或重大，不在究极到底而得到结论(对这些固然也会感到愉悦，但不是我意所存)，而在抒发的随意如闲云之自在，印证的密合如呼吸之相通，如佩弦所说的“促膝谈心，随兴之所至。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时而纵谈

时局，品鉴人伦，时而剖析玄理，密诉衷曲……"可谓随意之极致了。不比议事开会，即使没法解决，也总要勉强作个结论，又不比登台演说，虽明知牵强附会，也总要勉强把它编成章节。能说多少，要说多少，以及愿意怎样说，完全在自己手里，丝毫不受外力牵掣。这当儿，名誉的心是没有的，利益的心是没有的，顾忌欺诈等心也都没有，只为着表出内心而说话，说其所不得不说。在这样的进程中随伴地感到一种愉悦，其味甘而永，同于艺术家制作艺术品时所感到的。至于对谈的人，一定是无所不了解，无所不领会，真可说彼此"如见其肺肝然"的。一个说了这一面，又一个推阐到那一面，一个说如此如此，又一个从反面证明决不如彼如彼，这见得心与心正起共鸣，合为妙响。是何等的愉悦！即使一个说如此，又一个说不然，一个说我意云尔，又一个殊觉未必，因为没有名誉利益等等的心思在里头作祟，所以羞愤之情是不会起的，驳诘到妙处，只觉得共同找到胜境似的，愉悦也是共同的。

这样的境界是可以偶遇而不可以特辟的。如其写个便条，说"月之某日，敬请驾临某地晤谈，各随兴趣之所至，务以感受愉悦为归。"到那时候，也许因为种种机缘的不凑合，终于没什么可说，兴味索然。就如我希望佩弦来上海，虽然不曾用便条相约，却颇怀着写便条的心理。结果如何呢？不是什么也没有谈，若有所失地又"天各一方"了么？或在途中，或在斗室，或在临别以前的旅舍，或在久别初逢的码头，各无存心，随意倾吐，不觉枝蔓，实已繁多。忽焉念起，这不已沉入了晤谈的深永的境界里么？于是一缕愉悦的心情同时涌

起，其滋味如初泡的碧螺春，回昧刚才所说，一一隽永可喜，这尤其与茶味的比喻相类。但是，逢到这样愉悦是初非意料的。那一年岁尽日晚间，与佩弦同在杭州，起初觉得无聊，后来不知谈到了什么，兴趣好起来了，彼此都不肯就此休歇，电灯熄了，点起白蜡烛来，离开了憩坐室去到卧室，上床躺着还是谈，两床中间是一张双抽屉的桌子，桌上是两枝白蜡烛。后来佩弦看了看时计，说一首小诗作成了，就念给我听：

> 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烛光里，
> 我眼睁睁瞅着
> 一九二一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佩弦每次到上海总是慌忙的。颧颊的部分往往泛着桃花色；行步急遽，仿佛有无量的事务在前头；遗失东西是常事，如去年之去，墨水笔和小刀都留在我的桌上。其实岂止来上海时，就是在学校里作课前的预备，他全神贯注，表现于外面的神态是十分紧张；到下了课，对于讲解的反省，答问的重温，又常常涨红了脸。佩弦欢喜用"旅路"之类的词儿，周作人先生称徐玉诺"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如果借来形容佩弦的慌忙的神气，可谓巧合。我又想，可惜没有到过佩弦家里，看他辞别了旅路而家居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慌忙。但是我想起了"人生的旅路"的话，就觉得无须探看，"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大概是"永远的"了。

佩弦的慌忙，我以为该有一部分原因在他的认真。说一句话，不是徒然说话，要掏出真心来说；看一个人，不是徒

然访问，要带着好意同去；推而至于讲解要学生领悟，答问要针锋相对；总之，不论一言一动，既要自己感受喜悦，又要别人同沾美利（佩弦从来没有说起这些，全是我的揣度，但是我相信“虽不中不远矣”）。这样，就什么都不让随便滑过，什么都得认真。认真得利害，自然见得时间之暂忽。如何叫他不要慌忙呢？

看了佩弦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的人，见佩弦什么都要去赏鉴赏鉴，什么都要去尝尝味儿，或许以为他是一个工于玩世的人。这就错了。玩世是以物待物，高兴玩这件就玩这件，不高兴就丢在一边，态度是冷酷的。佩弦的情形岂是这样呢？佩弦并非玩世，是认真处世。认真处世是以有情待物，彼此接触，就以全生命交付，态度是热烈的。要谈到“生活的艺术”，我想只有认真处世的人才配，“玩世不恭”，光棍而已，艺术家云乎哉！——这几句就作佩弦那篇文字的“书后”，不知道他以为用得着否。

这回佩弦动身，我看他无改慌忙的故态。旅馆的小房间里，送行的客人随便谈说，佩弦一边听着，一边检这件看那件，似乎没甚头绪的模样。馆役唤来了，叫把新买的一部书包在铺盖里，因为箱子网篮都满满的了。佩弦帮着拉毯子的边幅，放了这一边又拉那一边，还有伯祥帮着，结果只打成个“跌塞铺盖”。于是佩弦把新裁的米通长衫穿起来，剪裁宽大，使我想起法师的道袍；他脸上带着小孩初穿新衣那样的骄意和羞态。一行人走出旅馆，招呼人力车，佩弦则时时回头向旅馆里面看。记认耶？告别耶？总之，这又见得他的“认

真"了。

在车站，佩弦怅然地等待买票，又来回找寻送行李的馆役，在黄昏的灯光和朦胧的烟雾里，"旅人的颜色"可谓十足了。这使我想起前年的这个季节在这里送颉刚。颉刚也是什么都认真的，而在行旅中常现慌忙之态，也与佩弦一样。自从那回送别之后，还不曾见过颉刚，我深切地想念他了。

几个人着意搜寻，都以为行李太重，馆役沿路歇息，故而还没送到。哪知他们早已到了，就在我们团团转的那个地方的近旁。这可见佩弦慌忙得可以，而送行的人也无不异感塞住胸头。

为了行李过磅，我们共同看那个站员的鄙夷不屑的嘴脸。他没有礼貌，没有同情，呼叱似的喊出重量和运费的数目。我们何暇恼怒，只希望他对于无论什么人都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他的上司或者洋人。

幸而都弄清楚了，佩弦两手里只馀一只小提箱和一个布包。"早点去占个座位吧"，大家对他这样说。他答应了，颠头，将欲回转身，重又颠头，脸相很窘，踌躇一会儿之后，他似乎下了大决心，转身径去，头也不回。没有一歇工夫，佩弦的米通长衫的背影就消失在站台的昏茫里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发表

原题为《与佩弦》

别 人 的 话

一、照　旧

甲：老兄近来的主张怎样？

乙：外甥提灯笼。

甲：那么“照旧”了。照旧是……

乙：打倒帝国主义！

甲：这是的确的，一个月以前，我已经听见你这样主张了。不但主张，并且喊，我眼见你和着群众一齐喊。

乙：岂止一个月以前，就是一个月以后，还是这样主张。就是一年以后，十年以后，直到世界的末日——这似乎说得过分些，总之，直到我这一辈子的最后一息，还是这样主张！

甲：可以说安身立命，全在这上头了。

乙：岂敢——然而差不多。

甲：这纸包里是什么东西？

乙：一点洋纱，给孩子们做衫裤穿。

甲：外国货吧？而且是……

乙：大概是东洋货；但是价钱便宜，图案也不错。我根本就不主张空口抵制外货。假如国货又好又便宜，还等你抵

制外货么？

甲：真是一针见血，旁的都是废话。不过……

乙：不过什么？

甲：记得老兄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抵制外货是我们最坚强的力量》。那篇文章我觉得痛快不过，真切不过，一口气从头到尾来回念了三遍。

乙：这叫做"题中应有之义"。况且，大家都想到了这一路去，我们执笔的，当然也得顺着潮流这么说说。

甲：说自己心里的话岂不更好么？

乙：老兄未免有点儿迂腐了。难道笔头上谈谈抵制外货就跟打倒帝国主义不一致么？哈哈……

甲：哈哈……

乙：还有，自己心里的话也不是随时随地可以说的，像我，就感到"有泪没处挥"的痛苦。我的主张是打倒帝国主义，然而飘到我耳朵里来的是关税会议，沪案重查，女师大风潮，章行严扮老虎；假如一定要说我自己心里的话，非急得两脚直跳不可。所以……

甲：唉！教育界糟到如此地步，前途不堪设想。

乙：这些枝节问题，有什么可叹的！不要管它就是了。

甲：教育是枝节？

乙：当然。你要知道，唯有打倒帝国主义才是一个整体，一个完成，一个终极！此外全都是枝节。

甲：是这样么？

乙：毫无疑义。

甲：那么领教了。——老兄险些儿对牛弹琴，哈哈。

乙：幸而老兄及早顽石点头，哈哈。

二、东 西

哲：你们开口是爱国，闭口是爱国，就跟你们谈谈爱国。

愚：欢迎极了，你先生肯指导我们！

哲：第一要记得：高唱“打倒”什么算不得爱国，排了成千成万的大队游行算不得爱国，乃至砍下手指头写血书，跳下大江自尽，都算不得爱国。

愚：我们爽然若失了。因为你先生所说“算不得”的，我们都曾经做过：我们喊过，我们游行过，他的手指头的伤还没有好，他的哥哥的灵柩还停在江边的小庙里。

哲：那么你们应该回头了。

愚：愿意接受你先生黄金似的教训。

哲：爱国的扼要方法，就是先把你们自己造成功一件东西。

愚：对呵！我们也是这样想。不成功一件东西，譬如破扫帚就扫不了地，碎茶盏就盛不了茶，何况爱国是这么重大的事。

哲：所以外面的刺激增进一点儿，社会的扰攘厉害一点儿，你们就该更加努力抽动你们的风箱，把你们自己鼓铸成功一件东西。你们听见过么？欧洲大战的时候，法国地方头顶上张着铁丝网，脚底下开着壕沟，但是学堂里照常上课，画家还是凝神屏息的对着模特儿。这样前途无量的国家的气象，正是我们的榜样。

愚：怕有点不定心吧？

哲：不定心！假如根基这样的浅薄，还配爱国么？

愚：惭愧惭愧。现在我们认清了该走的道路了，旁的都不用管，立定脚跟，先把自己造成功一件东西。

哲：这才对了。你们就此开头吧。

愚：感谢得很，告辞了。——不过……

哲：什么？

愚：在我们成为一件东西之前，这个国家由谁来爱呢？

哲：这个……

愚：我们一时糊涂，竟说出这样愚蠢的话来，这当然是已经成功的东西的责任咯。

哲：大概如此。

愚：恕我们冒昧，有如你先生，是不是一件已经成功的东西？

哲：岂敢岂敢。

愚：我们又糊涂了。你先生当然是的，还待问么！我们放心了，有你先生在这里。我们回去了。正是"解嘲今何晚，入山昔未深。"

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作

“同胞”的枪弹

“五卅事件”的半周纪念方过，上海地方又听到对群众开放的枪声！谁开的枪？不是英捕头，不是印度巡捕，却是我们的“同胞”——他们虽然开了枪，我忍心不称他们做“同胞”么！

今年的市民大会，在闸北青云路的一片空场上举行，时间是下午两点钟。我走去的时候，场上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大约有一万光景。高高矗起迎风飘扬的，是学校会社的旗，蠕蠕而动飒飒作响的，是群众手里的写着口号的纸旗。场的左面较为空旷的地方，驻着保卫团的马队，有几个下了马，在那里看望；其馀都骑在马上，枪在他们的背上。又有一队警察，二十人光景，有三个挂指挥刀的巡长站在队伍前面。场的右面则站着几队灰色衣服的兵士，戴的是灰布软边的铜盆帽，这种帽子颇有点儿滑稽的意味，教人看了发笑。似乎还有些保卫团，我记不清了。可是，穿军服的都带着一支枪，这个我记得十分清楚。

站在高台上捧着传声筒演讲的，我听不清他们所讲的话，只能听得他们那种激昂的悲壮的声调。很不争气的我，会被那种声调引起心酸，而且实在也无法听清楚，倒不如随便看看会场上的情形，于是又走到场左。

白纸的小旗时时举起，摇动时发出满山千叶般的声响。群众的呼声跟着涌起，应和着台上演讲者的口吻。

颇有味的，一位青年站在一队警察的面前，向他们讲军人的价值和天职，赞美他们的力量，又祝颂他们要用得其当；他的语调如哥哥谆劝着弟弟，并不谦恭，却十分恳挚。警察都不敢抬起眼光看那个青年，仿佛学生受先生训诫似地，只低着头玩弄那枪口，也有脱了帽子搔头皮的。三个巡长反负着手，故意作若无其事的模样，但眉目之间掩不住心头的不安。

这个青年讲完了，又来了一个，声音略低，我不能听清楚他讲的。人们好奇地聚拢来，围成了密密的半个圈。

"立正，向右转，开步走！"一个巡长乘这位青年讲完，还不曾再来一位的时候，发出了口令。他领着他的队伍离开了会场。

高台上的主席宣布今天的口号，他高喊一声，群众就和着齐喊一声。喊完了口号，主席宣布排队游行。

群众立刻回转身来，舞动着旗帜，预备向场的右角出发。可是路口塞住了，不知被什么塞住的。

"上前去呀！冲上去呀！"男女壮幼的声音一阵又一阵地喊。

我跟着群众慢慢移向前去。弃在地上的各种传单及旗子有如满田枯菜一般，已经印上好些泥痕了。忽见一个似乎学生又似乎商人模样的人走过一个兵士的身旁，略带狡狯地喊道："打倒军阀！"

不知为什么，前边的群众好像突然受惊了，一阵号呼，一顺地向场左乱窜。我莫明所以，没看见什么可惊的事物。

随即有人喊："不要走散！""归队！归队！"群众的队伍渐渐恢复，继续拥上前去，小纸旗又飒飒地大响起来。

我跟着又向前移了几步。瞥见玄君同几个人站在路旁荒墓前的砖砌上。砖砌不过桌子那么高，是个很适宜综览全局的地方。

"砰！"忽听得一声枪响，从大队的前方，会场的右角发出的。

队伍突然散乱，以吓人的势头后退。

我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用不着神经中枢指挥，就窜到刚才玄君所站的砖砌的地方。砖砌后面的坟头已经下陷，有个人俯伏在那里，我也就跌倒似地俯伏下来，靠砖砌作为屏障。我觉得背上有好几个人压上来，又见先俯伏的那个人面颊紧贴着泥土。

枪声接连地响着，此外非常寂静。

我心头只觉得空虚，但不很害怕，仿佛想过，我也许就会死。

枪声似乎停了。我抬起头来，同俯伏在一起的人也正抬起头来。我看看他们，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而且也没看清他们的脸。眼光转向砖砌之外，一个人，穿着黑长袍的人！孤单地躺在路上，离开我们不到一丈路，就是我刚才站的地方。

"砰！砰！"枪声重又开始。

我不及思索，连忙再俯伏下来。

共计有二十馀响吧。等了一会儿，不再响了，我才慢慢地站起来。望那片曾是万人拥挤的空场上，有如扫过了一般，

四围显现黑色的灰色的黄色的武装的人物。那个人，那个穿黑长袍的人，孤单地躺在路上，紧贴着地面，一动也不动……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六日夜作

我们的意思

自已睡在乱草丛中，却说颇有风雅之趣；被蚤虱咬得直跳，却说也是布施众生：这似乎是个心地很安然，不为外物所累的君子。但是，这位先生也就自欺得可怜，懦怯得可怜了！至少至少，身体底下是乱草，你该认识这是乱草，咬着你的是蚤虱，你该认识这是蚤虱。能够这样的，自然逢好花也知欣赏，遇好人也知倾慕。不然，一塌糊涂，什么都不辨，还成什么生活。不成什么生活本来也无妨，但是乱草会刺痛你的皮肤，蚤虱会给你传染疾病，简直教你吃苦不浅呢！

所以认识我们的周围是非常切要的。

现在我们谈到苏州。我们住在苏州，苏州是我们的境界，不该把它认识个清楚么？听别地的人说起苏州，总是"三吴文物""富庶之区"那些老调子，通俗一点的，便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还在杭州的上头。本地人呢？别的且不说，单看上两年兵灾没有轮到，一般人都说"到底苏州地方香烟重，神灵保佑"，这话里就藏着不少的自满的意思。但是，听听这些，就能够认识苏州么？不，决不。流传的老调子，里巷间的浮言，哪里够作我们的材料。我们要认识苏州，要用我们的眼睛耳朵，去看，去听；要用我们的身体心灵，去经历，去体验：这才会认识它的真实相，恰如其量，不

多也不少。

我们自以为看过了，听过了，经历过了，体验过了，现在来描绘一个我们所认识的苏州：

苏州确曾是文明的一块地方，可惜它衰老了，从前的文明跟着它的盛年一同过去。现在有的是古旧的僵化的遗迹，仅足供人怀念而已。它也会改装作青年的面目，要想把衰颓的气氛赶走，但是热忱不够，终于露出了它的弓背和皱额来：这只须看市政的荒芜，公共场所的徒有其名，已可了然。更剖析到它的骨里，“贫穷”和“愁苦”是一副镣铐。从前一年到头的嬉游的盛况没有了，饥寒的呼声几遍于东街西巷；几个所谓绅士握着一切的权力，一些“异途功名”的基督教徒也是“准绅士”，此外什么人都不能透一丝气，开一声口，所有的愁苦只好咽入肚里。可以揣想得到以后的情形是贫穷到了极点，再没有东西来营养这副衰老的筋骨，愁苦到了极点，再没有方法来支持这腔垂暮的心情，除了死，除了灭亡，更不会有第二条路！

我们听惯了这样的话，“戴蓝眼镜的看出来一切都成蓝色”，这是说抱着成见的坏处。我们认识苏州也许免不了抱成见。但是我们确然本于真诚，除了真诚以外没有旁的。如其这真诚就是一副蓝眼镜，那我们是很愿意把它戴着的。

苏州既是这样的一块地方，就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丢开它的念头：丢开了它，可以到旁的青年的壮盛的地方去。但是，这实在是腐败的不道德的思想！我们是走了，不能大家都走，一定有留下不能走的，难道他们就命该守住这快要消亡的地方么？譬如吃一样东西，我们尝了一点，发见这是含毒的，

就嘴里的吐去，手里的丢掉，自己走开了。人家不晓得，拾起地上的东西毫无戒心地大嚼起来，结果不是牺牲一条性命，便是沉痾三月：这不是我们的罪恶么？所以尝到了毒物，最正当的办法是先把这毒物毁灭净尽，再进一步，想法制成无毒有益的东西供大家吃。倘若舍此不图，就是腐败，就是不道德！而丢开苏州的念头，正同随手丢掉毒物的情形相仿佛，这怎么要得！惟其衰老，惟其危殆，我们更不该丢开苏州，给它想法，给它将护，是我们最低限度的责任；使它回春，使它光华，是我们要进一步努力的。如果说切身，苏州是我们游钓之乡，室家所寄，最切身不过的了；如果说近习，苏州是我们童而亲之，梦魂所系，最近习不过的了。颇有一班人以为区区小邑，何足道哉，大丈夫自有澄清天下的志概。我们不甘自弃，未尝没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也不愿意附和着说一声："区区小邑，何足道哉。"我们觉得不忘情于本土和有志于四方根本上并不冲突，而且正见其脚踏实地；所谓"四方"，不就是四方人的"本土"么？

不能忘情自然就有许多的话要说，于是我们想到报刊，想到自己办报刊。我们觉得现成有的报刊太可怜了！他们有许多的顾忌，有许多的拘束，为权势，为利益，几乎不能说心头的话，仅能说嘴边的话，那自然也未便刊载我们心头的话。自己办报刊就什么障阻也没有，要怎样说就怎样说，心头与笔头如一，我们所想的与人家了解的如一，直捷爽快。我们办这个《苏州评论》就为着这一点意思。

还有一些要告诉读者的。一种刊物出世，往往引起人家两种想头：一种以为这是几个人怀着一腔牢骚，没处发泄，

所以形诸笔墨的；又一种以为这是几个人要出锋头，别无法想，所以作此勾当的。即不用小人之心度人，我们觉得这两种想头实在不应该有，因为把作者发言的真诚看得太轻蔑了。讲到这个《苏州评论》，我们不是说过了就算的，这就和发牢骚根本不同。（凡属牢骚，只图发泄发泄罢了。）我们要借它征求同志，来和我们合在一起。老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亲爱的苏州人，我们的同乡，想来同情我们的总有很多很多吧！我们更要使我们所说的见诸事实，从笔上纸上移到地方上。须知道用纸用笔真是不得已的办法，如果有别的方法可以快快形成事实，表现在地方上，我们就不愿意弄什么《苏州评论》了。这又和出锋头之说配合不上了。

此外别无他意，就请读者又热诚又坦白地看我们本期及以后的文字。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于《苏州评论》

读《重修甘将军庙记》

碑碣文字，而且所记又是一个神庙，这在将来短视陋儒修县志的时候，自然要攫入抽屉，预备充他们著作的材料；而在我们这《苏州评论》，仅仅一万二千字的一张报纸，应该没有刊登的馀地。但是，一个迷于什么者的梦话，往往足以窥见其人的本真；譬如梦中呼喊掘地藏，可知其人贪财，梦中不歇地唤爱人，可知其人好色。所以虽然是梦话一般的碑碣文字，要说它有用，也就特别有用。现在我们要请诸位赏鉴底下的一篇碑碣文字，不用说，自然也是这样的取义。况且这篇文字里，讲起的是甲子乙丑年间的事，这位作者又是我们苏州的所谓“绅士”。正是：欲知心头意，且听口中言。

重修甘将军庙记

吴之俗习，轻逸避事。然士大夫犹能重名节，敦礼信；细民亦谨愿自将，无大奸慝。职是之故，天不降罚，神其用歆。甲子秋徂冬，江左两遘兵，他郡邑多糜烂，垂及吴下矣；终得免。以人事言，非所望也。予盖屡与其役，而心知非神不为功。先是知吴县事郭侯曾基以慈惠诚民，奉济公圣僧十年，自苏浙战起，人情凶惧，而郭侯洒然言吴地必无事。齐燮元之去江宁也，吴有裨将传檄促之，裨将卒不能戢其部曲，以致交哄。先一夕，郭侯微语予：“今事急过前十倍，济师降坛谕曰：

'天胄遣特将护吴民'民毋恐。" 予询特将何人。曰:"甘将军兴霸。"苏军六团既退吴江,五团复内变,发枪纵掠,城外之廛市危甚。彭前团长启鹏一出而遂定。其起也燎原,其灭也飙风,天也,非人也。其后浃旬,涉险百端,而终底于平。今思之,杀机发而仍收,群匪聚而即散,大厉入而复出,岂非天哉!岂非天哉!人情莫不玩明而疑幽,顾至于莫之为而为,不期然而然,则昭答冥佑,虽微亦显,不必疑也。先王以神道设教,大报答阳,美报答阴。记曰:"有功德于民则祀之,能捍大患能御大灾则祀之。"若刘猛将军,身世茫昧不可考,而以能驱蝗孽之故,庙祀遍城乡;吴门旧有福顺王庙,相传隋将陈杲仁尝以羽兵助吴越钱氏伐淮寇,钱氏为立庙;以及温将军琼,宋尚书恭,潘都尉元绍,皆以福佑斯土,庙食弗替;礼固有以义起者,然则吴人之祀甘将军也,宜哉。将军庙在胥门万年桥下,卑陋不足观,志乘亦不载。郭侯谋之众,葺而新之。士女施者麕集,凡得银若干元。始事于乙丑三月,讫于六月。落成之日,像设有严,牺醴毕具;邦人瞻拜者倾城而至。郭侯立庭下语之曰:"若曹知神来格思之安在乎?若曹不务其本业而儇薄骄淫,不思来日之难而因循玩愒,虽日夕礼神,神弗福也。"众肃然曰:"敬闻命。"又进而谕之曰:"神为若曹捍患御灾,甚勤矣。灾患之来,莫大于兵革。其召之也积渐非一日,逮其孽重而灾患至,即神亦弗能捍,弗能御。若曹勿谓大福之可屡微也。必同心向善,自强不息,而后契机与神相应也。"众瞿然曰:"敬闻命。"予再释而赓言曰:"侯已解印绶,犹以吴民故终成此祠,不懈益虔,已可感矣。凡人之情,其忘也可使之思,其思也不可使之忘。今侯以若曹所久忘者耳提面命以使之思,其果思耶?其不忘耶?其终克副侯所期而上答神贶耶?"或者谓将军转战淮楚间,其肸蚃灵显固也。将军之没,远在吴大帝迁都建业前,其生平未至吴郡甚明。何因而惓惓于此?噫,惟天心佛力,人不可得而见,爰假手于明神。何爱于吴人,惟天所诏,惟佛所命。神之灵也,不行而至,有感斯通。而胡拘拘于迹象之粗乎?祠基隘无可

拓，架屋为高阁，下临流水，风物清美，宜纳凉远览。祠门原榜曰"延爽阁"。知前此固有阁也。更以都料所馀资权子母，赡常住僧，使虔奉香火。既蒇事，请予记其始末如此。若夫栋旃埏埴，修除黝漆，享祀不忒，惟吴人之责，其勿忘郭侯之德于永永无极也。吴江费树蔚撰文，江宁邓邦述书。

诸位读完了么？读完以后，试闭目冥思，这篇文字里所表现的是何等荒谬的思想？在民国，在中华民国，却有"士大夫"，又有"细民"！当二十世纪，在文物之邦，却有"奉济公圣僧十年"的县知事；作者既称之曰"可感"，又说他有"德"！军阀捣乱的当儿，偶尔没有打翻苏州城，中间也费了不少迎接犒赏的劳费，作者却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你看所谓郭侯像个什么？装神作怪，腐语连篇，简直是个愚不可及的妖巫！又看作者像个什么！一倡一和，强补罅漏，何异是个详梦看香的虔婆！

这篇文字可以表显绅士阶级的无廉耻，无是非。所谓"屡与其役"者是什么？无非向甲军阀哀颜乞怜，回过来又向乙军阀偷送秋波，唯一的目的在表白苏州人是奴隶，是"顺民"而已。幸而"终得免"，便欢欣歌舞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他们哪里敢说一句人民该说的话，当然更不敢有什么实际力量的裁制——其实说他们不敢已把他们看高了，他们根本上就不是人民，只是"顺民"！只是奴隶！

这篇文字又可以代表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就是在民众的上头，应该有一个阶级叫做"民牧"。这实是野蛮时代的情形，不幸我们的祖先总当它天经地义。流传到这位作者，他就本此观念作文。你看他描写这"郭侯"简直当他了不得的圣

知，他自己也自附于圣知的伙计，“若曹”“若曹”地呵斥着，教训着，不是“作之君作之师”的意思么？其实在现在这时代，要不要再有什么“民牧”，是应该明白的。如其要的，就得有个最高的“民牧”，这自然该把中华民国的招牌除下，一方面去奉一个皇帝，自己预备作永久的奴隶；如其中华民国还有点值得恋念的地方，那就万万要不得什么“民牧”，“君师主义”同中华民国是决不相容的。官僚绅士所以包办一切，鱼肉民众，固然根于他们的贪欲，而他们取为护符的，就是“君师主义”！一般民众所以不声不响，任人宰割，固然由于大家的懦弱，而弄成这么懦弱的，也就是这“君师主义”！那么，“君师主义”同“民牧牧民”的思想，不是非常荒谬，应该打破的么？——至于迷于神鬼，出语不经，自然也荒谬，但我们不暇指斥了。

记着，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们苏州的所谓“绅士”！

爱苏州爱中华民国的明白人青年人，能无动于衷么？

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发表于《苏州评论》

致死伤的同胞

我想见你们激昂而又悲愤的面容，我想见你们高亢而带辛酸的呼号，我想见你们各含着一腔不平的气，我想见你们各怀着一颗纯赤的心。我又想见奴隶的奴隶狠毒地抬起枪枝来，我又想见那些枪枝里射出无论如何总归是罪恶的子弹。啊！不堪再想，但是又怎能不想。我想见你们震怒地跌倒了，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我想见鲜红的血淌在你们身旁，还是突突地沸腾。我想见你们的眼睛大大地睁着，还是怒对着仇人。我唯有十二分地悲悼，十二分地虔敬，来对待这严重的惨酷的新闻！

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你们遭到枪击而死而伤，难道单只是你们的命运么？我知道，凡是要这个民族，要这个国家的，对于奴隶们的措施一定会反对。开一个会，聚起许多人来游行，正是反对的初步表示，可谓平常之至，当然之至。但是他们丧了心，昏了头，就会叫他们的奴隶开枪！那么，我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我的邻居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我的邻居；全国的非奴隶们如果在那里，死伤的就是全国的非奴隶们。你们的死伤，是代表这么多的人吃苦受辱；对于你们，固然十二分地悲悼，但是可悲悼的仅止于你们的死伤么？他们开枪，表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敌对这么

多的人；杀伤你们，固然十二分地可恨，但是可恨的仅止于杀伤你们么？

我相信世界上只有两类人，欺人的与被人欺的。缩小范围来看，这个国度里也清清楚楚认得出这两类人的界线。命令放枪的，赞同放枪这件事的，乃至于微微觉得这件事有点儿快意的，自然都是“欺人的”。他们有顽固的头脑，有卑劣的贪欲；他们不要这个民族，不惜让它衰微，他们不要这个国家，愿意促它灭亡；同时他们是别人的奴隶。你们死了的，伤了的，我的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朋友，以及我，不用讳言自然都是“被人欺的”。但是我们有深刻的悲悯，有坚强的意志；我们要这个民族，希望它会壮健，我们要这个国家，相信它会永存；我们始终不肯做别人的奴隶。只有两类人，非此即彼，非彼即此，决没有徘徊于两类之间的。三月十八日北京的枪声就像归队的信号。在我们这边的，已经听见信号而且嗅到我们的代表的血腥了，赶快集合起来吧！

我们再不用多说废话了。要是责备他们不该放枪，说他们没有道理，我就认为这个意思不必说。他们是我们的仇人，当然我们也是他们的仇人，仇人相见还该让坐献茶么？唯有放枪才是他们的正经事，他们的道理。我们只消问自己：仇人当前，情势严重，如何才是我们眼前的正经事，我们应当尽的道理？

北京死伤的同胞们，我听见了你们的惨酷的消息，悲悼地虔敬地作如是想。

一九二六年三日十九日作

可怕的名词

现在最好的诬陷人的名词是“共产”“赤化”，正如前清时代的“革命党”与袁皇帝时代的“乱党”一样，一被加上了这个可怕的名词，便有“父不敢以为子”，“妻不敢以为夫”，“友不敢与之同伍”之概。凡与某某人有仇的，不必说什么别的话，只要说某某人是赤化，是共产党，于是他的仇便已暗中报复了；凡欲加某某人以罪的，也不必说什么别的话，只要说某某人是赤化，是共产党，便可以随便“正法”，或“格杀勿论”了。“五卅”事件发生后，英国日本的报纸上口口声声说的是防御赤化，打的是共产党；现在北京三月十八日国务院门前的大残杀，什么执政阁员又在说是共产党的煽动了。“共产”“共产”，这个可怕的名词一加上去，死者之冤便永久沉没，凶手的罪恶便轻轻的洗刷掉了！而同时又可扫去好几个政敌！好聪明的话语，好聪明的举动！

可惜他们的眼光太钝了，话虽说得聪明，却也难免有破绽。五十一个的牺牲者之中，有几个是共产的、赤化的分子？十三岁的小学生难道也是共产、赤化？于是他们不得不掩饰了，说是“无辜累及”。然而被认为主动者而下令通缉的徐谦，易培基，顾孟余，李石曾等几个人，哪几个是真的共产党？谁都晓得他们是什么性质的人，却硬加之以“共产”的头衔，真

是欲盖弥彰了。政府当局糊涂至此，无怪日本人要以唐继尧、江亢虎，乃至章锡珍为共产党了。

然而可怜的忠厚的国民不免有几个被他们的话所欺骗，而宽恕他们的这次大规模的空前大残杀的罪恶的；或许竟有一部分人因牵及了共产、赤化的问题，而不敢出来说公道话的；你一开口，准保你逃不了"共产""赤化"的嫌疑，真的真的，他们终于是很聪明的！

你们不要反对英、日的侵略，不要做什么爱国运动，不要说什么急进的话，甚至于不要管什么闲事，一不小心，"共产""赤化"的可怕名词便加在你们的头上了。一部分爱国者之极力的在报上发表反对共产的言论，以辨明自己之非赤化，夫岂得已哉！

甚至于连白话文也不能做，做了也可得到"共产"的嫌疑。于是明哲保身的人用了古文的笔调，来发表他的反对共产的言论。

"共产""共产"，这个名词真是太可怕了，太有作用了！凶手可借之以逃罪，无辜者乃冤沉海底！

血染街前，陈尸满地，空前的屠杀，乃以归罪于"共产""赤化"之言，轻轻的瞒过了愤慨的国民，呜呼，巧矣！巧矣！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发表

原为《文学旬刊》之《杂谈》

“五卅”纪念与苏州

惊天动地的“五卅”惨案发生以来，到今已有一周年了。我们《苏州评论》向来只谈地方上的事情而不涉及国家大事的，唯“五卅”事件的意义实较任何事件为重要，所以也应当约略说一点意见。

苏州邻近上海，交通便利，每逢全国有一种什么运动，苏州也往往响应得很早的；然而也不过很早的响应而已，至于沉寂起来较任何地方(穷乡僻壤自然不算)为快，这是谁也看得出的，无庸多言。而且所谓响应，也带着敷衍的色彩，事前既无广泛的宣传，当时也没有激昂的举动，不过“虚应故事”而已。听说最近的“五九”纪念，军警倒认真到场弹压，民众却漠无所知，以致开会时连大中小学生合并起来，只抵及数不满百的军警的二分之一(决非到场之后被军警赶回去的)。而各种运动会，水龙会……以至大出丧，却从来没有如此萧索。所以“五卅”周年纪念的时候，逆料也不过有若干人在那里“虚应故事”罢了。

我们也并不希望苏州有怎样慷慨激昂的群众运动，因为苏州的地位以及苏州人的习性，是于此道不十分适应的。不过“五卅”运动断非上海一隅的事，也不是去年“五卅”一时的事，是几十年来中国人民生活凋敝，精神痛苦，受足内压外侵后的

一点挣扎的呼声，这意义是确定不移的。所以“五卅”事件虽发生于上海，而全国人民应当一致声援；“五卅”流血，虽已事过境迁，而我们当永远继续此种精神。人人能够晓得这一点这种道理，已经是“五卅”运动绝大的效果了。我们所希望于同乡父老兄姊的，不过这一点，就是认识“五卅”运动的意义。

但是，对于已经明了此种意义而有志唤起群众的人，却还有一点意见。我们要唤起民众，表现我们的热诚，我们要深入民众，我们要注意地方事业。“五卅”运动后，事实上已很明显的表示这是必需的了。为什么？地方事业和民众切身有关，切身的利益比什么都要紧；“五卅”以后外国人都已见到这一层，所以近来上海闹什么参加华董三人，恢复辛亥前会审公堂制度，修改《洋泾浜章程》等问题，这都是外国人想要一点功夫在地方事业上，施行一点小惠，使中国人感觉到皇恩浩荡，便把所有的气都平了下来，若不是上海总工会等团体揭破其阴谋，上海人险乎上他们的当。所以从这些教训看来，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注意地方事业，使我们和民众发生真切的关系，我们所希望的才有把握。

我们不能不认为“五卅”运动较任何运动为伟大，而所以能伟大，便是因为能结合全国各界努力一致，而不像“五四”时候只有学生卖力。上海的“五卅”运动渐就失败，乃是因总商会首先分离的原因。从这点看起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尤其不可离开了地方上的群众。所以除土豪恶棍之外，我们应一致联合。

“五卅”周年纪念所给与有志努力者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团结地方上的各界民众，共谋地方事业之改进。

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发表于《苏州评论》

莫　遗　忘

被遗忘的人比没有被遗忘的人多不知多少倍。我们翻开过去的记载，就看见一个个姓名，看见由这些姓名代表的一个个本体所做的事，于是兴起钦仰，怀念，憎恨，鄙薄等等感情。这些虽然颇不相同，而自以为所知不少，足以自慰，却是必然会有的意念。但是，这就真个“所知不少”了么？试一细思，就知道未必。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前，曾经有过多少可以由姓名代表的本体，在通行使用姓名以后，曾经有多少本体连同姓名一齐泯灭了，这是谁也不能确切地回答的。确切地回答诚然不能，但是谁也能想到这一定是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吧。这非常大非常大的数目，有他们的灵魂，有他们的力量，在人类生存的历程中，他们尽了承前启后的责任；或许有一部分还不止于此，他们的努力使人类少走若干弯路，他们的恩泽将留传到无穷尽的将来。这未必比我们能够记住的那些姓名不重要吧？然而我们遗忘了，遗忘得干干净净，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他们似的。我们还能自夸“所知不少”么？

对于往昔不必多论，我们且来说现在。在报章和文件里常常出现的那些姓名和事迹，排印时须用大号字，谈论时须提高嗓音，当然是所谓“要人”和“大事”了。一个人假若不明白这些，那就只有抿紧嘴唇站在墙角里的份儿，因为他“不知

世务”。反过来，能够源源本本，如数家珍的，那就是个“通达世务”的通人。这似乎非常公平，通人与非通人均由自取，正如赛跑者的成绩等等，全凭各自的足力。但是我们有时候不免有点儿怀疑。某人的寿宴有某某等伶人的堂会，某人在西湖上吃醋溜鱼大加称赏，也就是腾于口说，遍载报章的材料。从谈说和登载上看，这些当然是“要人”和“大事”无疑了。然而把通晓这些人和事的人称为“通人”，我们却觉得殊难感服。为什么？因为他通晓得太无聊，而不通晓的又太多了。

现在同往昔一样，而且将来也还是一样，总有极大部分人从不挂在别人的心头，虽然他们确实出生在这世间。这在别人方面自然觉得歉然，而在不挂在别人心头的人本身却没有什么，苟无名心，尽不妨独往独来。可是更有一部分人，他们是值得让人知道的，而且是应当让人知道的，他们的事业是为自己也为大众；然而他们被淹没了，被毁灭了，淹没他们的是愚昧的浪潮，毁灭他们的是残暴的烈焰。这比偶尔被人遗忘惨酷得多。同样生而为人，竟至于受到不容向人们透露一点真消息的严惩，不能不说是人间最深刻的悲哀！这种悲哀，我们想，凡是勉为“通人”的定必深致同情，而且极愿意知道经过的一切，不惮从水底里去检查遗痕，从灰烬里去剔寻残屑。本来，单只通晓人世的浮面而不能通晓它的阴暗幽秘的部分，是不配称作“通人”的啊。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为着自己也为着大众的利益而奋斗，所得的报酬却是毒骂和罪名和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并没有犯罪而以罪名死，死了之后，亲旧友朋都不很方便公然说死者是无罪的。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所干的事业不便于别一类人，忽然失踪了，他们的形体就此消灭于天地之间——大概死了吧，死也不得公然地死！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些人，为着自身吃着痛苦，正当抗护，便受罪罚；这罪罚又是秘密的，不容谈及，在报纸的角落里都找不到这类消息，因为一谈及就是煽动之罪。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不为战争而给排枪打出来的血，凝结在大都市宽广的大路上。

我们要知道，这世间有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却永久被拘囚在牢狱里的人物。

以上说及的这些人，都是被一般人遗忘了或者改装了的。现在我们要知道他们，遗忘当然不至于了，同时也就剥掉了他们被改装的外衣，认识他们本来的真相。这样，似乎可以堂而皇之作"通人"了。其实通不通没有多大关系，得到很多实益却是真的。这些人的人格，这些人的事迹，给与我们的感动是没有限量的。从此，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识力，知道应当怎样做人，怎样处世。从此，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感情，知道应当怎样去爱，怎样去恨。

莫遗忘，莫遗忘了被圈禁在人世阴暗幽秘的部分的人们！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发表于《光明》

创 造 光 明

第一期的《光明》算是编成了，因为付印匆促，有好几位先生答应特为第一期撰文的，来不及等待他们了，很觉不安。但是答应作文并不是来装点门面的，内外感应，如鲠在喉，不说出来就觉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别人，这样真诚的话留到下一期刊出，难道就没有意思了么？决不是的。这样想的时候，不安也就减淡了。

这个刊物是公开的，凡是有良心的，为中华民族同时为世界人类之一员的人，都是这个刊物的栽培者和爱护者。我们可以不加入任何党派，我们可以不拘守任何主义。但是我们同为中华民族同时为世界人类之一员，却是坚强如铁石的事实，不容我们否认；而凡是要生活的，必须如航海者守着罗盘似的，抱定一种生活的态度，也不容我们自居例外。那么，一个人，一个具有良心的人，在这个时代该抱什么态度呢？具有良心的人的核心是"爱"，是"广大的爱"，这是无待解释的。惟其如此，具有良心的人又有"恨"，有"深切的恨"。他恨那些破坏了人间之爱的，他恨那些不自爱又不爱人的。徒然恨又有什么用呢？因而要作种种努力，如杨杏佛先生所说的"互助与自救"，用来消释心头之恨。这个恨到什么时候才消释呢？杀尽了那些可恨的东西之后吧？不是的，要到他们

变化了，他们也能完成人间之爱，也能自爱而又爱人的时候；换句话说，要到他们恢复了丧失的良心，回归到具有良心的人的队伍里来的时候。这个工作真不轻呵，也许需要祖父子孙不知道多少代的继续努力。具有良心的人呀，还不该赶早团结起来么？见解的不同，派别的互异，那些算得了什么，完全驱散，排除出心灵之外！只想着彼此同是具有良心的人，同怀着“广大的爱”，也同怀着“深切的恨”，我们是一伙儿，是永远以心相结合的一伙儿啊！这个叫作《光明》的刊物，不啻是我们团结起来的宣言，同时也无妨作为我们团结起来的盟誓。

萧朴生先生说：“人们并不努力创造光明，人们有什么权利咒诅黑暗？”这是意味深长的一句话。我们的同伴啊，抛弃了我们的悲叹颓丧与一切消极，我们开始从杨杏佛先生指出的两条路上努力创造光明吧！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发表

原为《光明半月刊》第一期《编辑馀言》

国故研究者

读了曹聚仁先生和朱佩弦先生的谈话（见本报第二二六期），就觉得我也有话想说。今天真个提起笔来了，却又觉得我的话不完全同曹先生的话照应。这里提起一声，就作为小引。

国故研究，我们认为是一种专门的事业，正如化学研究生理研究各为专门的事业一样。凡说到研究，研究者必须站定自己的地位，认定应取的态度；这差不多谁都承认的。而于国故研究，研究者的地位与态度尤其要确定；因为国故这东西太浩大了，有如波涛，你如果不站定脚跟，它会把你淹没；又太复杂了，有如染坊，你如果不抱定态度，它会把你染成五颜六色。国故研究者的地位与态度应该怎样呢？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所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是近来一篇可贵的文字，他差不多代表纯正的国故研究者向人间宣言，他说："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我们如果相信他，从这话里可以找到我们所要求的答案。他说"不受制于……"，可知地位应该是"超然的"：不慕古，不叹今，不崇尊，不薄卑，不尚贵，不鄙贱，不赞好，不咒坏。地位既这

样的超然，那么除了“检察的”态度以外，还能抱什么态度呢？我们不妨这样比方：研究室里有一位穿着工作服的研究者，在他面前是一排试验管，管内培养着各种细菌，有立刻会使人丧命的，也有直接间接帮助人生活的。但是这位研究者完全不管这些，而且仿佛忘了他自己，他凝聚他整个的心灵，倾注于各个试验管内细微的生命，看它们怎样繁殖，怎样生存，怎样活动，怎样死亡。这时候，他不诅咒那些立刻会使人丧命的，也不恭维那些直接间接帮助人生活的。国故研究者仿佛就是这样一位研究者，站的是“超然的”地位，抱的是“检察的”态度。

老的少的被称为的自以为的国故研究者，你们也这样想么？你们也这样相信么？如果不以为然，我就说不下去。如果也承认国故研究者应该立于超然的地位，应该采取检察的态度，那么我还有如下的意思。

很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认为翻翻旧书或者记诵旧书或者虔奉旧书的人是国故研究者。国故并不限于旧书，而且并不限于书籍，试听纯正的国故研究者如顾颉刚先生所说的一只弓鞋一件玩具也都是研究的材料，我们就可以明白。现在姑且退一步，认为国故就等于旧书，这种见解还是不对；你只是翻翻而已，“研究”在哪里？你只是记诵而已，“研究”在哪里？你只是虔奉而已，“研究”在哪里？并无研究而都冒充研究，此所以近二三年间，国故的声价特别高涨，“研究国故”一语萦绕于教育者的心魂，占据了受教育者的灵府，而终于不曾研究出什么名堂来。

又是很普遍的情形，翻翻的人记诵的人往往也就是虔奉的人。本来，熟习同检察是不大相容的。歪额塌鼻的妻子，相处了三年，也许会看作“天人”；何况原来未必歪额塌鼻，既没有别个恋人，自然要奉为神圣了。要对熟习的事物施加超然的检察，我想总得有相当的素养吧。自古以来，读书的人这么多，能作国故研究而有成就的却只有数得清的若干人，就因为大多数人没有相当的素养之故。他们翻翻旧书，记诵旧书，就莫名其妙地虔奉旧书，犹如不识字的人听听传说，记住传说，就莫名其妙地虔奉传说。凡事一到虔奉的地步，那被虔奉的就是无上的权威，它可以主宰虔奉者的灵魂。即以虔奉旧书论：翻开史书时，就不问里边有神话，有传说，有谎话，一律给它个相信，相信这些都是真实的史事；翻开教训书时，就不问里边有吃人的故事，有迷信的做作，有无识的格言，一律给它个钦敬，钦敬这些都是人生之至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都“有旧书为证”，而旧书是被虔奉的。但是试问，这样的人真个知道了真实的历史么？真个懂得了人生之至理么？不，不，他被骗了。他虽然被骗，而被告也就是他自己，他不该一味地虔奉啊。真个知道与真个懂得原是“研究”的报酬，而一味虔奉只能受到欺骗。这等自欺的人，即使韦编三绝，著作等身，我们决不该让他欺人，承认他为国故研究者。他要是提出质问，可以这样回答：“你并不立于超然的地位，你并不抱着检察的态度，你被国故的波涛淹没了，你被国故的染坊染成五颜六色了，所以你不是国故研究者，所以你只是国故虔奉者。”

（最近《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周刊》第十五十六期合册

是《说文证史讨论号》，相对的两方面是顾颉刚先生疑古玄同先生魏建功先生容庚先生和柳诒征先生。我觉得从他们两方面的文篇里，很可以看出国故研究者和国故虔奉者完全不同。我愿意介绍这本专号给读者。）

其次，我们要谈到把国故研究压在青年的肩上这件事。先问，这件事必需不必需？那是很容易回答的，我们刚才把细菌研究者比方国故研究者，不妨再来一下。细菌研究是人人非做不可的么？假如人人必需去研究细菌，那么研究动物植物乃至经济伦理等等的还有谁呢？这当然看各人的素养和兴趣来定的，适合研究国故才研究国故，正如适合研究其他各样才研究其他各样一样。所以人人必需是没有的事。清醒的教育者不主张一般学校有读经课，其前提并不在“经是坏的”；不论经坏不坏，只因为经不是受教育者所必需，所以不主张叫他们读。我们如果不存成见，总会同情这些清醒的教育者吧。

其次再问，这件事可能不可能？这须得看怎样才算得上可能。这也容易解决，能够立于超然的地位，能够抱着检察的态度，就有研究国故的可能。青年都能够这样么？当然，教育的努力就在辅导青年使他们在许多方面能够这样，但是所指的许多方面是有关于要他们做明白的人，办实际的事的，研究国故并不包括在内。每个教育者大概都不敢承认自己教育的青年已经完全达到能够这样的地步了吧。条件尚未完备的青年，却要他们去干必需条件完备才能干的事，我不懂得是什么道理。其结果是研究不出什么来，徒然费功夫，还算是大幸；最不幸的是由青年而变为国故虔奉者，那就像不懂什

么而胡乱去弄细菌一样，总会有染到几个毒菌的危险，才真糟糕呢。

曹聚仁先生驳朱佩弦先生的话，说“现代生活就是国故”。朱先生的意思，原是把国故同现代生活划开的。我的意思同于曹先生。汽车洋房固然不是国故，火车枪炮固然不是国故，工厂里过囚犯似的生活固然不是国故——这些都是所谓现代生活，但是试一看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的中心，纯正的国故研究者一定会高兴的发现许多国故的活材料，其中有初民的思想，有蛮性的遗留，有骗人的伦理，有怪诞的教训，有儒家的成分，有道士的气味，有这样，有那样，多得不胜说；自然，也有永恒的真理，不朽的金箴。绝大部分的人习而安之，虔奉敬守，以为唯有这样生活才对，故而这些全是好的。于是国故就化身为现代生活。

纯正的国故研究者并不会做什么特别神奇的工作，他们只从书籍及书籍以外取来许多材料，用检察的眼光，剥去了笼罩在材料身上的迷信附会增饰等等的外衣，还它们各自的赤棵棵的本相而已；仅能如此，一毫也不能增多。一般人说，什么什么是现代人应当相信的；但是，如果国故研究者研究的结果知道那是初民的思想，他们就平心静气地报告大众说这是初民的思想，他们不用什么宣传方法，他们只给大众看那不开口的真凭实据。假如一般人说，什么什么是现代人应当做的；国故研究者研究的结果却知道那些确实是蛮性的遗留，他们就毫无顾忌地告诉大家说这是蛮性的遗留，他们不容你不相信，他们会披露他们的检查报告书。对于永恒的真

理或者不朽的金箴，当然也如此。

能够这样做的：如顾颉刚先生，他说古史不是真史，只同传说一样，是慢慢地转变而成的；他不是随便说说，他有数万言的古史讨论，又有数万言的古史讨论集序文(将要出版)，是他的报告书。又如江绍原先生，他的论题很奇怪，有“红血”，有“爪发”(见《京报》《晨报》副刊)，他告诉我们从书本以及其他的材料里，检察出我国人对于这些东西抱着怎样古怪的观念。又如周予同先生，他说明经今古文是什么一回事，纬书是什么一种东西(他的论文见《民铎杂志》)，但是他自己并不曾去依傍哪一家的门户，并不说谈经心参纬。——我没有说他们三位是头等的国故研究者，也没有说国故研究者就只有他们三位。但是我相信，国故研究者至少要像他们三位那样，否则简直不配。

我的意思总不免有点儿功利，无论国故研究者如何为学问而学问，我却相信他们所得的结果总是有裨实用的。古史只是传说，那么太古的黄金时代岂非渺茫，怀古之情或者可以淡一点吧。对于红血和爪发原来有那么多古怪的观念，那么日常生活中类此者何限，反省之念或者可以动一下吧。所谓经所谓纬原来如此，那么拘守是自缚，盲从是谬妄，思想精神或者可以振一振吧。一般人沉溺于传统，长养于国故，所知所行都是蒙了外衣的，苦于不知其真相。国故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把那些事物的外衣一一脱下，“你们看吧！”这时候，一般人睁眼看了，对于平日以为是真相而确是真相的，就增加一层确信；对于平日以为是真相实际却是不堪问的，就直跳起来急于找改趋的路：这二者都是生活的跃进。研究国故原

是为学问而学问，其结果却能使一般人生活跃进，溉世的价值又何等崇高啊！然而要注意，这只是指纯正的国故研究者而言，冒充国故研究者而其实是国故虔奉者，一丝一毫也没有他的份。

再就国故研究者一方面说。所谓超然的地位与检察的态度，是专指研究的时候说的。在研究已毕，结果既得之后，就不是这样了。譬如，古史只是传说，有种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然是事实。但是一个问题马上跟在后头：要不要相信古史呢？我们是人，古史与人多少有关系，我们对它信或是不信，必得决定一下；决不能只知检察，终于超然，也不信也不不信。这是说国故研究者对于研究的结果，在自己生活上不能无所取舍。

如何取舍呢？是个宝贵的教条，理性上该当遵从的，当然把它融入自己的生活里。是一宗无上的罪恶，虽然研究它的时候站在超然的地位，无憎厌亦无偏好，但是从人生的立场，不容不给它个深恶痛绝。我想，若是纯正的国故研究者，决不会仅仅研究而止，凭他们的素养处理他们的生活，他们必然是新生活的企图者。新生活不就是合理的生活么？国故研究同其他研究一样，彻头彻尾就只在达到合理生活的目标。

曹先生说："现代社会显然分为二群了：那一群是以旧道德旧思想为根据而过他们的旧生活，组织他们的旧社会；这一群是以新道德新思想为根据而过我们的新生活，组织我们的新社会。"通常的见解以为国故研究者必是笃旧之辈，其实

笃旧之辈只是国故虔奉者而已。纯正的国故研究者无论如何不存功利之心，但他们是人，总得归入二群里头的一群；根据他们的素养和研究结果，他们又一定是后一群里的成员。组织新社会，实现真的现代生活，要有各色的工程师，国故研究者就是工程师中之一部分。

笃旧的国故虔奉者，你们休矣！

少数的纯正的国故研究者，你们要分外努力，尤其是在这十足黑暗的时代！

（写毕后自觉说得不畅，但是也自信不甚荒谬。）

一九二六年六月六日发表于《文学》

诗　　人

甲：近来有新诗吗？

乙：没有，久已没有了。

甲：啊！未免使诗坛寂寞。不知道有多少读者正渴望着你的新诗呢。

乙：我倒没有想到这一层。

甲：在酝酿更伟大更名贵的诗篇吧？

乙：不。诗跟我疏远了，疏远得像消散了的梦，我也不想去找它。

甲：这是多么可惊的事，诗会跟你疏远！你遭到了什么意外的事吧？

乙：没有遭到什么意外的事，我还是平常的我。

甲：那么……

乙：那么什么？

甲：那么不应该改变了常例。好久不作诗，总有点儿不同往日吧？你得仔细省察一下。

乙：也不用仔细省察，我近来只觉得满腔都是恨。

甲：哦，原来如此。是春恨呢还是别恨？——这些都是再好不过的诗题呀。

乙：都不是，都不是。

甲：那么一定是生老病死，人生无常，那个彻底的大恨了。这也是绝好的题材，古代的《诗经》跟《古诗十九首》里，就有属于这一类的好些名篇。

乙：也不是。告诉你，我所恨的在“生”之后“老病死”之前。

甲：在中间，中间是什么呢？

乙：我恨我们这个生活，我恨形成我们这个生活的社会。

甲：原来你不声不响，转成厌世派了。那么，也不妨作几首“游仙诗”“招隐诗”聊以寄意呀。

乙：你的心思真像弹簧一般，听我说恨这个生活，马上一弹弹到了厌世派。恨着这个，不可以望着那个吗？那个也是生活，也是社会呀。又哪里搭得上什么厌世派！

甲：这倒不错。我不妨把弹过去的自己检回来。但是，我要听你说说为什么要恨。

乙：啊，我们的生活！“愚昧”高高地坐在顶上，抽着他那狠毒的鞭子；“强暴”密密地围在四周，刺着他那锋利的刀剑；不容声响，声响就是罪恶；不容喘息，喘息就是乖逆；再也不用说昂头挺胸走几步，放怀称心谈一场：你想，这还成什么生活？除了厌世派（他们本来就不愿意好好地活在世间），谁还能不恨？

甲：确然如此，确然如此。我也觉得有点儿怅怅然了。

乙：你跟我原是同一个网里的鱼呀。我们处在同一个社会里，过着同样的生活，当然会抱着同样的恨。

甲：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正像同舟共济的伙伴，彼此该有个商量。

乙：我自己跟自己商量过了，不妨告诉你。

甲：希望你的意思比金子还名贵。

乙：我的意思是这样：恨，不妨填满胸腔，不妨像海一样深，可是，决不能徒然的恨。徒然的恨只有毁灭了自己，此外没有半点儿结果。

甲：我能明白，这是个虽简单却真实的道理。肚子饿的时候，要是不想办法找东西吃，不是只有饿死自己吗？

乙：怎么不是？并且，单只会恨，可没有力量消释这个恨，这样的人配恨吗？这是丧失了人格，也就是毁灭了自己。

甲：那么……

乙：所以我决意拿出我的力量来，亲自动手，把这个生活撕成粉碎，让它再也拼凑不拢来；同时另外建造个新的。

甲：好大的志愿！但是，这只怕不是你的事。

乙：怎么不是我的事？这不单是我的事，而且也是你的事。

甲：你忘了你是诗人了。

乙：我是诗人吗？

甲：你决不至于丧失了记忆力吧。报上提起你的名字，不是总给加上“诗人”的称号吗？

乙：这是别人这样写的，我并没有关照他们这样写。

甲：他们这样写，原为你能作诗的缘故。

乙：我虽然能作诗，但是我也能做人；与其称我为诗人，不如直截了当称我为“人”好了。

甲：你究竟作了许多不是人人能作的诗。

乙：所以必得称我为诗人吗？

甲：正是这个意思。

乙：就算是诗人，又怎样呢？

甲：诗人自有他的园地，自有他的工作。诗人的收获能够清醒人家的心灵，安慰人家的痛苦，具有无上的价值，正不必再去过问旁的。像你说的，撕碎一个再来建造一个，这太现实了，太功利了，是另外一种人的事，不是你诗人的本分。

乙：原来这里头有这样一个圈套。

甲：什么圈套？

乙：世间的圈套多得很，往往用很好的名目引你去钻，钻了进去之后，你就休想有自由天地。譬如当尼姑，专门替人家忏悔罪孽，超度幽魂，岂不是个很好的名目？但是当了尼姑之后，任它春花秋月，总不容你思一思"凡"。《孽海记》里的小尼姑可不管，她"思凡"而且"下山"，所以对于她的笑骂一直延到如今，并且可以料想，还会延到很远的将来。这是何等可怕的圈套！用诗人的称号来加给人，无非是同样的圈套。

甲：你说笑话了，哈哈！

乙：倒并非笑话。思凡是尼姑最切身的事，为什么当了尼姑就不许思凡？难道尼姑只该替人家忏悔罪孽，超度幽魂，却不该实现自己的愿欲吗？同样的情形，撕碎一个再来建造一个是我最切身的事，为什么被称为诗人的时候就做不得？难道诗人只该给人家当清心丸或者忘忧草，却不该当心自己的生活吗？——我若是尼姑，决不怕人家笑骂，要思凡就思凡。我现在被称为诗人，虽然你说其他的事不是我的事，又岂能动摇我的心呢？

甲：哈哈，你要用尼姑来对比到底了吧？

乙：哦，十年二十年之后，也许有真好的诗出现，这好诗的作者也许就是我。

甲：欢喜之至，诗坛终究不至于寂寞了。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发表

腐烂了玷污了的

我现在开始要骂了。骂什么？我要骂腐烂了的人心，我要骂玷污了的人格。这种人心这种人格是我们的乡人的。我为他们悲痛，我想：怎么乡人中会有这样的人心和人格呢！但是，悲痛有什么用呢？腐烂了再会完整么？玷污了再会干净么？不会，不会，历千万劫也不会。于是我就决定易悲痛而为骂。骂，老实说，就是表示“深恶而痛绝之”。其作用当然是说给完整的人心干净的人格听的，至于被我骂的听或是不听，倒并不在乎，反正他们的人心腐烂了，他们的人格玷污了，再没有别的希望。

在本刊第二期里，我们曾恳切说明我们不高兴骂人。我们所期望的是地方的改善，全体乡人生活的进步。要做到这些，用得到的是道德、智慧、热诚和不断的努力，用不到的是无谓的骂。但是要知道，这是常情恒理，可以概括一般的人和事，却不可以概括异乎寻常的怪人怪事。好好的人心，会自致腐烂，好好的人格，会自取玷污，你想其人其事多么怪？既然是怪，我也就破了常例给他们一顿骂。而且，这些东西正是地方改善生活进步的障碍物，障碍物难道不该攻击么？那末，我的骂就譬如轰然的一声炮，并未违背我们的初旨。

事情是很简单的，恐怕读者不大知道，在此说一说。有

些人说，我们办这个刊物是"有所为"的，为的是拿钱。钱哪里来？广州的宣传费。谁是收受者？丁晓先。多少数目？二千几百块。丁晓先拿了当然不好意思独吞，由几个作文的朋友分派。所以，我也是拿到钱的一个。可是，他们没有说我拿了多少，故而现在无法告诉读者。

他们的眼光比泥底下的地鼠还要细，他们的志概比泥潭里的猪还要渺茫。他们相信人生有所作为时，一定是有所为，所为一定是为自己，为自己的肚皮，为自己的地位，为自己的妻子，为自己的什么什么。他们不相信一个人会有谋及大众的志愿，他们不相信自己就包在大众里，大众的福利才是自己的福利。因为不相信这些，看见了不大熟习的事情就不免骇怪。出一种刊物是要出钱的，是要费心思的，而且在这八表同昏的时代，又是要担负一些危险的。他们想："钱，何等可贵的东西，哪有肯白花的？有心思，打打麻雀不好么，为什么一定要作文字来提倡什么改善苏州？危险，那是可怕极了，不为了什么，哪有随随便便就把它担上肩膀的道理？"他们提出了这些疑问，自然要有个解答，以己度人，他们作如是想："那一定是为自己的什么什么了。有了钱，自己的什么什么统可以解决，那么，一定是为的钱了。"于是传出上面所说的那个消息。——你晓得我所悲痛的是什么？我所悲痛的就是他们这样揣测完全表现了他们自己的心理，而这种心理，这样的自私，这样的卑鄙，简直是亡国破家的长养不来子孙的心理！

我不愿意告诉他们，我们的印刷费是你一块钱他两块钱凑集起来的，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不会相信人世间会有这样的

事。我们本来可以把谁出一块钱，谁出两块钱，刊登在本刊以为凭信；但是，卑鄙的心理是什么都想得出的，他们不会说我们故意列出某人某人的姓名作为掩饰么？即使我们同人当着他们的眼，从衣袋里摸出一块两块钱来，他们不会说我们拿了若干若干的宣传费，特意吐出一块两块钱来遮人眼目么？所以我们不想辩白，只认他们自烂良心，自污人格，给他们一顿骂。

他们常常感慨道德沦亡，青年浮薄，似乎世间的直行美德只有他们还保守着。然而，他们偶一妄揣，误传消息，原形就显露了：原来他们是无上的自私者，是不知有群的鄙夫，是金钱座下的奴隶！道德，在哪里？淳朴，在哪里？让这些东西担负社会的责任，社会哪得不腐败！以这些东西作地方的栋梁，地方哪得不消沉！我相信一个社会一个地方要弄得好，须有许多高尚贞固的分子，须有许多阔大精深的人才。那些口里嚷着"道德道德"，而其实是鄙污不堪的东西，没有他们的份，应该淘汰，淘汰之后，社会地方才有新生的希望。

我们口里不嚷什么道德沦亡，然而幸免自私，言行如一，自以为具有那些东西所没有的一点美德。我们都是青年，不造谣言，不以小人之心度人，自以为比那些东西淳朴得多，而且还不屑与那些东西相比。我们各有一点能力，各有一种职业，虽然他们造我们的谣言，我们依旧可以从劳力所得之中取出一块两块钱来，继续做我们愿意做的事，自以为颇心安理得。——可是我们一点也不自满。我们觉得我们的力量太微弱了，只能出一张评论；我们又觉得我们的诚意太单薄了，并不能感化那些东西，却暴露了他们的丑恶。我们实在非常

的不自满，我们口口声声说改善苏州，而苏州还是个委靡破烂的苏州！

末了再说一句，我这些话是说给良心未烂人格未污的读者听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发表于《苏州评论》

水 患

甲：水只是涌进来，涌进我的田里，像山洪归壑一般。我的天呀！我的田！

乙：你看我的田，白茫茫一片，竟成为湖荡了。葱绿的禾苗淹在水底下，现在该要腐烂了。啊，我的宝贝！我的生命！我的葱绿的禾苗！

甲：你这样说，更教我伤心了。十几天前，我已经发见禾苗透出了尖尖的花穗。你想，假如没有这水灾，现在该是什么样子了？

乙：啊，我的眼泪要滴下来了！还不是漫天遍野，一片稻花香么！稻花香，稻花香，你在哪里？我张开了两个鼻孔在嗅呢，你在哪里？

甲：往后不堪设想呢！

乙：我简直不敢往后想。

甲：不敢想就完事了么？

乙：怎么讲？

甲：事实会教你不得不想。你有嘴，你有肚皮，你有老婆，你有儿子，你能够不想么？

乙：我不过这样说说罢了。不瞒你说，我是三个整夜没有睡熟了，心里老在想，想眼前的灾难，想将来的困苦。

甲：想这些没有用，我们该想法子。

乙：当然，咱们该想法子。

甲：我想，咱们有的是力量。造成灾害的是河水，咱们就该抵挡这河水。

乙：好，抵挡这河水！我把眼泪擦干了。我现在觉得咱们的将来不一定是困苦，说不定比往年还要满足。

甲：咱们一起来工作吧！

乙：咱们一起来工作！咱们是同志，咱们是一伙儿，现在大家先伸出手来。手在这里！

甲：手在这里！

乙：咱们紧紧的握一握吧！

甲：咱们紧紧的握一握吧！

甲：你预备干什么，把衣服脱得精光？

乙：我要下水去，把河底的泥挖起来。

甲：哈哈，好笨的法子。我不想脱衣服，也不预备挖河底的泥。我要筑一道坝，所以把扁担畚箕都带来了。

乙：筑一道坝！这有用么？

甲：防水筑坝，小孩子也明白，怎样会没有用？

乙：你看上游的水来得多厉害，立刻会冲毁了你坝。我不赞成你这种苟且的法子！

甲：依你怎么样？

乙：我早已告诉你了，我要挖河底的泥。把河挖得很深很深，上游的水势再急，也不会漫到咱们的田里来了。

甲：嗤，等你把河挖得很深的时候，浸在水底的禾苗早已烂

光了。我不赞成你这种迂远的法子！

乙：对不起，我深信自己的主张是可靠的，我不愿意抛弃自己的可靠的主张。

甲：你以为我只是随便说说，不很相信自己的主张的么？老实说，我考虑再三，这边那边都想到，才拿定了主张。我执持我的主张，比武士执持他的戈矛还要坚强。

乙：太可笑了，这等粗浅的苟且的法子，也要执持着不肯改变。这不是愚蠢么，不是成见么！

甲：不要当着我的面说这样的屁话。你要知道，侮辱别人的意见，比侵犯别人的身体还要罪恶，还要该死！老实不客气，你这个麻烦的迂远的法子，只有大大的笨伯才想得出。我也不高兴说你是什么了！

乙：你才是屁话！——我是什么？你说！你说！我定要你说！

甲：你定要我说，我不妨说。你在那里做梦！你的脑子连三条皱纹也没有！

乙：太侮辱人了！你混帐！你不是东西！

甲：你破口就骂么！我也要骂了，你是猪！是蠢猪！

乙：气死我了。和你这种东西一起站在大地之上，真是我倒楣！我要飞上天空去，先把脚底上沾的泥洗干净，因为这泥是你所站的这块地上的。

甲：我的肚皮给你气破了。我要另外去找一个太阳，再也不和你这蠢猪同在一个太阳的照临之下！

甲：他真肯同我合作么？如今这个时代，好人早已死完了，连骨头也化为灰尘了；活在世上的，谁也不会是好人。说

什么公众的利益，说什么彼此的好处，说什么同志，说什么一伙儿，我都明白，全是挂在嘴唇上的门面话，说起来好听些，脸上也似乎好看些。其实呢，第一是为自己，第二是为自己，第三第四还是为自己。他瞒得过我么？他的田是出了名的坏田，又低又瘦，一亩田收不到几斗米。他醒里梦里都在那里祈祷，最好天公把他的田涨高几尺，又赏给他最好的肥料。可惜天公没有依从他的愿望。现在，他想机会来了，借抵挡水灾的名儿，要我帮他的忙，去挖河底的泥。挖起泥来放在什么地方呢？他一定会说，"就近放在我的田里就是了。"他的田就慢慢的填高了，那河泥又多么肥呀。傻子才会上他的当，出了汗，费了气力，却去填高别人家的田！这家伙真是不长眼睛的，会把这个当来教我上，真是猪！蠢猪！

乙：真要被他气死了。"该想法子，该想法子"，原来他想他的法子，又教人家帮着他想他的法子！本来，合作共事，成功以后好处均分，如今的人是谁也不会满足的。他是特别的好人么？我看不像，他自己照着镜子看看，恐怕也未必像。他的主张完全为着他自己的好处。他的田不是靠着河边么？我听见他说过不止一回了，"可惜这田岸太狭了；不然，在这里架一个罾，一边种田，一边捕鱼，真是再好也没有了。"现在他主张筑坝，那是用不着商量的，自然筑在他的田旁。坝筑好了，他可以架起罾来捕鱼，牵着牛走过也方便了，来回上船也方便了。这些完全是他的利益，却要我帮他出一半的气力，而且题目多好听：

"协力合作，抵挡水患！"我假若看不透他的诡计，那才真是个"大大的笨伯"哩。可恶透了，竟把人看做没中用的笨伯。混帐之极！真不是个东西！

水：哗……哗……一点没有障碍，一点没有阻挡，要到哪里就是哪里。自由呀，自由呀，我才是自由的王！白茫茫的，波漾漾的，你看，全是我的国土。啊，我的势头方兴未艾呢！我有山岳一般的力量，我有烈火一般的气焰。转眼间，什么东西都要被我压在底下，什么东西都要破败成烂泥残屑。只在昨天倒略微上了些心事，听说有一位甲先生一位乙先生要合力同我为难了。但是我立刻就放心了！因为他们两个才握了手，接着就是闹意见，后来竟分开了，谁也不曾动一动手。这不是给我一个保证，表明再没有什么势力能同我对敌了么？我的国土还会不等于全世界么？啊，我的胜利！我的光荣！哗……哗……

甲：又碰见了。

乙：我想向你说一句话，你愿意听么？

甲：我也有句话想说。你不妨先说。

乙：只有一句，我想了一整夜想出来的：这样下去总不对呀！

甲：你怎么揣知了我的心？我正想向你说：这样子下去总不对呀！

乙：我不曾揣摩你的心，我自己这样想。

甲：那么彼此同心了。我想，水势越来越大，咱们还不曾动手

对付它，结果受更大的困苦的还是我们。

乙：不错，我也这样想。

甲：那么更见得彼此同心了。我想，如果昨天动了手，今天的水势总要差一点吧。

乙：昨天为什么不就动手，咱们得各自反省反省。

甲：我很惭愧，我过于执持自己的意见了，绝不考查你的意见究竟怎么样，总给你一个反对。

乙：你说惭愧，我何尝不惭愧，我犯的正是同样的毛病。

甲：索性告诉了你吧：我怀疑你完全出于私见，要填高你的低田，才想出你的方法，教我给你当义务的帮工。

乙：我也当着你面忏悔：我怀疑你要填宽那太狭的田岸，所以想出你的方法，教我给你充临时的奴隶。

甲：哦，不幸得很，彼此都给魔鬼的一支冷箭射中了！现在大家都坦白的说出来了，两支冷箭也就拔去了。

乙：啊，狠毒的冷箭！它教咱们走向卑鄙，永远与正大光明绝缘。我此刻想，人与人交接，为什么不以坦白的心相见呢？为什么定要这样那样的揣摩，总把不好的想法加在别人身上呢？真没有道理！

甲：的确没有道理！只有坦白的心有粘合力，把人一个一个团结起来，而且越团越紧。

乙：而且，心既坦白，闹意见的事情也就少有了。大家就事实着想，是是是，非是非，有什么可闹的呢？

甲：让咱们诅咒猜疑吧！诅咒闹意见吧！

乙：咱们的工作已经被耽误了一天了。

甲：虽然耽误，也还值得，现在咱们认识了这支冷箭了。

乙：你说得不错。那末，咱们动手工作吧，要加劲的做，要合力的做。

甲：好！要加劲，要合力。我现在具有十二分的勇气！

乙：咱们先一同来筑一道坝，暂时把水势挡一挡！然后一同挖掘河底的泥，使河床能永远容受上游来的水。

甲：你的法子，我的法子，不是都用得上么？

乙：你要记着。现在咱们不再闹意见了，完全就事实着想。

甲：在真个合力工作之先，咱们该重新伸出手来。

乙：手在这里。

甲：咱们紧紧的握一握吧！

乙：咱们紧紧的握一握吧！

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发表

杀头与枪毙

杀头，枪毙，不是现在有权威者处置所谓罪犯的、不用反省的最普通的办法吗？听人讲说和在报纸上看到杀头和枪毙的新闻，也如听到吃饭喝茶那么平常，似乎这世界本当保存着这些事情的。畏垒先生问得伤心，“难道二十世纪的人类，已经‘血渴’到和野兽一样吗？”其实，他们所缺少的只是反省。能够反省时，虽有权威未必定要学张献忠的，而听到这等新闻，定会如撕去一缕脑筋似的震骇。

本志于最近期内拟出一个专号，来讨究处置犯罪的种种极刑问题。我们要从历史上观察，民族学上观察，法理学上观察，心理学上观察……看看所谓“极刑”到底是野蛮还是文明，是培养人类还是残戕人类，是有效的手段还是没有用的手段。现在向读者报告一声，同时也表示我们努力使这个杂志更为充实的诚意。

一九二六年七月五日发表

原为《光明半月刊》第三期《编辑馀言》

该 谁 抱 歉

不多几年前，北京地方当局为维护风化，不大高兴青年男女谈什么恋呀恋，爱呀爱。他们认定有些书籍是专在那里教育青年们这样做的，于是查禁言“爱”的书。《爱的成年》当然是罪在不赦了，“爱美的戏剧”也做了陪客。我想，倘若有一位欢喜科学的先生给电气发明家爱迪生先生写一篇小传，大概同样要被查禁吧。

本期登载了蒋光赤先生的小说。读者诸君读这一篇时，会发见有几处印着点子，占到十个字的地位，这是表示删节的意思。为什么删节呢？无非免得被人家看作爱美的戏剧与爱迪生传之类罢了。这是得了蒋先生同意才这样做的，然而总觉得对蒋先生和读者诸君抱歉。但是再一细想，该抱歉的到底是编者么？

一月来天气酷热，担任撰稿的诸位先生交稿较迟，因此本期出版延后了几天。这倒的确是编者应该对读者诸君抱歉的。

一九二六年八月五日发表

原为《光明半月刊》第五期《编辑馀言》

我们与绅士

一

知人论世，立身处事，都必须取一种态度并用一种方法。我们所取所用的是这样子，别人所取所用的也可以这样子。谁能够要求“专利权”呢？这样，可以说在某一桩事件某一个问题上，我们与别人步调相同；但不能说谁附和了谁，谁利用了谁。这道理浅显不过，不用申说。

但是，在苏州颇有人传说，我们《苏州评论》社的人包围苏绅的某派，同时立言持论都为某派张目。证据呢？某派不满从前的教育行政人员，而我们也攻击从前的教育行政者；某派似乎有澄清苏州的意趣，而我们也号召“改善苏州”。

这就是说我们要想在某派的旗帜之下，达到我们的目的；说得坏一些，就是我们想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说得更坏一些，就是我们想迎合着某派，借此图点私利。

我们不希望有人从更坏的一层意思来说我们，因为他们这样做徒然自己表白他们的“小人之心”而已。至于我们想不想在任何派绅士的旗帜下达到我们的目的，以及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是否有点儿好处，就在后面说。

二

现在先论绅士之分派别。绅士者，或者世家子，或曾作官，或登从前的科第，或得晚近的学位如时人所称为“洋翰林”者，或营盛大的商业，或有一二百亩乃至几千亩的田产。总之绅士是地方的特殊阶级，与一个小学教师、布店伙计固然不同，与一个泥水匠、机织工尤其不能比类。他们因利害的关系，亲疏的关系，历史的关系等等，这几个人团结在一起发议论办事情，那几个人又另行团结在一起发议论办事情：这就分派别了。两派当然不能一致，于是不免彼此攻击。

绅士阶级出面谋事，当然也会得到福利，但是这福利只属于绅士阶级。至于地方上，即有沾润，亦微细极了。然而绅士偏欢喜说为地方上谋福利。我们不愿存“小人之心”，不妨相信他们良心上的确如是想。但是，他们的立脚点不对啊！立脚点是绅士阶级，无论如何不能为地方上谋得充分的福利。小有好处，他们就板起施与者的面孔来。谁甘愿受施与呢？事关公众，他们往往代当了家。谁委托了他们呢？他们那种不自觉的傲慢，没来由的守旧，就可以给人家造成不少的损失。如或存心鱼肉别人，那更不堪问了。

回过来说我们《苏州评论》社。比方苏州绅士有两派，我们想同他们鼎足而三么？或者有三派，我们想充“三缺一”里头的“一”么？不，决不。第一个原因，自然在我们并不是绅士。第二个原因呢？以下详说。

我们结社，我们纠合同志，在别人看来自然也成为一派。

但是这个派与绅士之某派某派的性质根本不同，所以不得与他们等列齐观。他们的立脚点是特殊阶级，我们的立脚点是一个市民，一个苏州的市民。我们希望泥水匠、机织工、布店伙计、小学教员，乃至所谓绅士等，各以一个市民的资格来图谋苏州的事业，把苏州改善，因而各得其应享的福利。这当然不是立刻就办得到的事。所以我们要鼓吹我们的主旨，使它渐渐成多数人的意思。直到大家都相信应该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就实现了。一个地方，唯有做到这样，方是个永久长进的地方，十分健全的地方。一个市民，唯有努力促成这样，方是个爱地方的市民，真爱自己的市民。

试问，绅士的某派某派，也作如是想么？

试问，在任何派绅士的旗帜之下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么？借这一种势力摧败那一种势力会有什么好处么？

如其相信我们是言必由衷的，一定知道我们是决不愿意去走那些无益的路径的。

三

看了我们上一节的文章，须知我们所不满意者不是姓张姓李的个人，乃是姓张姓李的个人以绅士的资格来图谋地方的事。姓张姓李的如其舍弃了绅士的资格，他们的市民资格还在。他们若以市民资格来图谋地方的事，我们就绝无不满意。这是应该注意的一点。

在全体市民尚未一致起来的时候，地方事情当然还在绅士手里。这当儿，自信无他而确想服役于地方的绅士，实在

很有可以用力之处。他在社会的眼光里是绅士，可得到许多的便利；但是他自认只是一个市民，就避免了阶级的过恶：这样，成绩自然不会差。如其有这样的绅士，我们也相当的赞许。这是应注意的又一点。

四

但是所谓“自信无他”这句话太没凭证了，利用社会眼光里的地位也未免欺人。贤人政治是反社会的，已不适于人类思想既经解放到社会本位的现代。

所以我们又这样说：从市民这方面，决不该希望有“其心无他”的绅士出来，把大家的担子都挑了去，让大家躲在一旁专待他赏赐福利。市民只该及早觉悟，地方的事非市民起来图谋不可，于是真个起来，用自己的力量，求得地方与自己的种种福利。

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发表于《苏州评论》

二　等　车

偶尔谈乘火车，一友说某君乘车必二等，在车站遇见买了三等票的朋友，即使谈得非常投机，只看车辆一到，宁可说声“到那边下车再谈”，他非钻进二等车不可，这真表露他小资产阶级的癖气。

小资产阶级，这名词何尝不好；资产，谁个不爱？或许就是这“小”字使人不大满意。但是，这里却是个贬辞。褒贬本来也很难说定。曾经讨论过，结论如下：使被指及者觉得悦耳的是褒，使被指及者觉得刺耳的是贬。“这真表露他小资产阶级的癖气”。听到这一句的，耳朵里未必见得滑润吧。那末，非贬辞而何？

像某君这样，我想的确该贬他一贬。他钻进二等车之后，头必故意地昂起，眼必仰视，像旁边没有人在，举动必扮演出又大方又满不在乎的姿态，这是绅士和体面人的特征……因此推想及他的生活：穿必怎么怎么，吃必怎么怎么，喝必怎么怎么，吸必怎么怎么，居必怎么怎么，玩必怎么怎么。固然可以说，他是个十分能够享受生活的人；但他也是个十分自私的人，这自私里充满着卑鄙与平凡，教人不得不发生反感。

论理，他嗜好二等车，买他的二等票，坐他的二等车，并不与人相干，谁对他发生反感，简直多事。诚然，二等车是

他的嗜好。我也有我的嗜好，却是四等车。但我并不曾坐过四等车。虽不曾坐过，常常这么想：在青布衫黑棉袄中间挤，听听那些质直的粗野的甚而至于猥亵的谈话，虽多闻些土气汗气，若论趣味，未必比二等车坏了多少吧。而且，在里头也许会遇见伟大的人物，听到宝贵的谈话，其机会决不比二等车里少。尤其足以快意的，就是这就混在被挤落后的伙伴里了。一群人赶路，一致的意念是达到目的地，当前的事务是努力于各自的前程。但回转头去招呼落后的伙伴，给他们鼓励，镇定他们，教他们不要心慌，告诉他们说真的伙伴决不抛弃他们，也不是没有意味的事。要一齐达到目的地才是无上的快乐呢。独个儿赶到了，回头望伙伴，一丝影儿也不见(他们还颠顿在半途里)，岂不寂寞得可怜？而且，这也是对于伙伴的僭越；那种单顾自己毫不谦让的怪样儿，自己良心明白时想起来就会胀得面孔通红。所以，我颇想坐四等车。

但是，二等车舒服呢。

这个我也知道，并且知道头等车比二等车更舒服。人类的努力，虽有什么家什么家说得天花乱坠，但是我想，大半的动机无非总欲求舒服。不过，请注意，讲到舒服就该没有二等车三等车四等车，只有头等车。在尚有三四等车时，坐头等二等就不免带点儿僭越的意味，如有人非坐头二等不可，那简直是最卑鄙的东西。

“我有钱坐我的二等车！”仿佛听见那傲然的话声，而且仿佛看见那红润的不屑正看人的面孔。

哈哈，我只能对最卑鄙的东西笑笑。

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发表

"怎么能……"

"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吃！"

"这样的材料，这样的裁剪，这样的料理，怎么能穿！"

"这样的地方，既……，又……，怎么住得下来！"

听了这一类话，立刻会想起这个人是懂得卫生之道的，非但懂得，而且能躬行。卫生当然是好事，谁都该表示赞同。何况他不满意的只是东西、材料、裁剪、料理、地方等等，并没有牵动谁的一根毫毛，似乎不致引起别人对他的反感。

反省是一面莹澈的镜子，它可以照见心情上的玷污，即使这玷污只有苍蝇脚那么细。说这类话的人且莫问别人会不会反感，先自己反省一下吧。

当这类话脱口而出的时候，未必怀着平和的心情吧。心情不平和，可以想见发出的是怎么一种声调，而且目光，口腔，鼻子，从鼻孔到口角的条纹，也必然改变了平时的模样。这心情，这声调，这模样，配合成十足傲慢的气概。

傲慢必有对象。这难道对东西等等而傲慢么？如果是的，东西等等原无所知觉，倒也没有什么。但是，这实在不是对东西等等而傲慢。所谓"怎么能"者，乃是我"怎么能"也，这里省略了一个"我"字。"我怎么能"的反面，不用说了，自然是"他们能，他们配，他们活该。"那末，到底是对谁傲慢？不

是对"我"以外的人傲慢么？

对人傲慢，必然把自己看得特别贵重。就是这几句极短的话，已经表现出说话的是个丝毫不肯迁就的古怪的宝贝。他不想他所说的"怎么能"的，别人正在那里吃，正在那里穿，正在那里住。人总是个人，为什么人家能而他偏"怎么能"？难道就因为他已经懂得卫生之道么？他更不想一想他所说"怎么能"的，还有人求之而不得，正在想"怎么能得到这个"呢。

对人傲慢的又一定遗弃别人。别人怎样他都不在意，他却非满足自己的意欲不可。"自私"为什么不好，要彻底讲恐怕很难。姑且马虎一点说，那末，人间是人的集合，"自私"会把这集合分散，所以在人情上觉得它不好。不幸的很，不顾别人而非满足自己的意欲不可的，就是极端的自私者。

这样一想，罅漏实在不少，说话时却并未料到。可是，懂得卫生之道总是好的，因为知道了如何使生活过得更好。

但生活是普遍于人间的。知道了如何使生活过得更好，自私的气味不太重的人就会想："得把这更好的普遍于人间才是。"于是来了种种的谋划，种种的努力。至于他自己是不用担心的，更好的生活果真普遍于人间了，难道会单把他一个除外么？

所以，知道更好的生活方法，吐出"怎么能"一类的恶劣的话，表示自己的意欲非满足不可，满足了便沾沾自喜，露出暴发户似的亮光光的脸，这样的人虽然生活得很好，决不是可以感服的。在满面菜色的群众里吃养料充富的食品，在衣衫褴褛的群众里穿讲究合身的衣服，羞耻就属于这个人了；

群众是毫无愧怍的，虽然他们不免贫穷或愚蠢。

人间如真有所谓英雄，真有所谓伟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随时考查人间的生活，随时坚强地喊“人间怎么能……”，而且随时在谋划在努力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作

同　归

就说讲恋爱的吧。现在这时代，除了已老已衰及未老先衰的人，总欢喜谈到恋爱上头去。仿佛有一条极熟的路，起始不论讲什么，只消一滑就上路了。经好几次的参证，知道这是个普遍的现象，就是"望之俨然"的学者，其嗜谈恋爱也并不比别人差多少。谈恋爱有种种的方面，有种种的论据，可谓殊不一致。但是对于为恋爱而恋爱，不欲参杂一丝其外的因子，差不多有一致的期求。这一点就好，已足以引起我的话头。

所谓期求，当然不是不经意地这么想想而已，而是具有非常的热情，要把意想中的产品植根于地上。但是，地上的荆棘太多了，你想随便种下合乎理想的恋爱的根，非但将来会枯死，简直现在就不容你种。你就此放手么？还是不放手别有打算？我想，如其真个有所期求，决不肯就此放手，他的第一步将是斩除地上的荆棘。

其次讲到学问家。学问平等，所以研究整个宇宙的与研究一种细菌的有同样的尊贵。他们都是无所为而为，勉强要说有所为，也只是为着兴趣，为着真理；可谓超然世表，与外物全不相干了。但是，荆棘的蔓延，并不因为你是学问家而却步。于是有些学问家太息起来了："环境压迫我，使不得

尽力研究学问！”

而且，我始终相信人是忘记不了同伴的。同伴在荆棘之中挣扎，而我独个去研究什么学问，这学问也许如同玉液琼浆，但对于同伴无异一杯污水，因为他们现在希求的是少触几个荆棘上的刺，并不在什么液和浆。这样想时，学问家或将惘然了。

把这样的想法都丢开，学问家想：真理的发见，文化的增进，终是大可慰悦的事。但我要提醒一句：“且莫快意。”所谓文化增进云云，如果记账，乃是归入荆棘这一户的，只使它多一种装饰，教人望去并不类荆棘，有点儿像秀苗。这“有点儿像”自然经不起查考的，万一精细的检验员来到，用平均分数的方法来核算文化，装饰的痕迹便立刻显露了。真诚的学问家，你们真愿意作荆棘的装饰品么？

虽然我不是学问家，但为学问家设想，无论如何，当研究学问，同时非斩除荆棘不可。

再讲治百业的。治百业的都值得尊崇，他们一方面赡己，一方面又贡献了报答大群爱我的礼物。但是，这只是个理想罢了，其根从未着生地上，正同恋爱的理想一样。实际的情形，百业的辛勤大部分充作了荆棘的肥料，使它长得愈蓬勃，生气旺盛。人若不想倒也罢了，如或一想，哪有不直跳起来的。辛勤纵不值钱，总不至于去灌溉那荆棘！这当儿，自然就提起斩割荆棘的镰刀。

所以，不只是你的事，也不只是我的事。地上的荆棘，必得地上的人大家来斩除。不用说什么更为好听的话，就说为自己，为自己的愿欲，为自己的事业，不斩除地上的荆棘

就将没有希望。

但是颇闻有人说，“斩除荆棘是谁某的事业；至于我，站在云端里看看好了。”而且，还有带着讥讽的语调说的：“有谁某在那里干，又何关我的事！”这究竟算什么？

另一方面又仿佛傲慢地挂起这样的招牌：“专除荆棘，只此一家，并无分出，认明牌号，庶不致误”。有时还发出“你配么！你配么！”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声音。这又究竟算什么？

异途殊趋的人们，大家反省吧。该明白你们须是“同归”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七日作

愤　　愤

什么都不满意，什么都看不入眼，当然来了愤愤。

愤愤是一条毒蛇，它缠绕你的心，像蔓枝绕树。如果舍不得使用你的力量，那么，徒有愤愤而已，终于愤愤而已。

投入那不满意的看不入眼的事物中间去，勇往直前，像一个冲锋的战士，才能够抓住毒蛇，把它消灭。

用热情与真诚面对生活的人，得到的报酬是充实的生活，犹如打足了气的皮球。丰富的，是他，伟大的，是他。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发表

原为《小说月报》之《卷头言》

白　采

那一年我从角直搬回苏州，一个晴朗的朝晨，白采君忽地来看我。先前没有通过信，来了这样轻装而背着画具的人，觉得突兀。但略一问答之后，也就了然，他是游苏州写风景来的，因为知道我的住址，顺便来看我。我始终自信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人，虽然有愿意了解别人、以善意恳切对待别人的诚心，但是从小很少受语言的训练，在人前难得开口，开口又说不通畅，往往被疑为城府很深甚至是颇近傲慢的人。而白采君忽地来看我，我感激并且惭愧。

白采君颇白皙，躯干挺挺的使人羡慕。坐了一会，他说附近有什么可看的地方愿意去看看。我就同他到沧浪亭，在桥上望尚未凋残的荷盖。转到文庙，踏着泮池上没踝的丛草，蚱蜢之类便三三两两飞起来。

大成殿森然峙立在我们面前，微闻秋虫丝丝的声音，更显得这境界的寂寥。我们站在殿前的阴影里，不说话。白采君凝睛而望，一手按着内装画板的袋子。我想他找到画题了吧，看他作画倒是有味的事。但是他并不画，从他带笑的颧颊上知道他得到的感兴却不平常。

我想同他出城游虎丘，但是他阻住我，说太远了，他不愿多费我的时间，——其实我的时间算得什么。我声明无妨，

他只是阻住，于是非分别不可了。就在文庙墙外，他雇了一头驴子，带着颇感兴趣的神情跨了上去。驴夫一鞭子，那串小铜铃康郎康郎作响，不多时就渺无所闻，只见长街远处小玩具似的背影在那里移动。

我的记性真不行，那一天谈些什么，现在全想不起来了。

后来也通过好几回信，都是简短的，并不能增进对于他的了解。但是他的几篇小说随后看到了，我很满意。我们读无论怎样好的文字，最初的感觉也无非是个满意，换句话说，就是字字句句入我意中，觉得应该这么说，不这么说就不对。但是，单说满意似乎太寒伧了，于是找些渊博的典雅的话来这样那样烘托，这就是文学批评。去年，他的深自珍秘的一首长诗《羸疾者的爱》刊布出来了，我读了如食异味，深觉与平日吃惯了的青菜豆腐乃至鱼肉不同，咀嚼之馀，颇想写一点文字。但是念头一转，我又不懂什么文学批评，何必强作解人呢，就把这意思打消了。不过我坚强地相信这是一首好诗，虽然称道的人不大有。

去年冬，我们到江湾看子恺君的漫画。在立达学园门前散步的时候，白采君与别的几位教师从里面出来，就一一招呼，错落聚谈。白采君不是前几年的模样了，变得消瘦，黝黑，干枯，说话带伤风的鼻音。后来知道他有吐血的病。

今年大热天的一个午后，愈之君跑来突然说："白采死了！"

"啊！"大家愕然。

我恍惚地想大概是自杀吧；当时虽不曾想到他的诗与小说，但是他的诗与小说早使我认定他是骨子里悲观的人。

经愈之君说明，才知道是病死在船上的。

“人生如朝露”等古老的感慨，心里固然没有，但是一个相识而且了解他的心情的人离开我们去了，永不回来了，决不是暂时的哀伤。

他的遗箧里有许多珍秘的作品，我愿意尽数地读它们。已经刊布的一篇诗一本小说集，近来特地检出来重读了。我们能更多地了解他，他虽然死了，会永远生存在我们的心里。

一九二六年十月五日发表

好友宾若君

前晚，善儿将睡，倦意已笼住他的眉目，忽然懊丧地说，“听济昌说，明天他要跟着祖父母母亲回苏州去了。”

济昌跟善儿同班，是善儿最好的朋友。当善儿说起学校里的玩戏时，我们往往不待思索地问：“是不是跟济昌？”或者陈说功课的成绩时，我们也常常会问：“那么济昌的成绩怎样？”

听善儿这么说，知道离别之感侵入他的心了。而在我，更触动了似已淡忘而实在是有意避开的生死之感，于是颇觉凄然。

济昌的父亲宾若君，我永远纪念的好友，是给火车轮辗伤而惨死的。在我粘贴照片的簿子里，有他一帧半身的遗像，我在上边题着“是具真诚能实行的教育家”十一个字。

宾若君在角直当高小学校校长，先后邀伯祥与我去当教员。本来是同学，犹如亲兄弟一样，复为同事，真个手足似地无分彼此，只觉各是全体的一部分。我因年轻不谙世故，当了几年教师，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有时甚且是苦的；但自从到角直以后，乃恍然有悟，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

宾若君不好空议论，当然也不作现在所谓宣传性质的文字，他对于教育只是“认真”，当一件事去干。在到角直之前，他在诗人所萦系的虎丘下的七里山塘当小学校长。山塘的店家每看宾若君的往还作他们的时计；而学生家属有难决的事，如关于疾病资产营业等的，宾若君往往是他们的重要顾问：这就见得他不单是个教读书写字的教师。

我与他同事以后，只觉得他的诚恳远过于我，竟略带压迫的力量。学生偶犯过失，他招犯过失的学生到他的办事室里详细地开导，严正而慈祥，往往是一点钟两点钟。末了，那学生擦着悔悟的眼泪退出来，宾若君自己的眼眶也好像湿润了。他热心于卫生常识的传授，以为这是一切的基本，所以讲刷牙齿洗澡等每至两三星期，讲了之后，见学生一一照着做了，他才放心。

他并不主张什么教育什么教育，像其他的教育工作者。

他的唱歌是学生时代早著名的，曼声徐引，有女性的美而无其靡。课毕，学生回去了，我们有时沽酒小酌，酒既半酣，他按拍而歌，双颜红润，殊觉可爱。数阕以后，歌者听者皆觉无上快适，已消散了积日的辛劳。

我对他也有不满意之点，就在他略带粘滞的性质。他总是“三思而后行”，而我以为未免多了一思或两思。但是轻忽偾事的先例正多呢，像他这样审虑再四，欲行又止，即从最平常的方面说，也未必不因而少偾了几件事。所以我的不满意只因彼此的气质有不同罢了。

那年暑假已过，我因父亲去世，移家住角直。宾若君家

里有事，来了又回去，说两三天就来。但是第三天没有来。他是不肯失约的，这不来颇使我们疑怪，揣度的结论是他害病了。次日傍晚，两条航船都已泊在埠头，连船夫也散得渺无踪影，而他仍杳然。我与伯祥回家，正在谈论不知他的病重不重，那每晚来一趟的瘦脸郎差送信来了。伯祥接信，看了看，似乎放心又略带惊讶地说：

“果然，他病了，这是他的老太爷写的。”

“啊！”伯祥抽出信笺看，突然叫起来。我赶忙凑近去看，八九行的话，似乎个个字是生疏的，重看一遍方才明白。信里说宾若君在昆山下车，车尚未停稳，失足陷入月台与车身之间，致下身被轧受伤甚重；现由路局送回苏州，入福音医院医治；医生说暂时没有把握，要看一两天内经过情形再说。

这消息于我们真是一声霹雳似地震撼；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惊惶，实在无以名心头一时的情状。想到这个具有真诚的心的可贵的躯体正淌着红血，想到老年的父母亲爱的哥哥正在伤心这猝然降临的不幸，我们的心都麻木了……

次日，这消息震荡了全校的心，有如突然来了狂飙。

又次日，我们买舟到苏探视。原是怀着寒怯的心情的，到望见福音医院低低的围墙时，全身仿佛被束缚了，不相信等会儿会有登岸跨进门去的勇气。“但愿是梦里吧！”这样无聊地想。

真同梦里一样，恍惚地登岸，恍惚地进医院的门。繁密的绿叶遮蔽了下射的阳光，细沙路阴森森的，树以外飘来礼拜堂里唱颂祷诗的沉静而稍带悲哀的声音，一缕哀酸直透心胸，我流泪了。

前边来了宾若君的大哥勘初君，我们迎上去问，差不多

都噤口了，只简短地低低说："怎样？"

勖初君的眼睛网着红丝，惘然的，想来已经过度失眠而且流了好些眼泪吧。他摇头默叹，说宾若君失血太多了，至于十之六七，大半身无处不烂，肠也有被轧出来的，简直无望了。

立刻要去看见的是个未死而被判定必死的好友，还能有馀裕想什么！无形的大石块早已紧紧压住我们了。我们承着这无形的大石块踅进病房，一切所见全是浮泛的，也不曾嗅到病房里特有的药气或者其他气味。

宾若君盖在红色的被单之下，这个想是医院里特别预备来混淆可怕的血迹，以减轻视疾者的忧惧的吧。但是我们明知这里掩盖着半截糜烂了的身体，虽用红色，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脸色纯乎灰白，眼睛时时张开，头发乱结像衰草。他神志还清，抬起眼来望着我们，说："你们来看我了，谢谢。我的毛病……学校……唷……唷……"一阵剧痛打断了他的话。

除了"你放心养病，一切都有我们在"这样虚空的安慰语，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知怎样的，两条腿就把我们载出这间病室，与直躺着的宾若君分别了。伤心呵，这就是永远永远的分别，我竟不曾仔细地多看他一眼。

记得床头站着个悲伤的影子，默默的，低头，是宾若君的夫人。

受伤后的七天，宾若君才离开了人世。我因牵于校课，不曾去送殓。后来知道，宾若君在最后的两三天里是吃尽了剧烈的痛楚的。血流得越多，残破的肌肉和内脏越发不可收拾，

痛觉也越见厉害。不知几千百回的沉吟哀号，不知几千百回的辗转反侧，使在旁侍奉的人想不出一点儿办法。医生给他打吗啡针，麻醉他的痛觉，但是不见有效，还是一阵阵的痛。后来他实在担当不住了，对自己的命运也已明白，含着眼泪哀恳他的二哥致觉君说："二哥，你是我的亲哥哥，疼我的，请设法让我早点儿死吧！"

致觉君是个诚笃的人，虽然万分伤心，却同意宾若的要求，就去与医生商量。

把病人看做死物一般的医生只是摇头；他们对于病人亲属的眼泪和哀泣，视同行云流水，无所动心。

"他不是绝对没有希望了么？"

"是的，绝对没有希望。"

"他当不起强烈的痛楚呢！"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给他打针。"

"打了针还是痛。"

"这就没有办法了。"

"与其听他多延时刻，多吃痛苦，还不如让他早点儿解脱？这是我们对于他的唯一帮助。我们是人，人有同情心，不这样做是我们的罪过！"

"向来没有这个办法。"

"哥罗仿（三氯甲烷）之类，你们不是惯用的么？只要份量适合，给他一嗅，就完事了。"

"我不能依你，因为我是医生。"

"病人自己愿意。"

"不相干，"

“我用病人的亲哥哥的名义给你写笔据，并且签字在上面！”致觉君郁悒久了的心情一不自禁，泪珠与哭声迸裂而出，髑落地跪在医生面前。“医生，我求你，求你的仁慈，请你依我的话！该是犯罪，是杀人，都由我承当！”

“但是医生的宣誓是决不弄死一个还有一线生机的生命。”

“不管病人比死还难堪的痛苦么？”

“虽然痛苦，生机未尽的决不能绝灭他的生机。”

“这是人情么！”致觉君转为愤愤了。

“不问人情不人情，当医生就得如此。”医生还是那样冷静。

于是致觉君只得怀着自己害了弟弟似的歉意再去坐在宾若的榻前，直看他的生命一丝一丝地自己断绝。

宾若君受伤的消息才传出的时候，好些人就开始“逐鹿”，希望继任校长；他们用了各色各样的方法，有巧捷的，也有拙劣的，这且不说。到他的死信传来，学校里立刻笼罩着一重惨雾，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特地为他唱追念的歌，特地为他刻碑砌入教务室的墙壁，都是凭神灵如在的信念来作的。

开追悼会的一天，致觉君出席致感谢。还没有开口，出于天性的友爱的眼泪先已流满两颊，开口时是凄苦的声音，我忍不住，低下头来哭了。

各有各的伤心，可以达到同样的深度而各异其趣，所以说谁最伤心其实是不合的。但是据传闻的消息，宾若君的母亲太伤心了。她因宾若君死于火车，视火车如残暴的恶魔。

可是住家贴近西城，每天城外来往的火车不知经过多少回，就得听不知多少回凄厉的汽笛。她听着，心就震荡了，仿佛还将夺去她的别的宝贝！有时惘然失神了，有时泫然掉泪了。忧伤痛苦笼罩她的一切，差不多没法继续她的生活。

关于招魂之类的方术经人推荐，就时时一试。这当然是迷信：但是只要想起母性的生死不渝的爱，你就不会有那种心存鄙弃的轻薄想头了。

其中一个术者声誉最高，也说得最动听。她说宾若君已在某某菩萨座旁为童子，光明而快乐；如果生者多多给他念些经卷，升天成佛是十分稳当的。

这是一条新的道路！她开始念经，凭着坚强的信念，以为果得升天成佛，也就差足安慰。直到现在，念经是她的日课——将永远是她的日课了。

然则念经完全替代了忧伤痛苦么？此殊未必，有一事可以证明。前年江浙战争，他们全家搬来上海，住在致觉君那里。每天下午没到四点半，她就倚着楼廊的栏杆，望致觉君归来。望到了，这才安心，知道放出去的宝贝重复回到掌中。致觉君偶或因事迟归，虽经先期禀明，她必对灯等候，直到看见儿子的笑容确已呈现于面前，然后去睡。使她致此的根源，不就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忧伤痛苦么？

有时经过致觉君家，望见宾君夫人寂寞的侧影，或在灌花，或在闲立，心头就不禁暗淡了。抱着终生的悲哀，为恐伤翁姑的老怀，想来时时要自为敛抑吧；而为孩子的前途起见，想也不愿意多给他伤感的印象；于是只有闷闷地暗自咀

嚼那悲哀的滋味，这比起哀号长叹，尽情倾吐来，其难堪岂止十倍。

看见济昌，我同样地黯然，虽然他是个苹果红的面颊乌亮亮的眼睛的可爱的孩子。宾若夫人对于济昌，听说是竭尽了所有的心力的，差不多自己生存的意义就是为着孩子。

济昌与善儿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安慰，父亲与父亲突然中断的缘分，让他们好好接下去，直到永远吧！有一次，善儿来说济昌小病新愈，在家寂寞，济昌的母亲的意思要他去陪着济昌玩儿。我听说，催善儿立刻去；能够使人慰悦的事总是我们应该做的，何况需要慰悦的是济昌母子俩！

现在，两个孩子暂时分别了。我愿他们永远是很好的朋友。这不单是济昌的母亲祖父母伯父等以及我的欢喜，也该是永生在我意念中的宾若君的极大安慰。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七日作毕

原题为《心是分不开的》

江绍原君的工作

我觉得近来讨论文化史的人不免带点儿"夸大狂"。他们对悠远的古代涂上幻想的金彩，顾盼自豪地说："什么时代的文化已经发达到什么情形了！"

我又觉得近来讨论人生哲学的人似乎是"一只眼"。他们把所谓大哲的思想这样那样地分析，按照自己的嗜好；对于大哲的专著和语录，不惮一引再引。但是大哲以外还有所谓"常人"。常人的生活方式不属于这一派也不属于那一派，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这些道理是不被收纳入人生哲学的，似乎他们的人生根本不成其为人生。

假如有一类著作，并不夸大，指出某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流衍久远的影响，把所谓大哲也者暂且搁在一边，只从民众方面着手，我想，可能比较有用处。用处在哪里？含糊地说，谁也不会明白。不妨明显地说，这对于现在人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寻求适合的途径，颇有用处。

江绍原君一年来的工作，见于北京出版的几种刊物，想来注意的人一定不少。他从线装书里，从稗官野史里，也从当代人的相互交谈里，研究各个新鲜有味的题目，像《发须爪》，《血红血》，《冠礼》，《关于天癸》等等。岂止新鲜有味而已，这些题目里包容着我国人历代相承的生活方式，一般民

众都生存在这种空气里头；写文化史和人生哲学的先生们有时候也拿去做他们著作的材料，不过他们另外戴上一副眼镜罢了。

江君是研究宗教学的。研究宗教，可不是某教的信徒，就会有真实了解宗教的细心和识力。用同样的细心和识力来作风俗习惯的研究，至少不会有一般文化史家的夸大和一般人生哲学家的偏颇。他告诉我们许多习俗的原始意义以及流传下来的遗迹，他只是叙述，只是说明，并无其他。我们看了，对于以往的史迹固然用不着轻鄙；但是当我们觉察现在的生活还在遵行古昔的蛮俗，或者还在跟随陈旧的迷信的时候，至少要擦一擦眼睛醒过来吧。岂明君说："……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我觉得光是这一端已经可贵，虽然不免有人要说我太功利了；何况除此以外，这种研究的本身就是一种学问。

就最近的情势看，努力于改革的人实在并不少，但是注意思想方面的，似乎不如前几年的旺盛了。难道因为判别了"唯心""唯物"的分野么？在我，觉得这种纠缠的话都牵连不上；要社会像个样子，那么，让各个人清醒些总是应该而且必须的。所以我对江君一年以来的工作致无量的敬意。

近接张久君来信，中有一段话可以并观，抄在这里：

……研究学问只要目的在于求真，也是斩除思想上的荆棘。例如哥白尼的地球说足以打破地为宇宙中心的谬见，达尔文的进化论足以打破人为宇宙中心的谬见，而间接打破"天

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阶级制度。所以学问不必求用而自然有用。……我前在家中，在园内斩除榖树，斩了若干次，只要一下雨又复生长。其故只因只在地面上斩除，而没有绝它的根荄。所以要斩除荆棘，须要掘去它的根。人间社会种种不公平的制度和政治现象，其根荄在于潜伏于人类脑中的荒谬思想。要除去这种荆棘的根，便不得不赖于有一部分人肯以全力沉浸于学问之中，使得一般人可以受了他们的指示，揭穿黑幕而见青天。我不愿以“革命”自己标榜，但我自己知道，我是对于二三千年来中国人的荒谬思想与学术的一个有力的革命者。我现在固然毛羽未丰，还不能有什么成绩，但只要顺了这条路走，不怕无成功。我深信我这样做是“入虎穴得虎子”，“入室而操戈”，“前清革命党入政界”的办法。但我不愿意人家知道我这样，以致因名生累，妨碍我的工作。至于我肯这样做，这是全由于我的兴味。……

江君的工作，或许同张久君一样，“全由于兴味”，然而“不求用而自然有用”了。国内不乏学人，以“国学”名家的也不在少数，试问：你们的工作是否“目的在于求真”？你们能“不求用而自然有用”么？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发表

汪伯乐烈士传略

这一篇传记叙述的，是一个苦儿院里勤工好学的孤儿，教育界里热忱尽职的教师，国民党里忠诚有为的党员；但是，现在，作了恶魔的牺牲了，尸骸不知在什么地方，妻儿正在伤心哀哭。他虽然没有伟大的事迹，不朽的言论；但是，只要是有心人，一定会用哀矜的真挚的心来读他的传记，结果同情于这样做人而这样了局的一个平常的人。

汪君德琪，字伯乐，原籍安徽怀宁，生于江苏吴县(清光绪二十六年)。他生来就很不幸，父亲于当年去世，到四岁，母亲也舍下他死了，由叔叔担任抚育。但是叔叔并不尽责；却把他些微的遗产消费完了。于是他除了进苦儿院，再没有旁的法子。这一年是八岁。在苦儿院里，他是个聪明的孩子；皮鞋做得很好，学科成绩尤其佳胜。毕业时，院长很看重他，要他升学，便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差不多是特例，旁的孩子都投入小工业界从业去了。他这一年是十七岁。师范学校的功课里，他尤其精熟的是数学和英语。他有语言的天才，表达意见扼要而有条理，所以学校举行演说竞赛，往往是他得了锦标。

民国八年，“五四”运动兴起。这仿佛是觉醒的警钟，全国的学生血都沸了，气都壮了，大家了悟自己的肩背上担负

着政治的社会的种种重大的使命，于是各地都有学生联合会的组织。汪君即为一师出席江苏学联的代表。当时学联的事业，重要的有两项，通俗演讲和开办平民学校。演讲本是汪君的能事，就不辞疲劳地到处去讲。平民学校是在夜间授课的，他每夜尽心教授，延续至两年之久。这时候，他的终身的标的已经确切认定了，就是社会运动和教育事业。

二十二岁那一年毕业，便任市立小学教师。他当教师胜任愉快，雷氏私立纯一小学又把他聘了去。

二十三岁那一年，他与吕兆璜女士结婚。吕女士少于汪君四岁，安徽女子职业学校毕业，是汪君归原籍探望姊姊时，姊姊给他们订婚的。夫妻两个非常和爱，差不多"同心"；吕女士操作家务，汪君偶得馀暇，总是帮助她。

去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汪君研求孙先生的著作，同时认清中国民族应该走的道路，便加入国民党。这并不是突兀的事，根源就在他前年认定的终身标的。从此他口里滔滔不绝的，往往是党义党务等等，只要有人与他相对，他就能谈一个整夜。历次民众运动，当然无不参加，又热烈又详明地当众演讲的总是他。苏州地方各色人的脑子里，都深深留着他的印象。

今年七月，他以列名党籍，解除纯一小学职；一半也因与少数共事者思想上发生冲突之故。他便专任苏州市党部常务委员，兼任中国体育学校教员。苏州的党务本来不很有精神，他竭力着手整顿，又加教课辛勤，于是病了。病是筋发炎症，于十月下旬入苏民医院割治。病中仍规划党务，邀同志到院共商，因为总揽一切的辛劳，没有人能代替他。

十二月十一日，“柳唐案”发生，柳伯英唐觉民被捕，官中认为他们将在苏州有军事动作。汪君是市党部常务委员，因而被牵连，受警探的监视。十四日，警察厅长李树珊亲到医院探询。汪君答说卧病已四十天，少接触外事；况党部专理党务，并不兼顾军事动作。厅长也就没有话说，临走时嘱汪君安心养病就是。哪知就在这晚上，他与柳、唐一起被解到江宁！久病的身躯，精神本已委顿，突然受到刺激，却非常兴奋起来。吕女士要送行，他坚决阻止；并且安慰她说没有犯罪凭证，决无死理。容色是憔悴极了，躺在病榻上被抬着走，已差不多是绝了气的人，何况在深夜里，何况前面是不可测的程途，何况分别的是心碎的妻！就是护送的警察和兵士，也有禁不住酸鼻的。

在这四五天里，营救的有好几起，地方士绅和教育团体想尽了种种办法。但是有什么用呢！十六日的清晨，汪君与柳、唐一同被枪决了！他怎样受审讯，怎样中弹而倒仆，谁知道！谁知道！只有教他死的人才知道！他的身体打成什么样子，他的尸骸埋在什么地方，谁知道！谁知道！只有教他死的人才知道！吕女士之外，他的亲属就只有两个儿子，四岁的经羲，未满周岁的经农，谁能胜任到江宁去寻找他的血肉模糊的尸骸呢？他的许多师范学校时的同学哀痛他的遭遇，共同设法想找还他的尸骸，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呢。

他仅有短短的二十七年的生命！他平时曾说过能如刘华、周水平等为民众而死，就死得其所。但是不知道当他最后的一刹那，对于这一死的感念如何。

他一生困穷。友谊的真情的施与，他无所容心地受了，不

一定道谢。唯有困穷的人也能同情别人的困穷，所以他帮助人家时才是毫不吝心的。曾有邻家死了人没法买棺材，他就当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去买。

啊，这样的人！啊，这样的死！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作

附 录：

原《脚步集》作者自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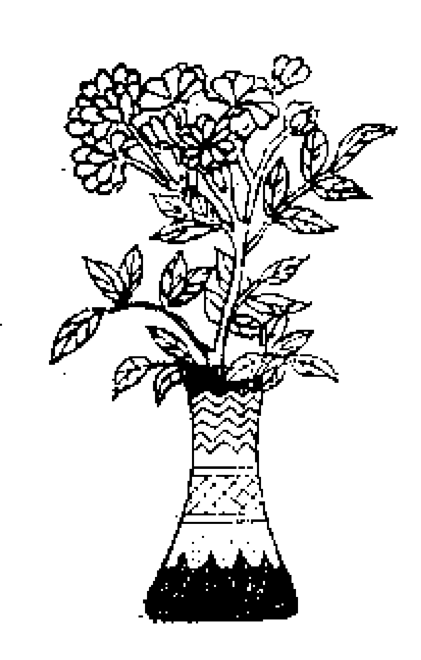
随笔书感的文字，数年来所作也不算少。在写作的当时，总觉得确乎有一些话要说，说来也还有点意思。但日后重读往往只感惶愧，仿佛清醒时听人家传述我的醉话，哪里来的这许多没意思的话！一直不想把这些文字编集刊行，即为此故。

近承新中国书局征稿，情不可却，勉从近年来的文字中选出十篇，把未入集的小说两篇合在一起，以便印一小册。其中几篇谈到读书为学，颇菲薄"读书""读书"尽嚷嚷的人。我知道弗洛依特派必将说你自己少读书，就菲薄读书来掩饰自己的贫乏。对于这一点，我不想辩护。另外三篇，每篇记叙一二人物，他们感动我或深或浅，都值得永远纪念，所以我自己比较爱惜这三篇。

因为其中有《双双的脚步》一篇，即题此册为《脚步集》，取便称说而已，别无深微的意义。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七日作

未厭居習作





两　法　师

在到功德林去会见弘一法师的路上，怀着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也可以说带着渴望，不过与希冀看一出著名的电影剧等的渴望并不一样。

弘一法师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国初年；那时上海有一种《太平洋报》，其艺术副刊由李先生主编，我对于副刊所载他的书画篆刻都中意。以后数年，听人说李先生已经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时，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见到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恺先生刊印《子恺漫画》，丏尊先生给它作序文，说起李先生的生活，我才知道得详明些；就从这时起，知道李先生现在称弘一了。

于是不免向子恺先生询问关于弘一法师的种种，承他详细见告。十分感兴趣之馀，自然来了见一见的愿望，就向子恺先生说了。“好的，待有机缘，我同你去见他。”子恺先生的声调永远是这样朴素而真挚的。以后遇见子恺先生，他常常告诉我弘一法师的近况；记得有一次给我看弘一法师的来信，中间有“叶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尊称。

前此一星期，饭后去上工，劈面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我并不措意。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我颠

头。我也颠头，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我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我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会见。

是深深尝了世间味，探了艺术之宫的，却回过来过那种通常以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态度该是怎样，他的言论该是怎样，实在难以悬揣。因此，在带着渴望的似乎从来不曾有过的洁净的心情里，还搀着些惝怳的成分。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房间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叫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就悠然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向他谈，见这样更沉入近乎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时，似乎该有好些抒情的话与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许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

倾诉整个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钢琴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中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前面。

“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愿欲。

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些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么，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那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的馀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儿。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他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

光法师这个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抄，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就走，我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着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啊，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

惭愧，我这年轻人常常落在他背后。我在他背后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丐尊先生告诉我，他曾经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是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达非由"外铄"的程度，人就只觉得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它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家大概采用这种生活法。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为有点儿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行，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其要紧的是同时得承

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并且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潜移默化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儿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要紧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涵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很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

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咳，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装钉作似的，线装、平装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就向他告别。这位带有通常所谓仙气的和尚，将使我永远怀念了。

我们三个在电车站等车，滑稽地使用着“读后感”三个字，互诉对于这两位法师的感念。就是这一点，已足证我们不能为宗教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作毕

追念陶元庆先生

与陶元庆先生会见仅三四面，一回在酒席间，其馀几回是接洽他的画幅制版的事。话谈得极少，他那种安详亲和的态度却永不能忘。

制版的画就是那幅《卖轻气球者》，原定制三色版，他屡次往制版部分监看，制成时不惬意。制版部分对这位认真的画家自觉抱歉，愿意重制。但是他看了印红色的一块版子倒中意，说就用这块版子印单色吧。制版部分不了解，以为他怕人家嫌麻烦，硬说制得不好重制是应该的。他回答说，"这就很好了。"

看钱君匋先生文，知道这幅《卖轻气球者》从开始到完成，费时一个月，中间曾把整幅设计斟酌变更了不知多少次，才成现在的这一幅。结合着制版的事来看，可知务求心之所安，不失当前的机，是他的艺术的良心与能力。

有些写文字的人提起笔来时自以为大有可写，到写完时说："我不高兴再看第二遍了。"这些人大概是所谓天才。而艺术家者，是天才又加上些别的东西的一种人物。画画与作文虽是两回事，而在这上边并无二致。象陶先生，说他是天才，我想，不如说他是艺术家来得贴切。

画，我完全不懂，但喜欢看。所谓不懂，是说没有关于

这一部门的素养，不能用内行家的尺度来衡量作品的短长，不能用内行家的眼力来摄取作品的精魂。而看是一种嗜好，画幅展开，足以悦目娱心，就屡屡想看了。

陶先生的画，如《落红》《一瞥》《墓地》《卖轻气球者》《烧剩的应天塔》等，我都喜爱。只觉得看在眼里舒服，是所以喜爱的极简单的缘故。作品能使几同盲目的无识者看来舒服，心里喜爱，同时又为具有素养的人所赞叹，不是艺术造诣的理想境界么？陶先生的苦心钻研使他的艺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从《申报》看到许钦文先生报告陶先生的死耗，心头一怔，仿佛觉得不应该有这回事似的。随后检出以前惠赠的作品复制本，逐一重看，藉寄哀思。这些复制本，我要永远珍藏，纪念这位艺术家。

从钱君匋先生来信里知道，陶先生在病中对于世间颇满意。他不是抄写这个世间的人，但是他的成就他的艺术却多方使用了这个世间，我想这就是他所以满意之故吧。果尔，他离去世间不但使知好悲伤，为他自己的艺术，他更要悲伤了吧。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作

原题为《追念陶先生》

过去随谈

一

在中学校毕业是辛亥那一年。并不曾作升学的想头：理由很简单，因为家里没有供我升学的钱。那时的中学毕业生当然也有"出路问题"；不过像现在的社会评论家杂志编辑者那时还不多，所以没有现在这样闹闹嚷嚷的。偶然的机缘，我就当了初等小学的教员，与二年级的小学生作伴。钻营请托的况味没有尝过，照通常说，这是幸运。在以后的朋友中间有这么一位，因在学校毕了业将与所谓社会面对面，路途太多，何去何从，引起了甚深的怅惘；有一回偶游园林，看见澄清如镜的池塘，忽然心酸起来，强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这样伤感的青年心情我可没有，小学教员是值得当的，我何妨当当；从实际说，这又是幸运。

小学教员一连当了十年，换过两次学校，在后面的两所学校里，都当高等班的级任；但也兼过半年幼稚班的课——幼稚班者，还够不上初等一年级，而又不像幼稚园儿童那样地被训练的，是学校里一个马马虎虎的班次。职业的兴趣是越到后来越好；因为后来几年中听到一些外来的教育理论和方法，自家也零零星星悟到一点儿，就拿来施行，而同事又

是几位熟朋友的缘故。当时对于一般不知振作的同业颇有点儿看不起，以为他们德性上有污点，倘若大家能去掉污点，教育界一定会大放光彩的。

民国十年暑假后开始教中学生。那被邀请的理由有点儿滑稽。我曾经写些短篇小说刊载在杂志上。人家以为能写小说就是善于作文，善于作文当然也能教国文，于是我仿佛是颇为适宜的国文教师了。这情形到现在仍然不变，写过一些小说之类的往往被聘为国文教师，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还不曾有人切实注意过。至于我舍小学而就中学的缘故，那是不言而喻的。

直到今年，曾经在五所中学三所大学当教员，教的都是国文；这一半是兼职，正业是书局编辑，连续七年有馀了。大学教员我是不敢当的；我知道自己怎样没有学问，我知道大学教员应该怎样教他的科目，两相比并，我的不敢是真情。人家却说了："现在的大学，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这固然不错；但是从"尽其在我"的意义着想，不能因大学不像大学，我就不妨去当不像大学教员的大学教员。所惜守志不严，牵于友情，竟尔破戒。今年在某大学教"历代文选"，劳动节的下一天，接到用红铅笔署名"L"的警告信，大意说我教的那些古旧文篇，徒然助长反动势力，于学者全无益处，请即自动辞职，免讨没趣云云。我看了颇愤愤：若说我没有学问，我承认；说我助长反动势力，我恨反动势力恐怕比这位L先生更真切些呢；倘若认为教古旧文篇就是助长反动势力的实证，不必问对于文篇的态度如何，那么他该叫学校当局变更课程，不该怪到我。后来知道这是学校波澜的一个弧痕，同系的教

员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辞比给我的信更严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丑脸那样笑了。从此辞去不教；愿以后谨守所志，“直到永远”。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识以及好嬉肯动的少年心情，当个小学或初中的教员大概还适宜。这自然是不往根柢里想去的说法；如往根柢里想去，教育对于社会的真实意义（不是世俗认为的那些意义）是什么，与教育相关的基本科学内容是怎样，从事教育技术上的训练该有哪些项目，关于这些，我就与大多数教员一样，知道得太少了。

二

作小说的兴趣可以说因中学时代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录》引起的。那种诗味的描写，谐趣的风格，似乎不曾在读过的一些中国文学里接触过；因此我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开头作小说记得是民国三年；投寄给小说周刊《礼拜六》，登出来了，就继续作了好多篇。到后来，“礼拜六派”是文学界中一个卑污的名称，无异“海派”“黑幕派”等等。我当时的小说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后来相仿佛，浅薄诚然有之，如何恶劣却不见得，虽然用的工具是文言，还不免贪懒用一些成语典故。作了一年多就停笔了，直到民国九年才又动手。是颉刚君提示的，他说在北京的朋友将办一种杂志，写一篇小说付去吧。从此每年写成几篇，一直不曾间断；只有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将尽了，还不曾写过一篇呢。

预先布局，成后修饰，这一类ABC里所诏示的项目，总

算尽可能的力实做的。可是不行，写小说的基本要项在乎有一双透彻观世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够不上；所以人家问我哪一篇最惬心时，我简直不能回答。为要写小说而训练自己的眼睛固可不必；但眼睛的训练实在是生活的补剂，因此我愿意对这方面致力。如果致力而有进益，由进益而能写出些比较可观的文篇，自是我的欢喜。

为什么近来渐渐少写，到今年连一篇也没有写呢？有一个浅近的比喻，想来倒很确切的。一个人新买一具照相机，不离手的对光，扳机，卷干片，一会儿一打干片完了，就装进一打，重又对光，扳机，卷干片。那时候什么对象都是很好的摄影题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这有天真之趣，照它一张；老母亲捧着水烟袋抽吸，这有古朴之致，照它一张；出外游览，遇到高树、流水、农夫、牧童，颇浓的感兴立刻涌起，当然不肯放过，也就逐一照它一张，洗出来时果能成一张像样的照相与否似乎不关紧要，最热心的是"搭"的一扳——面前是一个对象，对着它"搭"的扳了，这就很满足了。但是，到后来却有相度了一番终于收起镜箱来的时候。爱惜干片么？也可以说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于照相的条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长，构图要适宜，明暗要美妙，还有其他等等，相度下来如果不能应合这些条件，宁可收起镜箱了事；这时候，徒然一扳被视为无意义了。我从前多写只是热心于一扳，现在却到了动辄收起镜箱的境界，是自然的历程。

三

《中学生》主干曾嘱我说些自己修习的经历，如如何读书

之类。我很惭愧，自计到今为止，没有像模像样读过书，只因机缘与嗜好，随时取一些书来看罢了。读书既没有系统，自家又并无分析和综合的识力，不能从书的方面多得到什么是显然的。外国文字呢？日文曾经读过葛祖兰氏的《自修读本》两册，但是像劣等学生一样，现在都还给老师了。至于英文，中学时代读得不算浅，读本是文学名著，文法读到纳司非尔的第四册呢；然而结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电影字幕还不能完全明白。(我觉得读英文而结果如此的实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和时间，终于不能完全看明白电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读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彻底修习，达到全通真通，当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学校对于学生修习各项科目都应定一个毕业的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问学生果否达到了最低限度，这不能不怪到学校了。外国文字这一工具既然不能使用，要接触些外国的东西只好看看译品，这就与专待喂养的婴孩同样可怜，人家不翻译，你就没法想。说到译品，等类颇多。有些是译者实力不充而硬欲翻译的，弄来满盘都错，使人怀疑外国人的思想话语为什么会这样奇怪不依规矩。有些据说为欲忠实，不肯稍事变更原文语法上的结构，就成为中国文字写的外国文。这类译品若请专读线装书的先生们去看，一定回答“字是个个识得的，但是不懂得这些字凑合在一起说些什么”。我总算能够硬看下去，而且大致有点儿懂，这不能不归功于读过两种读如未读的外国文。最近看到东华君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清楚流畅，义无隐晦，以为译品像这个样子，庶几便于读者。声明一句，我不是说这本书就是翻译的模范作；我没有这样狂妄，会自认有评判译品高下的

能力。

说起读书，十年来颇看到一些人，开口闭口总是读书，“我只想好好儿念一些书”，“某地方一个图书馆都没有，我简直过不下去”，“什么事都不管，只要有书读，我就满足了”，这一类话时时送到我的耳边；我起初肃然起敬，既而却未免生厌。那种为读书而读书的虚矫，那种认别的什么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简直自封为人间的特殊阶级，同时给与旁人一种压迫，仿佛唯有他们是人间的智慧的笃爱者。读书只是至为平常的事而已，犹如吃饭睡觉，何必作为一种口号，惟恐不遑地到处宣传。况且所以要读书，从哲学以至于动植矿，就广义说，无非要改进人间的生活。光是“读”决非终极的目的。而那些“读书”“读书”的先生们似乎以为光是“读”最了不起，生活云云不在范围以内：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颇想标榜“读书非究竟义谛主义”——当然只是想想罢了，宣言之类并未写过。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够说明我之所以有这种反感，由于自家的头脑太俭了，对于书太疏阔了，因此引起了嫉妒，而怎样怎样的理由是非意识地文饰那嫉妒的丑脸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辩解，总之我确然曾有这样的反感。至于那些将读书作口号的先生们是否真个读书，我不得而知；可是有一层，从其中若干人的现况上看，我的直觉的批评成为客观的真实了。他们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间智慧的宝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得便时抛开了为读书而读书的招牌，就不妨包办一切；他们俨然承认自己是人间的特殊阶级，虽在极微细的一谈一笑之顷，总要表示外国人提出来的“高等华人”的态度。读书的口号，包办一切，“高等华人”，这其间仿佛

有互相纠缠的关系似的。

四

我与妻结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结婚以前没有会过面，也不曾通过信。结婚以后两情颇投合，那时大家当教员，分散在两地，一来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头，写信等信成为盘踞心窝的两件大事。到现在十四年了，依然很爱好。对方怎样的好是彼此都说不出的，只觉很合适，更合适的情形不能想象，如是而已。

这样打彩票式的结婚当然很危险的，我与妻能够爱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点儿说，全凭西湖白云庵那位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种便宜，不曾为求偶而眠思梦想，神魂颠倒；不曾沉溺于恋爱里头，备尝甜酸苦辣各种滋味。图得这种便宜而去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值得不值得固难断言；至少，青年期的许多心力和时间是挪移了过来，可以去对付别的事了。

现在一般人不愿冒打彩票式的结婚的险是显然的，先恋爱后结婚成为普遍的信念。我不菲薄这种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谓"必然"。我只想说那些恋爱至上主义者，他们得意时谈心，写信，作诗，看电影，游名胜，失意时伤心，流泪，作诗(充满了惊叹号)，说人间最不幸的只有他们，甚至想投黄浦江；像这样把整个生命交给恋爱，未免可议。这种恋爱只配资本家的公子"名门"的小姐去玩的。他们享用的是他们的父亲祖先剥削得来的钱，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时早就安排停当，他们看世界非常太平，没有一点儿问题；闲暇到这样

地步却也有点儿难受，他们于是就恋爱这个题目，弄出一些悲欢哀乐来，总算在他们空白的生活录上写下了几行。如果不是闲暇到这样的青年男女也想学步，那惟有障碍自己的进路，减损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类不灭，恋爱也永存。但是恋爱各色各样。像公子小姐们玩的恋爱，让它“没落”吧！

一九三零年十月二十九日作

做了父亲

假若至今还没有儿女，是不是要与有些人一样，感到是人生的缺憾，心头总有这么一个失望牵萦着呢？

我与妻都说不至于吧。一些人没有儿女感到缺憾，因为他们认为儿女是他们份所应得的,应得而不得,当然要失望。也许有人说没有儿女就是没有给社会尽力，对于种族的绵延没有尽责任,那是颇为冠冕堂皇的话,是随后找来给自己解释的理由，查问到根柢,还是个得不到应得的的不满足之感而已。我们以为人生的权利固有多端,而儿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内,所以说不至于。

但是儿女早已出生了，这个设想无从证实。在有了儿女的今日，设想没有儿女，自然觉得可以不感缺憾；倘若今日真个还没有儿女，也许会感到非常寂寞，非常惆怅吧。这是说不定的。

“教育是专家的事业”,这句话近来几乎成了口号,但是这意义仿佛向来被承认的。然而一为父母就得兼充专家也是事实。非专家的专家担起教育的责任来，大概走两条路：一是尽许多不必要的心，结果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一是给了个“无所有”，本应在儿女的生活中给充实些什么，可是并

没有把该给充实的付与儿女。

自家反省，非意识地走的是后一条路。虽然也像一般父亲一样，被一家人用作镇压孩子的偶像，在没法对付时，就"爹爹，你看某某！"这样喊出来；有时被引动了感情，骂一顿甚至打一顿的事也有。但是收场往往像两个孩子争闹似的，说着"你不那样，我也就不这样"的话，其意若曰彼此再别说这些，重复和好了吧。这中间积极的教训之类是没有的。

不自命为"名父"的，大多走与我同样的路。

自家就没有什么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验之中，怎么能给后一代人预先把立身处世的道理规定好了教给他们呢？

学校，我想也不是与儿女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的。学习一些符号，懂得一些常识，结交若干朋友，度过若干岁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经担过忧虑，因为自家是小学教员出身，知道小学的情形比较清楚，以为像个模样的小学太少了，儿女达到入学年龄的时候将无处可送。现在儿女三个都进了学校，学校也不见特别好，但是我毫不存勉强迁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这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要保藏在装着暖气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华胄贵族，谁也不肯对儿女作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可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属无谓。

何况世间为生活所限制，连小学都不得进的多得很，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学校好坏于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关系呢？——这样想时，以前的忧虑尤见得我的浅陋了。

我这方面既然给了个“无所有”，学校方面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这就拦到了角落里，儿女的生长只有在环境的限制之内，凭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这里所谓环境，包括他们所有遭值的事和人物，一饮一啄，一猫一狗，父母教师，街市田野，都在里头。

做父亲的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若去请教专门的教育者，当然，他将说出许多微妙的理论，但是要义大致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样诱导呢？我就茫然了。虽然知道应该往哪一方向走，但是没有往前走的实力，只得站在这里，搓着空空的一双手，与不曾知道方向的并无两样。我很明白，对儿女最抱歉的就是这一点，将来送不送他们进大学倒没有多大关系。因为适宜的诱导是在他们生命的机械里加添燃料，而送进大学仅是给他们文凭、地位，以便剥削他人而已。（有人说起振兴大学教育可以救国，不知如何，我总不甚相信，却往往想到这样不体面的结论上去。）

他们应付环境不得其当甚至应付不了的时候，一定会怅然自失，心里想，如果父亲早给点儿帮助，或者不至于这样无所措吧。这种归咎，我不想躲避，也没法躲避。

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句话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

所谓人间所谓社会虽然很广漠，总直觉地希望它有进步。而人是构成人间社会的。如果后代无异前代，那就是站在老地方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时光，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凭这么想，我希望儿女必须胜似我。

爬上西湖葛岭那样的山就会气喘，提十斤左右重的东西走一两里路胳膊就会瘦好几天，我这种身体是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强壮的身体。

人家问一句话一时会答不上来，事务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我这种心灵是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明澈的心灵。

说到职业，现在干的是笔墨的事，要说那干系之大，当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没有！自家却使用了人家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岂非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能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我希望他们与我不一样：至少要能够站在人前宣告道，“凭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其时手里拿的是布匹米麦之类；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个成为玄学家，也希望他同时铸成一些齿轮或螺丝钉。

一九三零年十一月作

学问无用论

予同先生说，知识分子应该背着十字架到民众中间去赎罪，他写成了《学问赎罪论》。化鲁先生说，知识分子何妨替平民老百姓做工具，他写成了《学问易主论》。他们两位能反省，肯说老实话，不嫌拆穿西洋镜，我佩服。

我现在写这篇《学问无用论》，也是来一点儿反省。我自己很明白，我所以选这个题目由于我自己没有学问。没有，就说他没用，这是人情之常，不待弗洛伊特派的心理学家来戳破这秘密。

他们两位的题目都写着"学问"的字样，文字中间却没讲到学问是什么。学问究竟是什么？问多少人也许有多少个不同的回答。但一般人对于学问也有个笼统的概念，就是入学校"求学"以及到外洋"游学"所得的便是学问。予同先生化鲁先生没讲学问是什么，想来就为此。细读文字，他们所指的学问正是这个。

假若学问就是这样的东西，我想，学问是无用的。

学校教育承继着科举制度。送子弟进学校的父兄谁不期望子弟将来飞黄腾达。所谓飞黄腾达就是得到一种身份，可以不劳而获，而且"获"得特别丰厚。他们的凭借是掠夺大多数的生产者，如予同先生所说；他们的目标是特殊享受，如

化鲁先生所说。我以为知识分子的罪恶就在这一点上，他们根本就不想从自己身上拿出些什么来给社会用。许多人共举一重物，几个人却放下手说："我们不高兴干这吃力的事了，偏劳诸位吧。"这几个人便是知识分子。许多人在那里蒸馒头，刚揭开蒸笼的盖，几个人却走来把多数又白又大的馒头拿了去（自然还有把整个蒸笼拿去，让做馒头的人空咽馋涎的）。这几个人便是知识分子。所谓学问是他们的牌记；挂起学问的牌记，他们得公然放下手让别人偏劳，又得公然拿走多数又白又大的馒头。我这一节是说，从取得学问的动机上讲，学问本不预备去用的。

学问本不预备去用，一方面也实在无所用。

在从前，从专为应考的八股文试帖诗到似乎颇有大道理的经学史学等等，无非在书本纸笔上做工夫。八股文试帖诗是敲门砖，大家知道不足为训。经学史学等等就很了不起了，钩稽、比核、阐发、疏证，写成多少卷的稿子，刻入什么堂丛书什么斋全集，这是可贵的学问。但是，世间多了一部什么堂丛书什么斋全集，除了供那些不预备用的人来了钩稽、比核、阐发、疏证外，还有什么用处？学校教育兴起以后，一切科学也成为书本纸笔上的东西。试看小学校，国语科固然要读、要讲、要写，而社会科自然科也只是读、讲、写。至于小学以上，能够读者就是最出色的学生。一级一级的书读完了，甚至出洋回国，这好比中了状元，他们便可以著书立说，可以作官治人，可以任教教人。作官一项且撇开不提，著书任教两项实在与从前刻丛书刻全集无异，同样是从几缸现成的水舀出几勺来，拼成一缸，再让无聊的人来舀。我这一节

是说学问已堕落到仅属书本纸笔上的东西，所以就功能说，它无所用。

还有一层，占有学问的人物是自成一国的。城墙筑得很坚，城门终年关着；在内的人互相往还：书籍，你做，我看；演说，我讲，你听。他们把他们的国土位置在高高的空中。他们低头下望，看见与他们自己相对峙的蠢然无知的所谓“民众”。几声“无知啊！”“没有办法啊！”是他们慷慨的馈赠。至于下面的国土里的人当然不能知道上面的国土里在玩些什么把戏。所以，大学校长被驱逐了，报纸上刊着专电，这在上面的国土里自然是件大事；但是在下面的国土里，就把所有的大学都关起门来，决没有一个人为此搔头摸耳，睡不着觉，或者反而得多吃一口饭。又如前一二年，文坛上有过热闹的情形，谁没落了，谁升起了，大家动色相告，这在上面的国土里自然是盛况；但是在下面的国土里，试拉一个苦力或者农夫来问，他们必将回答从来没有看见叫做“文坛”的这么一座坛。学问在上面的国土里被看作几缸水，由一些人舀出倒进，这并不能算有用，前面已说过。至于在下面的国土里，学问简直像天上的浮云，之聚之散都与生活漠不相关。我这一节是说，学问与一般生活不相联系，所以就实况说，它无所用。

再来说化鲁先生所提起的“作工具”。知识分子作工具是历史的事实，我们眼前就堆着满坑满谷的例子。似乎学问的用处就在作工具吧。然而不然。科举时代，士子读的是诗文，考的是文章，等到被录而作官治人，诗文文章完全没有用，还得从别的方面去揣摩。我们现在，国学专家当厅长，工科专

门出身的当县长，他们所做的事与所占有的学问又有什么干涉？所以学问只是牌记，主人看见知识分子挂起牌记，就招他们去作工具了。并不在利用他们的学问。这犹如现在有身份的男人都要娶女学生，只因为她们是女学生，并不问她们是否更适于为妻。我这一节是说，学问对于工具也是无用的。

农人没有学问，但他们种田，供大家吃，工人没有学问，但他们制作，供大家用。文化文人被说得天花乱坠，最基本还在于大家吃用两项上；哲学家可以说出一百种人生目的，最切实的一说该是要使大家有吃有用；没有学问的人却做了最有用的事情，就因为他们肯劳力。可怜的中国由谁支持在这里？统治者想："当然是我咯。"知识分子也想："责在我辈"，于是主张大学教育救国。这只是想想而已，实际全不是这么回事。百分之八十的农人虽然受种种掠夺，农村渐将破产，他们却担着支持中国的重任。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如果换一个想头，"我们放弃了责任吧，"中国决不就此坍下去；但是如果百分之八十的农人放弃责任，不再劳力呢，其影响之重大谁都想得到的。

知识分子自夸他们占有那些学问，同时安于特殊享受，这是一般的情形。从今倘若有能够反省的，应该觉悟披在身上的花采似的学问实是无所用的东西，他们便走出空中的国土，下降黑泥的土地，把学问向每一个角隅分送，也并没有多大实益；因为他们所有的只是这样的学问，是书本纸笔上的东西，是舀出倒进的几缸原有的水。他们如发愿用这样的东西去赎罪，结果必然废然而返，身上仍烙着"掠夺犯"的印记。有用的事物该是带着自己的一勺水，倒出这一勺水，大

家共有的水的总量便多了一勺；这就是必然有所成，有所产。学问要转成有用的，当然也须有所成，有所产，这非学问先从堕落中被救出来不可。谁来救？系铃解铃，还该让知识分子。那被救以后的学问与以前的截然不同，它不复是书本纸笔上的把戏，它将与种田制作同料，是劳力的工作，是一般生活的营养料。其时空中的国土自然消灭，知识分子无异于农人工人，所以谁的身上都不负什么罪孽。不负罪孽，更何以用其"赎罪"呢？

复次，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竟做农人工人呢？吃的用的无非劳力的产物，既已吃了用了，凭什么理由可以不生不产？劳心劳力分工说只是统治者的诡辩，有赎罪的存心的知识分子定嗤之以鼻。嗤之以鼻，自己动手：研究化学的同时种一畦田，考察天文的同时织一匹布。

说到这里，近于化鲁先生的"易主论"了。但我以为这并非易主。元朝换明朝，明朝换清朝，凡前朝所有山河子民一箍脑儿归属到战胜的朝代，这是易主。而我们现在所说的情形与此不同。分润掠夺品的工事既然不必做了，就已勾销了旧时的工具的名籍；正在手里做的事情却是倒出自己的一勺水，而所有的伙伴也无非在倒出自己的一勺水，谁是主人呢？谁给谁作工具呢？说主人谁都是主人，说工具谁都是工具。所以这实在是转变，一转移间，把旧时的属性地位都改变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四日作毕

速　写

密雨初收，海面漫着白色的雾气。时间是傍晚了。那些海岛化为淡淡的几搭影子。

十几条帆船系在石埠上，因波浪的激荡，时而贴近石埠，时而离得远些。客人的行李包裹都已放入船舱。船夫相对说笑，声音消散在苍茫之中；有几个在船梢睡觉，十分酣畅，仿佛全忘了等一会儿将有一番尽力挣扎的工作。

客人怀着游览以后的快感与不满或者朝过了圣地的虔敬的欢喜在石埠上等待，不免时时回头望那题着“南海圣境”的牌坊。牌坊可真恶俗，像上海杭州大银楼的门面。

风紧，穿着单衫，颇有寒意。

“来了！”不知谁这样一声喊，石埠上与帆船上的人顿时动乱起来。我直望，白茫茫而外无所见。

在船舷与岸石击撞中我们登了预定的帆船。站稳，手扶着夹持桅杆的木板。船夫匆忙地解缆，把舵，摇橹。那普陀的门户便向东旋转了。回看其他的船，有大半行在我们前头，相距十来丈远。

记起几年前的一个寒夜从江阴渡江，张着帆，风从侧面来，背风的一面船舷几乎没入水；渡客齐靠在受风的一面，两脚用力踏着舱板，仿佛觉得立刻会一脱脚横倒下来似的。两

相比较，眼前这一点儿颠荡算不得什么了。

望见星儿般的几点光亮了，是开来的轮船上的电灯。定睛细认，我才看清了轮船的轮廓。我们这船并不准对着轮船行驶，却取斜出的路径。

突然间船夫急促而力强地摇着橹；船尾好似增加了不少重量，致使船头昂起。这当儿船身轻捷地转了向，笔直前驶；轮船的左侧就在我们前面了。

当靠近轮船时，先已伸出的竹篙有如求援的手，搭，一下，勾住了轮船的铁栏。船身便上下抛荡，像高速度的摩托车叠次经过陡峭的桥。左右两边是先到这里勾住了轮船的帆船，船舷和船舷相磨擦，相击撞；我想，我们这船会被挤得离开水面吧。

轮船并不停车，伸出求援的手的帆船依附着它行进。它右侧的两扇铁门早经洞开，客人便攀援着铁栏或绳索慌乱地爬上去。行李包裹附着在肩背上或臂弯里。并没意义的叫喊声几乎弥漫于海天之间。

乘着轮船开行之势，我们这船与轮船并行了。昌群兄与小墨抢先爬了上去，混入纷乱的旅客中间。我提着小皮箱正想举足，一个浪头从两船间涌起，使船夫不得不让竹篙脱勾。船便离开了轮船。

“喂，喂，”我有点儿慌急。

搭，一下，竹篙勾住了另一帆船的船尾，船夫指点我可从那里上轮船。

我跨上那帆船，蹒跚地走到它的左舷。浪头总想分开轮船与帆船的接连似的，又从两船间涌了起来。看船夫又将让

竹篙脱勾，我只得奋力举一只脚踏上轮船的门限。不知谁伸给我一只手，我握住了，身子一腾跃，便离开了帆船。

门内是一间排列坐椅的大统舱，电灯光耀得人目眩。

我立刻给热闷污臭的空气包围住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发表

牵 牛 花

手种牵牛花，接连有三四年了。水门汀地没法下种，种在十来个瓦盆里。泥是今年又明年反复用着的，无从取得新的泥来加入。曾与铁路轨道旁种地的那个北方人商量，愿出钱向他买一点儿，他不肯。

从城隍庙的花店里买了一包过磷酸骨粉，搀和在每一盆泥里，这算代替了新泥。

瓦盆排列在墙脚，从墙头垂下十条麻线，每两条距离七八寸，让牵牛的藤蔓缠绕上去。这是今年的新计划，往年是把瓦盆摆在三尺光景高的木架子上的。这样，藤蔓很容易爬到了墙头；随后长出来的互相纠缠着，因自身的重量倒垂下来，但末梢的嫩条便又蛇头一般仰起，向上伸，与别组的嫩条纠缠，待不胜重量时重演那老把戏；因此墙头往往堆积着繁密的叶和花，与墙腰的部分不相称。今年从墙脚爬起，沿墙多了三尺光景的路程，或者会好一点儿；而且，这就将有一垛完全是叶和花的墙。

藤蔓从两瓣子叶中间引伸出来以后，不到一个月工夫，爬得最快的几株将要齐墙头了。每一个叶柄处生一个花蕾，像谷粒那么大，便转黄萎去。据几年来的经验，知道起头的一批花蕾是开不出来的，到后来发育更见旺盛，新的叶蔓比

近根部的肥大，那时的花蕾才开得成。

今年的叶格外绿，绿得鲜明；又格外厚，仿佛丝绒剪成的。这自然是过磷酸骨粉的功效。他日花开，可以推知将比往年的盛大。

但兴趣并不专在看花，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那藤蔓缠着麻线卷上去，嫩绿的头看似静止的，并不动弹；实际却无时不回旋向上，在先朝这边，停一歇再看，它便朝那边了。前一晚只是绿豆般大一粒嫩头，早起看时，便已透出二三寸长的新条，缀一两张长满细白绒毛的小叶子，叶柄处是仅能辨认形状的小花蕾，而末梢又有了绿豆般大一粒嫩头。有时认着墙上的斑剥痕想，明天未必便爬到那里吧；但出乎意外，明晨竟爬到了斑剥痕之上；好努力的一夜功夫！"生之力"不可得见；在这样小立静观的当儿，却默契了"生之力"了。渐渐地，浑忘意想，复何言说；只呆对着这一墙绿叶。

即使没有花，兴趣未尝短少；何况他日花开，将比往年盛大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发表

闻　警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这一天的晚间十时，日本满铁守备队开始军事行动，实现日本帝国主义攫取满蒙的第一手！

十九日晨，他们占领沈阳，同时宽城子、牛庄、安东、营口、抚顺等处也被日军占领。今天报载昨天（二十日）的消息，葫芦岛、连山湾等处续被攻占；长春县城被焚毁，长官多遭杀害。明天又将有何等惨痛的消息，现在不得而知。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狠心与贪欲已如旺盛的火焰，正在蔓延开来。

对于对等的国家，使用这样凶暴蛮横的手段，日本帝国主义不爱惜他们国家的名誉，竟然做了出来。试问，身被毒害的我们忍受得了么？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庚子以来最重大的耻辱！

日本帝国主义棘手于他们国内的不景气，另一方面对于苏俄的五年计划感到很大的威胁，因而攫取满蒙的野心十分迫切。近见欧洲方面经济恐慌，各国都在那里皇皇然图谋自保，而我国则既多纷争，又被重灾，他们以为这是稍纵即逝的难得的时机，就毫不顾忌地遂行他们的劫夺。

以前种种的利用与威胁，明取与暗占，是准备，是伏线。

九月十八夜的炮声才是大张晓谕地宣告，他们现在来了，他们现在动手了！

日本在我国的投资，东北占十分之七。日本学校社会间用来互相勖勉的一句话是"到满蒙去"。他们对于攫取满蒙处心积虑，抱着绝对的决心。所以这次的事件虽似突发，实在是势所必至的。但是，身被毒害的我们忍受得了么？

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庚子以来最重大的耻辱！

"其曲在彼"，"理直气壮"，这些话是弱者当无可奈何时用来自慰的，或许又将听到了吧。向世界公告，在国联提出对策，那是已经在那里着手了。然而在现今的世界上，公理是拜伏在炮口之下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公理要等世界换过面目之后方才落胎。那么这些对策的效果如何也就不难揣度了。

热血的青年听到这样重大事件的消息无不愤怒，激昂，同时内问自己，外问同辈，遭逢这样的时势应当怎样自处。我们以为第一就应当认识公理——认识现今世界上所谓公理者是怎样委琐、卑鄙、不值齿及的东西！

第二应当认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素质、机构及其运用，将是我辈青年今后最切要的研究课题。要制敌必须详知敌方的底蕴，大家该立下这样的信念。

第三应当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有怎样的力量，患怎样的病害，都要客观地加以检讨。检讨过后，对于所有的力量才可以设法扩充，纵使进展迟缓，扩充得一分一毫全是有用的；对于所患的病害自须努力排除，无论病在知识、技术或者一种制度、一个阶级，都须给它注射充量的解毒剂。

睁开眼睛，我们青年从新认识吧！我们将来的工作与事业就从这里开始！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日子！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作

“认　　识”

日本肆行横暴以来，我国人多倡“认识”论，报章撰文，政客演说，“认识”“认识”，满目充耳。而他们教人认识的，大抵在日本方面。其实日本为帝国主义资产国家，以侵略攫夺为其必要手段，这早已共知共信，就是没有这一回的暴行，大众也未尝无此认识。至于这一回的暴行，其凶残无理，全失人性，又是诉诸直觉而能了知的，大众决不会无此认识。把已然的事实摆在笔端嘴边作为倡导，恕道一些说，未免无聊；入骨一些说，简直另有规避的用意。

认识根源于事实。有一些认识虽不为报章政客所倡导，但经事实昭示，大众便深切地认识了。例如于“镇定”“一致”“定有对付办法”之外，不见有何种办法，大众便认识这些口号和誓言的背景是一个泡影；于东三省民众惨遭蹂躏死亡流离之际，单只有一个“无办法的”办法，大众便认识写在纲领里的民族云云直同废话。旬日以来，这些认识真所谓“不胫而走”，盘踞住大众的心胸。是谁倡导的呢？曰：无须倡导，乃由于事实，与认识日本是什么东西一般，由于事实。

就大众的立场讲，单只对外未必可通，这是联带而至的认识。因为对大众虚与委蛇的那些东西，在素质上便是“顺民”，却又硬要作大众的主人。大众若不排除这一重阻障，对外殊不

可能。“一切姑且不谈吧，现在来对外。”“顺民”而主人的将私心化装了，说出这样的话。但明白的大众并不相信；内与外有着联系，必须双方兼顾才有意义，这又是由事实得来的认识。

派系之争，利禄之争，揭起丑怪的标帜，演成滑稽的戏文。大众对于这些，是所谓“牛羊何择”。一个派系如果倒了，另一派系代兴，“顺民”而主人依然，还是大众的阻障。完全排除那些，真个自己起来作主人，对外才得有办法呢：这应是眼前的“结论的”认识。

谈起认识，觉得近来人得到认识的事物真多。九月二十六日《民国日报》的社论说：“然吾人以为今日国际战争均已入于智力与科学战争之时代，决非蠢如鹿豕之青年而徒恃热血可与文明盗寇相搏战者。”二十七日《申报》的时评说：“盖救国之根本方法唯有科学。欲图国力之发展，一切商业之进步，罔不有赖乎科学。吾国因科学落后，乃至如此积弱。故今日正宜加倍努力，埋头于读书工作。”（附注：并无缮写之误。）看他们双管齐下，恐吓青年，可称竭力。你“蠢如鹿豕”，你没有科学，要想救国么？不行！如何得到科学呢？唯有“埋头于读书工作。”如果青年听从他们的话，不声不响埋头读书去了，他们便将在编辑室里拊掌而笑道：“行将燎原的星星之火给我的游说扑灭了！”胡愈之先生说：“政府畏惧民众运动实甚于日本出兵。这不但政府如此，一般代表商人利益的上海报纸亦如此。”这一种认识很值得提及，故附书于短文之后。

一九三一年十月三日发表

书匡互生先生

一星期前，周予同先生对记者说，“这次战后重来上海，朋友中最使我受感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便是匡互生先生。当战事剧烈时，大家都以为立达学园将从此毁灭，决没有重兴的希望了。到上海后，听说匡先生仍在力谋重兴，已经觉得奇怪。后来到江湾去一看，立达竟已焕然一新：被破坏的屋宇门窗都已修葺完整；被抢失的校具书物都已重行置备。而且学生宿舍里，从前本用木床的，竟一律换成崭新的铁床。暑期补习的学生已经到了一百多人。呵，这是何等可惊奇的事呵！”

“一二八”事件发生以后，江湾因接近闸北，立达学园立刻受到恐慌。那时正在寒假期内，有几位重要的教职员都已因假回里，但许多远道学生却仍然住在校内。其馀没有回里并带有家属的许多教师便大家集议，主张将学生迁往设在南翔的立达农场，家眷也都移到安全一点的地方去。决定之后，学生和学校中重要的器物逐渐迁移，教师也大多数带了家眷搬往南翔或上海。匡互生先生却决意留守学校，他的夫人也愿和他同在一起，不肯离开江湾。后来军队驻入校内，他仍然和军队同住；并且每隔一天必去南翔一次，第二天又回江湾，直到江湾被日军占领为止。江湾一经失守，南翔也告危

急。立达的学生和农场的种蜂种鸡又从南翔迁往无锡。匡先生这时又奔走于南翔无锡两地，没有息脚。这其间最使他为难的，是学校毫无现款，学生的饭食和鸡的食料每天需银二百馀元没法供给，虽经多方借贷，都被拒绝。正在这时候，他宝庆的家中来了一个电报，说他的父亲病故，叫他立刻回去。他不得已只好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在家中大约逗留了一星期，把丧事匆匆办妥，便又单身从宝庆赶回无锡。那时候战事暂告平息，"停战协定"还没签字。他曾于此时来上海一次，筹划运鸡蛋来上海，把卖得的钱去买鸡的食料。不料刚在他从上海回无锡的时候，又从无锡转来一个他家里发出的电报，这电报再从上海转往无锡，却报告他的母亲逝世了！于是他又二次奔丧回籍。家中遭了两次的大故，学校又受了这样重大的打击，许多人都以为虽是匡先生也不免要灰心了吧。但匡先生却仍然匆匆的办了丧事，赶回上海。后来他对人说："我不该只知有母亲，不知有学校。假使我再迟几天回去，南翔农场里的东西一定还可搬出许多，所受损失不致这样重大。"

"停战协定"签字之后，他立刻赶回江湾，察看学校损坏的情形，用铅笔一一记载在日记簿上，计算恢复应需的费用，并且搜寻遗在校内的未爆炸弹，设法搬去，同时又派人守校。这时他比战时更加忙碌，奔走于江湾、上海、无锡、南京等处，所做的事，如筹划款项，搬移物件，修理破坏，计划下半年开学等事，不但足无停趾，简直饥不得食，倦不得睡。有一次，他要去见一位阔人，请他捐助款项，因为时间不及，雇了一辆汽车，叫车夫开足速力，限在约定时间内赶到。这时

正在早晨，又落着绵绵的细雨，街上没有行人。汽车开足了马达，飞一般的直向前驶，正当转弯的地方，车夫来不及转换方向，竟把车一头撞在一所大厦的铁门上。门被撞坏了，汽车也停止了，汽车夫和车内的匡先生都晕倒在地上。铁门内的主人没有知道，而这条冷落的街上，竟连警察也没有。匡先生醒来的时候，看到旁边卧着的车夫，以为已经死去，一按脉息，庆幸着还没有死。这时警察居然慢慢的来了，他便把车夫和车交给了警察，自己仍然负着伤换车到捐款的地方去。从那边出来，才到医生处去诊察，幸而只在胸口受了一点微伤。因为汽车转弯的时候，他一看要发生事故，早把两手攀住连篷上挂着的藤圈，将身子悬在空中，所以受伤不重。医生除给了药之外，叫他每天要喝几杯白兰地，活动血脉。他到酒馆里去喝了一杯，算账的时候知道要六角大洋，便不敢再喝了。

现在匡先生的伤已渐渐的平复了，立达学园也如周先生所说焕然一新了。但是匡先生仍是一天到晚焦虑着：学校的欠债应该怎样设法偿还；学校的基础应该怎样使它稳固。

我们写这段文字，并不是想表扬匡先生。匡先生一向不喜欢人家表扬，而且也用不着人家表扬。我们的本意，无非希望诸君看了献身于中等教育事业的匡先生的事迹，能够有所感动，知道在中国的现在，有像匡先生这样的人正为着青年而献身，青年诸君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无关重轻才是。

一九三二年七月一日发表

战时琐记

一月二十五前后，闸北人家移居者纷纷。我家不曾打算过搬。一则看定当局必将屈服，既屈服，总不会有事情了。二则也颇不以那些抱头鼠窜的人为然，祸患将至，什么也不想，只有一个逃，未免卑怯；我们若无其事，仿佛给他们一个抗议。但是到了二十八下午三点过后，全里差不多走光了。邻居周乔峰先生来说："听说会冲突起来的，还是避避的好。"我们于是"动摇"了，扶老携幼走入租界。对于先前纷纷逃窜的人，我们是"五十步"。

那夜三点光景听得了枪声，非常的激动。激动，当然莫能自明其所以然。说是为着中国兵这才打了有意义的仗吧，也许有之，不过当时并不清晰地意识着。

随后几天里，听说粮食恐将不继；百业停顿，即本来有业的也暂时成为失业者；便想到《饥饿》那部小说里所写的情形。饥饿本已踏遍了中国的各地，现在踏到了富室豪商伟人政客所认为乐土的上海，中国会换一副面目吧。

平时执笔做一些编录工作，算是作事。至此才觉自己实无一事能做。裁缝师傅能替士兵制丝棉背心，看护小姐能为士兵包扎伤处。凡有实在技能的人都能间接参加这一回战役，唯执笔的人没有用。你说作宣传文字么，士兵本身的行为的

宣传力量比文字强千万倍呢。你说制作什么文艺品，表现抗争精神么，中国却是一种书卖到一万本就算销数很了不得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我以为执笔的人应该“没落”。

传闻总退却，不见报载而知其为真，那一天很难过。一位朋友说：“既这样，闸北的人不是白牺牲！”我以为这倒不该这么说的。

领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派司”，经过一道道日本守兵的检视，回到旧居去看看残破情形如何：这时闸北人共同的经历。我们也是这样。在将近里门的所在，日本兵检视“派司”后，知道我们要搬东西，用粉笔在我的衣襟上画了一个圆圈（是屋主人的符号，对于搬运夫则画三角形）。在这所在，我看见有好些端正着和顺的笑脸的人恭候那日本兵画圆圈的。

旧居中了猛烈的弹，三层门窗都不存了，墙上天花板上的粉饰也都震落下来。木器全毁，衣服有了枪弹孔。书籍埋在灰屑中，就把比较完整的捡出来。一只吃饭桌，榉木的，是祖传的家具，只有一个枪弹孔，到现在全家还在这桌子上吃饭。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日发表

没 有 日 记

《现代》编者嘱交出最近一周间的日记。可是我并没有日记。在二十岁前后的数年间，曾继续不断地写过十几本日记；成了习惯，就与刷牙漱口一样，一天不写是很不舒服的。怎样会间断下来，现在已想不起了。这十几本东西包得好好地，放在一个书箱里，在今春上海战役中失去了。

有一些人确然应该写日记，但是像我这样生活简单的人似乎没有必要。今天和昨天相仿佛，明天又和今天差不多，如果写，无非刻板文字。即就最近一周间说，写日记时就将每天是"看稿多少篇，校排样多少张，撰小学国语课文多少课"。这有什么意义？

从家里的床而工作所的椅子，而家里的椅子，这样就是一天。第二天照样。莫说有冬夏而无春秋，就是最近半个月的酷热，也只觉腕底的汗沾湿了纸张而已。若说这就是夏令，似乎殊无凭证：耳不闻蝉声，目不见荷花，纳凉消暑的韵事也不曾做过。但是我并不叹惋，以为这样的生活非人所堪。春间炮火连天，每天徘徊街头或者枯坐避难所里，愤慨百端，但没有一事可为，那时候我尝到了空着手不做事的强烈的苦味；聊自排遣，曾经缝了一身自己的衫裤。自从有了这经验，我比以前不怕忙迫了，有事做，尽量做；节候之感谁

还管。——如果写日记，这一节倒是可以写上去的。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发表

原题为《夏？》

“学　者”

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发表了，内容大概以及我国和各国舆论的反响，本期仲华先生的文字叙述得很清楚了，这里不说。胡适先生作了一篇《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单看题目，就可以知道是“褒辞”了。对这个报告书致褒辞的，国内论者似乎没有第二个。该文刊载于《国闻周报》第九卷第四十一期，有兴致的不妨取来看，这里恕不转述。只是该文结末的一句话倒可以抄下来请大家看看。那句话是：

> 如果这样严重的全世界公论的制裁力在这个绝大危机上还不能使一个狂醉了的民族清醒一点，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和整个文明世界，都得准备过十年的地狱生活！

“整个文明世界”且不说，单说“我们这个国家”，劳苦民众不是早已在过地狱生活了么？何待“准备”？又何止“十年”？

北平友人来信，说有些人主张定北平为文化城，把军备撤除，免得人家打过来，毁灭了北平地方这也是“古”那也是“古”的文化。他们的“宣言”稿里有这样的话：

我们的目的，是要借此减除北平城里各种文化设备遭受炮火打击的可能。……当然，敌人的道德是应当顾虑的；亦许我们撤除了军事设备，而敌人仍不免造出种种诬陷的话来说，以图破坏北平的文化，这在我们当然也无法可想。但我们姑且不假定敌人的道德已坏到了这一步；先尽其在我，这总是应当的。

（上海报纸也登过该文，改称“意见书”，语句也改动过了。）

按照他们的逻辑，若把我国定为文化国，宣布我们连裁纸刀都销毁了，“尽其在我”岂不更到了家？这样办的时候，敌人会不客气作非分之想么？不妨，“我们姑且不假定敌人的道德已坏到了这一步”！

我们知道东北数十万民众义勇军中没有一个“学者”！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发表

“今天天气好啊!”

《自由谈》，这是个幻影似的名词。从前秦始皇的时代，两个人在路上碰见了，停了步，谈一句两句话，就犯死罪；谈的什么话是不问的。后来虽然没有这样干脆简单的法令，但是一方面有示范作式的教条，教训人们谈话应该怎样谈；另一方面又有多少条多少款的律文，规定人们谈话不许怎样谈。在这双方钳制之下，哪里有什么“自由谈”？

我们听到的一些谈论，看到的一些文篇，都是苟存在这双方钳制的夹缝里的。不触着这一边，也不冒犯那一边，才得以说出来，写下来，给我们听到看到。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谈论就只好咽下肚去，让它烂掉；文篇呢，劈版，收毁，禁止投递，它的灾难何止一端。——于是我们就无缘听到看到了。

环境如此，人们就变得异样机警，非常圆滑。怎样才能在双方钳制的夹缝里转侧自如，成为立言持论的人的必修科目。对于这个科目修习得太到家了，有时候竟会起一种幻觉，把自己所处的夹缝收缩得更窄些。试举一个例子，近来北平有许多学者主张定北平为文化城，撤除军备，免遭日本飞机大炮的蹂躏；但是在他们的意见书里，却只含胡地指称“敌人”，绝对不见“日本”二字。他们大概是这样想的：若在

这“未雨绸缪”的意见书里交代明白，说为的是日本，未免太使日本难堪了。

想谈张君，恐怕张君生心，不谈。想谈李君，恐怕李君动怒，不谈。谈谈甲事乙事吧，又恐怕跟甲事乙事有关的赵君王君不高兴，也只好不谈。于是谈天气。但是说天气不好还是不行，也许会冒犯了冥漠无言的大自然，忽地来一阵烈风暴雨，吹痛了头脑，沾湿了衣裳。“推头着壁”，只有说天气好是唯一妥当的办法。所以，两个人遇见了，往往异口同声地说，“今天天气好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

“文明利器”

以前，商店逢到“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的时候，就雇几名军乐队(“乐”字通常念作“快乐”的“乐”)吹吹打打，借此吸引过路人的注意。现在，这办法似乎淘汰了。只在偏僻的小马路上，偶尔还有几家背时的小商店送出喇叭和竖笛的合奏，调子是《毛毛雨》或者《妹妹，我爱你》。过路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头也不回地走过了。这寂寞的音乐只有屋檐下的布市招寂寞地听着。

现在，上海的商店有了另外的引人注意的办法。即使并非“特别大减价”“多少周年纪念”，他们也要装一具收音机在当门的屋檐下。好在播音台那么多，从清早到深夜可以不断地收音，他们就一直把机关开着。于是，电车汽车声闹成一片的空间，又搀入了三弦叮咚的“弹词”，癞皮声音的《哭妙根笃爷》，老枪喉咙的《毛毛雨》和《妹妹，我爱你》，诸如此类。

但是，这办法也未必真能够引人注意。只在刚流行的时候，装有收音机的商店前站着几个抬头呆望的过路人。到后来就同雇几名军乐队吹吹打打的一样，你尽管“弹词”《妹妹，我爱你》，过路人还是走他的路。看看店里的伙计，似乎也没有一个在那里听这些“每天的老调”。那么，收音机

收了音究竟给谁听呢？这大概只有市招知道了。然而新装收音机的还陆续有增加，好像没有收音机就失了大商店的体统似的。

我家左邻有一具收音机，发音清楚而宏亮，品质大概是不坏的。可是他们对付这家伙的办法太妙了。他们时时在那里旋转那刻度器，老生唱了半句，就来了女声的小调，一曲小调没有完，又来了高亢的西洋喉咙……他们到底想听什么，三四个月来我还不曾考察明白。也许他们的兴趣就在旋转那刻度器吧。否则就在“有”一具收音机！收音机是时髦，人家都“有”，他们就非“有”不可。

又听说上海有好多吸鸦片的人懒得出门，就利用收音机来互通声气。有几个自设播音台，在夜间一两点的时候，从鸦片榻上播音道：“张老三，吃过夜饭么？”“李老四，明天晚上的麻将局有你，不要起得太迟了。”啊，现代文明的生活！

说“收音机救国”（前天报上登载了吴稚晖君“马达救国”的谈话，我这语式是有来历的）固然近乎荒诞不经；然而收音机这家伙如果能好好利用，譬如说，用来团结大众的意志，传授真实的知识，报告确切的消息……那么，从社会的观点说，它的价值的确是了不起的。反过来，如果它仅成为“街头军乐队”的代替品，仅成为商店与人家的点缀品，仅成为吸鸦片的人的通信机，传送的又仅是“哭谁的爷”“哭谁的娘”之类，试问，社会上又何贵乎有这等“奇技淫巧”的玩意儿？

一切所谓“文明利器”，其价值都不存在于本身，而存在于对社会的影响。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它被操持在谁的

手里，二、它被怎样地利用。就说马达，像美国，总算马达很不少的国度了，然而都会的大道上有大队的饥民奏着饥饿进行曲。这就因为所有的马达操持在资本家手里的缘故。假如那些马达也有饥民的份，饥民就不是饥民了。那时候，马达的价值岂止可以“救国”而已？又如飞机。苏联用飞机散播种子，扑灭害虫。这就扩大了人类战胜天然的能力，飞机的价值何等高贵。但是，飞机被用作轰炸机侦察机的时候，除了在军缩会议中斤斤计较的野心家以外，谁还承认它的价值呢？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

新年停止办公三天

新年停止办公三天，既经通过，又说“通令全国一致办理”，一切服务诸君有三天“自相”是肯定的了。

前些时曾见报上登过，新年庆贺等举动一概免除，理由是如今仍在国难期中。好像也有过新年照常办公的主张。若问为什么，小学生也能回答，无非“国难方殷”“工作紧张”之类。这与逢到国耻纪念日吃一天素的办法是一贯的。统而言之，就是“卧薪尝胆”。

吃了苦头，从此愁颜相对，原是人情之常。但是愁颜要与坚决的实践和切实的希望同时并存才有意义。如果愁颜而外，别无其他，那只有一辈子愁下去。就是愁死了，谁来理睬你呢？

说到工作，通常总是说进行好，停顿不好。譬如一位木工，他停一天工作，就少制成两把椅子，如果不停，就多制成两把椅子：工作停顿，效率就降低，所以不好。然而未可一概而论。有些工作几乎是无所谓效率的：它永远在那里进行，并没有什么好；它从此永远停顿，也没有什么不好。试举一例，“等因奉此”的所谓“办公”就是。

近来读王印川所著的《苏联五年计划奋斗成功史》。书中记载一个中年妇人对著者说的话：

“从前我们的生活虽然舒服，可是仅止我们的少数，那多数的人比我们的现在还不如得多多，现在我们少数虽然不如从前，可是多数人比从前好了，这也是公道应该这样的。……又况政府人员他们把我们的节省物料都卖到外国，换来现金，买成机器，建筑这许多的工场铁路房屋等等。我们是亲眼看得见的。我们现在的生活虽是不大美满，虽是拮据，可是我们是有希望的不大美满，有富裕的拮据。并且全国通同一样的不美满与拮据。”

说这一段话的时候，那个妇人也露着愁颜吧。试想，和她的愁颜同时并存的是怎样的力和心？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了，这是效率的总表现。这样巨大的工作中，当然谁也偷懒不得。

如果愁颜而外别无其他，还不如追欢寻笑的好。这究竟有益于卫生。反正进行与停顿犹如二五与一十，停顿一下又有什么要紧。所以通令全国新年停止办公三天的办法是值得赞许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 发表

“新年的梦想”

——答《东方杂志》问

梦想中的未来的中国，描写起来只须简单几条线条：个个人有饭吃，个个人有工作做；凡所吃的饭绝不是什么人的膏血，凡所做的工作绝不为填满一个两个人的大肚皮。岂只是未来的中国，未来的世界不应该这样么？中国地方什么时候会涌现这一幅图画呢？恐怕很遥远吧，遥远到不能“梦想”吧。

再来描写所谓“一个方面”者：

“高等华人”绝迹……苍蝇声似的“文化”“文化”之声绝于耳……“报销主义”断种……现在这样的大学中学一齐关掉……不多写了。原来是实现时期遥远到不能“梦想”的梦想，多写又有什么意思？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发表

养　　蜂

近年来我国有一种新兴事业——养蜂。蜂种从意大利买来。据说我国的蜂不曾经过遗传上的选择，不适宜用新法养的。

养蜂可以增益国产，养蜂可以沾光厚利，养蜂的人这么说。这不是群己两利么？这不是理想事业么？于是养蜂的人多起来了。

养蜂原来有两个目标，采蜜和分房。养蜂的人能够用不同的管理方法操纵那班飞行的工人；要它们酿蜜就酿蜜，要它们繁殖就繁殖，而一般的目标大都在后者，就是要它们做传种的工人。

理由是很明白的。意大利种，增益国产，沾光厚利，谁听了不动心？谁不想分几房来试试？所以蜂种卖得起钱。卖蜂种还可以营副业。人家买了蜂种，就得使用养蜂的一切家伙；制造了蜂房、巢础、隔王板、摇蜜机等等卖给人家，也可以沾不少的光。

“人同此心”，买蜂种的人的打算和卖蜂种的人一样，他的事业也是卖蜂种，卖养蜂应用的家伙。大家把采蜜的事看得无关紧要；也可以说，差不多把蜂能酿蜜这一项常识忘了。

然而采蜜究竟是个不该放弃的目标。惟其采蜜，分房才

有意义；蜂的数量愈多，蜜的产量也愈多。现在不然；前一回的分房只是后一回的准备，后一回又是更后一回的准备，而并不希望采什么蜜。这样，养蜂就成一种空虚的事业——原说增益国产，实际上却没有"产"，岂非空虚。

可是市场上并不缺少蜜。新式的养蜂家也有长瓶矮瓶盛着蜜陈列在玻璃橱里作幌子。据说这些都是不曾经过遗传上的选择的"国"蜂的成绩。"国"蜂虽然蹩脚，却供给了真实的蜜。

这情形恰同我们的教育事业相像。

前几年有人提出"循环教育"这个名词，讥议教育事业的空虚；大意好像说人所以要受教育，原在受些训练，学些技能，准备给社会做些真实的事；但是教育事业的实况并不然，先前受训练学技能的学生后来成为先生，去教诲后一辈，后一辈后来也成为先生，又去教诲更后一辈。如果一辈辈都不曾动手，丝毫真实的事也没有做，这些受教育的无异新式养蜂家所养的蜂，他们是不酿蜜的。

在鼓吹教育价值的言论里，增进生产呀，发扬文化呀，提高生活水准呀，总之天花乱坠，而实际只成了"循环教育"，一条周而复始的空虚的练子。这无异养蜂家标榜"增益国产，沾光厚利"，而实际只做了卖蜂种的营业。

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农人好比"国"蜂。他们被摈在教育的新式蜂房以外，但是他们供给真实的蜜。无论谁吃一点儿蜜，总是他们的。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发表

看　月

住在上海“弄堂房子”里的人对于月亮的圆缺隐现是不甚关心的。所谓“天井”，不到一丈见方的面积。至少十六支光的电灯每间里总得挂一盏。环境限定，不容你有关心到月亮的便利。走到路上，还没“断黑”已经一连串地亮了街灯。有月亮吧，就像多了一盏灯。没有月亮吧，犹如一盏街灯损坏了，没有亮起来。谁留意这些呢？

去年夏天，我曾经说过不大听到蝉声，现在说起月亮，我又觉得许久不看见月亮了。只记得某夜夜半醒来，对窗的收音机已经沉寂，隔壁的“麻将”也歇了手，各家的电灯都已熄灭，一道象牙色的光从南窗透进来，把窗棂印在我的被袱上。我略微感到惊异，随即想到原来是月亮光。好奇地要看看月亮本身，我向窗外望。但是，一会儿月亮被云遮没了。

从北平来的人往往说在上海这地方怎么“呆”得住。一切都这样紧张。空气是这样龌龊。走出去很难得看见树木。诸如此类，他们可以举出一大堆。我想，月亮仿佛失掉了这一点，也该列入他们认为上海“呆”不住的理由吧。假若如此，我倒并不同意。在生活的诸般条件里列入必须看月亮一项，那是没有理由的。清旷的襟怀和高远的想象力未必定须由对月而养成。把仰望的双眼移到地面，同样可以收到修养上的效

益，而且更见切实。可是我并非反对看月亮，只是说即使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罢了。

最好的月色我也曾看过。那时在福州的乡下，地当闽江一折的那个角上。某夜，靠着楼栏直望。闽江正在上潮，受着月光，成为水银的洪流。江岸诸山略微笼罩着雾气，好像不是平日看惯的那几座山了。月亮高高停在天空，非常舒泰的样子。从江岸直到我的楼下是一大片沙坪，月光照着，茫然一白，但带点儿青的意味。不知什么地方送来晚香玉的香气。也许是月亮的香气吧，我这么想。我心中不起一切杂念，大约历一刻钟之久，才回转身来。看见蛎粉墙上印着我的身影，我于是重又意识到了我。

那样的月色如果能得再看几回，自然是愉悦的事，虽然前面我说过"即使不看也没有什么关系"。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发表

中　年　人

接到才见了一面的一位青年的信，中间有“这回认识了你这个中年人”的话。原来是中年人了，至少在写信给我的青年的眼光里已经是了。

平时偶然遇见旧友，不免说一些根据直觉的话：从前在学校里年龄最小，体操时候总作“排尾”，现在在常相过从的朋辈中间，以年龄论虽不至于作“排头”，然而前十名是居之不疑的了。或者说：同辈的喜酒仿佛早已吃完了，除了那好像缺少了什么的“续弦”的筵席。及至被问到儿女有几，他们多大了，当不得不据实回答：大的在中学，身子比我高出半个头，小的几岁了，已经进了小学。

听了这些话，对方照例说：“时光真快呀。才一眨眼，就有如许不同。我们哪得不老呢！”这是不知多少世代说熟了的烂调。犹如春游的人一开口就是“桃红柳绿，水秀山明”似的，在谈到年龄呀儿女呀的场合里，这烂调自然而然脱口而出；同时浮起一种淡淡的伤感心情，自己就玩味这种伤感心情，取得片刻的满足。我觉得这是中年人的乏味处。听这么说，我只好默然不语或者另外引起一个端绪，以便谈下去。

中年的文人往往会“悔其少作”。仿佛觉得目前这样的功力才到了家，够了格；以今视昔，不知当时的头脑何以那样

荒唐，当时的手腕何以那样粗疏。于是对着"少作"颜面就红起来，一直蔓延到颈根。非文人的中年人也一样。人家偶尔提起他的少年情事，如抱不平一拳把人打倒在地，与某女郎热恋至于相约同逃之类，他就现出一副尴尬的神态说："不用提了，那时候真是胡闹！"你若再不知趣，他就要怨你有意与他为难了。

大概人到中年，就意识地或非意识地抱着"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大志。发些议论，写些文字，总得含有教训意味。人家受不受教训当然是另一问题；可是不教训似乎不过瘾，那就只有搭起架子来说话作文了。虽是寻常的一举一动，也要在举动之先反省说："这是不是可以给后辈示范的？"于是步履从容安详了，态度中正和平了，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差不多可以入圣庙的样子。但是，一个堪为"士则""世范"的中年人的完成，就是一个天真活泼爽直矫健的青年人的毁灭。一般中年人"悔其少作"，说"那时候真是胡闹"，仿佛当初曾经做过青年人是他们的绝大不幸；其实，所有的中年人如果都这样悔恨起来，那才是人间的绝大不幸呢。

在电影院里，可以看到中年人的另一方面。臂弯里抱着孩子，后面跟着女人，或者加上一两个大点儿的孩子，昂起了头找坐位。牵住了人家的衣襟，踩着了人家的鞋，都不管得，都像没有这回事。找到坐位了，满足地坐下来，犹如占领了一个王国。明明是在稠人广座之中，而那王国的无形的墙壁障蔽得十分严密，使他如入无人之境。所有视听之娱仿佛完全属于他那王国的，几乎忘了同时还有别人存在。这情形与青年情侣所表现的不同。青年情侣在唧唧哝哝之外，还

要看看四周围，显示他们在广众中享受这份乐趣的欢喜和骄傲。中年人却同作茧而自居其中的蚕蛹一样，不论什么时候只看见他自己的茧子。

已经是中年人了，只希望不要走上那些中年人的路。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发表

不甘寂寞

今年夏间，铮子内姑母病殁。当热作昏沉的时候，对她的侄女口述四语道："凄风苦雨，是我归程。蓬莱不远，到处飞行。"

科学观点说起来，所谓精神是有机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产生出来的，它是某些有机体特有的生理上的属性或机能；换言之，它是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发生的一种作用；有机体破坏，精神作用也就跟着消灭。但是，就一般人情说，死如果等于"从此消灭"，把以前曾经存在的账一笔划断，那是非常寂寞的事。受不住这寂寞，就来了死后依然存在的想头。依然存在，自当有所处的境界和相与的伴侣。这各依自己的信仰和想象来决定；在已经走近了生死界线的当儿，往往会造成一些"奇迹"，供后死者传说不休。如信鬼者临死，会有祖先或亡故的亲属到来，导往冥土；基督徒就遇见生着鸟翅膀的天使，迎归天国；佛门弟子则由佛来接迎，往生净土，试翻《净土圣贤录》，这类故事不可胜数。基督徒何以不会遇见祖先或亡故的亲属呢？蒙佛接引的又何以只限于信佛的人？这其间的缘故，原是一想就可以明白的。

最受不住这种寂寞的应该是修持净土的人了。他们把死看做往生净土与堕入地狱的歧路口。其设想净土与地狱，都

源于死后依然存在这一念；而净土悦乐，地狱痛苦，所以临到歧路口必须趋此舍彼。于是一心念佛，平生用尽功夫；指望临命终时，此心不乱，仍能念诵佛号，蒙佛引归净土。还恐怕自力不够，就预先告诫亲属后辈，当己临终，慎勿啼哭，啼哭则此心散乱，就将堕入地狱苦趣；惟有助念佛号，最是功德无量。曾读当代某大师的文抄，厚厚的四本，差不多全讲这些：教人对于死这一件大事怎样去做预备功夫。他们的不甘寂寞也就可想而知了。

“蓬莱不远”的蓬莱，正无异于基督徒的天堂和佛门弟子的净土。

再从送死者这方面说，断了气的一个人如果就此灵爽无存，斩绝了曾与世间发生过的一切关系，那也是非常寂寞的事。承认他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吧；惟有这样才好比宝物虽不在手头，而存放在外库里，并非就此失掉，就也足以自慰。从这一念，于是来了种种送死的花样。

这回因铮子内姑母的丧事，把久已忘怀了的故乡种种送死的花样温理了一遍。逢七，或请和尚嗱经，或延道士礼忏。让死者受佛门的戒，由和尚给与法名；另一方面，道士“给箓”的法场，派定死者在瑶池会上当一份小差使，也给与道号。佛教徒呢？道教徒呢？只好说“兼收并蓄”。逢七前一天，到各个城隍庙去烧“七香”。城隍是冥土的地方官，到他们那里去烧香，无非希望他们对于新隶治下的鬼魂高抬贵手，不要十分为难；老实说，就是去行贿赂。既已是佛门的戒徒，瑶池会上的“职仙”，何以又成为城隍治下的鬼魂呢？这其间的矛盾谁也不去想，总之，多方打点，只求对死者“死后的生

活”有利。

纸制的服用器物，凡想得到的都特制起来焚化。细针凿花的是纱衣，纸背粘一点儿薄棉的是法兰绒，摺成凹凸纹的是绒绳衫，灰纸剪细贴在衣服里面的是“小毛”，黄纸剪细贴在衣服里面的是“大毛”。桌椅箱笼，镜奁盘盒，乃至自鸣钟，热水瓶，色色俱备，而且都是摩登的款式。因为死者生时爱打“麻将”，就给准备一副麻将牌，加上三道“花”，还有“财神”和“元宝”。死者使用这些器物，“死后的生活”大概很“舒齐”的了，只是还没有自己的房子，租赁人家的房子终非久计。据说在最近的将来就有一所纸房子为她建筑起来了。

死者每天进食三次，中午用饭，早晚用点。食毕就焚化纸锭。逢食拿钱，这是阳世生活所没有的。唪经礼忏的日子则焚化得特别多。统计七七中所焚化的纸锭，至少可以堆满半间屋子。普通纸锭是用一张锡箔摺成的；还有用几张锡箔凑合摺成的中空的正方体，名之曰“库”，中间容纳一只菱形的小锭。这东西非常贵重，据说只须有极少的几个，就可以在冥土开一爿“典当”。这回焚化这样的“库”也不少。在冥土，新开的“典当”像上海四马路的书局一样一家一家接连起来了吧。让死者去剥削穷鬼实非佳事，这一层当然不去想它了；想到的只是从此死者将成为冥土的大财主。

灵座旁安置一件铜器，名之曰“磬”，却是碗形圆底的东西。每天须敲这东西四十九下；恐怕少敲或多敲，就用四十九个铜钱来记数。据说死者一直在那里趱行冥土的路程，而冥土是黑暗的，须待磬声一响，才有一段光明照见前路。如果少敲了，光明不继，那就有迷路的危险；多敲了呢，光明

太强，耀得踅行者眼花，也许会累她跌交。照这样说，死者并不住佛土，也不在瑶池，也不作城隍治下的鬼魂，也不安居冥土的寓所，享受丰美的起居饮食，也不当许多爿"典当"的大老板，吮吸穷鬼们的鬼脂鬼膏，却在那里作踽踽独行的"旅鬼"。

承认死者存在于另一个世界里，可是终于不能确定死者的境况，因为这种种矛盾荒唐的花样原来是由送死者想象出来的。送死者忙着这种种的花样，仿佛得到了抚慰，强烈的悲感就渐渐地轻淡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五日发表

苏州“光复”

革命，一般市民都不曾尝过它的味道。报纸上记载着什么什么地方都光复了，眼见苏州地方的革命必不可免，于是竭尽想象的能力描绘那将要揭露的一幕。想象实在贫弱得很，无非开枪和放火，死亡和流离。避往乡间去吧，到上海去作几时寓公吧，这样想的，这样干的，颇有其人。

但也有对于尚未见面的革命感到亲热的。理由很简单。革了命，上头不再有皇帝，谁都成为中国的主人，一切事情就能办得好了。这类人中以青年学生为多。上课简直不当一回事，每天赶早跑火车站，等候上海来的报纸，看前一天又有哪些地方光复了。

一天早上，市民相互悄悄地说：“来了！”什么东西来了呢？原来就是那引人忧虑又惹人喜爱的革命。它来得这么不声不响，真是出乎全城市民的意料之外。倒马桶的农人依然做他们的倾注涤荡的工作，小茶馆里依然坐着一壁洗脸一壁打呵欠的茶客。只有站岗巡警的衣袖上多了一条白布。

有几处桥头巷口张贴着告示，大家才知道江苏巡抚程德全改称了都督。那一方印信据说是仓卒间用砚台刻成的。

青年学生爽然若失了，革命绝对不能满足他们的浪漫的好奇心。但是对于开枪、放火、死亡、流离惴惴然的那些人

却欣欣然了，他们逃过了并不等闲的一个劫运。

第二年，地方光复纪念日的晚上，举行提灯会。初等小学校的学童也跟在各团体会员、各学校学生的后头，擎起红红绿绿的纸灯笼，到都督府的堂上绕行一周；其时程都督坐在偏左的一把藤椅上，拈髯而笑。

在绕行一周的当儿，学童就唱那练熟了的歌词。各学校的歌词不尽相同，但是大多数唱下录的两首：

苏州光复，直是苏人福。
……
草木不伤，鸡犬不惊，军令何严肃？
我辈学生，千思万想，全靠程都督。

哥哥弟弟，大家在这里。
问今朝提灯欢祝，都为啥事体？
为我都督，保我苏州，永世勿忘记。
我辈学生，恭恭敬敬，大家行个礼。

可惜第一首的第二行再也想不起来了。这两首歌词虽然由学童歌唱，虽然都称“我辈学生”，而并非学童的“心声”是显然的。

革命什么，不去管它。蒙了“官办革命”的福，“草木不伤，鸡犬不惊”，什么都得以保全，这是感激涕零，“永世”不能“忘记”的。于是借学童的口吻，表达衷心的爱戴。此情此景，令人想起《豳风·七月》的末了几句：

跻彼公堂，
称彼兕觥，
万寿无疆。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发表

读　书

听说读书，就引起反感。何以致此，却也有故。文人学士之流，心营他务，日不暇给，偏要搭起架子，感喟地说："忙乱到这个地步，连读书的功夫都没有了。"或者表示得恬退些，只说最低限度的愿望："别的都不想，只巴望能安安逸逸读点儿书。"这显见得他是天生的读书种子，做点儿其实不相干的事就似乎冤了他，若说利用厚生的笨重工作，那是在娘胎里就没有梦见过，这般荒唐的骄傲意态，只有回答他一个不理睬了事。衣锦的人必须昼行，为的是有人艳羡，有人称赞，衬托出他衣锦的了不起。现在回答他一个不理睬，无非让他衣锦夜行的意思。有朝一日，他真个有了读书的功夫了，能安安逸逸读点儿书了，或者像陶渊明那样"不求甚解"，或者把一句古书疏解了三四万言，那也只是他个人的事，与别人毫不相干。

还有政客、学者、教育家等人的"读书救国"之说。有的说得很巧妙，用"不忘""即是"等字眼的绳子，把"读书"和"救国"穿起来，使它颠来倒去都成一句话。若问读什么书，他们却从来不曾开过书目。因此人家也无从知道究竟是半部《论语》，还是一卷《太公兵法》，还是最新的航空术。虽然这么说，他们欲开而未开的书目也容易猜。他们要的是干练的帮手，自然会开足以养成这等帮手的书；他们要的是驯良的顺民，

自然会开足以训练这等顺民的书。至于救国，他们虽然毫不愧怍地说"已有整个计划"，"不乏具体方案"，实际却最是荒疏。救国这一目标也许真能从读书的道路达到，世间也许真有足以救国的书，然而他们未必能，能也未必肯举出那些书名来。于是，不预备做帮手和顺民的人听了照例的"读书救国"之说，安得不"只当秋风过耳边"？

还有小孩进学校，普通都称为"读书"。父母说："你今年六岁了，送你到学校里去读书吧。"教师说："你们到学校里来，要好好儿读书。"嘴里说着读书，实际做的也只是读书。国语科本来还有训练思想和语言的目标，但究竟是工具科目，现在光是捧着一本书来读，姑且不说它。而自然科、社会科的功课也只是捧着一本书来读，这算什么呢？一只猫，一个苍蝇，一处古迹，一所公安局，都是实际的东西，可以直接接触的。为什么不让小孩直接接触，却把这些东西写在书上，使他们只接触一些文字呢？这样地利用文字，文字就成为闭塞智慧的阻障。然而颇有一些教师在那里说："如果不用书，这些科目怎么能教呢？"而切望子女的父母也说："进学校就为读这几本书！"他们完全忘了文字只是一种工具，竟承认读书是最后的目的了。真要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读书当然是甚胜的事，但是必须把上面说起的那几种读书除外。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

观"新乐府"剧杂评

二三月来，偶得暇闲，辄往大世界观新乐府戏剧。携曲本数种，邀朋侪两三，自笑如归校之学童。濡染既多，颇欲有说，随写数则，取示同好。呜呼，不为无益，怎遣有涯。歌场月旦，或犹愈于谈某军某军战略优劣也。

一、姚传芗之《寻梦》

始未奇姚传芗之艺，及观其所为《寻梦》，乃叹为绝妙之才。彼盖能创造一神化境界，慑住观众心魂，俾与之同其欢愁喜嗔者也。论其胜处，尤在传神，以双眸为主，而眉心颧颊唇吻辅之；遂觉凝盼含羞，轻颦浅笑，无不适如分寸。其发音清越而圆润，以视张传芳，虽同属可听，而张似较浅露，不逮姚之深涵。至于舞姿，亦复工细，指点亭台，摹拟榆杨，忆入梦之前欢，伤对花之独宿，俱一笔不苟，深深体贴出之。余赏心无极，当其曲终下场，乃忘鼓掌，颔首默叹而已。试思《寻梦》一剧，体裁为独角，若以庸手为之，必将枯寂无味，催人入睡。而姚能曲达感春少女情怀，于难处见长，其为聪慧，不言可喻，更益精研。未可量也。昨日又排演是剧，亟往重观，实移吾情。归有馀甘，因以《浣溪沙》题之：

标格居然绝世人。幽寻装束小腰身。徐回盼睐恰宜春。　艳意不禁流浅笑，新愁无奈入轻颦。那回情事幻还真。

二、勖朱传茗

观新乐府者，恒称朱传茗，顾余未能究朱之胜。谓其有矩度，无逾越，自致赞可。然吐音不清，又低微沉于笛下，实足憾惜。道白坐同病，遂令人惟闻唉唉之声，来如串珠，而不审其何云。论其表情作态，似亦未臻神化，不论何剧，现相唯同。忆三年前往观，彼艺已达今境。岁月累积，工力应加，悉心精求，必能超妙。宜如何致力于歌唱，余所不能言，然期其日进月新，固颇抱热忱也。近见欧阳予倩论剧文字，有谓演剧初宜忘我，以剧中人之人格移易己之人格，是谓容受；而唯事容受，犹非上乘，装束登场，固宜随处自认剧中人，尤须视此身为傀儡，克以意识驱遣之。第能容受而弗能驱遣，其表演难得深切。此论甚微妙。传茗若于容受驱遣并加之意，其表达之道当有进耳。

三、倪传钺之真诚

天下众事，同贵惟诚，即游戏小道，如蹴踘超跃，苟非以诚赴之，类弗能精。演剧为综合艺术，藩篱殊广，不出以真诚，直儿戏耳。新乐府诸人，余最敬倪传钺，以其无一时一刻不认真，无一字一句图苟且也。新语有曰“艺术良心”者，

倪传钺庶几近之。观其演《牧羊记》《望乡》，《绣襦记》《打子》，一表忠愤，一传激怒，观者动容，或且泪下，非于所谓容受驱遣深有体会，何得至此。而所以能体会，能令所体会与所表现一致者，诚也。

四、谈题赠联语

新乐府台上悬题赠联语殊多，而佳作寥寥。此亦有因，体裁取嵌字，未免思为字累；或又以寻常酬应视之，成句即可，未欲其工。以余观之，中惟赠传芳传芗二联为胜，曰，“是幻是真，才子传奇留四梦；亦庄亦雅，美人芳草赋三湘。”曰，“妙处传神，双眸剪水；袭人芗泽，一曲临风。”书法皆闲适秀雅，且似出于一手。有赠顾传玠一联，上四言俱忘之，余为“我不周郎偏顾曲，君非宋将也同名。”上语有负气之意，下语谓顾与吴玠同名，同名又如何耶，殊无意义，斯为恶札矣。

一九三三年发表于《大世界》

马可尼来华

上一个月，无线电发明家意大利人马可尼到我国来游历，在北方访问了北平，向南来在上海耽搁了五天，于十二日上轮船回欧洲去。他停留在我国的期间，我国的报纸有刊登欢迎他的特刊的，政界和学术界都设宴款待他，颇为热闹。

无线电的发明把空间的距离缩短了。所谓征服自然，这是很厉害的一手。从前无论登高山，涉大海，总觉得茫茫大地，我们人类附着在上面微小极了。但是马可尼在试验无线电的时候，常发现电波环绕地球三四匝重又回到他耳朵边，因此他嫌这个地球太小了，简直不够供他试验之用。岂只马可尼有这种感想，我们每天早上翻开一张报纸来看，昨天下午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都刊载在上面了，这时候我们也会想："地球实在不怎么大，荒远的南北极，在那一面的美洲，几乎就是我们的前街后巷呀。"人类屡次凭实际的经验改变了空间观念，每次空间观念的改变往往改变了实际生活的方式。无线电的发明及其发明家的值得颂赞，就在于此。

在欢迎马可尼的文篇里，我们看到好几篇把马可尼像英雄一般推崇；并且说，这位科学界老英雄来到我国的今天，我国还没有一个足以与他比并的发明家和他握手，互叙平生，实在是国家民族的莫大耻辱。

其实英雄这种人物是从来就不存在的。提起英雄，人们就会想到"赤手空拳""独往独来""无所凭借"那些成语；又会想到神灵似的一个角色，他能创造类乎奇迹的境界。试去翻查历史，那些成功立业的人物果真是这样的吗？只要不戴什么有色眼镜，就会觉察并不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能成功立业，须有种种事物作为他的条件；条件具备，再加上努力，于是功成而业立。倘若并无作为条件的事物，那就根本无从努力，除了在童话或者神话里，事实上哪里会有成功立业的可能呢？科学发明的原因由于经验的积集。许多经验积集到某种程度，有一个人据此作条件，觉察其中的诸般关系，经过试验之后，果然如是；于是一种新发明成功了，这个人就是发明家。为什么别人觉察不出来而他觉察得出来？当然是他的心思能力用得比别人专精，可以佩服；但是，把他推崇得过了分，认为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忘了他的成功是根据历来积集的许多经验得来的，这样的眼光未免太短浅了。这次马可尼到我国来，有一个侨居我国的电学专家叫做暴安良的特撰一文，论马可尼的成功，篇末有一节道："一个科学家成功一种发明，必须凭借他的前驱者给他留下的产业。因此，他的成功应一部分归功于供给他工具的人。他的荣誉只不过在人类的科学建设上增加了一块柱石而已。"这表示了对于一个发明家的正当观点。发明家决不是什么创造奇迹的英雄。

再说我国没有一个足以和马可尼比并的发明家，这是当然的事，如果有了，那倒是奇迹了。要说这是耻辱，也可以。然而历史如此，有什么法子呢？历代的政治经济规定了传统的教育方式，那种教育方式，是叫一些人一辈子在古籍里打滚，一

辈子在“古圣呀，先王呀”，“风云月露呀，叹老嗟卑呀”这些上面做功夫，和所谓探究自然的奥秘却是绝缘的。自从兴办了学校，功课里头有所谓自然科了，然而立即成为新的古籍，只作考得分数之用。最重要的还是“英”“国”“算”三门；而“算”也是陪客，只有“英”可以当买办，“国”继承古籍的系统，是真正蒙一般人青眼的两大学科。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之下，学生除了教科书不接触关于自然科的知识，除了在教室里看戏法不碰见实验的器械。难道袖着手，对着墙壁呆看，能发现什么物理学的定律，化学的方程式吗？教育不会独自改头换面的，要到政治经济都改变了以后，才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那时候，我国人感觉迫切的需要了，对于人类的科学建设也得给加上几块柱石，这才或许会产生几个发明家吧。

许多种的发明，价值原是平等的。所谓重大发明，乃就其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言；影响大，造福于人类者广，就是重大发明。这全看人类怎样去利用了，发明的本身是不负责任的。就把无线电来说，传递消息，输送知识，差不多把茫茫大地缩到像一间房间那么大小，这是何等的价值。然而，如果用来作荒唐的宣传，供无聊的娱乐，那就不如不要利用这宗发明了。这回马可尼来到上海，听见满街的收音机里放送出来的怪声怪气的弹词和申曲，以及没有一家不是“顶好顶便宜”的商店广告，他也许会爽然若失吧。

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发表

预　　言

近来预测未来的风气似乎很盛行。杂志社出了题目请人写文章，就是一九三四年的情形怎么样，某都市的将来怎么样那一套。英国史学家威尔斯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在一九三六年爆发。最近外国通讯社报导某一个专作预言的妇人对于今年世界大势的预言，话颇噜嗦，我们不必转载，总之，她说今年是"和平之年"。

在赌场里屡次败北的人最注意可以认为预兆的事物，穷得潦倒不堪的人往往想去算一算命，在都市里谋官营差的人大都是星相家的好主顾。人陷落在颠连困苦的境地里，睁着眼睛直望前途，只见一片黑，就会想起"命运之神"来，总希望他能够给一点详切的指示。近来预测未来的风气盛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确有其社会的根源。社会大众都陷落在颠连困苦的境地里，于是那些作者、史学家乃至预言家权充"命运之神"来向大众宣告了。

同样是预言，却也有分别。根据各方面的事势作综合的考察，然后推断由于这般的"因"，将会达到那般的"果"：这是一种预言。或者看星象，或者看个玻璃球，或者焚香点烛，叩头默祷，随后忽然有悟，就这般那般地说出来：这又是一种预言。从开通的人看来，后一种预言当然是鬼把戏，不值一

笑；而前一种却有凭有据，十分可靠，几乎可以加上“科学的”这个形容语。

因果之说，如果像佛家那样讲法，那是渺茫得很的；但是，如果按照常识来讲，就没有什么讲不通的。乱吃狂喝就会生病，无度地浪费就会陷于穷困，亏待了人家就会受人家怨恨，专横的政权就会引起大众的反抗：都是因果呀。这里有一点可以注意的，就是受“果”的固然是人，而造“因”的也莫不是人，这中间并没有什么超人的势力在发生作用。

那些几乎可以称为“科学的”的预言也只是说，人群倾向于造这般的“因”，就会受到那般的“果”而已。大众如果欣羡预言者所推测的良果，袖起手来专等这个良果到来，而不在造因上用功夫，那么，虽是“科学的”预言，也将终于不验。反过来，大众如果恐惧预言者所推测的恶果，而忘却自己正就是造因的负责者，还是在造因的道路上盲目前进，那么，必将有一天惊叹于预言的应验了。

所以，无论对于什么预言，如果把它看做星相家的批命辞和论相书，总是一种无益有害的态度。照这种态度推而广之，那么一九三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就只有等着轰炸机来毁灭我们的城市，毒气弹来收拾我们的生命。这要得么？为什么要不得？就在于忘却了自己是造因的负责者，而把所谓“果”看作无凭准的命运了。

在预言盛行的现时代，我们不希望大众对预言取这样的态度，尤其不愿青年们取这样的态度，所以约略地说了这番话。

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发表

儿子的订婚

十六岁的儿子将要与一个十五岁的少女订婚了。是同住了一年光景的邻居，彼此都还不脱孩子气，谈笑嬉游，似乎不很意识到男女的界限。但是看两个孩子无邪地站在一块，又见到他们两个的天真和忠厚正复半斤八两，旁人就会想道："如果结为配偶倒是相当的呢。"一天，S夫人忽然向邻居夫人和我妻提议道："我替你们的女儿、儿子作媒吧。"两个母亲几乎同时说"好的"，笑容浮现在脸上，表示这个提议正中下怀。几天之后，两个父亲对面谈起这事来了，一个说"好的呀"，一个用他的苏州土白说"既啥"，足见彼此都合了意。可是两个孩子的意见如何是顶要紧的，就分头探询。探询的结果是这个也不开口，那个也不回答。少年对于这个问题的羞惭心理，我们很能够了解，要他们像父母那样若无其事地说一声"好的"或者"既啥"，那是万万不肯的。我们只须看他们的脸色，那种似乎不爱听而实际很关心的神气，那种故意抑制欢悦而把眼光低垂下来的姿态，就是无声的"好的"或者"既啥"呀。于是事情决定，只待商定一个日期，交换一份帖子，请亲友们喝一杯酒，两个孩子就订婚了。

有"媒妁之言"，而媒妁只不过揭开各人含意未伸的意想。也可以说是"父母之命"，而实际上父母并没有强制他们什么。

照现在两个孩子共同做一件琐事以及彼此关顾的情形看来，只要长此不变，他们就将是美满的一对。

这样的婚姻当然很寻常，并不足以做人家的模范。然而比较有些方式却自然得多了。近来大家知道让绝不相识的一男一女骤然在一起生活不很妥当，于是发明了先结识后结婚的方式。介绍人把一男一女牵到一处地方，或者是公园，或者是菜馆的雅座，“这位是某君，这位是某女士，”一副尴尬的面孔，这样替他们“接线”。而某君和某女士各自胸中雪亮，所为何事而来，还不是与“送入洞房”殊途同归？觌面的羞惭渐渐消散了，于是想出话来对谈，寻出题目来约定往后的会晤，这无非为了对象既被指定，不得不用人工把交情制造起来，两个男女结婚以后如何且不说，单说这制造交情的一步功夫，多么牵强不自然啊。

又有一种方式是由交际而恋爱，由恋爱而结婚。交际是广交甲、乙、丙、丁乃至庚、辛、壬、癸，这不过是朋友的相与。恋爱是一枝内发的箭，什么时候射出去是不自知的。一朝射出去而对方接受了，方才谈得到结婚。这种说法颇为一部分青年男女所喜爱。但是，我国知识男女共同做一种事业的很少，所谓交际，差不多只限于饮食游戏那些事。若不是有闲阶级，试问哪里有专门去干饮食游戏那些事的份儿？并且，交际只限于饮食游戏那些事，谨愿的人因而往往向隅，而浮滑的人才是交际场中的骄子。我们曾经看见许多青年男女瞩望着交际场，苦于无由投身进去，而青春已渐渐地离开他们，他们于是忧伤，颓丧，歇斯底里。这是很痛苦的。再说一部分青年心目中的恋爱境界，差不多是一幅美丽而朦胧的

图画。那是诗词和小说教给他们的，此外电影也是有力的启示。这美丽而朦胧的图画实在只是瞬间的感觉，如果憧憬着这个，认为终极的目的，那么恋爱成功以后，一转眼就将惊诧于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时候是很无聊的。

伴侣婚姻是美国的产品，而且在美国也未见怎样通行。我国如果仿行起来，将会感到“此路不通”吧。

青年男女能从恋爱呀结婚呀这些问题上节省许多精神和时间，移用到别的事情上去，他们是幸福的。若把这些问题看作整个的人生，或者认作先于一切的大前提，那么苦恼就伺候在他们背后了。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发表

薪　工

我记得第一次收受薪水时的心情。

校长先生把解开的纸包授给我，说："这里是先生的薪水，二十块，请点一点。"

我接在手里，重重的。白亮的银片连成的一段，似乎很长，仿佛一时间难以数清片数。这该是我收受的吗？我收受这许多不太僭越吗？这样的疑问并不清楚地意识着，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通过我的全身，使我无所措地瞪视手里的银元，又抬起眼来瞪视校长先生的毫无感情的瘦脸。

收受薪水就等于收受于此相当的享受。在以前，我的享受全是父亲给的；但是从这一刻起，我自己取得若干的享受了。这是生活上的一个转变。我又仿佛不能自信：以偶然的机缘，便遇到这个转变，不要是梦幻吧？

此后我幸未失业，每月收到薪水，习以为常，所以若无其事，拿到手就放进袋里。衣食住行一切都靠此享受到了，当然不复疑心是梦幻。可是在头脑空闲一点儿的时候，如果想到这方面去，仍不免有僭越之感。一切的享受都货真价实，是大众给我的，而我给大众的也能货真价实，不同于肥皂泡儿吗？这是很难断言的。

阅世渐深，我知道薪工阶级的被剥削确是实情，只要具

有明澈的眼睛的人就看得透，这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学理。薪工阶级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也是理所当然。但是，如果用怠工等拆烂污的办法来抗争，我以为是薪工阶级的缺德。一个人工作着工作着，广义地说，便是把自己的一份心力贡献给大众。你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反抗不当的剥削，可是你不应该吝惜你自己的一份心力，让大众间接受到不利的影响。

在收受薪水的时候，固然不妨考量是不是收受得太少；而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却应该自问是不是贡献得欠多。我想，这可以作为薪工阶级的座右铭。我这么说，并不是替不劳而获的那些人保障利益。从薪工阶级的立场说起来，不劳而获的那些人是该彻底地被消灭的。他们消灭之后，大家还是薪工阶级，而贡献心力也还是务期尽量的。

一九三四年九月一日发表

写不出什么

“随便写一点文字吧，”杂志的编者常常这样叮嘱我。我当然感激他们的好意，同时就想努力写一点什么，报答他们。然而结果往往是什么也没有写。见面，当面道歉；不见面，写封信去。

写一点什么总得有个意思，这个意思又得肢体完整，眉目清楚，朦朦胧胧像一团烟雾是不成的。我也时常有一些意思，不幸朦朦胧胧的居多。这自然因为学问不够，经验短少的缘故。

譬如读了人家的一篇小说或者散文，我也会觉得某一部分满意，某一部分未免有些欠缺。那么，好，来一篇评论吧。这个我可干不来。评论自有“评论”之学，外行去干，一定非驴非马。譬如，看了《渔光曲》，我就觉得前半部凝练、自然，后半部比较松散、牵强；如果用文体来比拟，这个影片是一篇记叙文，不是一篇小说。可是我不敢写“影评”。就只有这一两句话，写出来岂不笑杀“影评”的专家。譬如，听说张天师求雨，某要人主持“时轮金刚法会”，耳闻驱逐吃月亮的天狗的锣鼓鞭炮声，眼见街头飘飘地挂着“盂兰盆会”的纸锭，我就止不住心头的恨，恨这个鬼神充塞的地方。我能写一点什么去唤醒这批装神弄鬼的家伙吗？一来是没有多少话好说，“鬼神，

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样一句就完了；二来呢，这批家伙是无法唤醒的，除非决定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条件改变过了。所以，恨了也就完事，从不曾想到写一点什么。

一定要勉强写一点，那也未尝不可。就把那朦朦胧胧的意思作根子，对着它苦苦地想，待它发出枝条，长出叶子来。笔杆儿常常停在手里，写第一句的时候不知道第二句是什么，第二句有了，第三句还没有在一团烟雾里露脸。只要有相当的耐性，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也就可以成篇。但是，这样写成功的文字至多像一棵将要枯萎的树，缺少精力，毫无生趣。这种东西，自己看看就觉得讨厌，又怎么能够给人家看？对于人家，又怎么会有丝毫的益处？那么，开头就不要勉强，让笔尖儿插在笔帽里好得多了。

见许多朋友对于无论什么都有层出不穷的意思，嘴里时常滔滔不绝，提起笔来就连篇累牍写个不休，我唯有羡慕，没法追随。又听他们说“我预备写一部东西，大概有二十来万字”，或者说“这不过是一篇小论文，才只有十万字光景罢了”。这时候我就惊诧他们的“多”，同时惭愧自己的“少”，少到几乎等于零。

如果我懂得一点礼义廉耻之类的古义或者新诠，就可以写几篇《四维论》《礼义廉耻通释》，去应市面。可惜我对于旧的甲部丙部之学和新的生活哲学都没有研究，只好“不着一字”。

如果我有多馀的钱，能够向破落的旧家或者灵敏的书贾买几部希世的孤本，或者出洋到巴黎，伦敦，近一点就是日本各地，在那里的图书馆里看看敦煌的卷子，什么朝代的国

画，也就可以写几篇考证文字，希望加入学者之林。可惜我并没有多馀的钱，希世的孤本固然不敢梦想，出洋的轮船又难以有缘。

如果我过着闲适的生活，养花、品茶、看山、访友，兴到的时候就可以提起笔来写几篇小品文，在这个年头，小品文是时髦不过的。可惜我每天要往造书的工厂里去，从早上八点起，到下午五点半止，忙的是红墨水、蓝墨水、校样、复写纸之类的事；最近过了一个夏天，没有听到一声蝉鸣，也没有见到一朵荷花，小品文的"灵感"根本就不来访问我的头脑。

以上这些话无非说明我写不出什么，杂志的编者看了，就可以知道我并不是有意违背他们的嘱咐了。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发表

掮枪的生活

我当中学生的时代在清朝末年，那时候厉行军国民教育，所以我受过三年多的军事训练。现在回想起来，旁的也没有什么，只那掮枪的生活倒是颇有兴味的。

我们那时候掮的是后膛枪，上了刺刀，大概有七八斤重。腰间围着皮带。皮带上系着两个长方形的皮匣子，在左右肋骨的部位，那是预备装子弹的。后面的左侧又系着刺刀的壳子。这样装束起来，俨然是个军人了。

我们平时操小队教练、中队教练，又操散兵线，左右两旁的伙伴离得特别开，或者直立预备放，或者跪倒预备放，或者卧倒预备放。当卧倒预备放的时候，胸、腹、四肢密贴着草和泥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待教师喊出"举枪——放！"的口令的时候，右手的食指在发弹机上这么一扳，更是极度兴奋的举动。

有时候我们练习冲锋，斜执着上了刺刀的枪，一拥而前。不但如此，还要冲上五六丈高的土堆；土堆的斜坡很有点儿陡峭，我们不顾，只是脚不点地地往上冲。嘴里还要呐喊："啊！——啊！"宛然有千军万马的气势。谁第一个冲到土堆的顶上，就高举手里的枪，与教师手里的指挥刀一齐挥动，犹如占领了一座要塞。

有时候我们练习野外侦察，三个四个作一组，各走不同的道路，向田野或树林出发。如果是秋季的晴天，侦察就大有趣味。干草的甘味扑鼻而来；各种昆虫或前或后，飞飞歇歇，好像特地来与我们作伴；清水的池边，断栏的桥上，随处可以坐下来；阳光照在身上，不嫌其热，可是周身感到健康的快感。这当儿，我们差不多忘了教师讲的侦察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我们高兴有这样的机会，从沉闷的教室里逃到空旷的原野里，作一回掮着枪的游散。

一年的乐事，秋季旅行为最。旅行的时候也用军法部勒。一队有队长，一小队有小队长。步伐听军号，归队和散队听军号，吃饭听军号，早起夜眠也听军号。我有几个同级的好友是吹号打鼓的好手，每逢旅行，他们总排在队伍的前头，显耀他们的本领。我从他们那里受到熏染，知道吹号打鼓与其他技艺一样，造诣也颇有深浅的差异；要沉着而又圆转，那才是真功夫。我略能鉴别吹奏的好坏；有几支军号的曲调至今还记得。

旅行不但掮枪束子弹带，还要向军营里借了粮食袋和水瓶来使用。粮食袋挂在左腰间，水瓶挂在右腰间，里头当然装满了内容物。这就颇有点儿累赘了，然而我们都欢喜这样的装束，恨不得在背上再加个背包。其时枪也擦得特别干净，枪管乌乌的，枪柄上不留一点儿污迹，枪管子里面是人家看不见的，可是我们也用心擦，直擦到用一只眼睛窥看的时候，来复线条条闪亮，耀着青光，才肯罢手。

旅行到了目的地，或者从轮船上起岸，或者从火车上下来，我们总是排成四行的队伍，开着正步，昂然前进。校旗由排头笔直地执着，军号军鼓奏着悠扬的调子；步伐匀齐，没

有一点儿错乱。人家没有留心看校旗上的字，往往说“哪里来的军队”。听了这个话，我们的精神更见振作，身躯挺得更直，步子也跨得更大。有一年秋季旅行，达到目的地已经是晚上八点过后，天下着大雨，地上到处是水潭。我们依然开正步，保持着队伍的整齐形式。一步一步差不多都落在水潭里，皮鞋里完全灌满了水，衣服也湿透了，紧贴着皮肤。我们都以为这是有趣的佳遇，不感到难受。又有一年秋季，到南京去参观南洋劝业会，正走进会场的正门，忽然来一阵点儿很大的急雨。我们好像没有这回事，立停，成双行向左转，报数，搭枪架，然后散开，到各个馆里去参观。第二天《会场日报》刊登特别记载：某某中学到来参观，完全是军队的模样，遇到阵雨，队伍绝不散乱，学生个个精神百倍，如是云云。我们都珍重这一则新闻记事，认为这一次旅行的荣誉。

旅行时候的住宿又是一件有味的事。往往借一处地方，在屋子里平铺着稻草，就把带去的被褥摊在上面。睡眠的号声幽幽地吹起来时，大家蚱蜢似地窜向自己的铺位，解带子，脱衣服，都觉得异样新鲜，似乎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会儿熄灯的号声响了，就在一团黑暗里静待入睡。各人知道与许多伙伴在一起，差不多同睡在一张巨大的床上，所以并不感到凄寂。第二天醒来当然特别早，只等起身号的第一个音吹出，大家就站了起来，急急忙忙把自己打扮成个军人了。

从前的掮枪生活，现在回想起来，颇带一些浪漫意味。这在当时主张军国民教育的人说来，自然是失败了。然而我们这批人的青年生活却因此得到了一些润泽。

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发表

说书

因为我是苏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谈谈苏州的说书。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如《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如《三国志》《水浒》《英烈》《金台传》，都不止听一遍，最多的听到三遍四遍。但是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不要说“书”里的情节，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说不齐全了。

“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历史故事跟江湖好汉，这是大概的区别。“小书”在表白里夹着唱词，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如果是双档（两个人登台），另外一个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诸葛亮不离手的鹅毛扇，赵子龙手里的长枪，李逵手里的板斧，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都是那把黑纸扇。

说“小书”的唱唱词据说是依“中州韵”的，实际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ㄣㄥ不分，“真”“庚”同韵。唱的调子有两派：一派叫“马调”，一派叫“俞调”。“马调”质朴，“俞调”婉转。“马调”容易听清楚，“俞调”抑扬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变了，就听不明白。“俞调”又比较是女性的，说书的如果是中

年以上的人，勉强逼紧了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来，真叫人坐立不安，浑身肉麻。

"小书"要说得细腻。《珍珠塔》里的陈翠娥见母亲势利，冷待远道来访的穷表弟方卿，私自把珍珠塔当作干点心送走了他。后来忽听得方卿来了，是个唱"道情"的穷道士打扮，要求见她。她料知其中必有蹊跷，下楼去见他呢还是不见他，踌躇再四，于是下了几级楼梯就回上去，上去了又走下几级来，这样上上下下有好多回，一回有一回的想头。这段情节在名手有好几天可以说。其时听众都异常兴奋，彼此猜测，有的说"今天陈小姐总该下楼梯了"，有的说"我看明天还得回上去呢"。

"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像演员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态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到，一丝不乱，才是真功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书"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

说"大书"的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阔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灞陵桥就是这么一声"咆头"。听众听到了"咆头"，散出书场来还觉得津津有味。

无论“小书”和“大书”，说起来都有“表”跟“白”的分别。“表”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说书中人的话。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说书人自己的声口，而“白”的部分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份。起角色的时候，大概贴旦丑角之类仍用苏白，正角色就得说“中州韵”，那就是“苏州人说官话”了。

说书并不专说书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节的地方加入许多“穿插”。“穿插”的来源无非《笑林广记》之类，能够自出心裁的编排一两个“穿插”的当然是能手了。关于性的笑话最受听众欢迎，所以这类“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听到。最后的警句说了出来之后，满场听众个个哈哈大笑，一时合不拢嘴来。

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域全是这批说书人的说教地。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民。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听书的人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吴用式的阴谋诡计，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也说不尽这许多，总之，那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

现在，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太师等人的一声长嗽。非现代的人生经验利用了现代的利器来传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

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发表

昆　曲

昆曲本是吴方言区域里的产物，现今还有人在那里传习。苏州地方，曲社有好几个。退休的官僚，现任的善堂董事，从课业练习簿的堆里溜出来的学校教员，专等冬季里开栈收租的中年田主少年田主，还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人，都是那几个曲社里的社员。北平并不属于吴方言区域，可是听说也有曲社，又有私家聘请了教师学习的，在太太们，能唱几句昆曲算是一种时髦。除了这些"爱美的"唱曲家偶尔登台串演以外，职业的演唱家只有一个班子，这是唯一的班子了，就是上海"大千世界"的"仙霓社"。逢到星期日，没有什么事来逼迫，我也偶尔跑去看他们演唱，消磨一个下午。

演唱昆曲是厅堂里的事。地上铺一方红地毯，就算是剧中的境界；唱的时候，笛子是主要的乐器，声音当然不会怎么响，但是在一个厅堂里，也就各处听得见了。搬上旧式的戏台去，即使在一个并不宽广的戏院子里，就不及平剧那样容易叫全体观众听清。如果搬上新式的舞台去，那简直没法听，大概坐在第五六排的人就只看见演员拂袖按鬓了。我不曾做过考据功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演唱昆曲的戏院子。从一些零星的记载看来，似乎明朝时候只有绅富家里养着私家的戏班子。《桃花扇》里有陈定生一班文人向阮大铖借

戏班子，要到鸡鸣埭上去吃酒，看他的《燕子笺》，也可以见得当时的戏不过是几十个人看看罢了。我十几岁的时候，苏州城外有演唱平剧的戏院子两三家，演唱昆曲的戏院子是不常有的，偶尔开设起来，开锣不久，往往因为生意清淡就停闭了。

昆曲彻头彻尾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宴饮的当儿，叫养着的戏班子出来演几出，自然是满写意的。而那些戏本子虽然也有幽期密约，盗劫篡夺，但是总要归结到教忠教孝，劝贞劝节，神佛有灵，人力微薄，这就除了供给娱乐以外，对于士大夫阶级也尽了相当的使命。就文词而言，据内行家说，多用词藻故实是不算希奇的，要像元曲那样亦文亦话才是本色。但是，即使像了元曲，又何尝能够句句像口语一样听进耳朵就明白？再说，昆曲的调子有非常迂缓的，一个字延长到十几拍，那就无论如何讲究辨音，讲究发声跟收声，听的人总之难以听清楚那是什么字了。所以，听昆曲先得记熟曲文；自然，能够通晓曲文里的故实跟词藻那就尤其有味。这又岂是士大夫阶级以外的人所能办到的？当初编撰戏本子的人原来不曾为大众设想，他们只就自己的天地里选一些材料，编成悲欢离合的故事，借此娱乐自己，教训同辈，或者发发牢骚。谁如果说昆曲太不顾到大众，谁就是认错了题目。

昆曲的串演，歌舞并重。舞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各种动作跟姿势，唱到哪个字，眼睛应该看哪里，手应该怎样，脚应该怎样，都由老师傅传授下来，世代遵守着。动作跟姿势大概重在对称，向左方做了这么一个舞态，接下来就向右方也做这么一个舞态，意思是使台下的看客得到同等的观赏。譬

如《牡丹亭》里的《游园》一出，杜丽娘小姐跟春香丫头就是一对舞伴，从闺中晓妆起，直到游罢回家止，没有一刻不是带唱带舞的，而且没有一刻不是两人互相对称的。这一点似乎比较平剧跟汉调来得高明。前年看见过一本《国剧身段谱》，详记平剧里各种角色的各种姿势，实在繁复非凡；可是我们去看平剧，就觉得演员很少有动作，如《李陵碑》里的杨老令公，直站在台上尽唱，两手插在袍甲里，偶尔伸出来挥动一下罢了。昆曲虽然注重动作跟姿势，也要演员能够体会才好，如果不知道所以然，只是死守着祖传来表演，那就跟木偶戏差不多。

昆曲跟平剧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然而后者比较适合于市民，而士大夫阶级已无法挽救他们的没落，昆曲恐将不免于淘汰。这跟麻将代替了围棋，豁拳代替了酒令，是同样的情形。虽然有曲社里的人在那里传习，然而可怜得很，有些人连曲文都解不通，字音都念不准，自以为风雅，实际上却是薛蟠那样的哼哼，活受罪，等到一个时会到来，他们再没有哼哼的馀闲，昆曲岂不将就此"绝响"？这也没有什么可惜，昆曲原不过是士大夫阶级的娱乐品罢了。

有人说，还有大学文科里的"曲学"一门在。大学文科分门这样细，有了诗，还有词，有了词，还有曲，有了曲，还有散曲跟剧曲，有了剧曲，还有元曲研究跟传奇研究，我只有钦佩赞叹，别无话说。如果真是研究，把曲这样东西看做文学史里的一宗材料，还它个本来面目，那自然是正当的事。但是人的癖性往往会因为亲近了某种东西，生出特别的爱好心情来，以为天下之道尽在于此。这样，就离开"研究"二字

不止十里八里了。我又听说某一所大学里的“曲学”一门功课，教授先生在教室里简直就教唱昆曲，教台旁边坐着笛师，笛声嘘嘘地吹起来，教授先生跟学生就一同啜啜啜……地唱起来。告诉我的那位先生说这太不成话了，言下颇有点愤慨。我说，那位教授先生大概还没有知道，“仙霓社”的台柱子，有名的巾生顾传玠，因为唱昆曲没前途，从前年起丢掉本行，进某大学当学生去了。

这一回又是望道先生出的题目。真是漫谈，对于昆曲一点儿也没有说出中肯的话。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发表

三　种　船

一连三年没有回苏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点儿空闲，就去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无非是送一点钱给看坟的坟客，让他们知道某家的坟还没有到可以盗卖的地步罢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苏州人上坟向来大都坐船，天气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气充塞的河面上畅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确是非常舒服的事。这一趟我去，雇的是一条熟识的船。涂着的漆差不多剥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残败的样子。问起船家，果然，这条船几年没有上岸修理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胶住在浅浅的河浜里，哪里还有什么生意，又哪里来钱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码头上迎晓风送夕阳的份儿。近年来到各乡各镇去，都有了小轮船，不然，可以坐绍兴人的“噹噹船”，也不比小轮船慢，而且价钱都很便宜。如果没有上坟这件事，苏州城里的船恐怕只能劈做柴烧了。而上坟的事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经改变为三年上一趟坟了。

苏州城里的船叫做“快船”，与别地的船比起来，实在是并不快的。因为不预备经过什么长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浅，船底阔而平。除了船头是露天以外，分做头舱中舱和艄篷三部分。头舱可以搭高，让人站直不至于碰头顶。两旁边各有两

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红绿的明角灯，明角灯又挂着红绿的流苏。踏脚的是广漆的平板，一般是六块，由横的直的木条承着。揭开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储藏库。中舱也铺着若干块平板，可是差不多贴着船底，所以从头舱到中舱得跨下一尺多。中舱两旁边是两排小方窗，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来，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配上明瓦，或者在拼凑的明瓦中间镶这么一小方玻璃，后来玻璃来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舱与头舱艄篷分界处都有六扇书画小屏门，上方下方装在不同的几条槽里，要开要关，只须左右推移。书画大多是金漆的，无非"寒雨连江夜入吴"，"月落乌啼霜满天"以及梅兰竹菊之类。中舱靠后靠右搁着长板，供客憩坐。如果过夜，只要靠后多拼一两条长板，就可以摊被褥。靠左当窗放一张小方桌，方桌旁边四张小方凳。如果在小方桌上放上圆桌面，十来个人就可以聚餐。靠后靠右的长板以及头舱的平板都是座头，小方凳摆在角落里凑数。末了儿说到艄篷，那是船家整个的天地。艄篷同头舱一样，平板以下还有地位，放着锅灶碗橱以及铺盖衣箱种种东西。揭开一块平板，船家就蹲在那里切肉煮菜。此外是摇橹人站着摇橹的地方。橹左右各一把，每把由两个人服事，一个当橹柄，一个当橹绳。船家如果有小孩，走不来的躺在困桶里，放在翘起的后艄，能够走的就让他在那里爬，拦腰一条绳拴着，系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里去。后艄的一旁露出四条棍子，一顺地斜并着，原来大概是护船的武器，后来转变成装饰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门板柱都用广漆，所以没有其他船上常有的那种难受的桐油气味。广漆

的东西容易擦干净，船旁边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懒惰，船就随时可以明亮爽目。

从前，姑奶奶回娘家哩，老太太看望小姐哩，坐轿子嫌吃力，就唤一条快船坐了去。在船里坐得舒服，躺躺也不妨，又可以吃茶，吸水烟，甚至抽大烟。只是城里的河道非常脏，有人家倾弃的垃圾，有染坊里放出来的颜色水，淘米净菜洗衣服刷马桶又都在河旁边干，使河水的颜色和气味变得没有适当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时候还浮着肚皮胀得饱饱的死猫或者死狗的尸体。到了夏天，红里子白里子黄里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观。苏州城里河道多，有人就说是东方的威尼斯。威尼斯像这个样子，又何足羡慕呢？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等人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里舒服，以外尽不妨马虎，而且习惯成自然，那就连抬起手来按住鼻子的力气也不用花。城外的河道宽阔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乡各镇去，或逢春秋好日子游山玩景，以及干那宗法社会里的重要事项——上坟，唤一条快船去当然最为开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馆比不上的，特称“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样繁多，菜以外还有种种点心，一顿吃不完。非正式地做几样也还是精，船家训练有素，出手总不脱船菜的风格。拆穿了说，船菜所以好就在于只准备一席，小镬小锅，做一样是一样，汤水不混和，材料不马虎，自然每样有它的真味，叫人吃完了还觉得馋涎欲滴。倘若船家进了菜馆里的大厨房，大镬炒虾，大锅煮鸡，那也一定会有坍台的时候的。话得说回来，船菜既然好，坐在船里又安舒，可以眺望，可以谈笑，玩它个夜以继日，于是快船常有求过于供的情形。那时候，游手好闲的苏州人还没有识得“不景

气"的字眼，脑子里也没有类似"不景气"的想头，快船就充当了适应时地的幸运儿。

除了做船菜，船家还有一种了不得的本领，就是相骂。相骂如果只会防御，不会进攻，那不算希奇。三言两语就完，不会像藤蔓似的纠缠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纯是常规的语法，不会应用修辞学上的种种变化，那就即使纠缠不休也没有什么精采。船家与人家相骂起来，对于这三层都能毫无遗憾，当行出色。船在狭窄的河道里行驶，前面有一条乡下人的柴船或者什么船冒冒失失地摇过来，看去也许会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骂的口吻进攻了，"你瞎了眼睛吗？这样横冲直撞是不是去赶死？"诸如此类。对方如果有了反响，那就进展到纠缠不休的阶段，索性把摇橹撑篙的手停住了，反复再四地大骂，总之错失全在对方，所以自己的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骂到动武，他们认为男人盘辫子女人扭胸脯不属于相骂的范围。这当儿，你得欣赏他们的修辞的才能。要举例子，一时可记不起来，但是在听到他们那些话语的时候，你一定会想，从没有想到话语可以这么说的，然而唯有这么说，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种种成分。编辑人生地理教科书的学者只怕没有想到吧，苏州城里的河道养成了船家相骂的本领。

他们的摇船技术是在城里的河道训练成功的，所以长处在于能小心谨慎，船与船擦身而过，彼此绝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风固然也会拉纤，遇到顺风固然也会张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别种船上的驾驶人来，那就不成话了。他们敢于拉纤或者张篷的时候，风一定不很大，如果真个遇

到大风，他们就小心谨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坟必须经过石湖，虽然吴瞿安先生曾做诗说石湖“天风浪浪”什么什么以及“群山为我皆低昂”，实在是个并不怎么阔大的湖面，旁边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阴历八月十八，许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烧香的。船家一听说要过石湖就抬起头来看天，看有没有起风的意思。到进了石湖的时候，脸色不免紧张起来，说笑都停止了。听得船头略微有汩汩的声音，就轻轻地互相警戒，“浪头！浪头！”有一年我家去上坟，风在十点过后大起来，船家不好说回转去，就坚持着不过石湖。这一回难为了我们的腿，来回跑了二十里光景才上成了坟。

现在来说绍兴人的“當當船”。那种船上备着一面小铜锣，开船的时候就當當當當敲起来，算是信号，中途经过市镇，又當當當當敲起来，招呼乘客，因此得了这奇怪的名称。我小时候，苏州地方没有那种船。什么时候开头有的，我也说不上来。直到我到角直去当教师，才与那种船有了缘。船停泊在城外，据传闻，是与原有的航船有过一番斗争的。航船见它来抢生意，不免设法阻止。但是“當當船”的船夫只知道硬干，你要阻止他们，他们就与你打。大概交过了几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绍兴人的敌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们在水面上来去自由了。中间有没有立案呀登记呀这些手续，我可不清楚，总之那些绍兴人用腕力开辟了航线是事实。我们有一句话，“麻雀豆腐绍兴人”，意思是说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绍兴人，绍兴人与麻雀豆腐一样普遍于各地。试把“當當船”与航船比较，就可以证明绍兴人是生存斗争里的好角色，他们与麻雀豆腐一样普遍于各地，自有所以

然的原因。这看了后文就知道，且让我把"哨哨船"的体制叙述一番。

"哨哨船"属于"乌篷船"的系统，方头，翘尾巴，穹形篷，横里只够两个人并排坐，所以船身特别见得长。船旁涂着绿釉，底部却涂红釉，轻载的时候，一道红色露出水面，与绿色作强烈的对照。篷纯黑色。舵或红或绿，不用，就倒插在船艄，上面歪歪斜斜标明所经乡镇的名称，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制作也将就，只要河水不至于灌进船里就成，横一条木条，竖一块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补缀一样，那是不在乎的。我们上旁的船，总是从船头走进舱里去。上"哨哨船"可不然，我们常常踩着船边，从推开的两截穹形篷中间把身子挨进舱里去，这样见得爽快。大家既然不欢喜钻舱门，船夫有人家托运的货品就堆在那里，索性把舱门堵塞了。可是踩船边很要当心。西湖划子的活动不稳定，到过杭州的人一定有数，"哨哨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它的活动不稳定也与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势，让重心落在踩着船边的那只脚上，然后另一只脚轻轻伸下去，点着舱里铺着的平板。进了舱你就得坐下来。两旁靠船边搁着又狭又薄的长板就是坐位，这高出铺着的平板不过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来就得耸起你的两个膝盖，如果对面也有人，那就实做"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躯干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头触着篷顶，你不免要起侷促之感。先到的人大多坐在推开的两截穹形篷的空档里，这里虽然是出入要道，时时有偏过身子让人家的麻烦，却是个优越的位置，透气，看得见沿途的景物，又可以轮流把两臂搁在船边，舒散舒散久坐的困倦。

然而遇到风雨或者极冷的天气，船篷必须拉拢来，那位置也就无所谓优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没在含有恶浊气味的阴暗里。

“唘唘船”的船夫差不多没有四十以上的人，身体都强健，不懂得爱惜力气，一开船就拼命划。五个人分两边站在高高翘起的船艄上，每人管一把橹，一手当橹柄，一手当橹绳。那橹很长，比旁的船上的橹来得轻而薄。当推出橹柄去的时候，他们的上身也冲了出去，似乎要跌到河里去的模样。接着把橹柄挽回来，他们的身子就往后顿，仿佛要坐下来似的。五把橹在水里这样强力地划动，船身就飞快地前进了。有时在船头加一把桨，一个人背心向前坐着，把它扳动，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听得河水活活地向后流去，奏着轻快的调子。船夫一壁划船，一壁随口唱绍兴戏，或者互相说笑，有猥亵的性谈，有绍兴风味的幽默谐语，因此，他们就忘记了疲劳，而旅客也得到了解闷的好资料。他们又喜欢与旁的船竞赛，看见前面有一条什么船，船家摇船似乎很努力，他们中间一个人发出号令说“追过它”，其馀几个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会儿冲出去，一会儿倒仰过来，好像忽然发了狂。不多时果然把前面的船追过了，他们才哈哈大笑，庆贺自己的胜利，同时回复到原先的速率。由于他们划得快，比较性急的人都欢喜坐他们的船，譬如从苏州到甪直是“四九路”（三十六里），同样地划，航船要六个钟头，“唘唘船”只要四个钟头，早两个钟头上岸，即使不想赶做什么事，身体究竟少受些拘束，何况船价同样是一百四十文，十四个铜板。（这是十五年前的价钱，现在总该增加了。）

风顺，“嘚嘚船”当然也张风篷。风篷是破衣服、旧挽联、干面袋等等材料拼凑起来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因为船身不大，就见得篷幅特别大，有点儿不相称。篷杆竖在船头舱门的地位，是一根并不怎么粗的竹头，风越大，篷杆越弯，把袋满了风的风篷挑出在船的一边。这当儿，船的前进自然更快，听着哗哗的水声，仿佛坐了摩托船。但是胆子小点儿的人就不免惊慌，因为船的两边不平，低的一边几乎齐水面，波浪大，时时有水花从舱篷的缝里泼进来。如果坐在低的一边，身体被动地向后靠着，谁也会想到船一翻自己就最先落水。坐在高的一边更得费力气，要把两条腿伸直，两只脚踩紧在平板上，才不至于脱离坐位，跌扑到对面的人的身上去。有时候风从横里来，他们也张风篷，一会儿篷在左边，一会儿调到右边，让船在河面上尽画曲线。于是船的两边轮流地一高一低，旅客就好比在那里坐幼稚园里的跷跷板，“这生活可难受，”有些人这样暗自叫苦。然而“嘚嘚船”很少失事，风势真个不对，那些船夫还有硬干的办法。有一回我到角直去，风很大，饱满的风篷几乎蘸着水面，虽然天气不好，因为船行非常快，旅客都觉得高兴，后来进了吴淞江，那里江面很阔，船沿着“上风头”的一边前进。忽然呼呼地吹来更猛烈的几阵风，风篷着了湿重又离开水面。旅客连“哎哟”都喊不出来，只把两只手紧紧地支撑着舱篷或者坐身的木板。扑通，扑通，三四个船夫跳到水里去了。他们一齐扳住船的高起的一边，待留在船上的船夫把风篷落下来，他们才水淋淋地爬上船艄，湿了的衣服也不脱，拿起橹来就拼命地划。

说到航船，凡是摇船的跟坐船的差不多都有一种哲学，就

是“反正总是一个到”主义。反正总是一个到，要紧做什么？到了也没有烧到眉毛上来的事，慢点儿也死啥。所以，船夫大多衔着一根一尺多长的烟管，闭上眼睛，偶尔想到才吸一口，一管吸完了，慢吞吞捻了烟丝装上去，再吸第二管。正同“哨哨船”相反，他们中间很少四十以下的人。烟吸畅了，才起来理一理篷索，泡一壶公众的茶。可不要当做就要开船了，他们还得坐下来谈闲天。直到专门给人家送信带东西的“担子”回了船，那才有点儿希望。好在坐船的客人也不要不紧，隔十多分钟二三十分钟来一个两个，下了船重又上岸，买点心哩，吃一开茶哩，又是十分或一刻。有些人买了烧酒豆腐干花生米来，预备一路独酌。有些人并没有买什么，可是带了一张源源不绝的嘴，还没有坐定就乱攀谈，挑选相当的对手。在他们，迟些儿到实在不算一回事，就是不到又何妨。坐惯了轮船火车的人去坐航船，先得做一番养性的功夫，不然，这种阴阳怪气的旅行，至少会有三天的闷闷不乐。

航船比“哨哨船”大得多，船身开阔，舱作方形，木制，不像“哨哨船”那样只用芦席。艄篷也宽大，雨落太阳晒，船夫都得到遮掩。头舱中舱是旅客的区域。头舱要盘膝而坐。中舱横搁着一条条长板，坐在板上，小腿可以垂直。但是中舱有的时候要装货，豆饼菜油之类装满在长板下面，旅客也只得搁起了腿坐了。窗是一块块的板，要开就得卸去，不卸就得关上。通常两旁各开一扇，所以坐在舱里那种气味未免有点儿难受。坐得无聊，如果回转头去看艄篷里那几个老头子摇船，就会觉得自己的无聊才真是无聊。他们的一推一挽距离很小，仿佛全然不用力气，两只眼睛茫然望着岸边，这样地过

了不知多少年月，把踏脚的板都踏出脚印来了，可是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无聊，每天还是走那老路，连一棵草一块石头都熟识了的路。两相比较，坐一趟船慢一点儿闷一点儿又算得什么。坐航船要快，只有巴望顺风。篷杆竖在头舱与中舱之间，一根又粗又长的木头。风篷极大，直拉到杆顶，有许多竹头横撑着，吃了风，巍然地推进，很有点儿气派。风最大的日子，苏州到角直三点半钟就吹到了。但是旅客究竟是“反正总是一个到”主义者，虽然嘴里嚷着“今天难得”，另一方面却似乎嫌风太大船太快了，跨上岸去，脸上不免带点儿怅然的神色。遇到顶头逆风航船就停班，不像“呇呇船”那样无论如何总得用人力去拼。客人走到码头上，看见孤零零的一条船停在那里，半个人影儿也没有，知道是停班，就若无其事地回转身。风总有停的日子，那么航船总有开的日子。忙于寄信的我可不能这样安静，每逢校工把发出的信退回来，说今天航船不开，就得担受整天的不舒服。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发表

怀念石岑先生

认识石岑先生十多年，始终佩服他的修己不懈诲人不倦的精神。他的哲学方面的造诣如何我不明白，可是每一回遇到他，听他的随便谈论，总觉得一回比一回精深；那些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罢了，也就是他的行为的表白。这就可见他的人生哲学不是专门预备写书本用的。他在好几处大学里担任功课，听说每逢他上课总是满座。他的演讲在青年的思想行为上发生影响，又是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现在他死了，有无数的学生追悼他纪念他，更可以见到他的教诲决不会随着他的生命一同消逝。

石岑先生这回卧病之前，曾经同郭一岑先生通电话说要到开明编译所来看我们，结果没有来，写了一封信来订后会之期。接着他病了。我给事务牵累住，不曾到医院去看过他一趟，直到他死了，也不曾去送葬，现在追悼会，也还是不能到。我很觉得抱歉，但是从另一方面想，这些都是形迹之末，脱略一点也没有甚么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头，将永远保留着石岑先生的紧紧握手恳切谈话的那一副神态。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发表

天井里的种植

搬到上海来十多年，一直住的弄堂房子。弄堂房子，内地人也许不明白是什么式样。那是各所一律的：前墙通连，隔墙公用；若干所房子成为一排；前后两排间的通路就叫做"弄堂"；若干条弄堂合起来总称什么里什么坊，表示那是某一个房主的房产。每一所房子开门进去是个小天井。天井，也许又有人不明白是什么。天井就是庭院；弄堂房子的庭院可真浅，只须三四步就跨过了，横里等于一所房子的阔，也不过五六步光景，如果从空中望下来，一定会觉得那个"井"字怪适当的。天井跨进去就是正间。正间背后横生着扶梯，通到楼上的正间以及后面的亭子间。因为房子并不宽，横生的扶梯够不到楼上的正间，碰到墙，拐弯向前去，又是四五级，那才是楼板。到亭子间可不用跨这四五级，所以亭子间比楼正间低。亭子间的下层是灶间；上层是晒台，从楼正间另一旁的扶梯走上去。近年来常常在文人笔下出现的亭子间就是这么局促闷损的居室。然而弄堂房子的结构确乎值得佩服；俗语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弄堂房子就合着这样经济的条件。

住弄堂房子，非但栽不成深林丛树，就是几棵花草也没法种，因为天井里完全铺着水门汀。你要看花草只有种在花

盆里。盆里的泥往往是反复地种过了几种东西的，一些养料早被用完，又没处去取肥美的泥土来加入；所以长出叶子来开出花朵来大都瘦小可怜。有些人家嫌自己动手麻烦，又正有馀多的钱足以对付小小的奢侈的开支，就与花园约定，每个月送两回或者三回盆景来；这样，家里就长年有及时的花草，过了时的自有花匠带回去，真是毫不费事。然而这等人家的趣味大都在于不缺少照例应有的点缀，自己的生活跟花草的生活却并没有多大干系；只要看花匠带回去的，不是干枯了的叶子，就是折断了的枝干，可见我这话没有冤枉了他们。再有些人家从小菜场买一些折枝截茎的花草，拿回来就插在花瓶里，不像日本人那样讲究什么"花道"，插成"乱柴把"或者"喜鹊窠"都不在乎；直到枯萎了，拔起来向垃圾桶一扔，就此完事。这除了"我家也有一点儿花草"以外，实在很少意味。

我们乐于亲近植物，趣味并不完全在看花。一条枝条伸出来，一张叶子展开来，你如果耐着性儿看，随时有新的色泽跟姿态勾引你的欢喜。到了秋天冬天，吹来几阵西风北风，树叶毫不留恋地掉将下来；这似乎最乏味了。然而你留心看时，就会发见枝条上旧时生着叶柄的处所，有很细小的一粒透露出来，那就是来春新枝条的萌芽。春天的到来是可以预计的，所以你对着没有叶子的枝条也不至于感到寂寞，你有来春看新绿的希望。这固然不值一班珍赏家的一笑，在他们，树一定要搜求佳种，花一定要能够入谱，寻常的种类跟谱外的货色就不屑一看；但是，果真能从花草方面得到真实的享受，做一个非珍赏家的"外行"又有什么关系。然而买一

点折枝截茎的花草来插在花瓶里，那是无法得到这种享受的；叫花匠每个月送几回盆景来也不行，因为时间太短促，你不能读遍一种植物的生活史；自己动手弄盆栽当然比较好，可是植物入了盆犹如鸟进了笼，无论如何总显得拘束，滞钝，跟原来不一样。推究到底，只有把植物种在泥地里最好。可是哪来泥地呢？弄堂房子的天井里有的是坚硬的水门汀！

把水门汀去掉；我时时这样想，并且告诉别人。关切我的人就提出了驳议。有两说：又不是自己的房产，给点缀花木犯不着，这是一说；谁知道这所房子住多少日子，何必种了花木让别人看，这是又一说。前者着眼在经济；后者只怕徒劳而得不到报酬。这种见识虽然不能叫我信服，可是究属好意；我对他们都致了谢。然而也并没有立刻动手。直到三年前的冬季，才真个把天井里的水门汀的两边凿去，只留当中一道，作为通路。水门汀下面满是砖砾，烦一个工人用了独轮车替我运出去。他就从不很近的田野里载回来泥土，倒在凿开的地方。来回四五趟，泥土与留着的水门汀平了。于是我买一些植物来种下，计蔷薇两棵，紫藤两棵，红梅一棵，芍药根一个。蔷薇跟紫藤都落了叶，但是生着叶柄的处所，萌芽的小粒已经透出来了；红梅满缀着花蕾，有几个已经展开了一两瓣；芍药根生着嫩红的新芽，像一个个笔尖，尤其可爱。我希望它们发育得壮健些，特地从江湾买来一片豆饼，融化了，分配在各棵的根旁边；又听说芍药更需要肥料，先在安根处所的下边埋了一条猪的大肠。

不到两个月，“一二八”战役起来了。停战以后，我回去捡残余的东西。天井完全给碎砖断板掩没了。只红梅的几条

枝条伸出来，还留着几个干枯的花萼；新叶全不见，大概是没命了。当时心里充满着种种的忿恨，一瞥过后，就不再想到花呀草呀的事。后来回想起来，才觉得这回的种植真是多此一举。既没有点缀人家的房产，也没有让别人看到什么，除了那棵红梅总算看见它半开以外，一点儿效果都没有得到，这才是确切的"犯不着"。然而当初提出驳议的人并不曾想到这一层。

去年秋季，我又搬家了。经朋友指点，来看这所房子，才进里门，我就中了意，因为每所房子的天井都留着泥地，再不用你费事，只一条过路涂的水门汀。搬了进来之后，我就打算种点儿东西。一个卖花的由朋友介绍过来了。我说要一棵垂柳，大约齐楼上的栏干那么高。他说有，下礼拜早上送来。到了那礼拜天，一家人似乎有一位客人将要到来，都起得很早。但是，报纸送来了，到小菜场去买菜的回来了，垂柳却没有消息。那卖花的"放生"了吧，不免感到失望。忽然，"树来了！树来了！"在弄堂里赛跑的孩子叫将起来。三个人扛着一棵绿叶蓬蓬的树，到门首停下；不待竖直，就认知这是柳树而并不是垂柳。为什么不送一棵垂柳来呢？种活来得难哩，价钱贵得多哩，他们说出好些理由。不垂又有什么关系，具有生意跟韵致是一样的。就叫他们给我种在门侧；正是齐楼上的栏干那么高。问多少价钱，两块四，我照给了。人家都说太贵，若在乡下，这样一棵柳树值不到两毛钱。我可不这么想。三个人的劳力，从江湾跑了十多里路来到我这里，并且带来一棵绿叶蓬蓬的柳树，还不值这点儿钱吗？就是普通的商品，譬如四毛钱买一双袜子，一块钱买三罐香烟，如

果撇开了资本吸收利润这一点来说，付出的代价跟取得的享受总有些抵不过似的，因为每样物品都是最可贵的劳力的化身，而付出的代价怎样来的，未必每个人没有问题。

柳树离开了土地一些时，种下去过了三四天，叶子转黄，都软软地倒垂了；但枝条还是绿的。半个月后就是小春天气，接连十几天的暖和，枝条上透出许多嫩芽来；这尤其叫人放心。现在吹过了几阵西风，节令已交小寒，这些嫩芽枯萎了。然而清明时节必将有一树新绿是无疑的。到了夏天，繁密的柳叶正好代替凉棚，遮护这小小的天井：那又合于家庭经济原理了。

柳树以外我又在天井里种了一棵夹竹桃，一棵绿梅，一条紫藤，一丛蔷薇，一个芍药根，以及叫不出名字来的两棵灌木；又有一棵小刺柏，是从前住在这里的人家留下来的。天井小，而我偏贪多；这几种东西长大起来，必然彼此都不舒服。我说笑话，我安排下一个“物竞”的场所，任它们去争取“天择”吧。那棵绿梅花蕾很多，明后天有两三朵要开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发表

几种赠品

两个月前，接到厦门寄来一封信。拆开来看，是不相识的广洽和尚写的；附带赠给我一张弘一法师最近的相片。信上说我曾经写过那篇《两法师》，一定乐于得到弘一法师的相片。料知人家欢喜什么，就让人家享有那种欢喜，遥远的阻隔不管，彼此还没相识也不管！这种情谊是非常可感的。我立刻写信回答广洽和尚；说是谢，太浮俗了，我表示了永远感激的意思。

相片是六寸的，并非“艺术照相”，布局也平常，跟身旁放着茶几，茶几上供着花盆茶盅的那些相片差不多。寺院的石墙作为背景，正受阳光，显得很亮；靠左一个石库门，门开着，画面就有了乌黑的长方形。地上铺着石板，平，干净。近墙种一棵树，比石库门高一点儿，平行脉叶很阔大，不知道是什么；根旁用低低的石栏围成四方形，栏内透出些兰草似的东西。一张半桌放在树前面，铺着桌布；陈设的是两叠经典，一个装着画佛的镜框子，还有一个花瓶，瓶里插着菊科的小花。这真所谓一副拍照的架子；依弘一法师的艺术眼光看来，也许会嫌得太呆板了。然而他对不论什么都欢喜满足，人家给他这样布置了请他坐下来的时候，他大概连连地说“好的，好的”吧。他端坐在半桌的左边，披着袈裟，摺痕很明显，右手露出在袖外，掐着佛珠；脚上还是穿着行脚僧

的那种布缕组成的鞋。他现在不留胡须了，嘴略微右歪，眼睛细小，两条眉毛距离得很远；比较前几年，他显得老了，可是他的微笑里透露出更多的慈祥。相片上题着十个字：“甲戌九月居晋水兰若造”，是他的亲笔；照相师给印在前方垂下来的桌布上，颇难看。然而，我想，他看见的时候，大概也是连连地说“好的，好的”吧。

收到了照片以后不多几天，弘一法师托人带来两个瓷碟子，送给丏尊先生跟我。郑重地封裹着，一张纸里面又是一张纸；纸面写上嘱咐的话，请带来的人不要重压。贴着碟子有个字条子：“泉州土产瓷碟二个，绘画美丽，堪与和兰瓷媲美，以奉丏尊圣陶二居士清赏。一音”书法极随便，不像他写经语佛号的字幅那样谨严，然而没有一笔败笔，通体秀美可爱。

瓷碟子的直径大约三寸，土质并不怎样好，涂上了釉，白里泛点儿青，跟上海缸甏店里出卖的最便宜的碗碟差不多。中心画着折枝；三簇叶子像竹叶，另外几簇却又像蔷薇；花三朵，都只有阔大的五六瓣，说不来像什么；一只鸟把半朵花掩没了，全身轮廓作半月形，翅膀跟脚都没有画。叶子着的淡绿；花跟鸟头，淡赭；鸟身和鸟眼是几乎辨不清的淡黄。从笔姿跟着色看，很像小学生的美术课成绩。和兰瓷是怎样的，我没有见过；只觉得这碟子比那些金边的画着工细的山水人物的可爱。可爱在哪里，贪图省力的回答自然只消说“古拙”二字；要说得精到些，恐怕还有旁的道理呢。

前面说起照片，现在再来记述一张照片。贺昌群先生游罢华山，寄给我一张十二寸的放大片。前几年他在上海，亲手照的相我见过好些，这一张该是他的“得意之作”了。

这一张是直幅，左边峭壁，右边白云，把画面斜分成两半。一条栈道从左下角伸出来，那是在山壁上凿成的仅能通过一个人的窄路；靠右歪斜地立着木栏干，有几个人扶着木栏干向上走。路一转往左，就只见深黑的一道裂缝；直到将近左上角，给略微突出的石壁遮没了。后面的石壁有三四处极大的凹陷，都深黑，使人想那些也许是古怪的洞穴。所有的石壁完全赤裸裸的，只后面的石壁的上部挺立着一丛柏树：枝条横生，疏疏落落地点缀着细叶，类似“国画”的笔法。右边半幅白云微微显出浓淡；右上角还有两搭极淡的山顶，这就不嫌寂寞，勾引人悠远的想象。——这里叫做长空栈，是华山有名的险峻处所。

最近接到金叶女士封寄的两颗红豆。附信大意说，家乡寄来一些红豆，同学看见了，一抢而光。这两颗还是偷偷地藏起来的，因为好玩，就寄给我。过一些时，还要变得鲜艳呢。从小读“红豆生南国”的诗，就知道“红豆”这个名称，可是没有见过实物。现在金叶女士使我长些见识，自然欢喜。

红豆作扁荷包形，跟大豆蚕豆绝不相像。皮硃红色，光泽；每面有不规则形的几搭略微显得淡些。一条洁白的脐生在荷包开口的部分，像小孩的指甲。红豆向来被称为树，而有这生在荚内的果实，大概是紫藤一般的藤本。豆粒很坚硬，听说可以久藏。如果拿来镶戒指，倒是别有意趣的。

这里记述了近来得到的几种赠品。比起名画跟古董来，这些东西尤其可贵，因为这些东西浸渍着深厚的情谊。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发表

原题为《最近得到的几种赠品》

过　节

逢到节令，我们遵照老例祭祖先。苏州人把祭祖先特称为"过节"，别地方人买一些酒菜，大家在节日吃喝一顿，叫做"过节"，苏州人对于这两个字似乎没有这样用法。

过节以前，母亲早已把纸锭摺好了。纸锭的原料是锡箔，是绍兴地方的特产。前几年我到绍兴，在一个土山上小立，只听得密集的市屋间传出达达的声音，互相应答，就是在那里打锡箔。

我家过节共有三桌。上海弄堂房子地位狭窄，三桌没法同时祭，只得先来两桌，再来一桌。方桌子仅有一只，只得用小圆桌凑数。本来是三面设坐位的，因为椅子不够，就改为只设一面。杯筷碗碟拿不出整齐的全套，就取杂色的来应用。蜡盏弯了头。香炉里香灰都没有，只好把三支香搁在炉口就算。总之，一切都马虎得很。好在母亲并不拘于成规，对于这一切马虎不曾表示过不满。但是我知道，如果就此废止过节，一定会引起她的不快。所以我从没有说起废止过节。

供了香，斟了酒，接着就是拜跪。平时太少运动了，才过四十岁，膝关节已经硬化，跪下去只觉得僵僵的，此外别无所思。在满坐的祖先中间，记忆得最真切的是父亲与叔父，因为他们过世最后。但是我不能想象他们与十几位祖先挤坐

在两把椅子上举杯喝酒举筷吃菜的情状。又有一个十一岁上过世的妹妹，今年该三十八了，母亲每次给她特设一盘水果，我也不能想象她剥桔皮吐桃核的情状。

从前父亲叔父在日，他们的拜跪就不相同。容貌显得很肃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像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所谓“祭如在”，“临事而敬”，他们是从小就成为习惯了的。新教育的推行与时代的转变把古传的精灵信仰打破，把儒家的报本返始的观念看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于是“如在”既“如”不起来，“临事”自不能装模作样地虚“敬”，只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例行故事：这原是必然的。

几个孩子有时跟着我拜，有时说不高兴拜，也就让他们去。焚化纸锭却是他们欢喜干的事，在一个搪瓷面盆里慢慢地把纸锭加进去，看它们给火焰吞食，一会儿变成白色的灰烬，仿佛有冬天拨弄炭火盆那种情味。孩子们所知道的过节，第一自然是吃饭时有较好较多的菜；第二，这是家庭里的特种游戏，一年内总得表演几回的。至于祖先会扶老携幼到来，分着左昭右穆坐定，吃喝一顿之后，又带着钱钞回去：这在孩子是没法想象的，好比我不能想象父亲叔父会到来参加这家族的宴飨一样。从这一点想，虽然逢时过节，对于孩子大概不至于有害吧。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发表

路

有人来谈话，听见两件关于长途汽车路的事，并不重大，可是值得记下来。

乡下人牵了牛在新筑成的长途汽车路上走过，路松，牛身重，一步一个蹄印。走不多远，给路局或者公司里的人看见了，一把拉住，脸色很不好看。责骂的言语可想而知，无非“为什么把好好的新路踹坏了”之类。乡下人情慌着急，可是也有他的说嘴。他说筑这条路他也有份，大包小包，工钱那么少，路怎能不“搭浆”？“搭浆”的路给老畜牲走过总得有蹄印，不相信，去看田岸就有数。路局或者公司里的人没有心思听乡下人噜噜嗦嗦的声辩，只说弄坏了东西就得赔偿，眼前不用说别的，数数蹄印好了，一个蹄印四毛钱。乡下人有没有还价可不清楚，总之他一壁嘀咕着“自己筑的路自己走不得”，一壁赔了钱了事。当然，再往前走他决不敢走那看来好像坦坦荡荡的公共汽车路了。

还有一个乡下人，他田里的水路给公共汽车路挡住了。不知道他为什么早一点不说，大概是说也没有人听他的吧。但是田里的干渴实在耐不住，几天不下雨，眼见得稻秆都垂头丧气快要没命了，他终于硬着头皮去对路局或者公司里的人说。路局或者公司里的人的回答倒很中听，说：“这很容易，

只要在路底下通几节水泥管子就成。”乡下人千恩万谢地说，“那么，赶快给我通几节水泥管子吧。”路局或者公司里的人算了一算，说，“几节水泥管子该三十多块钱，我们可以给你代办。埋管子可要你自己来，我们的工人没有工夫。”乡下人有没有照办也不清楚，推想起来，他除非让田里的稻活活地渴死，不然，他只有借了债合了“会”或者当了当头来照办这一条路。

金焰主演的影片《大路》里有个雄壮的合唱：

大家一齐流血汗。
为了活命，那管日晒筋骨酸。
合力拉绳莫偷懒，
团结一心，不怕铁滚重如山。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向前！
压平路上的崎岖，辗碎前面的艰难。
我们好比上火线，
没有退后只向前！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

小孩子小女儿听得高兴，唱唱也满有精神，你也唱，我也唱，这个歌就成为家喻户晓的了。为着生活奋斗，大家团结起来，许多的心就像一颗心，许多力量合成一股力量，只有向前，没

有后退，向前面望，好比十层宝塔造到七八层，“自由大路快筑完”了，一种欢喜的心情自然流露出来，“日晒筋骨酸”都不管，“铁滚重如山”也不怕，流吧，流吧，流些血汗算得了什么。这并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境界，世界上已经有过先例。要开拓新生活，共同享受，实在是非这样“大家努力”拼命硬干不可的。可是所谓“大家”里头，如果有这么一个两个，在那里顾虑着将来牵了牛在大路上走还得赔钱，或者担心着自己田里的水路给大路挡住了，这样的歌恐怕就会唱不出来吧。我不知道除了《大路》影片以外，实际上有哪一批筑路队伍唱过这样的歌。

从前沪宁铁路动手测量的时候，我家有一座老坟被划在路线里头，必须迁移。既然找不到力量大的人写信请托，当然只得遵命。我父亲在觅地迁葬种种麻烦中间，不免连声叹气，埋怨那累人的铁路。依我们现在说，坟墓让铁路正是应该之至的事。一家人家占有几座坟墓，把地力白白地浪费，又把山林田野弄得非常难看，这算什么呢？据说从明年起，再不许私家建筑坟墓了，各地方都得有公墓，人死了就葬在公墓里。如果认真地办，这不能不说是内政上值得赞美的一桩。可是，牵了牛总得走路，田里干了总得灌水，现在想想，那是当然的，就是到将来，也不至于说“这算得了什么”吧。所以，筑了公共汽车路就不许牵了牛走过，又把田里的水路挡住，这并不能同兴筑铁路叫人家迁移坟墓相比，总之是该受非议的事，何况给人家的麻烦还有比这些更重大的。那么，横一条竖一条的岂但不是什么“自由大路”，简直可以说是束缚人家的铁链。

有一个肥头胖耳的自备黑牌汽车的朋友告诉我说：现在开了一辆汽车，从哪里到哪里，又从哪里到哪里，差不多可以游历半个中国，从前人断没有这种福气，但看徐霞客，他的游历多么困难。我点点头，心里想，现在人又有几个有这种福气。我们要有各种的路——铁路，航路，汽车路，飞行路，这是天经地义。但是必须能使人人说一声“从前人断没有这种福气”，那些路才真个是所谓“自由大路”。唯有建筑这样的路的时候，合伙工作的一群人才会真心诚意地唱出“大家一齐流血汗”的歌来。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发表

胡适先生的幻想

在上月十二日的《大公报》上，载有胡适先生的一篇《星期论文》，题目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总标题之下，又附有一个副标题：《告日本国民》。以前胡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敬告日本国民》，刊在《大公报》和《独立评论》，后来胡先生又和日本学者室伏高信有过两篇通信，讲到中日间的关系。从那时到现在，胡先生对于中日关系的观察有几个特点：一、胡先生认为中日间积有仇恨，这不是东亚之福，所以竭力希望解除这种仇恨；二、胡先生认为这种仇恨的解除，应当诉之于"日本国民"的觉悟；三、胡先生认为中日国民只要觉悟相互间的仇恨不是东亚之福，就可以据此而求得两国关系的"调整"；四、胡先生以为调整中日关系的方法是双方的让步。

上面的四点是根据胡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和主张归纳出来的。粗看起来，这四点或者都近情；但是仔细加以考察，可知其中包含着不少空虚的和错误的幻想。为了目前我们民族的危机严重万分，大家需要以正确的认识来指示行动，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幻想加以纠正，使青年诸君不致误入迷途。

我们试就上面的四点来加以分析。第一，所谓中日间的仇恨，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要说明中日间的关系，只

是一方面的侵略和另一方面的被侵略。日本帝国主义所需要的是征服中国，不是仇恨；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是抗敌求生，也不是仇恨：所以说到“仇恨”，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察。

第二，希望中日两国“国民”解除这种“仇恨”，却是陷于更大的错误。侵略中国的不是日本的全体“国民”，而是握有日本政权的野心统治者。固然，日本国民也有不少给他们统治者的侵略狂所迷惑的；但我们确信有许多日本国民一定不赞成对华的侵略，反而是同情于中国的民众的。不认清侵略中国的究竟是什么人，却贸然把这罪责完全加在“日本国民”身上，当然是不对的。

第三，说到“调整”，胡先生似乎幻想日本政府发言人所提出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口号，确有什么方法可以行得通的。这幻想的错误，是在于没有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机构；没有认清帝国主义的机构，当然更不知道帝国主义的“生命线”乃是一贯的向外侵略。侵略者所喊着的“调整”，乃是侵略者的一种方式而已；假若我国幻想被侵略者和侵略者的关系是可以“调整”的，不是自投罗网去送死吗？

第四，是关于调整的方式了。胡先生以为调整的方式是双方的让步，于是他提出了下列七点：

一、废止《塘沽协定》，取消非战地域；

二、宣告所谓《何应钦梅津协定》无效；

三、日本政府自动放弃《辛丑（一九一零）和约》及其附带文件所规定的平津铁路地带驻兵的权利；日本大使馆迁往南京之后，所有驻屯关内的军队一

律撤退回国，以为《辛丑和约》其他签字国的首倡；

四、宣告去年六月的《察东协定》的无效，撤退察哈尔境内的“满洲国”军队；

五、禁止华北各省及福建境内一切伪自治的活动；

六、日本政府自动的取消中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以为欧美各国的首倡；

七、统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两国正式外交全权代表所签订的文件完全无效。

上列七点是胡先生以为日本应让步的地方；至于中国应让步的地方呢？他没有说出，但从这七点所包括的范围去研究，可以知道他所假定要中国让步的，是东北四省的永远放弃！胡先生的幻想是勇敢的！然而，我们且不要说东北四省的数千万同胞应否这样被判定做他人的奴隶，只要看上面的七点决不会有一点能教侵略者接受，就可知道这种提议完全是幻想。从狮子口中夺食是可能的吗？侵略者现在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所进行的阴谋，会有自动中止以至取消的希望吗？不会，绝对不会！这是现在小学生也都想得到的事，而无端的幻想却把胡先生这点浅近的理解都蒙蔽了，不是太可笑吗！

在万分严重的民族危机中，我们必须辟除这种可笑的错误的幻想；而切实地认定：要救亡图存，只有抵抗侵略。从狮子口中夺食是不可能的；要把狮子制服，我们才能免于被狮子吞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发表

记游洞庭西山

四月二十三日，我从上海回苏州，王剑三兄要到苏州玩儿，和我同走。苏州实在很少可以玩儿的地方，有些地方他前一回到苏州已经去过了，我只陪他看了可园，沧浪亭，文庙，植园以及顾家的怡园，又在吴苑吃了茶，因为他要尝尝苏州的趣味。二十五日，我们就离开苏州，往太湖中的洞庭西山。

洞庭西山周围一百二十里，山峰重叠。我们的目的地是南面沿湖的石公山。最近看到报上的广告，石公山开了旅馆，我们才决定到那里去。如果没有旅馆，又没有住在山上的熟人，那就食宿都成问题，洞庭西山是去不成的。

上午八点，我们出胥门，到苏福路长途汽车站候车。苏福路从苏州到光福，是商办的，现在还没有全线通车，只能到木渎。八点三刻，汽车到站，开行半点钟就到了木渎，票价两毛。经过了市街，开往洞庭东山的裕商小汽轮正将开行，我们买西山镇夏乡的票，每张五毛。轮行半点钟出胥口，进太湖。以前在无锡鼋头渚，在邓尉还元阁，只是望望太湖罢了，现在可亲身在太湖的波面，左右看望，混黄的湖波似乎尽量在那里涨起来，远处水接着天，间或界着一线的远岸或是断断续续的远树。晴光照着远近的岛屿，淡蓝，深翠，嫩

绿，色彩不一，眼界中就不觉得单调，寂寞。

十二点一刻到达西山镇夏乡，我们跟着一批西山人登岸。这里有码头，不像先前经过的站头，登岸得用船摆渡。码头上有人力车，我们不认识去石公山的路，就坐上人力车，每辆六毛。和车夫闲谈，才知道西山只有十辆人力车，一般人往来难得坐的。车在山径中前进，两旁尽是桑树茶树和果木，满眼的苍翠，不常遇见行人，真像到了世外。果木是柿、橘、梅、杨梅、枇杷。梅花开的时候，这里该比邓尉还要出色。杨梅干枝高大，屈伸有姿态，最多画意。下了几回车，翻过了几座不很高的岭，路就围在山腰间，我们差不多可以抚摩左边山坡上那些树木的顶枝。树木以外就是湖面，行到枝叶茂密的地方，湖面给遮没了，但是一会儿又露出来了。

十二点三刻，我们到了石公饭店。这是节烈祠的房子，五间带厢房，我们选定靠西的一间地板房，有三张床铺，价两元。节烈祠供奉全西山的节烈妇女，门前一座很大的石牌坊，密密麻麻刻着她们的姓氏。隔壁石公寺，石公山归该寺管领。除开一祠一寺，石公山再没有房屋，惟有树木和山石而已。这里的山石特别玲珑，从前人有评石三字诀叫做"皱，瘦，透"，用来品评这里的山石，大部分可以适用。人家园林中有了几块太湖石，游人就徘徊不忍去，这里却满山的太湖石，而且是生着根的，而且有高和宽都达几十丈的，真可以称大观了。

饭店里只有我们两个客，饭菜没有预备，仅能做一碗开阳蛋汤。一会儿茶房高兴地跑来说，从渔人手里买到了一尾鲫鱼，而且晚饭的菜也有了，一小篮活虾，一尾很大的鲫鱼。

问可有酒，有的，本山自制，也叫竹叶青。打一斤来尝尝，味道很清，只嫌薄些。

吃罢午饭，我们出饭店，向左边走，大约百步，到夕光洞。洞中有倒挂的大石，俗名倒挂塔。洞左右壁上刻着明朝人王鏊所写的寿字，笔力雄健。再走百多步，石壁绵延很宽广，题着"联云幛"三个篆字。高头又有"缥缈云联"四字，清道光间人罗绮的手笔。从这里向下到岸滩，大石平铺，湖波激荡，发出汩汩的声音。对面青青的一带是洞庭东山，看来似乎不很远，但是相距十八里呢。这里叫做明月湾，月明的时候来这里坐坐，确是不错。我们照了相，回到山上，从所谓一线天的裂缝中爬到山顶。转向南往下走，到来鹤亭。下望节烈祠和石公寺的房屋，整齐，小巧，好像展览会中的建筑模型。再往下有翠屏轩。出石公寺向右，经过节烈祠门首，到归云洞。洞中供奉山石雕成的观音像，比人高两尺光景，气度很不坏，可惜装了金，看不出雕凿的手法。石公全山面积一百八十多亩，高七十多丈，不过一座小山罢了，可是山石好，树木多，就见得丘壑幽深，引人入胜。

回饭店休息了一会儿，我们雇一条渔船，看石公南岸的滩面。滩石下面都有空隙，波涛冲进去，作鸿洞的声响，大约和石钟山同一道理。渔人问还想到哪里去，我们指着南面的三山说，如果来得及回来，我们想到那边去。渔人于是张起风帆来。横风，船身向右侧，船舷下水声哗哗哗。不到四十分钟，就到了三山的岸滩。那里很少大石，全是磨洗得没了棱角的碎石片。据说山上很有些殷实的人家，他们备有枪械自卫，子弹埋在岸滩的芦苇丛中，临时取用，只他们自己

有数。我们因为时光已晚，来不及到乡村里去，只在岸滩照了几张照片，就迎着落日回船。一个带着三弦的算命先生要往西山去，请求附载，我们答应了。这时候太阳已近地平线，黄水染上淡红，使人起苍茫之感。湖面渐渐升起烟雾，风力比先前有劲，也是横风，船身向左侧，船舷下水声哗哗哗，更见爽利。渔人没事，请算命先生给他的两个男孩子算命。听说两个都生了根，大的一个还有贵人星助命，渔人夫妻两个安慰地笑了。船到石公山，天已全黑。坐船共三小时，付钱一块二毛。饭店里特地为我们点了汽油灯，喝竹叶青，吃鲫鱼和虾仁，还有咸芥菜，味道和白马湖出品不相上下。九时息灯就寝。听湖上波涛声，好似风过松林，不久就入梦。

二十六日早上六时起身。东南风很大，出门望湖面，皱而暗，随处涌起白浪花。吃过早餐，昨天约定的人力车来了，就离开饭店，食宿小帐共计六块多钱。沿昨天来此的原路，我们向镇夏乡而去。淡淡的阳光渐渐透出来，风吹树木，满眼是舞动的新绿。路旁遇见采茶妇女，身上各挂一只篾篓，满盛采来的茶芽。据说这是今年第二回采摘，一年里头，不过采摘四五回罢了。在镇夏乡寄了信，走不多路，到林屋洞，洞口题“天下第九洞天”六个大字。据说这个洞像房屋那样有三进，第一进人可以直立，第二三进比较低，须得曲身而行。再往里去，直通到湖广。凡有山洞处，往往有类似的传说，当然不足凭信。再走四五里，到成金煤矿，遇见一个姓周的工头，峄县人，和剑三是大同乡，承他告诉我们煤矿的大概。这煤矿本来用土法开采，所出烟煤质地很好，运到近处去销售，每吨价六七块钱，比远来的煤便宜得多。现在这个矿归利民

矿业公司经营，占地一万七千亩。目前正在开凿两口井，一口深十七丈，又一口深三十丈，彼此相通。一个月以后开凿成功，就可以用机器采煤了。他又说，西山上除开这里，矿产还很多呢。他四十三岁，和我同年，跑过许多地方，干了二十来年的煤矿，没上过矿业学校，全凭实际得来的经验。谈吐很爽直，见剑三是同乡，殷勤的情意流露在眉目间。剑三给他照了个相，让他站在他亲自开凿的井旁边。回到镇夏乡正十一点。付人力车价，每辆一块二毛半。在面馆吃了面，买了本山的碧螺春茶叶，上小茶楼喝了两杯茶，向附近的山径散步了一会儿，这才挨到午后两点半。裕商小汽轮靠着码头，我们冒着狂风钻进舱里，行到湖心，颠簸摇荡，仿佛在海洋里。全船的客人不由得闭目垂头，现出困乏的神态。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发表

勒令转学

勒令转学的办法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现在很通行，并且酿成了自杀案。在从前，学校觉得某一个学生不行，不堪造就，干脆把他斥退了事。他还念不念书，他有没有地方念书，一概不管。勒令转学的办法可不然，似乎很为家长所花的资本和学生的学业打算，只叫你转个学罢了，读了一学期一年级的还是进一年级，读完了一年级的照例升二年级，你一点儿不吃亏。这办法又似乎很顾全学生的面子，拿了一张转学证书，跑进另外一个学校，注册，缴费，你照样当你的学生，从前种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然而教育者的昏庸卑劣，就在这办法上显露得非常明白。假定学生的不行是真的不行，教育者自问无能为力了，只得推出去完事，这无异宣告他们对于教育事业完全不能胜任。教育事业是应该锲而不舍的，无论怎样不行的材质，总得不放手地加功夫上去。何况现在那些被勒令转学的学生并非真的不行，不过多点儿血气，怀着一腔忧愤，参加了所谓救国运动，如是而已。这样的学生，即使作事不怎么周妥，总该得到教育者的同情，因为教育者跟他们生在同时同地，他们所感到的，教育者决不会全无所感。可是事实上不然，教育者认为这样的学生不行，摆出一副不屑教诲的面孔，把他们推了出去。不知道教育者将自居于

何等样人！再说勒令转学的办法，跟县官遣送难民出境，上海巡捕房把叫化子逐出租界，是一脉相承的手段，留在自己的地方讨厌，赶了出去，让别地方受累，做起“报销”来，就可以说境内没有难民和叫化子。你看，这多么省事！尤其妙的是虽然勒令学生转学，而别的学校未必真会受累。学校之间不妨成立一种默契，对于转学的学生尽可以拒而不纳。学额已经满哩，还得经过一度考试哩，话头有的是，和颜悦色地用这些话答复转学的学生，就达到了不纳的目的。于是一边把讨厌东西驱逐出境了，一边并没有把将使自己受累的东西收留进来，彼此天下太平。而发转学证书这方面的教育者，当吩咐学生转学的时候，大概还堆着一脸“德色”，其意若曰：“你干得好事，可是我绝不难为你，好好儿转学去吧，你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吃亏。”实际呢，还是斥退，不仅是一个学校斥退，竟是所有学校都对转学的学生关起门来。没有斥退之名，而有斥退之实，教育者的心计工巧到这般地步，或许是教育界的一大进步吧。然而，从爽直的人想来，还是从前干脆斥退的办法值得称许。那个办法丝毫不扭捏，老老实实摆起蛮不讲理的面孔，“我不要你，滚你的！”开门见山，没有那种鬼祟尖刻的小家气。

教育者决不该跟学生对立，一对立就没有教育可言。现在大家在那里倡导，各色各样的人在民族解放的大目标之下联合起来。教育者跟学生，论关系是再密切没有了，论情谊又不亚于家人父子，应该最先联合起来。不幸事实上并非如此，双方往往形成对立的形势，不是消极地甲方不管乙方，就是积极地甲方压迫乙方。学生除了读书而外，还管一点儿

旁的事，使教育者增加许多麻烦，如军警来搜查学校之类，原是有的。但是教育者不能为了怕麻烦，不问是非曲直，也跟学生对立起来，只想把自己认为引起麻烦的学生推出去了事。至于说学生的某种举动有旁的动机哩，某种举动有党派作用哩，因而下断语说一概要不得，非取缔不可，这种钻到隐微渺茫处所去的看法，实在有失教育者坦白为怀的态度。章太炎打给宋哲元的电报说："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日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教育者吃了公众的饭，担负着教育的责任，什么事情不好想，却偏要在这等地方枉费心机，真该听听章太炎"对此务宜坦怀"的教训呢。当然，教育者也不是"心如槁木死灰"的人物，只因多吃了几年饭，懂得盘算个人的利害得失，以为学生干的只是胡闹，徒然吃亏，完全无济于事，由看不起而转成厌恶，由厌恶而转成对立，往往有之。依他们的意思，最好是学生什么都不闻不问，姑且关在学校里读死书。学校以外呢，一切人也装得若无其事，讨饭的讨他的饭，跳舞的跳他的舞。直到那么一年的那么一天，准保胜利的一切预备功夫都做得很好了，然后轰轰轰放起三声民族解放的礼炮，然后大家放下手头的私务，一齐来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那样的境界想想固然有趣，可惜只能想想而已，其难以实现正像一个虚幻的梦。学生不能关在学校里读死书，并非他们跟书有什么仇恨，实在时势太严酷，时时刻刻在学生的耳朵旁边警告，酷爱生活的学生还关得住吗？教育者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还只是勒令一部分学生转学，到最近的将来势必至于勒令全体学生转学。到了每个学校勒

令全体学生转学的时候，教育者大概要快慰地笑一笑吧，因为那时候学校再没有学生了，再不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加到他们肩膀上来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发表

报 销 主 义

一个县官上任不到几天，接到上峰的一道通令，要他调查县境内露天茅厕共有多少，又要他拟具撤除和改良的计划，理由是“以重公众卫生”之类。呈报的限期很短促，这公文大概又在缮写员和收发处那里耽搁了一些日子，送到这个县官手里，算来只有两天工夫了。

这真叫县官上了心事。两天以内，要把全县的露天茅厕调查清楚，就是县公署内全体动员，连厨房茶房都跑出去，也办不了。何况还要拟具撤除和改良的计划。你要因地制宜，处置得当，在一所茅厕旁边不就要消磨好几个钟头吗？

初不料办理县政有这么些麻烦，连茅厕也得过问一下，这个县官不免现出颓唐的神色，同时还说一些“怎么办得了”的怨苦话。

旁边一个第几科科长看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县官的慌张情形不由得要笑出来。看见这样一道通令就要说“怎么办得了”，接到了“限期剿匪”“催缴赋税”的公文，不将惊骇得发神经病吗？然而县官到底是他的东家，笑出来当然不好意思，看东家唉声叹气也不是事，“公事”总得要“办”了才行，这个科长就告诉县官这件“公事”应该怎么“办”。

依科长的办法，不要说县公署全体动员，简直连一个调

查员都不用派遣。县境内共有多少乡镇，是早就有数的，不待调查。每个乡镇假定它有多少露天茅厕，这不是只消念头一转就可以解决的吗？而且未必见得“不科学”，科学研究也往往利用假定呢。把假定数和乡镇数乘一乘，茅厕的总数就出来了。计划呢？“想当然”也就可以对付。勒令乡镇长撤除若干所，其不便撤除者，应由业主加以整理，以合于卫生为度：这不是个像模像样的计划吗？即使真个站到茅厕旁边斟酌上大半天，想出来的计划也不过如此而已。

第二天，呈报的公文立即发出，比限期超前了一天。关于这件事，以后再没有下文。公文大概由上级机关归了档，保存起来了。

以上并非说笑话，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县官以后的官运如何，不得而知。揣想起来，他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一定懂得“公事”应该怎么“办”，当他接到上峰无论什么命令的时候，该不至于再说“怎么办得了”了吧。

行政不能不用公文。不用公文，一些公务人员就得时时刻刻跑来跑去，关照这一件，报告那一件，多么麻烦。虽说现在各地有了长途电话，不用跑来跑去同样可以关照和报告，可是电话不留痕迹，要留个凭据备他日稽考，还得用公文。不过公文并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乃是实际的事务。为了要办理事务，所以要发送公文。根据了公文，还得去考核事务有没有办，办得妥当不妥当。一般行政界却把这一个浅显不过的道理忘了，竟让公文跟事务脱离关系，收发和归档就是一切，此外再没有别的事，好像“行政”和“办公文”只是同一意义的两个说法而已。那科长就是这样想的，所以他的办法

索性一件事都不去做，只要坐在衙门里发出一封呈报的公文就了事。这种办法，在没有行政经验的人看来，没有不觉得奇怪的。

有了收文簿发文簿，有了档卷，开起会来就有了报告的材料，“截至什么时候止，共收到公文多少件，发出公文多少件”。编起公报乃至年鉴等等东西来，同样可以取之不竭。办交代了，把这些东西交代下去，就是前任的政绩。后任来接手了，把这些东西接到手里，继续“办”下去。所谓行政就是“办”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全部行政的历史。

历史原是由人类造成的，但是靠的是人类实际的活动，并不靠纸面的文字。现在组织了一个报文的系统，大家专心致志，只在造成文字上的历史。你若问他们干了些什么，他们就抱了一大堆档卷向你报销，“我们干的全在这里了”，仿佛责任已尽，脸色十分泰然，却没有想到实际的历史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没有想到你所问的原来是实际的历史而不是文字上的历史。

我们再来看看教育界，似乎这种报销主义也非常流行，几乎成为一贯的信条。

先说学生。学校教学生念教科书，学生只管念，念了就完事。学校教学生抄各种笔记，学生只管抄，抄了就完事。其实教科书和笔记跟堪以应用的本领之间还有不少距离，读了教科书，抄了笔记，未必就有了堪以应用的本领，必须根据所读的所抄的，再从事事物物上去体察去磨练才行。现在读了抄了就完事，就学校说，固然可以报销过去了，就学生说，却没有多大好处。

再说学校。学校负着异常神圣的责任把学生接到手里，“养成健全的公民”哩，“陶冶完美的人格”哩，一大套。因为这些项目难以作明显的报销，学校就把它具体化了，让学生读教科书。仿佛正中的公民教科书，加上商务的国文教科书，加上中华的算学教科书……就等于健全的公民和完美的人格。这样，报销起来自然便当得多，读到末了一册的末了一页就是读完了，谁也不会弄不明白。又把学生考试一番，评定了分数或者等第，填上成绩报告书，这更是个真凭实据的报销。至于教科书的内容是否融化到学生的生活中去，分数等第跟真实的知识能力之间还隔着几重山水，这些都跟报销无涉，也就置之不问。

再说视学员。视学员跑到学校里，最注意的是学生足额不足额，表册完备不完备。学生不多和表册不完备往往是一个学校受到斥责的重大罪状。其实学生不来上学，没法到一家家去拉。表册挂满了所有的墙壁，其作用也可以仅等于几幅字画。那么为什么应该受到斥责呢？就斥责你的不懂得报销主义！学生照理要满多少额子，学校照理要造多少表册，你却不足数，怎么报销得过去？至于视学员自己，自然大都是报销主义的信徒。“某学校训练有方，可以嘉许，某学校教法欠妥，尚待改善，”这样写成了视学报告书，在公报上登过一下，原稿归到了档卷里去，他们就问心无愧，到会计处领他们的薪俸去了。

岂止教育界而已，报销主义好像肺痨病，蔓延得非常广泛普遍，几乎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一个团体组织起来了，章程通过，执行委员举出，以后就没事了：这样的经验差不多

大家都有。这除了向大众报销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团体以外，还有什么意义？——说是说不尽的，不想再说下去了。可是有一层，若要把一切事办好，总得丢开这种报销主义，即使不能丢得干干净净，也得把它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发表

时势教育着我们

民国元年，我初当小学教员，教的是二年级学生。大的十一二岁，小的七八岁，年龄虽然相差，识见却似乎没甚上下，都不出学校、里巷、家庭的范围。学校中最高的班次是四年级，学生有大到十六七岁的。踢球，赛跑，彼此为一些玩耍的事争闹，放了学成群结队到各处去玩，这些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他们不想到国内和世界各地随时发生一些新 事情，这些新事情直接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与他们的二年级同学一模一样。

现在可不同了。小学校中每天有时事报告，国内和世界各地发生的新事情随时汇集到小心灵里。偏僻的乡村小学，由于交通不便，大概还没有这种设施。但是都市中以及邻近都市的小学校差不多都有了。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小学生，亲戚朋友家里也有好些个。听听这班小学生的谈话，就觉得与二十多年前的小学生有绝不相同之处。他们除了功课和游戏之外，还关心到中国前途的命运，强敌的狠心和暴行，苏联的各项建设，西班牙的猛烈的内战，等等。在纯粹主张“儿童本位”的教育家看来，这该是个不值得赞许的现象，因为儿童自有儿童的天地，小心灵里不必要容纳这些事情。然而，无论如何，小学生识见的范围已经从学校、里巷、家庭扩大开

来了，这是不可否认的。

再说中学生。辛亥以前的中学生大多数没有看报的习惯。阅报室里散乱地摊着一两份报，大家抢着看的只是冷血和天灾的半翻译半创作的小说。有几个"维新"的教员取报上的论说作为国文教材，叫学生给加上句读，并且揣摩论说的声调。这只是把论说作为文章研究而已，对于论说的内容并不怎样措意，实际上与选读《汉高祖论》或《宋太祖论》差不多。多数学生见闻不出乡土，又受着古来一些诗文的影响，往往抱着"理乱不闻"的态度。他们觉得那些世事离开他们非常之远，仿佛隔着万水千山，而且未免尘俗，一个高雅的人是犯不着过问的。

现在可不同了。中学生关于功课方面的工作已经很繁重，温习哩，写笔记哩，作练习题哩，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全占去了。但是他们还要忙里抽暇，看一看当天的报，翻一翻新近收到的杂志。他们觉得功课只不过给他们一些目前还不很需要的知识，而世界转变成什么样了，每一转变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这些是他们急需知道的，偏偏不能从功课中知道。为满足这种需求，报和杂志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粮食"。虽然现在很有些人在那里嚷着说，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了，但那是指文言文的写作以及对所谓"国学"知识而言的，是另一回事。在一般常识方面，尤其在关心时事，了解世界大势方面，现在的中学生比二十多年前的中学生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别人如何，我不敢确切说定，自问中学生时代的我，在这些方面我决不如现在的中学生。

我们再可以看到学生界以外去。现在一些新书报很有销

路，除开那些纯粹娱乐性质的、大部分是涉及国际、政治、经济、文学、哲学等等方面的东西。看这些书报的不尽是"读书人"，也有不少店员和学徒。他们为店规厂规所拘，不能公然地看，只好把书报藏在抽斗里或是衣袋里，遇到适当的机会就偷偷地拿出来看这么一两页。你如果没事，站在一个贩卖书报的摊子旁边，就会看见好些人贪馋地翻看那些陈列品，好些人专程地跑来问"某某期刊到了没有？"他们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三四是店员或者学徒。这个现象好像没有什么希奇。但是，如果把这个现象告诉一个早已歇了手的店东或者厂主，他一定不相信。他知道店员学徒是看小唱本和《哈哈笑》之类的，至多也不过看看《岳传》《三国演义》。怎么会看起这些不相干的东西来呢？然而，现在的店员学徒竟把这些不相干的东西看作最亲密的伙伴了。

现在遇见一个电车卖票人，一个什么工厂的工人，或者一个工厂以外的手艺人，他也许识字不多，也许一个字也不识，但是听听他的谈吐，未必输于知识分子。他知道中国人吃亏在哪里，要不吃亏该走什么道路。当然，语言是直率而粗俗的，有时还要插入一两句谩骂。可是就意义说，"通人"的论文也不过如此，只是多了些学术的装饰和修辞的技巧而已。这不必追溯得很远，"五卅"以前的劳动者就不会这样。

再说农人，大家认为最落后的了。可是一受到启发，他们也就恍然。他们的生活正如一串的谜，自己没法解答，既然有一些给解答了，他们的信念就跟着萌发。"到农村去"的大学生差不多都有这样的经验：一番亲切详明的演讲之后，

一个老太婆或是一个小伙子也跳到板凳上说话了，虽然未必合于演说术，却能说出解悟以后的心愿，印入农村男女的心坎。这样的一幕是大学生得到的最大的报酬，为了这报酬，他们愿意常常“到农村去”。

二十多年前的儿童、少年、店员、学徒等等与一百二十多年前二百二十多年前的比较，大概没有什么两样。现在的儿童、少年、店员、学徒等等与二十多年前的比较，可大不相同了，识见的范围已经扩大得非常之广。第一，自己意识到是个中国人。第二，知道中国人与世界各地的人有关联。第三，相信中国人有与世界各地的人并存于世界的权利，这个权利绝对不容侵犯。第四第五当然还有，这里暂且不说吧。总之，这种解悟汇合成中国抬起头来的基本力量。

这样突跃的进步并不是个奇迹，也不是哪个大教育家做了倡导的工作，把大家引到这进步的路上去（至少在现代，我们没有什么大教育家）。是时势教育了我们，再像从前那样是不能生活下去了，于是我们钻头觅缝，努力追求，取得从前人所没有的识见，做一个与从前人大不相同的人。

我的话未免欠周遍，现在有些人还是停留在从前的模型里。然而，时势的转变越来越急，他们终于要直跳起来，一齐赶上进步的路，这是可以断言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一日发表

某商人的话

他圆脸上抹了一层灰色，喝了几口酒之后，才透着微红。

在以前，他的脸并不是这么圆圆的。颧颊突起，下巴尖像个小肉瘤，合起来看，脸的下半截成个三角形。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王道乐土”来不及编辑许多适应“王道”的书供学校应用，他的小本经纪居然做了点好生意。他向大书坊贩了好些“搁货”，就是不合于现行课程标准因而卖不出去的，到那边去供人家应急，两三年间赚了几千块钱。他的脸也渐渐地圆了起来，是到了中年生理上应有的转变呢，还是由于“财发”所以“身发”，当然没法断定。

然而现在，他圆脸上抹了一层灰色了。他的口气不再像以前那样乐天安命了。

“那边蛮好，规规矩矩做生意是一点没有什么的。”以前他常常说这样的话，使听到的人疑心那些惨酷的新闻是什么人在存心造谣。

他放下酒杯，把声音放得很低，仿佛邻座就坐着一个密探似的，感慨地说：“不行了，完全不行了，没有生意，天天贴开销。教科书由他们颁发下来，再没有我们的份了。凡是有中华民国字样的书都不能卖。你看，这碗饭怎么能吃下去？我

是决意收场了。蚀剩几个钱，还可以作回来的盘川。如果等到一个钱也不剩了，我知道，在那边讨饭比在上海当瘪三要困难万倍呢！”

他蹙紧眉头，眼光落在酒杯里，不开口了，大概在想象万一讨了饭以后的凄凉况味。一会儿，他又抬起头来喃喃地说：“照那边的情形看，三百六十行里头简直要剔出‘书生意’这一行。中国字的书要少读，不用说了。日本字的书总该叫大家多读些了吧。谁知道不然。学校里的学生只领到薄薄的几本书，随便读读也就算了。最吃重的是劳作和兵操。他们的想头真利害。他们知道无论什么文字都可以传达各自的心思，记载过往的历史，所以书越少读越好，最好使大家一个字都不识。开矿开工厂是需要劳力的，冲锋打仗尤其需要有人打头阵，所以劳作和兵操都要认真地教练。他们要的是赤心忠良的奴隶，他们的教育几乎用不着文字和书。

“说起赤心忠良的奴隶，我告诉你一个小故事。

“有一个老头子在教育界里当一份差使，位置并不低，平常的表现也很忠心。他的兄弟在欧洲，这回寄一封信回来，不免说了些不满现状的话。检查员看到这样的信，仔仔细细照原样封好，让邮差送去。这是试探那老头子的。那老头子要是真个忠心的话，看到这样的信，虽说是兄弟寄来的，也该公开检举。他们等了些日子，不见那老头子出来检举，就去搜查他的屋子。搜来搜去，没有那封信的踪影。原来那老头子恐怕惹祸，偷偷地把它烧掉了。这还了得，接到了意存反抗的信，非但不出来检举，还要把它毁尸灭迹，那么他的不忠心显然可知了。由于这个罪名，那老头子就送掉了老命。死法

很别致，不是枪毙，不是绞死，而是用什么方法毒打，听说尸体给打成了几段！”

“在那边，”他用拳头击桌子，说话声音转得响亮而有力，“一个人只有两条路可走，当赤心忠良的奴隶是一条路，当不顾一切的义勇军又是一条路。

“可是，像那个老头子，在他最后咽气的时候，大概还自以为是赤心忠良的，然而他免不了一死，并且死在不忠心的罪名上，可见奴隶的路实在不容易走。

“义勇军的袭击的确使他们穷于应付，‘清匪’‘治匪’成为他们最艰难的题目。然而义勇军的路也不是人人能够走的，胆子小，存着这样那样的顾虑，虽然在愤激的时候常常要说‘索性当义勇军去！’而结果还是耽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样的人究竟居多数。

“两条路都走不来的，也有他们的路，就是死路一条！譬如我，生意做不下去了，只好决意收场，我是走到死路的路口了。不过我还算好，此番去料理清楚之后，可以回南来再想办法。生根在那边的生意人可真不得了，生意支持不下去，动又动不得，只有等死的份儿。

“再说那边的农民，痛苦比生意人更厉害得多。告诉你，那边为了‘清匪’没有什么成效，现在施行一种‘集村’的办法。什么叫‘集村’呢？就是把散居在各处的农民搬到指定的地方去住，这样聚集起来，稽查和管束就便当得多。但是，农民的田地是搬不动的，离开了自己的田地又去耕种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一律不管，要你搬就得搬，不搬就是罪名。好在田地是不会荒废的，移民局正在那里招来大批的 移 民。

待移民达到预计的数量的时候，所有农民同胞就完全倒在死路上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发表

假　山

佩弦到苏州来，我陪他看了几个花园。花园都有假山，作为园子的主要部分。假山下大都是荷花池。亭台轩榭之类就环拱着假山和池塘布置起来。佩弦虽是中年人，而且身子比较胖，却还有小孩的心性，看见假山总想爬。我是幼年时候爬熟了这几座假山了，现在再没有这种兴致，只是坐定在一处地方对着假山看看而已。

假山实在算不得一件好看的东西。乱石块堆叠起来，高高低低，凹凹凸凸，且不说天下决没有这样的山，单说阳光照在上面，明一块，暗一块，支离破碎，看去总觉得不顺眼。石块与石块的胶粘处不能不显出一些痕迹，旧了的还好，新修的用了水门汀，一道道僵白色真令人难受。玄墓山下有一景，叫做"真假山"，是山脚露出一些石块，有洞穴，有皱襞，宛如用湖石堆成的一般。胶粘的痕迹自然没有，走近去看还可以鉴赏山石的"皱法"。然而合着玄墓山一起看，这反而成为一个破绽，跟全山的调子不协调。可观的"真假山"，依我的浅见，要算太湖中洞庭西山的石公山了。那里全山是湖石，洞穴和皱襞俯拾即是，可是浑然一气。又有几十丈高的幛壁，比虎丘"千人石"大得多的石滩，真当得上"雄奇"二字。看了石公山再来看花园里的假山，只觉得是不知哪一个石匠把他

的石料寄存在这里罢了。

假山上大都种树木，盖亭子。往往整个假山都在树木的荫蔽之下，而株数并不多，少的简直只有一株。亭子里总得摆一张石桌，可以围坐几个人，一座亭子镇压着整个所谓“山峰”也是常有的事。这就显得非常不相称。你着眼在山一方面，树木和亭子未免太大了，如果着眼在树木和亭子一方面，山又未免小得可笑了。《浮生六记》里的《闲情记趣》开头说：

> 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观。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邱，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这不失为很好的幻想。作者所以能“怡然称快”，“怡然自得”，在乎比拟得相称。以烟为云，自不妨以蚊为鹤；以丛草为树林，以土砾为邱壑，自不妨以虫蚁为走兽。假若在蚊帐中“徐喷以烟”，而捕一只麻雀来让它逃来逃去，或者以丛草为树林，而让一只猫蹲在丛草之上，这就凝不成“青云白鹤”和“林壑幽深”的幻想，也就无从“怡然”了。假山上长着大树，盖着亭子，情形正跟上面所说的相类。不相称的东西硬凑在一起，只使人觉得是大树长在乱石堆上，亭子盖在乱石堆上而已。

据说假山在花园中起障蔽的作用。如果全园的景物一目了然，东边望得到西边，南边望得到北边，那就太不曲折，太没有深致了。有假山障蔽着，峰回路转，又是一番景象，这才引人入胜。这个话当然可以承认，而且有一些具体的例子

证明这个作用的价值。顾家的怡园，靠西一带假山把全园的景物遮掩了，你走到假山的西边去，回廊和旱船显得异常幽静，假山下的一湾水好像是从远处的泉源通过来的（其实就是荷花池中的水），引起你的遐想。还有，拙政园的进园处类似从前衙署中的二门，如果门内留着空旷处所，从园中望出来就非常难看。当初设计的人为弥补这个缺陷，在门内堆了一座假山，使你身在园中简直看不见那一道门。可见假山的障蔽作用确有它的价值。然而障蔽不一定要用假山。在园林建筑上，花墙极受重视，也为它的障蔽作用。墙上砌成各式各样的镂空图案，透着光，约略看得见隔墙的景物。这种"隔而不隔"的手法，假若使用得适当，比较堆假山作障蔽更有意思。此外，丛树也可以作障蔽之用。修剪得法，一丛树木还可以当一幅画看。用假山，固然使花园增加了曲折和深致，但是也引起了一堆乱石之感。利弊相较，孰轻孰重，正难断言。

依传统说法，假山并不重在真有山林之趣，假山本来是假山。路径的盘曲，层次的繁复，凡是山上所有的景物，如绝壁，危梁，岩洞，石屋，应有尽有，正合"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谚语，在这等地方，显出设计的人的匠心。而假山的可贵也就在此。有名的狮子林，大家都说它了不起，就为那假山具有上面所说的那些条件。我小时候还没到过狮子林，长辈告诉我说，那里的假山曲折得厉害，两个人同在山上，看也看得见，手也握得着，但是他们要走到一条路上，还得待小半天呢。后来我去了，虽然不至于小半天，走走的确要好些时间。沿着高下屈曲的路径走，一路上遇见些"具体而微"的山上应有的景物。总之是层次多，阻隔多。就从这个诀窍，

产生了两个人看得见而不能立刻碰头的效果。要堆这样一座假山当然不是容易事，不比建筑整整齐齐的房屋，可以预先打好平面和剖面的图样。这大概是全凭胸中的一点意象，堆上了，看看不对就卸下，卸下了，想停当了，再堆上，这样精心经营，直到完工才得休歇。然而不容易的事不一定做成功具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在芝麻大的一粒象牙上刻一篇《陋室铭》，难是难极了，可是这东西终于是工匠的制品，无从列入艺术之林。你在假山上爬来爬去，只觉得前后左右都是石块，逼窄得很。遇见一些峭壁悬崖，你得设想自己缩到一只老鼠那样小才有味。如果你忘不了自己是个人，让躯体跟峭壁悬崖对照，那就像走进了小人国一般，峭壁悬崖再没有什么气魄，只见得滑稽可笑了。爬到“绝顶”的时候，且不说一览宇宙之大，你总要想来一下宽广的眺望吧。但是糟得很，什么堂什么轩的屋顶就挤在你眼前，你可以辨认那遗留在瓦楞上的雀粪。真山真水若是自然手创的艺术品，假山便是人类的难能而不可贵的“匠”制。凡是可以从真山真水得到的趣味，假山完全没有。

看既没有可看，爬又无甚意趣，为什么花园里总得堆一座假山呢？山不可移。叠起一堆乱石来硬叫它山，石块当然不会提抗议。而主人翁便怡然自得，心里想：“万物皆备于我矣，我的花园里甚至有了山。”舒服得无可奈何的人往往喜爱“万物皆备于我”，古董，珍宝，奇花，异卉，美人，声伎，样样都要，岂可独缺名山？堆了假山，虽然眼中所见的到底不是山，而心中总之有了山了，于是并无遗憾。兴到时吟吟诗，填填词，尽不妨夸张一点儿，“苍崖千丈”呀，“云气连山”呀，

写上一大套征求吟台酬和，作为消闲的一法。这不过随便揣想罢了，从前的绅富爱堆假山究竟是这个意思不是，当然不能说定。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发表

鲁迅先生的精神

瞻仰鲁迅先生的遗容，觉得非常慈祥。然而他的精神是超乎慈祥的。他伟大，他坚强。中华民族将来真个得到解放，必然由于人人有了他那样的精神。看到昨天的送殡的行列，严肃，激昂，六七千人合成一个巨大的集体。又想到各地受他感化的大众，他们虽然不能亲自来送殡，也必然遥寄最真挚的心情，使这个集体无形中扩大到不知多少倍。这样，与其说鲁迅先生的精神不死，不如说鲁迅先生的精神正在发荣滋长，广播到大众的心里。而这个，就是中华民族解放终于能够成功的凭证。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发表

弘一法师的书法

弘一法师对于书法是用过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见到他许多习字的成绩，各体的碑帖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这大概由于他画过西洋画的缘故。西洋画的基本练习是木炭素描，一条线条，一笔烘托，都得和摆在面前的实物不差分毫。经过这样训练的手腕和眼力，运用起来自然能够十分准确，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于是写什么像什么了。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远追随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用着急，凭真诚的态度去摹仿的，自然而然会有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经到了这般地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用了多年的苦功，临摹各体的碑帖，而且是写什么像什么的。

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的哪一家呢？实在指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使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他蕴藉有味。就全幅看，好比一堂温良谦恭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

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笔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上，不容移动一丝一毫。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使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候有点儿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天真，但是一面是原始的，一面是成熟的，那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的话，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

这样浅薄的话，方家或许要觉得好笑，可是我不能说我所不知道的话，只得暴露自己的浅薄了。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发表

骑　马

我小时候，苏州地方还没有人力车，代步的是轿子和船。一些墙门人家的女眷，即便要去的地方就在本城，出门总要依靠这两种交通工具。男人呢，为了比较体面的庆吊应酬，出门大都坐轿子，往城外乡间去上坟访友大都坐船，平时出门，好在至多不过三四条巷，那就走走罢了。

那时候已经通行了脚踏车，可是很少见。骑脚踏车的无非是教会里的外国人，以及到过上海得风气之先的时髦小伙子。偶然看见一个人骑着脚踏车在铺着小石块的路上经过，抖抖抖抖的似乎要把浑身的骨节都震得发酸，在几乎肩贴肩走着的两个人中间，只这么一闪就擦过去了：这使大家感到新奇，不免停了脚步回过头去望那好像只有一片的背影。

与脚踏车一样需要自己驾驭的，还有驴子和马。可是骑驴子和马，意义不纯在代步，把它当作玩意儿的居多。骑了驴子往玄妙观去吧，骑了马往虎丘去吧，并不为玄妙观和虎丘路远走不动，却在于借此题目尝一尝控纵驰骋的快乐。

一般人对于驴子和马，用两样的眼光来看待。驴子，那长耳朵的灰黑色的畜生，饲养它的只是藉此为生的驴夫，一匹驴子又不值几个钱，所以大家不把它看作奢侈品。无论是谁，骑骑驴子，还不至于惹人非议。马，那昂然不群的畜生，

可不同了，虽然多数的马也由马夫饲养，但是很有几个浮华的少爷名门的败家子也养着马，所以大家都把马看作要不得的奢侈品。谁如果骑着马在路上经过，有些相识的人就不免窃窃私议，某人堕落了，他竟骑起马来了。这种想法，在别的事例上也常常可见。从前我们地方一些规矩人都不爱穿广东的拷绸，因为拷绸是所谓“流氓”之类惯用的衣料。马既是浮华的少爷名门的败家子的玩意儿，规矩的有教养的人当然不应该骑：这好像是很周密的推理。

当时我们一班中学生可没有顾到这一层，一时高兴，竟兴起了骑马的风尚。原由是有一个同学在陆军小学呆过一年，他会骑马，把骑马的趣味说得天花乱坠，大家听得痒痒的，都想亲自试一试。刚好学校近旁有一片兵营里的校场，校场东边是一条宽阔的道路，两旁栽着柳树，正是试马的好所在。马夫养马的草棚又正在校场的西北角，花一角钱，就可以去牵一匹出来，骑它一个钟头。于是你也去试骑，我也去试骑，最盛的时候竟有二十多人同时玩这宗新鲜玩意儿。

现在马背上大都用西式皮鞍子了，从前却用木鞍子。十三四岁的人，站在平地，头顶就高出木鞍子不多，要用两手按着鞍子，左脚踏在踏镫里，让身子顺势一耸跨上马背，这是一连串并不容易的动作。马好像知道骑马的人本领的高低似的，生手跨上去，它就歪着头只是将身子旋转，这又是很难制服的。这当儿，马夫和朋友的帮助自属必要了，拉缰绳的拉缰绳，托身子的托身子，一阵子的乱嚷嚷，生手居然坐上了鞍子。于是把缰绳接在手里，另一只手按着鞍子，再也不敢放松。那畜生如果是比较驯良的，以为一切都已停当，背

规规矩矩走这么几步，初学的人就心花怒放了。

但是这样按着鞍子骑马叫做“请判官头”，是最不漂亮的姿势。多骑了几回，自然想把手放松，不再去“请”那“判官头”。同时拉缰绳的一只手也要学着去测验马的“口劲”，试探马的脾气，准备在放松一点儿或是扣紧一点儿的几微之间操纵胯下的畜生。

通常以为骑马就是让屁股服服贴贴坐在鞍子上。其实不然，得在大腿里侧用劲，把马背夹住，屁股部分却是脱空的。如果不用腿劲，在马“跑开”的时候不免要倒翻下来，两只脚虽然踏在踏镫里，也没有多大用处。这腿劲自然要从锻炼得来。我骑了好几回马，腿劲未见增强多少，可是站到地上，坐到椅子上，只觉得两条腿和腰部都是僵僵的了。

让马走慢步，称为“骑老爷马”，最没有趣味。那是一步一拍的步调，马头一颠一颠的，与婚丧的仪仗中执事人员所骑的马一样。我们都不爱“骑老爷马”，至少得叫它“小走”。“小走”是较为急促的步调，说得过甚些，前后左右四个蹄几乎同时离地，也几乎同时着地。各匹马的脾气不同，有的须把缰绳放松，有的却须扣紧；有的须略一放松随即扣紧，有的却须向上一提，让它的头偏左或是偏右一点儿；只要摸着它的脾气，它就会了意，开始“小走”了。好的马四条腿虽然在急速的运动，身子可绝不转侧，总是很平稳的前进。骑到这样的马是一种愉快，挺着身躯，平稳的急速的向前，耳朵旁边响着飕飕的风，柳树的枝条拂着头顶和肩膀，于是仿佛觉得跑进了古人什么诗句的境界中了。

至于“跑开”，那又是另一种步调：前面两个蹄同时着地，

随即后面两个蹄离地移前，同时着地，接着前面两个蹄又同时跨出去了。这里所谓着地实在并不“着”，只能说是非常轻快的在地上“点”一下。在前面两个蹄点地和后面两个蹄点地之间，时间是极其短促的。这当儿，马身一高一低，约略成一条曲线前进。骑马的人一高一低的飞一般的向前，当然爽快不过，有凌云腾空的气概。但是腿劲如果差点儿，这种爽快很难尝试，尝试的时候不免要吃亏。

有一回，我就这样从马上摔了下来。那一天，我跟在那个进过陆军小学的同学的后面，在我背后还有好几匹马。起初是“小走”，忽然前面的那个同学把缰绳一扣，他的马开始“跑开”了。我的马立即也换了步调。我没有提防，大概马跑了两三步，我就往左侧里倒翻下来。后面的几匹马怎么一脚也不曾踩着我，我至今还不明白。当时如果有一个马蹄踩着我的脑壳或是胸膛，我的生命早在中学二年级时候结束了。

我摔了下来就不省人事，醒来的时候，很觉得奇怪，我是通学生，怎么睡在寄宿舍里的一张床上！又好像时间很晚了，已经吃过晚饭。其实还是上午十一点过后，我只昏迷了一点钟多一点儿。想了一会，才把刚才的事想起来。坐起来试试，居然没有什么痛苦，只觉得浑身软软的，像病后起身的光景。我赶紧跑回家，像平时一样吃午饭，绝不提摔交的事——在外面骑马，我从来不曾在父母面前提起过。直到前几年，儿子在外面试着骑马，回来谈他的新经验，我才把那回摔交的事说出来。母亲听了，微皱着眉头说：“你不回来说，我们在家里哪里知道。这种危险的事，还是不要去试的好。”她现在为孙儿担心了。

当时我们骑马，现在想起来，在教师该是桩讨厌的事儿。那时候学校比较放任，校长是一个自以为维新的人物，虽然不曾明白提倡骑马，对于其他运动却颇着力鼓励。七八匹马在学校墙外跑过，铃声蹄声闹成一片，他不会绝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禁止呢？大概以为这也是一项运动，不妨任学生去练习吧。但是多数教师却受累了。他们有一般人的偏见，以为骑马是不端的行为，眼睁睁的看学生骑着马在旁边跑过，总似乎有失体统。于是有故意低着头走过去，假作不知道马背上是什么人的，也有远远望见学生的马队在前面跑来，立刻回身，或者转向从别一条路走去的。他们一定在怨恨学生，为什么不肯体谅教师，离开学校远一点儿去练习你们的骑术呢！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

书　桌

十多年前寄居乡下的时候，曾经托一个老木匠做一张书桌。我并不认识这个老木匠，向当地人打听，大家一致推荐他，我就找他。

对于木材，我没有成见，式样也随便，我只要有一张可以靠着写写字的桌子罢了。他代我作主张，用梧桐，因为他那里有一段梧桐，已经藏了好几年，干了。他又代我规定桌子的式样。两旁边的抽屉要多少高，要不然装不下比较累赘的东西。右边只须做一只抽屉，抽屉下面该是一个柜子，安置些重要的东西，既见得稳当，取携又方便。左右两边里侧的板距离要宽些，要不然，两个膝盖时时触着两边的板，就感觉局促，不舒服。我样样依从了他，当时言明工料价六块钱。

过了一个星期，过了半个月，过了二十多天，不见他把新书桌送来。我再不能等待了，特地跑去问他。他指着靠在阴暗的屋角里的一排木板，说这些就是我那新书桌的材料。我不免疑怪，二十多天功夫，只把一段木头解了开来！

他看出我的疑怪，就用教师般的神情给我开导。说整段木头虽然干了，解了开来，里面还未免有点儿潮。如果马上拿来做家伙，不久就会出毛病，或是裂一道缝，或是接榫处松了。人家说起来，这是某某做的“生活”，这么脆弱不经用。

他向来不做这种"生活"，也向来没有受过这种指摘。现在这些木板，要等它干透了，才好动手做书桌。

他恐怕我不相信，又举出当地的一些人家来，某家新造花厅，添置桌椅，某家小姐出阁准备嫁妆，木料解了开来，都搁在那里等待半年八个月再上手呢。"先生，你要是有功夫，不妨到他们家里去看看，我做的家伙是不容它出毛病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黄浊的眼睛放射出夸耀的光芒，宛如文人朗诵他的得意作品时候的模样。

我知道催他快做是无效的，好在我并不急急，也就没说什么催促的话。又过了一个月，我走过他门前，顺便进去看看。一张新书桌站在墙边了，近乎乳白色的板面显出几条年轮的痕迹。老木匠正弯着腰，几个手指头抵着一张"沙皮"，在磨擦那安抽屉的长方孔的边缘。

我说再过一个星期，大概可以交货了吧。他望望屋外的天，又看看屋内高低不平的泥地，摇头说："不行。这样干燥的天气，怎么能上漆呢？要待转了东南风，天气潮湿了，上漆才容易干，才可以透入木头的骨子里去，不会脱落。"

此后下了五六天的雨。乡下的屋子，室内铺着方砖，每一块都渗出水来，像劳工背上淌着汗。无论什么东西，手触上去总觉得粘粘的。穿在身上的衣服也散发出霉蒸气。我想，我的新书桌该在上漆了吧。

又过了十多天，老木匠带同他的徒弟把新书桌抬来了。栗壳色，油油的发着光亮，一些陈旧的家具有它一比更见得黯淡失色了。老木匠问明了我，就跟徒弟把书桌安放在我指定的地位，只恐徒弟不当心，让桌子跟什么东西碰撞，因而擦掉

一点儿漆或是划上一道纹路，他连声发出“小心呀”“小心呀”的警告。直到安放停当了，他才松爽地透透气，站远一点儿，用一只手摸着长着灰色短须的下巴，悠然地鉴赏他的新作品。我交给他六块钱，他随便看了一眼就握在手心里，眼光重又回到他的新作品。最后说：“先生，你用用看，用了些时，你自然会相信我做的家伙是可以传子孙的。”他说到“我做的家伙”，夸耀的光芒又从他那黄浊的眼睛放射出来了。

以后十年间，这张书桌一直跟着我迁徙。搬运夫粗疏的动作使书桌添上不少纹路。但是身子依旧很结实，接榫处没有一点儿动摇。直到“一二八”战役，才给毁坏了。大概是日本军人刺刀的功绩。以为锁着的柜子里藏着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东西，前面一刀，右侧一刀，把两块板都划破了。左边只有三只抽屉，都没有锁，原可以抽出来看看的，大概因为军情紧急吧，没有一只一只抽出来看的馀裕，就把左侧的板也划破了，而且拆了下来，丢在一旁。

事后我去收拾残馀的东西。看看这张相守十年的书桌，虽然像被残害的尸体一样，肚肠心肺都露出来了，可是还舍不得就此丢掉。于是请一个木匠来，托他修理。木匠说不用抬回去，下一天带了材料和家伙来修理就是了。

第二天下午，我放工回家，木匠已经来过，书桌已经修理好了。真是看了不由得生气的修理！三块木板刨也没刨平。边缘并不嵌入木框的槽里，只用几个一寸钉把木板钉在木框的外面。涂的是窖煤似的黑漆，深一搭，淡一搭，仿佛还没有刷完工的黑墙头。工料价已经领去，大洋一块半。

我开始厌恶这张书桌了。想起制造这张书桌的老木匠，他

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简直使缺少耐性的人受不住，然而他做成的家伙却是无可批评的。同样是木匠，现在这一个跟老木匠比起来，相差太远了。我托他修理，他就仅仅按照题目做文章，还我一个修理。木板破了，他给我钉上不破的。原来涂漆的，他也给我涂上些漆。这不是修理了吗？然而这张书桌不成一件家伙了。

同样的事在上海时时会碰到。从北京路那些木器店里买家具，往往在送到家里的时候就擦去了几处漆，划上了几条纹路。送货人有他的哲学。你买一张桌子，四把椅子，总之送给你一张桌子，四把椅子，决不短少一件。擦去一点儿漆，划上几条纹路，算得什么呢！这种家具使用不久，又往往榫头脱出了，抽屉关不上了，叫你看着不舒服。你如果去向店家说话，店家又有他的哲学给你作答。这些家具在出门的时候都是好好的，总之我们没有把破烂的东西卖给你。至于出门以后的事，谁管得了！这可以叫做“出门不认货”主义。

又譬如冬季到了，你请一个洋铁匠来给你装火炉。火炉不能没有通气管子，通气管子不能没有支持的东西，他就横一根竖一根地引出铅丝去，钉在他认为着力的地方。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窗框上。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天花板上。达，达，达，一个钉子钉在墙壁上。可巧碰着了砖头，钉不进去，就换个地方再钉。然而一片粉刷已经掉了下来，墙壁上有了伤疤了。也许钉了几回都不成功，他就凿去砖头，嵌进去一块木头。这一回当然钉牢了，然而墙壁上的伤疤更难看了。等到他完工，你抬起头来看，横七竖八的铅丝好似被摧残的蜘蛛网，曲曲弯弯伸出去的洋铁管好似一条呆笨的大

蛇，墙壁上散布着伤疤好像谁在屋子里乱放过一阵手枪。即使火炉的温暖能给你十二分舒适，看着这些，那舒适不免要打折扣了。但是你不能怪洋铁匠，他所做的并没有违反他的哲学。你不是托他装火炉吗？他依你的话把火炉装好了，还有什么好说呢？

倘若说乡下那个老木匠有道德，所以对于工作不肯马虎，上海的工匠没有道德，所以只图拆烂污，出门不认货，不肯为使用器物的人着想，这未免是拘墟之见。我想那个老木匠，当他幼年当徒弟的时候，大概已经从师父那里受到熏陶，养成了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了吧。而师父的师父也是这么一丝不苟的，从他的徒孙可以看到他的一点儿影象。他们所以这样，为的是当地只有这么些人家做他们永远的主顾，这些人家都是相信每一件家伙预备传子孙的，自然不能够潦潦草草对付过去。乡下地方又很少受时间的催迫。女儿还没订婚，嫁妆里的木器却已经在置办了。定做了一件家具，今天拿来使用跟下一个月拿来使用，似乎没有什么分别，甚至延到明年拿来使用也不见得怎样不方便。这又使他们尽可以耐着性儿等待木料的干燥和天气的潮湿。更因主顾有限，手头的工作从来不会拥挤到忙不过来，他们这样从从容容，细磨细琢，一半自然是做“生活”，一半也就是消闲寄兴的玩意儿。在这样情形之下做成的东西，固然无非靠此换饭吃，但是同时是自己精心结撰的制作，不能不对它发生珍惜爱护的心情。总而言之，是乡下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了老木匠的那种态度。

都市地方可不同了。都市地方的人口是流动的，同一手艺的作场到处都有，虽不能说没有老主顾，像乡下那样世世

代代请教某一家作场的老主顾却是很少的。一个工匠制造了一件家具，这件家具将归什么人使用，他无从知道。一个主顾跑来，买了一两件东西回去，或是招呼到他家里去为他做些工作，这个主顾会不会再来第二回，在工匠也无从预料。既然这样，工作潦草一点儿又何妨？而且，都市地方多的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每一件东西预备传子孙的观念，都市中人早已没有了(他们懂得一个顶扼要的办法，就是把钱传给子孙，传了钱等于什么都传下去了)。代替这个观念的是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住亭子间的人家新搬家，看看缺少一张半桌，跑出去一趟，一张半桌载在黄包车上带回来了，觉得很满意。住前楼的文人晚上写稿子，感到冬天的寒气有点儿受不住，立刻请个洋铁匠来，给装上个火炉。生起火炉来写稿子，似乎文思旺盛得多。富翁见人家都添置了摩登家具，看看自己家里还一件也没有，相形之下不免寒伧，一个电话打出去，一套摩登家具送来了。陈设停当之后，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招一些朋友来叙叙。年轻的小姐被邀请去当女傧相了，非有一身"剪刀口里"的新装不可，跑到服装公司里，一阵的挑选和叮嘱，质料要时髦，缝制要迅速，临到当女傧相的时刻，心里又骄傲又欢喜，仿佛满堂宾客的眼光一致放弃了新娘而集中在她一个人身上似的。当然，"想要什么"而不能"立刻有什么"的人居大多数，为的是钱不凑手。现在单说那些想要什么立刻有什么的，他们的满足似乎只在"立刻有什么"上，要来的东西是否坚固结实，能够用得比较长久，他们是不问的。总之，他们都是不嫌工作潦草的人。主顾的心理如此，工匠又何苦一定要一丝不苟？都市地方有一些大厂家，设着验工的

部分，检查所有的出品，把不合格的剔出来，不让它跟标准出品混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出品为要求形质并重的人所喜爱。但是这种办法是厂主为要维持他那“牌子”的信用而想出来的，在工人却是一种麻烦，如果手制的货品被认为不合格，就有罚工钱甚至停工的灾难。现在工厂里的工人再也不会把手制的货品看做艺术品了。他们只知道货品是玩弄他们生命的怪物，必须服侍了它才有饭吃，可是无论如何吃不饱。——工人的这种态度和观念，也是都市地方的一切生活方式形成的。

近年来乡下地方正在急剧地转变，那个老木匠的徒弟大概要跟他的师父以及师父的师父分道扬镳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发表

重看《今日的苏联》

这个影片没有故事，可是包含着一个最伟大的故事，就是苏联全体的人怎样运用着心思和气力，把一个全新的国家建设起来，巩固起来，成为世界的夸耀。

森林的利用，煤的发掘，钢铁的锻炼，运河的开凿，农作的机械化，果品的人工培养，人力和自然搏斗，终于战胜了自然。听到机械的声响，宛如听到雄壮的凯旋歌，而农场上农人的合唱以及果园中少女的笑声，更使人觉得这中间蕴蓄着世界上最真实的欢乐。

休闲生活的多方面发展，竞技表演的集体化，儿童教养的特别被重视，军备和军力突飞猛进，在群体中间，每一个人的生活健全而丰富。这样的人集合而成的群体，当然谁也不能把它动摇。而儿童是群体的持续者，要使群体在进化的路上不断前进，自当让儿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享受超过他们的前一代。

由这个伟大的故事，造成今日的苏联。

自从"八一三"战事爆发以后，我没有踏进过电影院。并不是怕人骂我全没心肝，实在觉得在这全面抗战期间，去看一些悲欢离合个人生活的平庸影片，与心情太不相应了。但是今天《今日的苏联》在汉口试映，虽然我在上海已经看过一次，

还是很高兴的跑去重看。像这样的影片，如果不是抱了消遣的目的去看，看三回看四回也不嫌其多。

现在，各方战区中的种种建设，都被敌人的飞机大炮摧毁了。我们要在最近的将来，在瓦砾堆中重行建设更完美的文明。非战区中的种种事业，事实上是全面抗战的必要的支持。我们要加几倍的努力，使后方的成绩和前方的战事相应。对于抗战，固然要勇敢和坚强，对于物质上精神上的建设，也要同样的勇敢和坚强，这才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完成复兴的大业。

而这个《今日的苏联》影片，对于心理上决不失败的我们，正是一个借镜，一服兴奋剂。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发表

附录：

原《未厌居习作》自序

我的散文曾经在十年前和俞平伯先生的散文合在一起，取名《剑鞘》，由朴社出版。以后写的，经过一番选剔，取名《脚步集》，由新中国书局出版。集子出版之后，自己看看，总觉得像个样子的文篇不多，淘汰还不见得干净，引起深切的惭愧。最近两三年来，又写了一些散文。朋友劝说，不妨再来一本。我就把这些新作也选剔一番，再把《剑鞘》和《脚步集》里比较可观的几篇加进去，又补入当时搜寻不到的几篇，成为这一本集子。

我常常想，有志绘画的人无论爱好什么派别，或者预备开创什么派别，他总得从木炭习作入手。有志文艺的人也一样，自由自在写他的经验和意想就是他的木炭习作。无奈我们从前的国文教师不很留心这一层，所出题目往往叫我们向自己的经验和意想以外去找话说，这使我们在技术修练上吃了不小的亏。吃了亏只有想法补救，有什么经验就写，有什么意想就写，一方面可以给人家看看，一方面就好比学画的描画一个石膏人头。即使没有大的野心，不预备写什么传世的大作，这样修练也是有益的。能把自己的经验和意想畅畅快快地写出来，在日常生活上就有不少的便利。我是存着这种想头写这些散文的，所以给这一本集子取了个“习作”的名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

编　后　记

作者写散文的年头最长，发表的篇数最多。现在把谈文学创作的、谈教育工作的、谈语文教学的、谈编辑出版工作的挑了出来，分别归类，编入以后各卷，其馀的四百来篇散文按写作或发表的先后，编成六集：新中国成立前四集，新中国成立后两集。

第五卷收入的《脚步集》和《未厌居习作》是散文的头两集。《脚步集》的最后一篇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年底，正是大革命的前夜。《未厌居习作》的最后一篇发表于一九三七年年底，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了。

一九三一年，新中国书局出版过作者自编的《脚步集》，收散文十篇，小说两篇；一九三五年，开明书店出版过作者自编的《未厌居习作》，收散文三十六篇。现在这两集散文只是沿用了那两本旧集子的名称，从所收的范围和篇数看，都不同于那两本旧集子。把作者为那两本旧集子的《自记》和《自序》作为附录，为的是便于读者比照。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叶圣陶集
作者＝
页数＝４５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